



# 安源

— 發掘中國革命之傳統 —

裴宜理 (Elizabeth J. Perry) 著

閻小駿 譯

# 安源

## 發掘中國革命之傳統

裴宜理 (Elizabeth J. Perry) 著

閻小駿 譯



香港大學出版社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安源

香港大學出版社  
香港薄扶林道香港大學  
[www.hkupress.org](http://www.hkupress.org)

© 香港大學出版社 2014

© 2012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ISBN 978-988-8208-06-7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圖片，  
如未獲香港大學出版社允許，  
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10 9 8 7 6 5 4 3 2 1

百樂門印刷有限公司承印



# 目錄

譯序	vii
致讀者	xi
致謝	xv
緒論	1
1. 革命預演	15
2. 教導革命：1922年罷工	41
3. 中國的小莫斯科	69
4. 從動員群眾到軍事武裝鬥爭	109
5. 築造革命傳統	135
6. 毛澤東最後的征戰：淨化革命傳統	181
7. 革命傳統發生變革	217
結論	249
註釋	263

# 譯序

恩師裴宜理教授的新作《安源：發掘中國革命之傳統》（以下簡稱《安源》）之繁體中文譯本即將由香港大學出版社付印，與廣大讀者見面，我感到十分欣慰。裴宜理教授是哈佛大學亨利·羅佐夫斯基政治學講席教授，現任哈佛燕京學社社長。若從裴宜理教授 2004 年第一次到訪江西安源算起，這本著作已凝聚了她將近八年的心血和研究成果，其學術意義自不待言。相信此次中文譯本的出版會得到兩岸三地及海外中文讀者的熱切歡迎。

正如很多讀者知道的那樣，裴宜理教授出生於上海，她的父母均長期任教於聖約翰大學。家庭的影響和幼年的記憶，使得裴宜理教授對於中國政治——尤其是中國近現代革命及社會運動——產生了極大興趣。從研究淮北的農民起義和革命開始，裴宜理教授在其三十餘年的學術生涯中，目光始終未曾離開過中國底層社會的革命者。她早年對淮北農民起義的研究，審視了該地區的捻軍運動、紅槍會和共產主義革命之間的相似之處，揭示了波瀾壯闊的中國社會運動之下所蘊含的結構性動力。她對上海工人運動的研究，解構了「階級」這一傳統概念，重新詮釋了階級構成與社會運動之間的複雜關係，提出了「不同的工人具有不同的政治」這一著名論斷。她對文化大革命中的上海工人運動的研究，則把對「工人階級」這一概念的解構引入到「文革」的特殊場域之中，探究了不同工人群體在這場聲勢浩大的革命運動中的不同反應和行為模式，從而揭示了「文革」這個史無前例的社會運動得以爆發所依託的社會基礎和社會動力。她對上海民兵的研究，則從全新的角度解讀中國革命所蘊含的政治與社會意義，提出革命性的社會運動亦可成為構建現代國家以及重新塑造國家與社會之間關係的重要工具。在這些主要著作之外，裴宜理教授也對中國革命中的情感

因素、中國的「單位」體制、中國的革命傳統及系列重要反叛行動（如捻軍起義、黃崖教案等）、中國改革時期的社會運動、基層政府改革以及毛澤東時代的政治遺產等諸多極為重要的理論和現實問題進行過深入和細緻的研究，並形成了大量的經典學術成果。

《安源》一書是繼裴宜理教授多年以來對中國革命深入研究和思考之後的又一部力作。在這部重要著作中，裴宜理教授將關注轉移到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源頭——安源煤礦。這部在敘事上跨越近一個世紀的著作，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開始娓娓道來，一直講到二十一世紀初期「紅色旅遊」為安源工人生活帶來的諸多新的變化。通過講述安源煤礦近一百年的革命歷程，裴宜理教授在本書中深入解析了文化在革命運動中的重要意義。她在本書中提出的兩個核心概念——「文化置位」(cultural positioning) 和「文化操控」(cultural patronage) ——為社會運動的研究提供了一個極為深刻的分析架構。「文化置位」揭示了革命的組織者與領導者如何通過對地方文化（包括語言、文學、藝術、符號象徵、社會意識、社會組織形態）的適應和運用來發起革命、完成動員、爭取支持以及將革命不斷引向深入。而「文化操控」則揭示了在革命國家建立之後，革命的領袖又如何通過對文化（話語、符號、象徵等）的控制與再解讀來鞏固政治權力和將政治權力神聖化。在這兩個過程中，文化（特別是社會文化）成為革命運動的核心工具和核心組件——這個新的理論框架對於中國革命的研究，以及社會運動基礎理論的發展都勢將產生極為重要的影響。我相信本書的理論意義將隨着時間的推移和相關研究的深入而不斷展現出來。

完成本書的中文翻譯，對我來說亦是一次回顧之旅。2003年冬天當裴宜理教授最初形成本書的研究設想時，我剛剛通過博士資格考試，正式投入裴宜理教授門下。十年中，我有幸耳聞目睹恩師從事安源工人運動的研究與寫作，在此難得的經歷中所學、所獲良多。因此我尤其希望本書中文譯本的面世能夠對兩岸三地的廣大讀者也有所裨益。在本書的翻譯過程中，香港大學的江維康、陳昊瀚、陸趙郢、馮智瀛同學參加了部分章節的初譯工作。國立政治大學的李嘉同學和香港大學的江維康同學協助核對了部分章節的初譯稿。香港大學的司徒禮梵同學協助整理了全書譯稿的格式。哈佛大學政府系博士研究生高歡同學校對了全書譯稿。裴宜理教授



的行政助理、哈佛燕京學社項目主任林希宜女士 (Lindsay Strogatz) 惠予幫助處理了本書所有圖片資料的版權事宜。裴宜理教授親自協助查對了部分中文檔案的原文，並審讀譯稿全文。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系主任（現任港大社會科學學院副院長）林維峯教授及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卜約翰教授 (John P. Burns) 分別在 2010 年和 2012 年盛情邀請和安排裴宜理教授訪問港大、並向來自兩岸三地的聽眾發表有關安源革命運動研究的公開演講。香港大學出版社的梁倩儀小姐、王建玲女士及前任社長 Michael Duckworth 為本書的出版和編輯所付出的辛勤工作及給予的大量協助，對我而言更是至關重要的支持和幫助。在此我謹表示衷心謝意。

由於本人的水平、學識均屬有限，雖經反覆校讀，此譯本中仍存在的錯漏，除完全由本人負責外，也請廣大讀者不吝指正。

閻小駿  
於香港薄扶林  
2014 年 1 月



# 致讀者

何為中國革命傳統？這一傳統在當代中國政治中又扮演何等角色？這些問題均難以簡單回答。但僅就頗為重要的一點而言，相較諸多曾經歷革命鬥爭而誕生的國家，中國革命之歷史顯得更為複雜，且充滿劇烈震盪。

數年前當我初次遊歷古巴時，隨處可見紀念古巴革命傳統的海報與布告牌，其數目之眾多實在令我感到震撼。不論普通民眾抑或政府官吏，凡我所遇，談話間皆屢屢提及「古巴革命」。在古巴政治文化及話語中，革命傳統竟具如此突出之耀眼地位，令我好奇不已。於是我詢問普通古巴民眾，希望了解革命傳統對於他們而言究竟意義如何。十分有趣的是，幾乎所有被問到的古巴人都給予我幾乎一致的答案，即他們認為，古巴革命意味着全體古巴人民能夠享有免費教育和免費醫療。

對於如此近乎眾口一辭的回答，我實在驚嘆。所以在返回美國後，我也向自己的美國同胞提出同樣的問題。無獨有偶，當被問及何為美國革命傳統時，美國人亦給出了全然一致的答覆，這個答覆與我在古巴聽到的答覆內容迥然相異。美國人民所談及的不是諸如教育或醫療等社會權利，而是民權。我們將自己的革命傳統與諸種自由權利緊密相聯——例如，宗教自由、言論自由、集會自由以及新聞自由等等。

隨後，我在訪問中國時，也向許多中國人詢問中國革命傳統究竟對於他們具有何等意義。然而大部分中國人面露尷尬，遲疑作答——他們真的不甚明瞭。而為數不多作出明確答覆的中國人對於革命傳統的評論幾乎全屬負面之語。他們認為，中國的革命傳統即等同於暴力、混亂和階級鬥爭。

一方面，這些中國民眾如此回答並不令人意外。革命之所以為革命，其定義即是暴力、混亂和殘酷。而中國革命比世界歷史上大多數革命尤顯

血腥。然而，另一方面，這些回答令人唏噓，寓含徵兆，使我觸動。這些回答之所以令人唏噓，是因為數以百萬計的中國人民為革命事業犧牲了生命。難道那數百萬人的生命不過是無謂的犧牲，毫無可資紀念或激勵的意義？這些回答之所以寓含徵兆，原因在於若人們就中國革命對當代政治價值和理念所具之積極作用無一定的共識，則革命尚未結束，故而還可能重又上演。斯如中國，從太平天國運動直到文化大革命，具顛覆與毀滅性的革命反覆發生；另一場流血的反叛動亂重臨中國之可能與麻煩不可低估。

本書以安源煤礦為窗口探究中國革命之傳統。中國共產黨創立後不久，許多中共早期的重要領導人（包括毛澤東、劉少奇以及李立三等人）在安源煤礦積極動員困境中的工人參與革命。彼時中國共產黨缺乏軍事力量，在動員工作中亦運用理想主義，而非暴力手段。毛澤東和他的革命同仁以希望改變勞動階層做牛做馬的處境，以及爭取勞工作為人的存在，來鼓舞激發安源礦工；正如李立三為 1922 年安源工人大罷工制定的口號「從前是牛馬，現在要做人」，便是表達如此的訊息。正是強調做人的尊嚴——而非階級鬥爭——最終激發一萬三千名安源工人發動一場非暴力的、有秩序的罷工運動。此次罷工成為早期中國共產主義革命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在後來的歲月裡，對安源革命傳統的重新解讀或誇大或歪曲真實的歷史事實，以迎合各類不同的個人或政治目的。在安源案例的研究中，我在充滿矛盾且政治化的文獻資料中認真甄別，以尋找可能更具教育意義和更激勵人心的革命遺產寶藏，而非僅僅是暴力、混亂和階級鬥爭。通過本書的寫作，我希望引發人們對中國革命歷史的諸種意義重新進行一番思考。中國革命構成現代世界史的一個主要篇章，所含意義會令世界各地人民感興趣，並認識到其重要性。但是畢竟中國革命的政治重要性，首先要由中國人民自己做結論。故而，本研究——儘管尚有諸多不足和瑕疵——能夠呈現於中文讀者面前，我尤為高興。我非常期待各種批評和指教。

本書的中譯工作是在香港大學政治學系閻小駿教授熱情而專業的領導與統籌下才得以完成。我衷心感謝閻教授及其優秀的學生團隊，不辭辛勞地將我的英文著作譯成清楚明白的中文。閻教授在他職業生涯中最為緊要繁忙的階段，於百忙之中將許多寶貴時間和精力用於本書的翻譯工作，令我甚為感動。此外，我亦要感謝前香港大學出版社社長 Michael

Duckworth，以及出版社編輯人員對於本書出版所作的許多貢獻。即使有如此良好協助，我擔心本書仍不免存有錯漏之處。所有這些失誤皆由本人負責。

裴宜理  
於美國麻省劍橋鎮  
2014年1月



# 致謝

本書緣起於 2003 年冬天一次晚餐時的談話。于建嶸教授發表了多篇關於湖南農村地區農民抗爭的論文，其研究令人留下深刻印象。我拜讀之後便邀請他來哈佛大學圍繞他的研究做一次講座。演講結束後，我們在一家中餐館晚餐。于教授問我是否清楚他為何要來哈佛。「當然，」我回答，「因為正是我邀請你來的呀！」「不，」他反駁道，「因為我想邀請你去安源煤礦！」于建嶸解釋，他本人在安源做田野調查已經有五年，準備就中國工人階級的困境做一項研究。由於讀過我的一本研究上海工人運動的論著，他邀請我與他一起進行一項合作研究項目。我禮貌而明確地婉拒了他的提議，表示我正在着手撰寫一本關於工人赤衛隊的論著，研究項目已經進展到中途，因此無法兼顧其他。我以為故事已到此為止，但是于教授對此並不輕易妥協。數月後，他從北京寫來電子郵件告訴我，為我「即將來臨的」安源之行的安排工作皆已就緒，如此我是盛情難卻。

2004 年 7 月，我第一次到訪安源。我發覺位於江西省的這個煤礦小鎮一切皆如于教授所言：這是一處令人着迷的地方，其豐富而複雜的歷史生動具體地顯現了中國革命傳統眾多重大主題。對於一名以研究農民和工人、過去和現在、領袖和信眾為興趣的學者而言，安源囊括一切。我立刻為之深深着迷。之後的幾個夏季，我和于教授以及其他一些中國學術同仁進行了接續田野調查，我本人亦於 2009 年秋天在安源停留了較長一段時間。這些工作中所收集到的核心史料、檔案資料和訪談材料是這項研究的基礎。我在此向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于建嶸教授深表謝意，他令人難以抗拒的熱情、溫暖的友情、強烈的幽默感以及深邃的洞見令我受益匪淺。若非他的幫助，本書不會問世。

當開始有關安源的研究工作時，我憶起多年前我同南京大學的蔡少卿教授的數次談話。在 1979-1980 年間，我在南大做訪問學者。我十分榮幸在蔡教授（以及茅家琦教授）的指導下進行關於中國秘密會社歷史的研究。那一年中我們時常交談，蔡教授談及他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還是北京大學的一名學生時，曾對安源勞工運動進行了初步的研究。他生動地描述了當年他在北京與散發着領導魅力的李立三訪談時的情形，以及在安源冒險下礦井與礦工們交談的經過。他的講述趣味盎然，也極具啓發性。因這項研究再次請教蔡教授，我感到十分高興。

在這項研究項目的進行過程中，有許多人士和諸多機構提供了寶貴的協助，難以盡表。我在此向所有幫助者深深致謝，同時對未能提及的人或機構深表歉意。這裡我要提及一些幫助者以表示特別的謝意。一些研究生——包括已經畢業的和現正攻讀學位的——對研究工作提供了協助；其中閻小駿（現於香港大學任教）和歐陽斌做了非常重要的協助工作。與江西省萍鄉黨校研究當地黨史的專家黃愛國進行的多次探討，令我增進了對安源歷史的了解。哈佛大學同事汪悅進 (Eugene Wang) 是一位著名的藝術史學家，他一直鼓勵我這個政治學家帶着天真的勁頭冒昧闖進素不熟悉的文化領域；他幫助我找到一些十分珍貴的安源圖片，甚至親自拍攝了一些照片。我的助理 Lindsay Strogatz 提供了一系列極具專業質素的協助，包括搜尋不明確資料的確切來源、製圖、編錄參考文獻等等。我還要特別提及另外一些對最後定稿作出重要貢獻的人士：溫奈良 (Nara Dillon)、馮筱才、Cindy Fulton、Nancy Hearst、Liu Chunyang、Hannah Love、陸雷、藍夢林 (Patricia Thornton)、馬小鶴、Reed Malcolm、任江華、Victor Seow、Hue-Tam Ho Tai、Wang Xiaojing、Jeffrey Wasserstrom、Sharron Wood 和 Yiching Wu。以下機構提供了許多珍貴資料：哈佛燕京圖書館，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圖書館、懷德納圖書館 (Widener Library)、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紀念館檔案館、萍鄉市圖書館、南昌市圖書館、上海市檔案館以及上海市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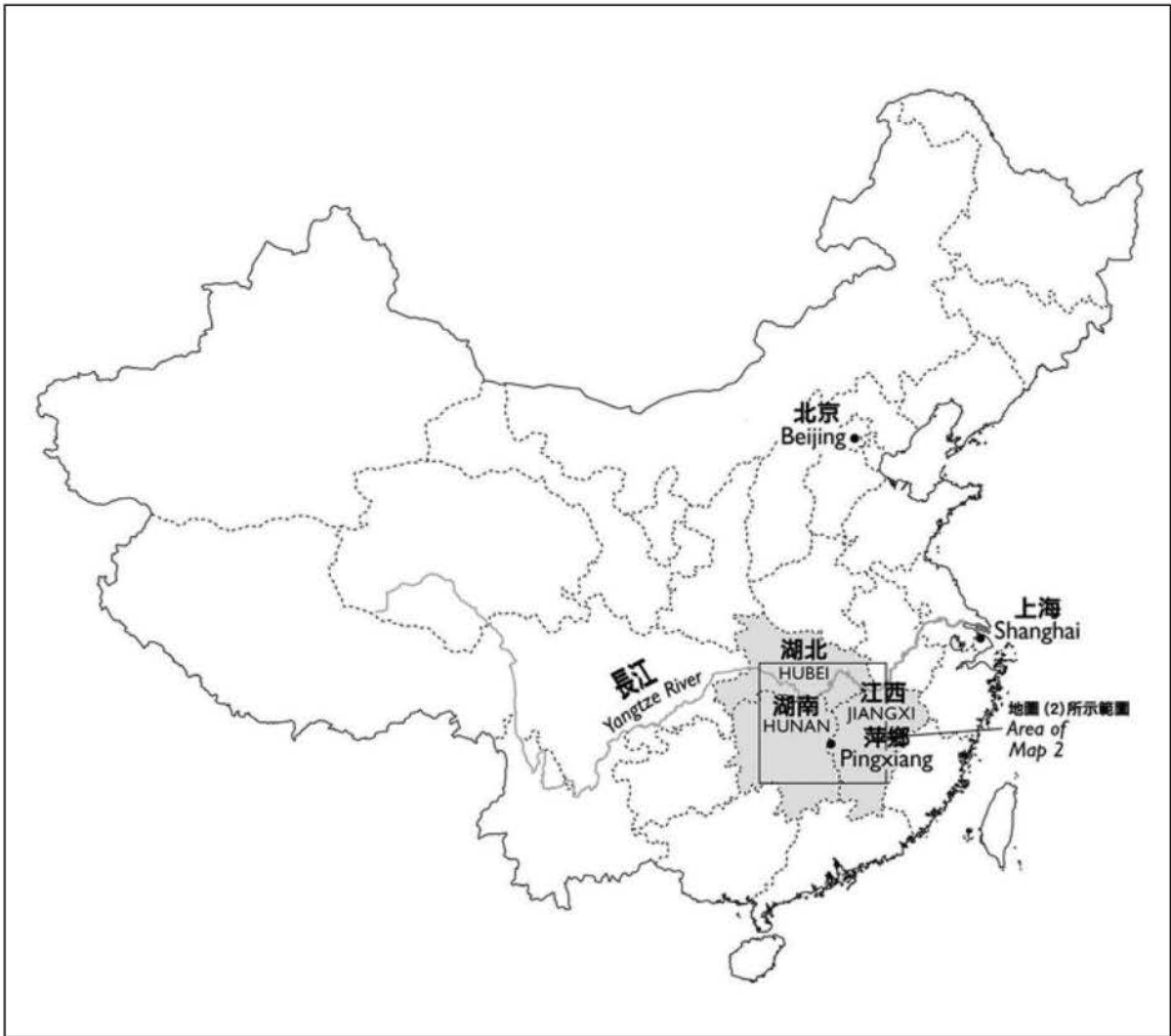
加州大學出版社邀請的三位審稿人均惠准公布他們的身份。他們為本書初稿提供了極為翔實和極具建設性（以及尖銳批評性）的意見，我對他們的嚴格審閱表示感激。這三位審稿人是：周錫瑞 (Joseph Esherick)、Richard Kraus 和 Steve Smith。同時，在本書寫作過程中，我亦在各種學



術論壇上介紹了部分內容，並受益於論壇評講人以及聽眾所提供的許多有幫助的建議。這些學術論壇是由以下機構舉辦的：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耶魯大學、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賓夕法尼亞大學、布朗大學、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香港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復旦大學、華東師範大學、北京大學以及亞洲研究協會。

儘管以上人士和機構為本書的寫作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幫助和指教，本書中仍存的事實和詮釋上的錯誤均由作者本人負責。

本書中的內容曾以“Red Literati: Communist Educators at Anyuan, 1921–1925”為題發表於期刊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32.3 (April 2007): 123–60. 經許可重印，期刊的網上版本見 [www.maney.co.uk/journals/tcc](http://www.maney.co.uk/journals/tcc) 和 [www.ingentaconnect.com/content/maney/tcc](http://www.ingentaconnect.com/content/maney/tcc)；內容亦來自文章“Reclaim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發表於期刊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7 (2008): 1147–64. 經許可重印。



地圖 1

中國地圖，江西萍鄉的位置



地圖 2

萍鄉縣和周邊地區地圖。圓點虛線表示株萍鐵路。



# 緒論

革命傳統 (revolutionary tradition) 這一概念本身即是內在矛盾的。革命旨在顛覆傳統，而非神化及崇拜傳統。然而，經革命之火鍛煉而生的民族國家往往仍營造出關於自身歷史淵源與政治遺產的種種神話。這些神話一方面影響力強大且持久，但另一方面也同樣矛盾難辨、倍受爭議。正如圍繞法國大革命兩百周年紀念不絕於耳的爭論聲音所表明的那樣，後人對於重要如斯的歷史事件背後所蘊涵的複雜意義在數百年後依然各執一詞。<sup>1</sup> 更晚近而言，美國的茶黨運動 (Tea Party Movement) 得名於作為獨立革命導火線的重要事件——波士頓傾茶事件，但其凸顯的是民眾在解讀美國革命遺產上所存在的深刻分歧。<sup>2</sup> 儘管爭論的各方都自稱是國家革命歷史傳統的忠誠守護者，事實上他們卻不外是因當下的議題而起舞。對於革命傳統各自不同的主張和解讀，不僅改變了有關過去事件的陳述，也塑造着現在和未來的政治軌跡。

直面過往的革命歷程、描繪未來的政治圖景——在世界上任何國家完成這一挑戰性任務都不會比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更問題重重，更難以逆料。鋪展中國艱難曲折的革命歷程不僅對中國，亦對整個世界有着巨大的影響與後果。然而，這一過程的未來方向卻不甚清晰：因為事實上並無明確先例或相似事例能輔助我們自信地預測中國共產主義體系的未來命運。從前，中國和蘇聯的共產主義彷彿是出自於共同的革命源頭，並且似乎沿着相似的歷史道路發展演進。而如今，他們發展道路的對比卻再強烈不過。佩里·安德森 (Perry Anderson) 指出：

如果說二十世紀被俄國革命的軌跡所主導甚於其他任何一個事件的話，那麼二十一世紀將會被中國革命的結果所塑型。蘇維埃政權……在七十年之後轟然解體，猶如它創立時一樣迅速……中國

革命的結果卻有着驚人的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走進第七個十年之際已然成為世界經濟的引擎……二十五年來一直保持着最快的人均收入增長速度，擁有着數量最多的人口紀錄……從這一成就的特點和規模來說（當然不止一項）——痛苦而諷刺。然而對比中國和俄國革命的命運，其間的區別則毋庸置疑。<sup>3</sup>

安德森作出此番評論的時候，一方面蘇聯的垮台（二十多年之前）使得俄國革命成為記憶中遙遠的過去；另一方面，中國經濟在一直堅持紀念其革命傳統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展現了驚人的力量，使得中國革命的經驗和傳統再次得到新的關注。

革命的最高領導者毛澤東已於幾十年前辭世，但他的畫像仍然懸掛在象徵中國政治最高點的北京城中心位置的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思想」以革命鬥爭為這位領導人言論的主要觀點，仍然被認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意識形態的核心部分。毛的陵墓——位於天安門廣場城樓的對面——仍然持續吸引着大批觀光者去瞻仰其經過防腐保存的遺體。然而毛澤東的領袖魅力卻不止於京城內，遠在 900 英里外的重慶，這個中國最大的城市不久前又掀起了一股「唱紅歌」的群眾運動，使毛澤東主義的革命文化重獲新生。<sup>4</sup> 確切地說，對毛澤東及其革命思想的崇拜在中國人中遠非普遍現象。<sup>5</sup> 雖則如此，對毛澤東的崇敬還是大大超出了由國家支持的各種活動。一項在中國四十個主要城市展開的民眾宗教信仰調查顯示，近 12% 的城市居民在家中掛毛主席像——這與在家供奉祖先牌位的數量相近，高過在家敬拜佛像的比例（10%），以及供奉財神的比例（9%）。<sup>6</sup> 農村地區對毛澤東革命成就的尊崇就更為直露公開。<sup>7</sup>

毛澤東的激進政策對於現今的中國政治有何確切影響還在爭議之中，但不可否認的是，毛所領導的革命建立起一個強大而統一的國家，並且這個國家現在成為整個世界經濟發展的巨大推動力——這場革命的重要性無可辯駁。<sup>8</sup> 中國共產黨能夠開闢特殊道路的原因到底是甚麼？中國的革命模式是怎樣變得與俄國的樣板原型如此差異巨大，其原因在於何處？革命傳統對於今天的中國人又意味着甚麼呢？

## 毛澤東與共產主義革命

西方學者或記者們近期的著作對毛澤東和他所領導的特殊革命性變革，有意刻畫出一種不良的形象。<sup>9</sup> 最暢銷的一本毛澤東傳記告訴我們，從作為一個政治組織者的早期歲月開始，毛便是一個暴虐和冷酷無情的人，而他的偏激主張與圖謀將會給大多數國人帶來不必要的苦難。<sup>10</sup> 雖然共產主義革命是以中國社會中最貧窮且最弱勢的人民的正義發動的，這個群體卻將因毛澤東的荒唐行為而承受比其他人更多的痛苦與折磨。

這一殘酷的論斷有大量證據支持。<sup>11</sup> 然而，如果情況確實如此，那麼我們該如何解釋毛澤東在尚未掌握強制工具以驅使人民聽命於他之時，是怎樣以傑出的能力使得數以百萬計的國人信服於他，並願為他的革命運動而犧牲呢？我們又該如何解釋普通中國老百姓（尤其是弱勢群體）在他逝世三十多年後的今天，仍對毛主席和他的事跡存有懷念之情呢？毛澤東的領袖魅力，無論是當時還是現在，都是廣義上的革命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今天，這革命傳統仍在以一種突出、甚至時而令人訝異的方式持續，反覆迴響。

與列寧領導的革命不同，毛澤東領導的革命是一個長期的過程。<sup>12</sup> 繼 1911 年創建共和的辛亥革命和 1925–1927 年國民黨發起的國民革命，從 1921 年 7 月中國共產黨建黨開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 1949 年 10 月成立，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經歷長達近三十年的時間才最終獲得政治上的勝利。中國共產黨最初向俄國學習，以城市的無產階級為對象開展運動，但後來被迫從城市轉移到農村，在毛澤東帶領下，形成一支強有力的軍隊，並成功抵抗日本人的侵略 (1937–1945) 和國民黨的進攻 (1946–1949)。解放戰爭的軍事勝利並未終結革命的進程。毛主席「將革命進行到底」的號召，落實到行動上即成為從五十年代早期的土地改革和婚姻法，推廣到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 (1966–1976) 一系列動盪不寧的群眾運動。毛澤東畢生致力於開創和培育一個全新的革命文化。雖然這工程直至 1976 年他逝世時仍未完成，然而其影響卻並非無足輕重。

中國革命歷程的起落變遷，為社會科學解釋和大眾文化解讀均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由於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中，革命所採取的政策不同，革命活動中心的地理位置相異，取得成功的程度也有別，中國革命因此為各

種不同的爭議學說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某些理論認為，與蘇聯的聯繫對革命勝利起着決定性的作用，<sup>13</sup> 而另一些理論則認為，毛澤東獨特的群眾動員模式尤為關鍵。<sup>14</sup> 二者各自都提出了一系列因素（如民族主義、階級鬥爭、列寧主義的黨組織形式、毛澤東的群眾路線等等）來解釋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緣何取得最終勝利及革命傳統緣何得以長期保持。<sup>15</sup>

## 創造革命傳統：文化置位

本書無意否定任何上述這些因素在綜合解讀中國革命中發揮的重要作用。意識形態和組織結構上的模仿和創新一直是中國共產黨成長壯大、執掌政權及執政之後進行統治的關鍵要素。然而，這仍未能解答一個問題，即在當時和如今，革命者如何將激進的新觀念引入，及採用甚麼方式得到聽眾對象的回應？共產黨員又是如何讓普通中國老百姓理解、接受，甚至在某些時候擁護革命權威的呢？

大多數共產黨的早期領導者，包括毛澤東在內，都是受過教育的讀書人。他們在進行組織工作活動中，運用了重要的文化資本和創新力。我認為，動員過程的核心就是文化置位 (cultural positioning) —— 或者說，對一系列符號資源（如宗教、儀式、修辭、服飾、戲劇、藝術等等）的戰略性運用在政治說服中所發揮的作用。毛澤東和他身兼啓蒙者與革命者於一身的戰友們，採取了靈活的手段，不僅將蘇聯的理念和制度移植到中國土壤，更進一步使得中國革命的個體發展將與蘇維埃的原型模板迥然相異。

強調文化置位在孕育特殊的中國式共產主義這一過程所起的重要作用，並非暗示某種從帝制時代到如今的重要延續性可以預先確定某種特定或可預測的結果必然發生。在本書之初即需聲明，本研究所使用的文化概念既無假定中國的國民性格或民族精神一成不變，亦無假定其擁有一個內在一致的符號和意義體系。而是，為了和最新的社會科學領域形成的理論保持一致，這裡所指的文化被認為是由靈活變化的、時時矛盾的符號學實踐活動所組成的集合。<sup>16</sup> 然而這並非指文化會隨便任意或無限變形。這樣的假定會剝奪文化因素所具有的任何獨立解釋力。同理，文化置位在任何社會運動中都有某種程度上的顯現，雖然並不總是有效。為了有信服力，文化置位要求操作者對普遍通行的規範和習慣高度熟悉，並且時刻注意在



傳統架構中進行有意義的創造的各種可能性。社會抗議（及領導抗議者）在應付這一挑戰上取得成功的程度並不相同。

儘管社會科學中的「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 已經進行了不止一代，它通常都是以話語分析的形式進行，分析對象包括著作、演講、電影、節慶和其他通訊材料。這些材料被當作是脫離實體的文本，其中的意義完全可通過學者的解構而顯現。而本研究中所採用的分析方式則有所不同。文化置位需要操作者積極主動的行動——而這些行為只有通過認真關注那些具體從事者才能得以理解。製造新的承諾和身份認同成功與否，自然取決於信息傳播者的技巧，但這信息本身的內容和表述結構也同等重要。

因此，本書也是一項有關政治領袖的研究。文化置位當然不是革命領導工作僅有的層面，但卻是極為重要的層面。<sup>17</sup> 毛澤東和他的黨內同志在招募和動員群眾追隨者的努力中，充分意識到了符號性資源所具有的吸引力和適應力。儘管深受蘇聯宣傳鼓動模式的影響，他們在這一過程中有一種獨特的中國式敏感。誠然，不同的中國革命領導者在這類活動上各具風格，其成功程度也不盡相同。然而這些差異隨時間的流逝只會愈加顯著。

當然，在群眾動員中應用文化資產並非中國獨有的現象。法國大革命的研究者們一直以來強調此歷史大事件中的文化層面。<sup>18</sup> 文化置位並不僅僅出現在革命運動中，任何持久的抗爭都需要將熟悉的文化資源轉化，以適應新的集體行動目標。社會學家阿爾貝托·麥路西 (Alberto Melucci) 在很多年前便指出，二十世紀歐美「新社會運動」(new social movement) (比如和平運動、環境運動和女權運動等等) 得以發展的中心要素即為在文化上構建全新的群體身份認同，以贏得愈來愈多的成員支持並獻身其中。<sup>19</sup> 儘管有這些跨國的共同性，對文化力量的推崇千百年來在中國一直是施行政治權威的一大特色，故而在中國情境裡探尋這一脈絡前景尤為廣闊。<sup>20</sup> 更重要的是，鑒於中國抗爭文化中儀式和公共表演的重要性眾所周知，在中國，延續性和非延續性比在其他政治情境中更易於觀察。<sup>21</sup>

探究熟悉的和外來的符號資源如何被應用及被融入到激進的新內容和涵義之中，提供了觀察中國革命歷程的重要視野。同時它表明了中國文化本身在這一動態的過程中是如何被轉化的。政治學家理查德·克勞斯 (Richard Kraus) 在研究中國書法在現代中國政治之作用的著作《毛筆的力量》(*Brushes with Power*) 中指出，「書法之所以在中華帝國作為首要的藝術

形式長期佔據統治地位，可以由其對於官僚統治階級所具的社會功能得到解釋。但是近期書法的地位一定要通過它在本世紀的社會革命中被賦予的新意義來解讀。」<sup>22</sup> 克勞斯深入探索了書法這一中國特有的藝術形式在政治過程中用途之變遷，而本研究亦觸及到（儘管不如其深入）廣義的文化媒體範圍：繪畫、詩歌、戲劇、舞蹈、電影、文學、音樂，等等。不過，與克勞斯的國家視角不同，本研究的關注焦點是完全的地方化視角。

## 安源之案例

本書旨在追溯中國革命傳統的進程，並將其與一個歷史驚人豐厚、影響深遠的小城超過一個世紀的歷程聯繫起來。這種思考研究所涉及的時間跨度之長，有別於其他研究中國革命文化的成果。<sup>23</sup> 作為一個以單一地點為對象並且跨越了 1949 年分界線的歷時性研究，所應用的方法與現存的極少數研究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微觀史學有某些相似性，最著名的如韓丁 (William Hinton) 研究山西省長弓村（譯者註：William Hinton 寫的是山西省張莊，他在書中將該村取名為 Long Bow Village）的兩卷著作，揚·米爾達 (Jan Myrdal) 兩卷陝西省北部柳林村 (Liulin Village) 研究，以及傅禮門 (Edward Friedman)、畢克偉 (Paul Pickowicz) 和馬克·賽爾登 (Mark Selden) 合著的兩卷河北五公村 (Wugong Village) 研究。<sup>24</sup> 然而，本案例研究與以上著作在很多方面又有所不同。

本研究所圍繞的重心安源煤礦並不是乾旱的華北平原上的一個農業村莊，而是位於中國中南部群山中的一個工業區。得益於其戰略性的地理位置和經濟上的特殊重要性，安源比其他大部分中國地區更早經歷由毛澤東領導的革命，其過程也更為深入。毛澤東和他的同志們在安源進行了較長時期的先驅式實驗，從中總結的經驗以後在中國被廣泛推行。並且，由於安源不僅是勞工運動 (1921-1925) 的搖籃，也是組成農民協會 (1926-1927) 的基石，亦是招募工農紅軍 (1928-1930) 的一大陣地，安源經驗在此後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發展的重心從工人轉向農民和士兵，發揮了重要的影響作用。安源並非一個「典型」的中國產業工廠或集鎮——如果這樣的典型在中國存在過的話。儘管如此，了解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安源所發生的林林總總及其後的變遷，便可把握中國革命之基本走向的很大一部分。

研究安源，可以有助於洞察中國革命者從其發展最早期開始的行動方式和吸引力所在。安源此地的反抗歷史之長也為了解共產主義者和他們之前的起義反抗者的區別之處開啓了一扇窗。早於毛澤東開始對安源煤礦初步調查的十多年之前，安源就已被 1906 年的萍瀏醴武裝起義波及，這個起義是後來 1911 年辛亥革命的先聲。因此此地對於比較中國的國民革命和共產主義革命也是極具意義。雖然具備先進思想的知識分子在兩種革命中都是領導者，但是只有在後一個革命中，他們才成功地消弭了與他們試圖團結的農民和工人之間將不同階級分隔開來的文化鴻溝。

1921 年夏，中國共產黨建黨數月之後，毛澤東第一次去安源考察，這是共產黨為開展無產階級革命、以有革命發展前景的工廠為對象所制定的一項工作。<sup>25</sup> 在毛澤東訪問之後，一批黨內同志於安源開展了一系列「紅色教育」活動，帶動了一大批活躍的工人積極分子大力參與改變窮人悲慘狀況的行動中去。幾年後，當中國共產黨的綱領從組織勞工轉向建立農民協會和發展軍隊之際，安源工人也成為關鍵的人員來源，發揮了重要的帶頭作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期，湖南和江西兩省的農民協會因毛澤東具有影響力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而倍受注意——這些協會實際上大部分是由前安源工人組建並領導的。1927 年 9 月的秋收起義以安源作為策劃和發動地點，數百名礦工參加，也堅定了毛澤東走農民革命道路的決心。至 1930 年秋天止，數千名安源工人加入了工農紅軍的隊伍。考慮到與這些重大歷史事件的緊密聯繫，安源的突出優勢，在於它為考察中國革命之起源和發展所提供的啟示性作用。

安源發動群眾之所以成功，與年輕的中國共產黨幹部將文化資本轉化為承載具體功用的革命實踐這一行為密切相關。工人們在工人學校裡受到的正式教育，對於形成一種新的無產階級精神起到關鍵作用，但是創新性地運用經典用語、民俗、服飾、儀式及其他精英和大眾的文化資源，亦同等重要。而且以多種多樣文化為媒介展現的安源的符號性力量與日俱增。

中國共產黨早期最重要的領導人當中有三位——毛澤東、劉少奇和李立三——均於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活躍於安源。三人都是生長於附近湖南鄉鎮的讀書人，渴望利用自己高等的社會地位所帶來的文化優勢，去實踐激進的社會和政治變革。<sup>26</sup> 在安源，毛澤東和他的「紅色知識分子」同志們利用中華帝國自古以來儒家知識精英所享的教育權威性，化作新的革命用

途。<sup>27</sup> 同時，他們也認識到當地秘密會社和習武傳統的作用——如果能加以駕馭和掌控，便可促進革命事業發展。

中國共產黨人從大量的文化資源以及武力資源入手，將中國文化的基本要義加以發揮運用。毛澤東等人為吸引和發展礦工和鐵路工人，文與武的形式雙管齊下，進而推動革命。文武兼用，部分因這是中國男性追求兼備的理想目標。<sup>28</sup> 另外，亦說明文化權威和政治權威如並生的支柱，其一源於文藝，另一源於武藝，廣泛地被中國人所認同。在中國情境下的政治合法性，需要這兩種力量的精巧配合運用，即所謂「文武雙全」。

共產主義勞工運動在安源取得的顯著成就，表明他們將傳統的權威來源轉而為新的政治目的服務是如此之獨具匠心。在這些可資利用的慣常資源中，最重要的是宗教和類宗教式儀式。這些儀式主要衍生自民間的節慶活動、祖先神明崇拜，以及秘密會社等，為革命者折衷但有效地加以運用。類似活動，自古以來一直反映並強化中華帝國的文官行政和軍事管理架構。如芮馬丁 (Emily Martin Ahern) 所認為，中國的民間宗教以「怪誕的社會學準確性」(uncanny sociological accuracy) 映射出中國傳統官僚政治系統，引導普通老百姓去理解、接近或反抗政治權力。<sup>29</sup> 雖然幾乎不具推翻現存政治秩序的指向性，但儀式活動仍是帶有革命雄心的活動組織者可資利用的有價值工具。

毛澤東生長於湖南，將臨近的安源作為革命動員地點。這決定不僅僅只是緣於地理之便。由於安源素以革命聞名，產業工人數量集中，安源煤礦成為了極好的無產階級鬥爭的開拓點。同時，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當中最投入和最有決心的幾位並無文化隔閡的問題——他們均對當地習俗極為熟悉，能夠與大部分礦工用方言通暢地交流各種行話，這大為便利他們開展活動。因為這種局內人的優勢，1922年9月，毛澤東、劉少奇、李立三共同在安源發起了非暴力的罷工行動並取得矚目成功，成為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一個里程碑。

這幾位湖南籍的革命者利用文化共識，以尋求基本人格尊嚴的口號發動了群眾運動。遵照毛澤東的指導意見，李立三創制了1922年安源罷工的口號「從前是牛馬，現在要做人！」，構思巧妙地體現了主旨內容。以尋求社會公平正義的道德呼籲為框架，一萬三千名礦工和鐵路工人持續五天的罷工，贏得了所有安源職員工友和當地主要社會精英人士的關注。罷工

取得了驚人的勝利——在無任何財產損失或人員受傷的情況下，工人們的經濟和社會地位得以顯著改善，共產黨控制下的工會「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也得到官方的承認，並給予很大的經濟支持。

罷工勝利之後的三年，安源成為共產主義組織活動的全國性中心。這個煤礦小鎮以「中國的小莫斯科」而著稱，並作為革命活動初期的樣板得到了全中國（甚至海外）的關注。安源是中國第一個共產黨支部所在地（幾乎全由產業工人組成），擁有最大和最活躍的產業工會、第一個由共產黨資助的消費合作社、由共產黨運作的最大的工農補習學校網及第一個共產黨幹部學校。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安源猶如一塊磁石，深深吸引了進步知識分子和運動組織者。安源的工人俱樂部擁有超過一萬名成員，並且（根據罷工協議條款）享受到路礦公司的巨款補助，為無產階級革命文化奠定了基礎。

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開展了許多項目，將民間宗教以及大眾和精英的諸多活動元素加以創造性應用，便於靈活地培養新的階級意識。通過開展群眾教育、寓教於樂的戲劇表演和其他共產黨資助的活動，許多工人對中國無產階級的經濟重要性和政治潛力有了前所未有的認識。結果，原先忠於當地秘密會社（即衍生自三合會的哥老會或洪幫，為當地富於反抗精神名聲的來源所在）的礦工們轉而認同工人俱樂部。這期間由共產黨緊密指導發展起來的學校活動、文化和職業培訓課程、閱覽室、圖書館、消費合作社、工會、劇社、演講社、農民協會和其他草根組織得到工人們愈來愈多的參與，充分反映了當時集體身份認同的轉變。當然，這樣的轉換並不徹底。礦工們有時表現出對領導人魅力的忠誠，高於社會主義理想。同時，工人俱樂部中那些秘密會社的武功高手們的暴力傾向，並沒有隨年輕的共產主義教育者的教育工作完全柔化。儘管如此，整個「小莫斯科」主要還是注重「文」的文化和教育甚於「武」的武力和戰爭。

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可觀的大部分資金，都投入在文化課程或其他形式的無產階級教育和宣傳上。為這些教育目的而編製的課本、戲劇、歌曲、講座或其他宣傳材料，形成了一種文化範本模式。而此模式之後散播到江西蘇維埃，並且於戰爭時期在全國各個革命根據地廣泛採用。甚而，在革命運動的重心從無產階級動員轉向農民武裝鬥爭之時，<sup>30</sup> 在安源經過

教育培訓的工人擔當了重要的領導角色，如農民協會的領袖或是紅軍政委。

「中國的小莫斯科」名不虛傳。安源，這個人口不足八萬的煤礦小鎮，在其全盛時期，聚集了佔全國五分之一之多的中共黨員。儘管這一切在1925年9月被數量眾多的反對派軍隊所鎮壓而消滅，但安源試驗仍然在中國共產主義革命歷史上佔據特殊的重要性。安源是中國最具影響的三位革命先驅的訓練場，是差不多五千名出身工人的紅軍戰士的來源地，是多個工農草根組織的建設基礎。安源及發生於其間的這些歷史事件與此後共產主義革命的走向緊密相聯。故而，毫不奇怪的是，未來幾代人都會因主張自己對安源革命遺產的所有權而爭鬥。

## 發掘革命傳統：文化操控

「光榮的安源革命傳統」，為人所熟知；但對後輩而言，其指引和鼓舞作用並非是無懈可擊的。儘管它對之後政策形成的影響作用得到公認，但是這段歷史以及對此歷史的評價和再現，跟隨一個個反覆變化和相互衝突的階段主題不得不一再被修改。在「發掘」(mining) 安源革命傳統的過程中，事實被有影響力的機構組織和強勢人物輕易隨便地遺忘，或經刻意編造來符合與此不一的個人圖謀或政治野心。結果革命活動及其理念的種種回憶，都相應地被擴大或刪減。

同任何複雜而漫長的歷史事件一樣，中國革命被對立的革命傳統繼承者們加以不同的解讀。<sup>31</sup> 中國革命的集體記憶的建造形成，正如社會學家李靜君 (Ching Kwan Lee) 和楊國斌所強調的，「是一個高度政治化的過程。同等程度地，這也是一個記憶得以詩化的文化過程，即運用了文化的工具和資源來對記憶進行建造和表述。」<sup>32</sup> 出於深刻的政治衝突和政治考量之驅動，對安源革命傳統的「詩化」重塑，因而牽扯入激烈的領導層鬥爭中。

在建立共產黨政權國家之後，政府的權勢部門，特別是宣傳部和文化部，率先齊心協力開始為政治大人物重寫革命歷史檔案的行動。在這重建歷史的過程中，文化置位讓位於文化操控 (cultural patronage) ——地方和中央官員將官方資源加以經營運作，因安源而獲得的資本收益亦被運用於不同目的——這些目的與當初之所以能在安源發動革命活動的那些目標大

相逕庭。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安源工人運動的發展過程中，文化置位使外國思想得以通過人們熟知的渠道進行有效的交流與傳播；1949年以後，文化操控將這一運動歷史上升到檢驗政治合法性的標準試金石的高度——通過官方媒體廣泛宣傳，從而鞏固加強領袖個人的以及中國共產黨整體的政治地位。

早期的共產主義組織者果斷地利用個人權威魅力來實現他們的任務，但這些努力乃是以喚醒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群體意識為目標，而非為強化政治領袖的權力而推行個人崇拜。然則在後來的歲月中，「安源革命光榮傳統」卻被官方宣傳機構加以復活和重建，以服務於完全不同的目的。在共產黨統治的國家，（對黨及其領導者的）忠誠奉獻取代了（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尊嚴成為國家的首要目的。這一過程在文化大革命中最为明顯。當時毛澤東的絕對巔峰權力，使得全國一致宣傳他是中國革命的唯一領導者。一個例證就是描繪1921年年輕的毛澤東到達安源煤礦事跡的著名油畫《毛主席去安源》。此畫1967年由一位當時尚為學生的紅衛兵藝術家完成，印在大約九億多張海報和數不清的其他形式宣傳品上，並成為神化毛澤東的重要標誌，推高了對他的個人崇拜。儘管毛澤東對安源工人運動的實際貢獻無法與劉少奇或李立三相比，安源工人運動勝利的全部榮譽最終還是被歸功於他一人。這個共產黨國家的全部力量，發揮在類近宗教的復興活動中，企圖從所謂的蘇維埃「修正主義」的危機中護衛這一位而且是唯一一位革命大救星以及他的「正確革命路線」。兼及文治和武功，一個新的革命神學體系建造了毛主席在安源工人中尊享的精神領袖地位。雖然文化大革命嚴重過度，但安源歷史的重寫既非開始於此亦不會於此結束。

強調個別中共領導人之安源聯繫的文化操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即彰彰甚明。當時支持劉少奇副主席的不同級別官員運用視覺和文學媒體，增添他作為中國無產階級領導者形象的光芒。效仿斯大林早期的個人主義崇拜，通過繪畫、戲劇、小故事、電影、博物館展覽和其他藝術表現形式，表現劉少奇在安源的英雄事跡，實現對他的個人崇拜。文化大革命對毛澤東安源經歷的神化，扭轉了之前的文化操控實踐的方向，並進一步深化。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得到人民解放軍鐵拳支持的紅衛兵佔據舞台中心，他們對安源故事的重新解讀，亦被刻意灌輸進一種絕對武力傾向。劉

少奇由於在安源期間採用了非暴力手段而否認階級鬥爭的必要性，因而遭到攻擊；他的「修正主義」錯誤雖是四十年前的陳年舊事，卻依然成為他遭受殘酷政治迫害的主要理由。文化大革命在某種程度上彷彿是一場充斥武力及宗教式狂熱的十字軍東征。革命傳統中的暴力衝動在其間被景仰，並越過和取代較為克制的有組織和教育性的活動——雖然這後兩者實際上亦曾在毛澤東本人的認可之下，對於安源的革命勝利經驗至關緊要。至少暫時來說，武人的方式勝出了文人的方式。在今天，爭奪安源遺產的各色對立者——既在國家層面上，亦在社會範圍內——仍然因為傳統的複雜性和矛盾性而爭執不休。

## 安源的挑戰

本書的主題是安源革命傳統之建造和發掘的過程，涉及從最初開始到如今的漫長歷史。前四章着重介紹文化置位在革命動員中的作用；後面各章則轉而解釋文化操控在評價和重新解讀這一複雜歷史遺產中的強大力量。安源的案例促使我們去探尋中國革命傳統的多重含義和多種功用——它不僅僅是群眾動員之渠道、精英權威之基石、國家教育和宣傳之核心主題，對官員、知識分子和普通百姓來說，亦具有長期持續的束縛和鼓舞雙重意義。

本書對安源革命傳統還原和重造的過程及革命最初的階段給以同等關注。我的意圖不僅在於簡單披露中國革命發展過程中曾經發生過的扭曲和欺騙，亦在於更好解釋從過去到現在的革命者所展現的奉獻和投入。在過去的那一個世紀，千百萬人曾付出巨大犧牲，加之對今天的中國人依然具有持久吸引力的革命人格和聖地，渾然構成相互交織的各種歷史事件及記憶。這些事件和記憶的連接體雖然時常因為一己私利之便而飽受威脅，但它們卻是含有深刻的文化與政治意義。毛澤東（和其他共產黨領導人）引入蘇維埃的理念，並適應國情加以改造，以使其與本土文化共鳴回應，形成一曲一張的高度彈性——這種能力在我們評價列寧主義式黨國體制政權在中國的建立和存續時，不可輕易忽視。

如果說中俄革命結果之差異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於兩國培育一種可信的政治文化並將之正常化的成功程度，存在高下之分，那麼將安源這根絲線



從複雜的毛澤東領導的革命的巨幅織錦上挑揀出來，會成為當代中國的重大挑戰之一。從一方面來說，不斷湧現的紀念（和評論）「安源光榮革命傳統」的文學和藝術作品，證明了它持久的感人力量，亦突出強調了中國政治想像中毛澤東革命追求所具有的長久魅力。另一方面來說，安源煤礦工人悲慘生活的現實狀況（如同一個世紀之前）和經過浪漫化處理的形象之間存在的巨大反差，提醒我們中國革命之任務尚未完成。被剝奪的底層人民對於人的尊嚴和社會公正的要求，哀矜動人地表達在安源罷工的基本口號之中：「從前是牛馬，現在要做人！」——這在當代中國依舊是政治討論的核心問題。<sup>33</sup> 而能否完成中國革命傳統中這些未盡之承諾，將最終決定中國黨國體制之存續與否。



## 第一章

# 革命預演

革命不會在文化真空中發生。儘管革命的最終目的是要同傳統決然割裂，及對政治與社會版圖進行全盤重組，但是它的各種目的只有被傳達得足夠清晰明瞭並且引人注意時，才能夠吸引大規模的群眾追隨。當革命借用來自國外的藍圖，這異域風格的新話語傳播之難，尤易令人氣餒與退縮。儘管中國共產黨的初創者們深受俄國革命的激勵，不過他們一開始便意識到自己的革命工程需要將蘇聯模式進行一定程度的適應和改變，才能獲得國民的廣泛擁護。

毛澤東成長於中國農耕中心地區的一戶農家，從未接觸過西學。故而相較他的一些都市氣息濃厚的戰友來說，他更合乎大規模群眾動員所要求於革命者的那種文化氣質。儘管他年輕時便已深信，儒家傳統已然瀕臨末路，一種新的革命意識亟待發育，然而毛澤東仍本能地意識到，本土文化在這種轉型中仍將扮演重要角色。在共產黨成立之後不久，毛澤東返回到自己的家鄉湖南，負責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工作。為了發展基本群眾，他不久便鎖定了毗鄰的萍鄉縣安源煤礦。毛澤東迅速察覺到，萍鄉地區對於來自湖南的革命發動者來說，不僅具有文化便捷性的優勢，當地民眾還擁有豐富的開展抗爭活動的實戰經歷。然而，該地也因為對外來觀念的強烈抵制而聞名於世——要在這個地方引入全然陌生的行事方式，真是談何容易！

萍鄉縣坐落在湘贛交界綿延的青翠群山之中。儘管行政區劃上萍鄉縣隸屬江西省（見地圖 1），<sup>1</sup> 但它的許多特色其實更接近湖南。穿越萍鄉而過的河流往西流向湖南，當地城鎮的食品主要來自湖南鄉下；萍鄉距湖南省會長沙 80 哩，不及其與本省省會南昌距離（170 哩）的一半。當地的方言、宗教、戲曲以及其他體現當地文化特色的內容也都深受湘味文化影

響。<sup>2</sup> 吸引毛澤東的不僅是萍鄉在文化上的相近，還有該地區聲名遠揚的反抗官府的光輝歷史。幾個世紀以來，這個蜿蜒崎嶇的省際交界山區分佈着數百個煤窯，散落在林木茂密的山麓中，成為許多教派和秘密會社的避風港——這些組織的成員因此可以隨時集合起來造反。對立的宗族之間爭奪豐富的煤礦資源所引發的武裝衝突，更形成了當地與眾不同的軍事化和群眾動員能力，而日常反抗和直接的全面造反之間的界限在此地模糊不分。暴力和脫離法律約束的行為模式，瀰漫於當地的各種地方機制之中。在帝制時期和民國時期，私募的鄉勇團練和秘密會社犯罪網絡，是萍鄉地區社會秩序的主要維持者，同時亦是破壞秩序的力量。國家的控制在當地極為鬆懈，也是眾所周知的一個事實。<sup>3</sup>

僅舉幾個著名的事例即可體現出此地的反抗傳統：在十四世紀中期，萍鄉縣有超過五千名士兵參加了屬於一種千禧教派的紅巾軍起義，這場戰爭中蒙古人潰敗，大明王朝建立。五百年之後，當地與三合會密切關聯的礦工群體，是太平天國起義的重要兵力來源之一。1892年——即帝制被推翻前二十年——萍鄉當地稱作洪幫的哥老會成員大多數為安源的礦工。九千餘名礦工發動了一場反對朝廷的叛亂，運動最後不幸流產。<sup>4</sup> 當地的一本中學歷史教科書驕傲地論證：「萍鄉人民有着光榮的革命傳統……中國歷史上的歷次革命運動、政治鬥爭，幾乎無不與萍鄉有着一定的關係……萍鄉歷史成了中國革命鬥爭的縮影。」<sup>5</sup>

在1921年毛澤東來到這裡時，大多數早期抗爭事件幾乎已經成為遙遠的回憶。不過，更近一些的抗議活動，仍成為安源以及周邊區域地方傳說的核心內容。<sup>6</sup> 毛澤東之所以相中此地作為群眾動員的目標，不只是因為當地擁有數量眾多並且人數集中的產業工人——既有鐵路工人也有煤礦工人——同時更因為萍鄉不間斷上演反抗活動。在1920年9月，即毛澤東初次訪問安源煤礦的前一年，附近的村莊發生大規模暴亂，數以千計飢餓的農民偷盜地主家的餘糧，並且在地主家聚眾「吃磨飯」。毛澤東在《共產黨》這本刊物中熱情洋溢地記錄了這些情形。<sup>7</sup> 在此事之後的次月，安源的鐵路工人因反對減薪而發動罷工。<sup>8</sup> 當地強大的秘密會社控制着湘贛邊境上利潤巨大的賭博和鴉片交易活動。在他們的教唆和挑動下，當地社會普遍動盪不安，這亦表明反抗活動在該地社會根源深厚。對於毛澤東及其戰友們來說，這既是機遇又是挑戰。

## 安源煤礦

同大多數帝制時期的郡縣一樣，萍鄉以農業為主。幾百年來，原始簡易的煤窯和焰火工廠是當地唯一的工業形式。<sup>9</sup> 然而，十九世紀末的「自強」運動為當地帶來了巨大變化。儘管煤礦開採從唐朝之前就已經在當地開始發展，但在規模和技術上的轉型，則發生於 1898 年在安源設立「萍鄉等處煤礦總局」之後。根據洋務派湖廣總督張之洞的指令，安源煤礦由當時最重要的官僚資本家盛宣懷發起，目的是為同期在湖北開辦的漢陽鐵廠提供近便並且廉價的煤礦資源。由於國家大多數煤礦儲備都集中在遙遠的華北或者東北各省，運輸到湖北費用高昂，因而需要一個位置更方便的煤礦來源地。盛宣懷聘請了兩名德國工程師提供專業幫助。他們勘察了華中各省後，推薦安源作為新礦的總部所在地。煉鐵所需的煉焦煤，萍鄉不僅儲備豐富而且品質極高，再者地理位置上毗鄰湖北，使之從地質和地理上都適合作為漢陽鐵廠既經濟又合理的礦產供應來源。<sup>10</sup>

萍鄉煤礦的首任總辦名張贊宸，江蘇人氏，由張之洞和盛宣懷親自委任。張贊宸積極協助盛宣懷為新工廠籌措資金，多次相隨前往漢口和上海等地籌款。對煤礦未來發展同等重要的是，張贊宸招募了一名有遠見的管理副手。這位副手是他的江蘇籍同鄉李壽銓，是一個讀書人。<sup>11</sup> 李壽銓是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末期揚州的一位年輕教師，確信中國的未來需要採用先進的西方技術。他急切希望有機會將自己的改革理念轉化為現實，欣然接受張贊宸的邀請。作為煤礦負責人，李壽銓承擔着監督建造煤礦和鐵路的任務，同時負責處理和當地鄉紳的微妙關係——儘管他們之間的相互來往並不總是順利。

在過去，這一地區的煤窯既小且分散，其中大部分由萍鄉的各個家族擁有與管理。由煤礦負責人李壽銓經辦，盛宣懷以五十餘萬銀元之資買下當地私營煤礦的產權，並進行統合，建立了他的新型現代產業。<sup>12</sup> 雖然盛宣懷花了近八年的時間才買下安源地區運營的全部 321 個私營煤礦，不過截至 1908 年 7 月，之前獨立經營的各個礦區都已被納入到萍鄉煤礦總局的實際控制之下，從而使萍鄉煤礦總局的管轄區域擴張至超過 250 平方公里的範圍。



圖 1

萍鄉煤礦公司原來的總部，建於 1898 年。照片為作者拍攝。

新煤礦公司的發展得到萍鄉大家族文家的幫助。從最初起，文家就已配合盛宣懷主持的官辦現代商業計劃。在幾位以贊同改革而揚名天下的傑出大儒帶領下，文家無視萍鄉其他鄉紳的反對，為盛宣懷及其同僚們提供重要的資訊和協助。然而，當明白安源煤礦在科技和管理兩方面造成的巨變最終會將當地士紳完全排擠出煤礦生意之後，甚至連文家都終止了他們的支持。<sup>13</sup>

在建設萍鄉煤礦的過程中，聘請外國人和運用外國技術兩方面，均引起當地人民的仇恨。在盛宣懷邀請下，煤礦聘用了三十多個德國工程師，幫助引進一套令人驚嘆的先進生產技術：

當西方的鑽孔機和炸藥把煤從直井的井壁提取出來、電動化的曲柄又將它們從礦井中抽出時，機械化動力最終取代了人力勞動。1904年，兩條平行的坑道開始運營，並配設兩架德國製造的電動鐵道

車，以將煤拖出坑道。萍鄉煤礦的煤被送往設於坑道口周邊多層大樓裡的現代化洗煤車間。這些煤被淨化後，在近三百個嶄新的德國煉焦爐中進行焦化。<sup>14</sup>

儘管這股外部勢力的侵入招致當地士紳的敵意，它仍舊獲得了經濟上的成功。在運營十年之際，安源的萍鄉煤礦總局與盛宣懷在湖北省主辦的兩間大公司漢陽鐵廠和大冶鐵礦合併，成立了當時為中國人所擁有的最大的工業聯合企業：漢冶萍煤鐵廠礦公司。其總部設於上海。一條連接萍鄉和湖南株洲的鐵路線興建起來，這條株萍鐵路將安源煤礦出產的煤經湖南運輸到漢陽鐵廠（見地圖 2）。之後萍鄉路礦公司這個統稱之名廣為人知。公司配備了自己的機械鋪、鑄造廠、修理鋪和焦化站。<sup>15</sup> 作為晚清自強改革的綜合性體現，路礦公司在 1899 年開辦了一家儲蓄銀行，1904 年又成立了一家裝備齊全的醫院，不久醫院就擁有二十餘位中外醫生。<sup>16</sup> 足以誇耀的是，其現代化綜合建築場所甚至擁有西式風格的公共花園，建有就餐設施和一個小型動物園，坐落在煤礦主幹入口上方的一座小山上。<sup>17</sup>

作為擁有宏大目標的工業企業，並配備最先進的德國機械，萍鄉路礦公司的發展必然需要巨額資本。這些資金部分來自於盛宣懷的其他企業，部分來自從德國和日本財團處獲得的貸款。儘管擁有外國的財政資助，安源煤礦的所有權和管理權仍掌握在中國人手中，同它的母公司漢冶萍煤鐵廠礦一樣。1908 年，盛宣懷在商部註冊了漢冶萍煤鐵廠礦有限公司，希望以有限責任股份制公司的形式募集更多的中國私人資本。經濟歷史學家費維愷 (Albert Feuerwerker) 形容漢冶萍聯合企業是「晚清中國最具雄心壯志的工業企業」。<sup>18</sup>

至 1909 年，萍鄉煤礦總局日產逾一千噸煤，足夠滿足漢陽鐵廠的需求。兩年之後，日產量提高到近兩千兩百噸，使得安源成為當時中國國人所有的最大煤礦，煤礦產量噸位和勞動力數量兩個指標都居全國之首。<sup>19</sup> 所產的煉焦煤硫含量低，品質極高，與最好的英國產品品質不相上下。這使得萍鄉的煤非常適用於蒸汽輪船的運作，以及製造重工業產品。萍鄉生產的煤在國際市場上定價高，所以日本在其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條」中提出控制萍鄉煤礦所有權的條款，不過這一目的並未達到。<sup>20</sup> 第一次世界大

戰末，安源出產的煤已經取代日本煤，成為了長江流域工業用煤和家庭消費的主要供給來源。<sup>21</sup>

曾經只是一個小鎮的安源以及周邊地區，由於有了這個現代煤礦，湧入大量的新居民。<sup>22</sup> 勞動力基本上主要來自於萍鄉和附近湖南村莊的農民，人數規模迅速擴大，達到萬餘名礦工和千餘名鐵路工人。<sup>23</sup> 最初礦工群的主體是萍鄉當地人，但不久之後，湖南人取代他們成為了多數——儘管兩個群體之間有着相近的語言和風俗，但仍造成一定程度上的緊張情緒。做最勞累和最危險的地下挖掘和搬運工作的工人，來自湖南湘潭和醴陵，毛澤東和李立三的籍貫就分別是這兩地。這些工人嗜食檳榔和紅辣椒出了名，他們和家鄉保持着緊密聯繫，按期回老家過節假，或者因傷病力衰回鄉休養。來自湖南的很多鐵路工人接受過一定程度的教育和培訓，他們和不識字的無技能礦工有所不同。不過，共同的方言和地域身份便於他們在工作上溝通和集體行動。與此相反，鐵路工人和煤礦工人卻無法同那些收入相對優厚、遠自江浙粵三省來的數以百計技術職員形成良好關係。那些掌握技術的技師，帶着上海或廣東口音，習慣過舒適的城鎮生活，自視身份高於當地的鄉巴佬。令複雜的人際關係更為加劇的，是那幾十個負責維護進口機械的高薪德國工程師。<sup>24</sup> 顯然出於文化隔離的標誌，德國人和從遙遠省份來的中國人都不願屈尊去參加節假日中那些氣氛活躍但喧嘩吵鬧的民俗節慶活動——他們更喜歡在房間裡聽聽音樂或者打打麻將來消磨時光。<sup>25</sup>

這種急劇的工業化和伴隨而來的人口多樣化，引起當地許多居民的憂慮，他們認為這種發展是對傳統生活方式的一大威脅。由於不信任外國的機械，當地產生了廣泛的恐懼。一位萍鄉人回憶，「當時形形色色的謠言在縣城和鄉間傳播，不是說鐵路破壞了風水、騷擾祖墳，就是說每天要拋小孩子入火車頭的煙囪中去祭祀，火車才能行走。煤礦礦井的煙囪每天也一樣要用小孩子的肉身去獻祭……這些謠言顯示當時一般人對於火車煤礦這類新事物的痛恨。」<sup>26</sup> 當地人認為，火車和煤礦高爐的神秘運作，是對一般宇宙秩序的威脅。這些「新事物」由外國管理員看管維護，更加深了這種憎惡。住在「配備着網球場和啤酒屋的精緻豪華居所」裡的德國人，成為群眾宣洩仇外情緒的顯著目標。<sup>27</sup>



在最初的二十年裡，賴倫 (Gustavus Leinung) 是煤礦的首席工程師。他的到來在這個極度仇外的華中心臟地帶小鎮，引起了極大的騷動。甚至在賴倫尚未初次露面之時，鎮上已經到處張貼告示，警醒大家這個外國人意圖不良，「此係吸萍之髓而焚萍之膏也」，並提出「洋人一到，各家出一人，持一械，巷遇則巷打，鄉過則鄉屠」。<sup>28</sup> 這種敵意不僅是由於單純地恐懼外國人，或者是恐懼外國科技和機器，更主要是萍鄉仕紳有保護自己經濟命脈的實際利益，幾百年來他們從散佈安源全境的數以百計私人煤窯上獲利豐厚。1898 年 1 月，憂心忡忡的盛宣懷警告賴倫，當地人兇狠殘暴，為了確保其安全，在沒有工廠負責人明確允許下，萬萬不可冒險出去。<sup>29</sup> 對外國人的憎惡可能在賴倫任期的開端最為嚴重，然而敵視實際上從未得到完全的平息：

在他第一次來萍鄉的時候，他就成為了那些從未見過歐洲人的當地人敬畏和驚奇的對象。圍繞他有着各種各樣的猜想。據說他有三隻眼睛，有一隻長在後腦；他被認為可以目測觀望到地球深處，發現那裡的寶藏所在。1896 年他第一次抵達萍鄉的時候，當地人都到屋頂上看他。他被安置在一間祠堂裡，村民們成群結隊，十或十二人一道，透過格柵窗戶去窺視他，好像他是動物園的稀有物種……在此地的第一年裡，賴倫身邊總是跟隨着兩百個士兵……在那時，湖南省瀰漫着一股強烈的仇外情緒……兩年後，由於發生騷亂和傳教士接連被殺害的事件，他不得不離開。<sup>30</sup>

通常，周邊的秘密會社分舵帶頭製造的仇外事件在安源持續上演，並且情勢日趨惡劣。

1901 年春，受北方義和拳運動鼓舞，哥老會 (洪幫) 的成員在萍鄉四處張貼告示，號召大家破壞鐵路和損毀「外國」機器。此時恰值由哥老會及湖南文人發起的席卷長江流域的重大教案發生十周年，仇外情緒重燃引起了官府的高度重視。<sup>31</sup> 盛宣懷擔心安源德國工程師的人身安全，從上海總部拍來電報要求江西和湖南省官府進行軍事干涉。萍鄉煤礦總局採取預防措施，將德國僱員及其家屬們送往湖南省的一個臨時避難處。省裡的官兵從礦上逮捕了兩名洪幫頭目，這場動亂得以平息。<sup>32</sup>

儘管如此，仇外的情緒並未減弱。四年後，哥老會帶領幾千名礦工發動罷工，抗議新上任的德國主管採用減薪手段懲罰工作表現不佳的工人。

這些氣憤的工人搗毀了煤礦公司的辦公室和德國工程師的住所，並且痛打了這位主管。公司又一次匆匆把外籍僱員們送往湖南避難，又一次從省裡派遣兵力來鎮壓暴動。然而，這一次工人們拒絕受脅迫。最後，煤礦公司同意發放所有被扣除的工資。<sup>33</sup>

## 萍瀏醴起義

安源的哥老會並沒有將他們的反抗局限在勞工抗爭方面。儘管這些幫會創立的初衷是為了在當地族群衝突中尋求保護，而非某些宏大的政治意圖；但是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很多幫會團體——像與哥老會在儀式上有關聯的三合會——都加入到反清浪潮中。<sup>34</sup> 1904年，安源的哥老會聯合江西西部和湖南的其他堂會密謀策劃襲擊長沙官府勢力。<sup>35</sup> 這次起義尚未付諸行動便被發覺，並遭到清剿，但是起義者在兩年之後發動了一次更加大膽的行動。

1906年，安源洪幫聯合當地志同道合的其他會黨一同發動了歷史上著名的萍瀏醴起義，成為辛亥革命前奏系列起義中的第一例。在孫中山新創的革命黨同盟會協助下，萍瀏醴起義聚集起毗鄰三個縣近三萬名秘密會社成員（即江西萍鄉以及湖南瀏陽和醴陵二縣）。在這次跨境起義中，有超過六千名擁有哥老會身份的安源礦工參加。他們的領導者名叫蕭克昌，是煤礦的一名領班。他原籍湖南湘潭，也即毛澤東的籍貫所在地。他在哥老會中是一位受人尊敬的頭領，被尊稱為「老龍王」。<sup>36</sup>

為了聯合參與起義的各派秘密會社人員，同盟會首領設立了新的秘密組織，名為洪江會。儘管取了新的名字，但洪江會的實際組織結構仍高度模仿哥老會，設有掌管錢庫、交通、訓練等等的內八堂和對應附近地區分支的外八堂。這個新的社團也採納千禧信仰的宗教語彙，通過萍鄉某寺廟的僧人宣揚「天下即將大亂，將有英雄鏟富濟貧」。他們在中秋節廟會上在民眾中散播這個預言，而廟會活動每日吸引近萬人。儘管名義上洪江會歸洪幫頭領蕭克昌帶領，但實際領導權主要集中在一群一年前在日本參與創立同盟會的學生手上。這個混合的會黨不久便在湘贛兩地擁有超過二十萬會眾。他們一方面保留了三合會飲雄雞血酒的傳統入會儀式，一方面引入了新的革命口號：「創立民國，平均地權」。<sup>37</sup> 儘管起義宣言與半個世紀前

的太平天國運動有着明顯的關聯，但亦反映出學生群體不同以往的政治雄心：「破千年之專制政體，不使君主一人獨享特權於上。必建共和民國，與四萬萬同胞享平等之利益，獲自由之幸福。而社會問題，尤當研究新法，使地權與民平均，不致富者愈富，成不平等之社會。」<sup>38</sup>

洪江會體現了孫中山推崇的革命方式，既有年輕知識分子的先進領導，又有民間秘密會社的廣泛參與。<sup>39</sup> 理論上，洪江會創辦的十進位組織序列令人印象深刻，以百人一隊和千人一隊的戰鬥編組，組成了中華民國軍南軍革命先鋒隊。<sup>40</sup> 但起義各方之間缺乏合作是致命性的問題。安源哥老會是第一個被打擊的洪江會組織。此組織多年以來一直將可觀的資金收益存入萍鄉煤礦總局開設的儲蓄銀行。礦局遂為哥老會的首領設下一個圈套。他們宣稱銀行即將結業，所有帳戶若在三日內未被申領則會被凍結。蕭克昌未有生疑，立即趕赴銀行，當即被捕，不久被處決。「老龍王」遇難，意味着安源礦工參與這次暴亂的行動到此為止。<sup>41</sup> 個人的領導，而非抽象的動機，是秘密會社成員效忠的主要基礎。

然而，此中問題其實比一位首領的覆滅要更大。內部矛盾令萍瀏醴起義在一段時日後便告慘敗。這一失敗亦表明孫中山對革命聯盟存有的樂觀幻想是根本性的錯誤：「這個理論的基本弱點，在 1906 年極為突出明顯，就是領導者和追隨者來自兩個不同的社會成分，各自有不同的目標。……年輕學生不能發揮領導作用，站在風口浪尖上無法掌控事件發展的方向——顯然，他們對農村群眾動員的成因知之甚少。」<sup>42</sup> 簡而言之，這也正是幾年後毛澤東和他的年輕知識分子同志們在安源發動群眾運動時所要面對的問題。一方面來說，無處不在的秘密會社慣於對抗朝廷，又積極保護成員的生計，他們是進行群眾動員的現成工具。另一方面來說，這些原生形態的手段和目標與作為理想主義同盟者的要求相距甚遠。要填補這個鴻溝需要比 1906 年的學生革命者所做的文化置位工作付出更複雜和更持久的努力。

從張國燾的自傳中可以看出，在萍瀏醴起義中這些秘密幫會人員與其准領導者之間存在着隔閡。張國燾是萍鄉一個富庶之家的子弟，他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在萍瀏醴起義時，他乃是一個稚齡學童，受到了驚駭。張國燾差點被洪江會的反叛者砍掉腦袋，他形容他們是「一些身背馬刀喝醉了酒的大漢」。<sup>43</sup> 張國燾承認秘密會社人員彼此幫助和提供保

護，大部分成員都是貧苦無依的農民、礦工、傷殘工人、小商販和苦力。但是他家屬於當地的富戶，在這個事件中他家的門庭大院並沒有受到起義者的客氣對待。饑餓的造反者們在張國燾家興高采烈地殺豬做飯，一片混亂狼藉。張國燾的一個叔叔被他們綁票索贖。<sup>44</sup> 儘管注意到「同盟會對於萍瀏之役的影響」，張國燾在評價這場起義時仍認為「洪江會造反的一切做法，還大部承襲着洪門的傳統，並沒有表現出革命的近代作風」。<sup>45</sup> 研究萍瀏醴起義的歷史學家們也得出了相似的結論。周錫瑞 (Joseph Esherick) 總結認為 1906 年「革命黨學生不過擔當了說明組織和引發一場人民起義的催化劑，而這個起義實際上遵循着自身內部的動態變化而運作」。<sup>46</sup>

同當地以往的叛亂一樣，對於起義者和地方官府兩方來說，萍瀏醴起義漸漸發展為極端暴力事件。這次暴亂遭到鎮壓而流產，但是可怕的大規模屠殺造成數以千計的洪幫成員喪生。<sup>47</sup> 由於眾多的安源礦工都捲入這次慘敗的反抗運動，事件後的鎮壓令煤礦運營遭逢巨大損失。來自湘潭的礦工，因為是哥老會頭領的同鄉，特別被加以嚴懲。<sup>48</sup>

萍瀏醴起義也在煤礦總局的上層管理者中播下了不和的種子。副礦長李壽銓，儘管之前因為強行收購萍鄉當地由鄉紳階層掌控的數以百計的煤窯而招致地方鄉紳不悅，在湖南省邊境地區仍獲得重要的盟友支持。李壽銓在支持西式改革的團體中受到歡迎，他是進步的文學社團南社的積極分子，因此與頗有名望的湖南學者和政客建立了聯繫。<sup>49</sup> 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叫黃興，他不久後成為孫中山領導的 1911 年辛亥革命的主要策劃者。1904 年冬天黃興悄悄到訪安源，意圖招納李壽銓加入黃興新組建的革命黨華興會。黃興向他解釋華興會是一個旨在以革命推翻滿清的愛國組織，李壽銓欣然加入。黃興送給他一本鄒容著的禁書《革命軍》，李壽銓反覆研讀。根據他的日記，這本宣傳小冊子使李壽銓確信中國的未來出路在革命。第二年，黃興將他的這個組織併入孫中山的革命黨同盟會。由黃興引領，李壽銓繼而效忠這個新的組織。1906 年萍瀏醴起義期間，李壽銓表現出他的革命傾向，他鼓勵安源一部分熟練機師參與這場反叛。然而，礦長張贊宸並不贊同李壽銓的進步態度。正是由於張贊宸的干預，洪江會的頭領蕭克昌才被抓捕並砍頭處決。<sup>50</sup>

## 勞動和生存條件

由於萍瀏醴起義導致的破壞和分隔，促使煤礦啟用更加嚴酷的管理制度。這場大災難的後果之一，就是萍鄉煤礦總局建立了自己的警察署以便預先制止騷動發生。新機構僱用的武裝警力很快就達到近九百名，他們保障法院判刑和監獄執行刑罰。<sup>51</sup> 警署運作經費主要來自煤礦公司建立的兩個蔬菜市場的收入和員警們收到的罰款。不久之後，員警們因職務之便獲利豐潤，礦工諷刺地稱其為「財神」。<sup>52</sup> 員警們配備毛瑟槍，穿着統一的制服，在當地的各個崗亭站崗，維護當地的秩序。他們也在火車站檢查行李，以防止外來滋事者混入。<sup>53</sup> 儘管部分警員是北方人，有北洋軍閥部隊的背景，但大部分其實是本地人，本身為洪幫的活躍分子。因此，儘管萍瀏醴起義遭到血腥鎮壓，煤礦總局亦採取了一系列控制大局的措施，當地秘密會社對安源工友的掌控仍然非常牢固。

之後數年中，礦工參與了多起由洪幫發起的抗議活動。在一戰時期，萍鄉煤礦總局規模日益擴大，欣欣向榮，而有黑幫背景的包工頭會從所僱工人的工資中抽取不小的比例，故而這些包工頭們大肆慫恿工人罷工要求加薪。同時期，中國的民族主義剛剛萌芽，尊享特權的外國人在煤礦出沒，也成為聲稱愛國主義的秘密會社發動抗議行動的藉口。1913年5月，安源工人正式對薪水表達不滿。同年10月，他們發起遊行罷工，抗議一位德國主管毆打一名礦工，直到肇事者正式道歉之後才復工。兩年後，因為這些德國人放縱中國工頭的殘暴行徑，礦工們再一次罷工。<sup>54</sup> 隨着這些對抗事件，他們放言要針對德國工程師行兇搶劫並威脅其人身安全。1919年夏季在五四運動的濃厚愛國主義氛圍下，所有外國職員被迫永久地離開安源。然而，他們的離開並沒有使工作環境得到明顯改善。在包工頭及其幫手的專制統治下，任意的罰款和肉體懲罰繼續施加在工人身上。<sup>55</sup>

一戰結束後，萍鄉煤礦公司遭逢突然降臨的經濟蕭條，鋼和鐵的價格直線下降，煤礦遭受巨大的生產損失和人員流失，工人們的悲慘境遇進一步惡化。各路軍閥的部隊為爭奪重要的株萍鐵路線持久混戰，令當地百姓生活艱難的程度在1920到1921年間日趨嚴重<sup>56</sup>——這恰好正是毛澤東首次去安源的前夕。

安源日常生活中的暴力如同一面鏡子，反映出地底下悲慘的工作狀況。煤坑中的溫度高達華氏 100 度左右，通風條件極差。<sup>57</sup> 礦工工作時沒有安全裝備和外衣，除了一幅三尺寬的藍布圍在頭上作為頭巾來減少頭部受傷之用。同樣的一塊布在出煤坑時作為裹腰布來提供一點點端莊，洗澡時又變成了面巾和浴巾。在瓦斯洩露時這塊布又有了另外一個用途，礦工將它用作臨時的面罩來遮擋口鼻，不讓有毒氣體攝入。<sup>58</sup>

瓦斯洩露經常發生，由此而導致死亡更屬尋常，這情況令人驚心。一份安源事故調查總結了關於這些危險狀況令人痛心的證據。1905 年超過 90 名礦工在一起瓦斯洩露中死亡。三年之後，超過 200 名安源礦工在一場地下火災中喪生。1917 年，92 名工人在中心煤坑的一次煤氣爆炸中被燒死，這次事故導致煤礦關閉了整整一個星期。三年後，39 名工人在另一次煤氣爆炸中喪生。次年在一次由炸藥引起的火災中，40 名工人喪生，20 名受傷。<sup>59</sup> 換句話說，在毛澤東來到安源之前的十五年裡，大約有 450 名工人在一連串重大事故中喪生。疾病也是另外一個重大問題。1918 年，安源的一位醫生撰寫報告說，百分之九十的礦工受到鉤蟲病的影響身體虛弱。<sup>60</sup> 最終會劇痛致死的黑肺病在礦工中大範圍肆虐流行。

加上殘酷無情的監工們的粗暴對待，地下礦井所存在的危險程度愈加可怕。據大多數人說，儘管德國主管們較容易成為秘密會社遷怒的目標，他們並不是最厲害的欺壓者。有一個來自湖北的總監工叫做王鴻卿，人稱王三鬍子，公認是安源煤礦最殘酷的監工。煤礦開辦之初他便開始任職，其權力不僅僅來自他資格較老，更來自他與當地另外兩個有權有勢者之間密切的私人關係。其中一個是他的湖北同鄉及同學方本仁，是多年擔任贛西守衛部隊的首長。另一個則是王鴻卿的兄長，是萍鄉洪幫的一個重要頭領。<sup>61</sup> 這些私人關係給予他欺壓工人的權威，王鴻卿在礦井生產中像暴君一樣統治長達近三十年，直到北伐時期政治環境驟變他才匆匆逃命。在煤礦的多年期間，除了常規工資，王三鬍子通過將包工頭職位售予出價最高者的方式來賺取收入。這些包工頭進入礦坑時很少有不帶着皮鞭的。只要有情況發生，他們隨時準備實施他們的權威。王三鬍子和包工頭同伙們隨意武斷地濫用刑罰，使得本就險情四伏的工作環境愈加危險重重。<sup>62</sup>

安源工人的生活環境也並不比工作環境好多少。圍繞着煤礦坐落着四個宿舍區，每區居住着幾千個工人。這些宿舍是空間狹窄、黑暗潮濕的

小屋子，除了極度疲勞的 12 小時上班時間之外，工人們就在這樣的小屋裡吃飯和睡覺。<sup>63</sup> 負責居住於此的每一組工人的包工頭的名字被寫在木板上，掛在每一間小屋的門上。宿舍小屋每間寬 3.5 米，長 7 米，容納 48 個工人。這些工人所睡的床為粗糙的雙人鋪位床，兩縱排，各有三層。兩排床中間安放着一張用於進餐的長條桌子。而在小屋內居住的工人數目是實際床位數目的兩倍，因為日班和夜班的工人們輪流使用這些床鋪。工人伙食是粗米飯和鹽漬蔬菜。宿舍裡遍佈昆蟲和害蟲，並且因為衛生條件極差而散發出惡臭。<sup>64</sup> 這些又陰暗又骯髒的工人宿舍與為公司職員層級的技師和管理人員所提供的向陽而且寬敞的住宅，形成鮮明對比。正如一位目擊者形容，此二者之間「且有天淵之別」。<sup>65</sup> 自然，那些外國顧問的住所擁有最優越的居住條件：坐落在四周環山的青翠綠地中的高大木建房屋，他們一直住在裡面直到不得不離開這個地區為止。<sup>66</sup>

## 民間宗教和秘密會社

由於此地窮人和富人之間，以及地面上和地底下的活動之間有如此巨大反差，煤礦地區的居民們形成了一種摩尼教加千禧主義的精神信仰。<sup>67</sup> 在安源長大並在當地共產黨開辦的一間學校上過學的革命作家吳運鐸，在他著名的自傳中回憶道：「我家就住在煤窯直井口旁的山腳下。在我童年的心裡，礦井是個很神秘的地方。老年人說，那裡藏着寶物，誰能得到寶物，誰就得到幸福。也有人說，那裡暗無天日，有一天太陽照進了礦井，人們就不再受窮受苦。」<sup>68</sup> 礦區工人的生活異常艱難，不同群體之間存在巨大的不平等，所以超自然的信仰和儀式在當地文化中佔據中心地位，並非是一件怪事。每天下礦之前，安源的礦工們都會燒香拜佛祈求平安。所拜的這個菩薩像是礦局出資購買的，擺放在通向各個礦坑的主要入口附近的一個大祭壇內。這個祭壇同時也是一年一度舉行向煤礦的保護神王爺致祭儀式的地點。慶典儀式由煤礦公司出資，供上雞作為祭品，還要上香並燒紙錢，以祈求來年得到神靈庇佑。<sup>69</sup>

煤礦的安全問題，並不是舉行宗教典禮的唯一目的。群眾參與的大型驅邪儀式中，一個主要環節便是把道教許天師的塑像放置在寬闊的肩輿上繞街，此乃當地宗教典禮的重要形式。宗教和娛樂是緊密相關的，驅魔舞



圖 2

安源煤礦原來的入口。右邊的建築物現在空置，以前曾經供奉有菩薩像，礦工們每天下礦之前都會在菩薩像前燒香。照片為作者拍攝。

者穿着彩色的道具服裝，戴着華麗的面具，不光為觀眾帶來娛樂，而且在驅走邪魔惡鬼的動作中為人們帶來治療效果。萍鄉作為一個重要的焰火生產中心，其宗教儀式以美輪美奐的夜間表演著稱。叮噹響亮的鈸聲、精美的木刻面具、芬芳的香氣、華麗的燈籠、喧鬧的鼓聲以及震耳欲聾的爆竹聲，吸引了潮水似的民眾前來觀賞，通常還有地方戲曲、雜技表演和舞獅舞龍等節目。<sup>70</sup> 萍鄉-湖南交界地區每年最隆重的節慶是新春的元宵燈節，寺廟和街市張燈結綵，掛滿了絢麗精美的獅燈、龍燈和其他生物形狀的花燈。萍鄉的特色地方戲被稱作採茶戲，從十八世紀開始流行。採茶戲深受湖南花鼓戲的影響，在燈節慶典上助興表演，演員們生動活潑的歌舞表演，使色彩繽紛的花燈展覽更加精彩紛呈。<sup>71</sup>

除了祈求獲得超自然神力的幫助外，礦工們還十分看重可能引起生產事故跡象的各種禁忌。在地底下工作時，礦工不許說與災難有關的任何



「不吉利」的詞語，比如火、洪水、瓦斯或者鬼。如果任何人打破了禁忌，煤礦的礦長或者總經理會放鞭炮來驅走壞兆頭，在這之後，惹事的工人要用被扣的工資給目睹這一輕率行為的每一名在場者買四塊豆腐。由於礦工們通常是一大群人一起作業，這一類違反規定的舉動，通常會使冒失的工人丟掉一到兩個月的工資。傷害在煤礦裡到處亂竄的老鼠也是禁忌之一。這些齧齒動物被認為是一種重要的警告信號，在洪水或者瓦斯爆炸即將發生之前的片刻它們會竄奔出礦井，有時會在這個過程中輕咬礦工裸露的腳趾。<sup>72</sup>

對工人們來說，要在這個困難重重的嚴峻環境中生存下來，最有效的方式便是去依靠秘密幫會當地的分堂。在二十世紀初，安源大部分礦工都是哥老會成員。入會儀式在夜間秘密舉行，儀式上要飲雄雞血酒，要發誓嚴守組織秘密以及對同伴忠心互助。入會的新人之間通過形同親屬關係的稱呼來加強密切關係，這種命名方法把所有新招成員定名為來自同一家庭的「兄弟」。當地地方幫會的內部組織等級森嚴，普通成員需要嚴格遵守香堂的「師傅」發出的指示。這種「徒弟」和「師傅」之間的追隨關係，包含着忠誠和義務。相反，各個地方分堂之間的外部聯繫則較稀少，也並不持久。<sup>73</sup>

可惜的是，關於哥老會在安源和其他地方如何發端，以及如何壯大的具體細節並不成體系，均是零散破碎不完整的信息。安源的分部，歸屬於由多個起誓結義兄弟團體形成的鬆散關聯組織中的一支，而且這個關聯組織並無統一的總部和首領。各個分堂「共同從來源於中國民間傳說的類宗教文化傳統進行了繼承，充滿了道德和倫理性的理想主義，制定了種種秘密儀式」。<sup>74</sup> 到底哥老會是源於三合會或白蓮教，或者更大可能是將之融合為一體還不能確定。<sup>75</sup> 無論最初如何肇端，在十九世紀末，哥老會已經成為中國中部區域勢力最大的秘密幫會，與三合會關係密切——假定他們之間仍存在着區分的話。他們亦是該地區土匪活動和有組織犯罪的主要操作者。

哥老會在十九世紀後半葉迅速擴張，主要得益於曾國藩將湘軍遣散。這些湘軍士兵在軍隊打仗時期相互結拜兄弟。1864年清剿太平天國之役結束，湘軍被解散，十萬餘名昔日「勇士」突然發現自己無用武之地。經歷了戰爭的炮火，習慣了四處流動，這些仍年輕力壯的退伍兵丁大都是哥老

會的成員，他們從湖南向中國中部各地四散，尋找其他可能出路。除了武力之外，他們無其他謀生技能。通過哥老會介紹可以最有把握獲得工作，因為哥老會壟斷了賭博、走私、挖礦以及其他無需技能的工作機會。儘管各個分堂在地域上界限分明，當成員從某地流動到他處時，仍可靈活地在不同的分堂之間轉換。<sup>76</sup>

哥老會內部運作的資料很稀見並不奇怪。根據大多數資料，哥老會的儀式同三合會或者天地會的複雜儀式很相似，甚至要較為簡單。<sup>77</sup> 同三合會一樣，入會儀式通常在晚上舉行，稱作「開山堂」。新成員由保人引薦，而保人要為新人的身家清白作擔保。在分堂堂主的常規形式問題之後，入會新人鄭重嚴肅地發誓，嚴守幫會戒律，在設有「五祖」牌位的供桌前上一把香，「五祖」乃是被尊為其門派創始人的五位祖師，此外還要飲摻了酒的雄雞血來證明他願與其他成員結拜為兄弟的誠意。照慣例是要繳納一筆入會費。在隆重熱鬧的盛會中，新老成員間的關係得以建立。每個香堂都有自己的口號、隱語、詩句和手勢；當新人交納入會費用之後，香堂的師傅就會把這些傳授給他們。<sup>78</sup> 像中國其他秘密幫會以及兄弟結拜團體一樣，這些隱秘語句和手勢代表了對數字算命的迷戀；數字 3 和 5 被認為吉利。把漢字拆解然後進行重組以卜吉凶的測字算命，為香堂頭領們常常使用。新成員會被授予咒符或者護身符，比如一塊寫有神奇字符的紅布或是一面有香堂旗形式特徵的小旗子，將它們隨身攜帶可以獲得超自然的神力保護。同時，分堂也會向入會新人傳授武藝。無論煤礦內外，安源日常生活充斥着暴力行為，掌握這種技能確實很有必要。

趕集市和民間節慶（尤其是新春元宵燈節）是表演武術的重要場合，也是徵募新成員的主要機會。出於招募成員的動機，幫會的人會當街派發小塊布製的護身符給人群中有可能成為成員的人，這種姿態叫做「放票」。為了吸引新的信徒，武術師傅們在喧天鑼鼓聲中精神抖擻地表演起舞獅和舞龍的節目。「請柬」會被送到當地顯貴人士家中，希望他們用鞭炮和紅包歡迎舞者。<sup>79</sup> 像這種日子，成百上千人在城裡遊玩，觀賞色彩繽紛的燈籠和生動的戲曲和舞蹈，如此場面為哥老會發動起義提供了方便的掩護，而起義也的確常常發生在舉辦這些活動的日子裡。<sup>80</sup> 分堂頭領們在領導信眾參與這種危險的集體行動之前——如深夜突襲當地糧倉或是大膽發動對縣

衙門的襲擊等——通常要重飲雄雞血酒、再發盟誓和升起戰旗，以加強成員間的結盟關係。<sup>81</sup>

在湘贛交界地區，哥老會照看着獲利豐厚的大賭館。每天早上，設在市集上的分堂都會派人去附近村莊向居民收取前一晚的賭注。其賭博方式要求玩家在三十六個漢字中選出一個，當晚莊家會抽一個字，押中這個漢字的玩家會得到賭注三十倍的金額，這種賭博在當地稱作「開票」。這在當地非常流行，不光富裕的地主和鄉紳人家，而且哥老會主要成分的工人和邊緣人員都大量參與。<sup>82</sup> 這些賭博業務為幫會提供經費，可以籌辦隆重的盛會，資助急需幫助的成員等。在煤礦的發薪日，每月的第一天和第十五天，工人們當天休息，賭博場所和妓院人滿為患。行政職員也參與賭博活動。曾經有一個公司職員吊死在路邊，因為他欠的賭債超過一千元，對於他微薄的五十元月薪來說，實在是一筆難以償還的巨債。<sup>83</sup>

哥老會這一名稱更多是官方或者學者指稱這個秘密會社派別的類別標籤，而並不是幫會成員的自我稱謂。至少在江西，成員們通常自稱為洪幫或者洪家。三合會的自稱也是洪幫或者洪家。他們均使用同樣的稱呼，因而這些曾經相互有別但又交叉重合的秘密幫會門派的自我稱謂使人困惑。儘管如此，很明顯，二十世紀早期華中地區以哥老會為名數目眾多的幫會都有共通組織特徵和儀式活動。<sup>84</sup> 同樣清楚的是，這些秘密幫會群體在各自勢力地盤內有着支配性的經濟和政治力量。<sup>85</sup> 在哥老會支配的地方，事無大小，從個人糾紛到公共集市都由哥老會規管。

一如它的名字，哥老會若不全是，也會是一個絕大多數成員為男性的團體。<sup>86</sup> 組織裡男性間的友誼和如兄弟般保護的承諾，對單身男性來說非常誘人——比如那些住在簡陋的單身宿舍裡，以危及生命的工作為生的士兵和礦工。有時，這些會堂也成為同性聯繫的地點。<sup>87</sup> 無論如何，豐盛宴席、醉酒、抽食鴉片以及秘密的夜間儀式，確實為他們單調乏味和艱辛困難的生活增添色彩，並且相互建立起深厚的同胞情誼。有規律的練武活動，為群體作戰強化了基礎。集體約束由嚴格的「紅十條」戒律規範，所有成員都必須遵守。在團體的心目中，成員所犯的最嚴重罪行，就是同另一個成員的女性家人，如妻子、姐妹或者女兒，發生奸情。這種罪行叫做「穿紅鞋子」，犯事者會被處死作為懲戒。<sup>88</sup>

雖然地域分化明顯，但哥老會內部結構都是從屬庇護關係，而且有明確的等級。香堂通常設八個領導層級，稱作「宮」，每個負單獨的職責。最高職位稱「龍頭」，所有香堂人員要絕對遵從這位高高在上的頭領。大家推崇他的超強神力，如高超的武藝、口頭相傳的刀槍不入能力等，龍頭對堂裡事務具有最終決定權。在儀式典禮上，龍頭常常會穿着有顯示神力的特別護身符裝飾的袍子。在他之下，頭目們分為七個不同等級，都有標準的頭銜稱呼，比如「紅旗」「旋風」之類，承擔不同的分工，例如負責招募新成員，和當地權貴聯絡等。香堂同時佈置自己的偵察和通訊網，以便保護幫會頭領，同時收集搶劫機會、敵人兵力等等方面的情報。<sup>89</sup>

至少在十九世紀晚期，哥老會的一些頭領充滿了反滿情緒，很容易地接受了推翻清朝統治的革命倡議。這種態度在領導層中延伸有多廣泛不得而知，更無法了解向一般大眾成員滲透到何種程度。正如萍瀏醴起義的失敗證明，秘密會社在革命事業中並不是完全可靠的盟友。儘管如此，每個分堂中數以千計的普通成員都立誓遵從香堂師傅的命令，這些特點使革命幹事們——如國民革命者和共產主義者——認為同秘密會社頭領結盟極為有用。對於積極尋找民眾支持的激進知識分子來說，同當地龍頭定約為大範圍地進行政治活動提供了即便不穩定也是頃刻即得的群眾基礎。

儘管十九世紀時期，涉及到哥老會的絕大多數暴力事件都是盜匪行為，例如搶劫和走私，但是到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公開的仇外和反教活動愈來愈多。這些衝突起先是出於對傳教士和教徒的敵意，漸漸成為以推翻清朝統治為宗旨的另一種仇外主義的基礎。哥老會提出了反清復明的口號，世紀之交的革命人士把這一行動解讀為是對萌芽成長中的國民主義的一種歡迎，這些反滿情緒的表達儘管短暫零碎，但是為激進知識分子和秘密會社結盟鋪平了道路。<sup>90</sup> 這種聯盟所具的效用和危險性，在萍瀏醴起義的興起以及失敗結局裡面得到非常具體的證明。在十五年之後，毛澤東及其同志們依據歷史上的這個經驗，也向安源的哥老會表達了如此意向。

### 當地的權勢人物——黑幫、神職人員、鄉紳和資本家

哥老會，或者稱洪幫，控制了勞動力和娛樂活動，在二十世紀早期成為安源的支配勢力。在這個時期，安源獲得了「小上海」的暱稱，同那個

處於青幫勢力之下而名聲更響亮的城市一樣，安源是一個蓬勃發展的產業中心，主要的居民為鄉下移民，他們需要從有秘密幫會背景的包工頭處覓得一份工作。<sup>91</sup> 萍鄉的洪幫龍頭是安源煤礦管理的「顧問」，領取薪水，煤礦大部分的包工頭都是向他宣過誓的信徒。這些包工頭在自己的老家招募工人，工人幹活掙得的工資要被工頭抽走可觀的比例，工頭對所招的工人施加極其嚴苛的控制。一個工人回憶道：

工頭家裡的婚喪喜事，工人都要送禮，並要聚在工頭家打牌，當然是工頭做頭，對工頭來說這又是一筆可觀的收入。如果有哪個工人不送禮，那就對不起，客氣一點的就在平常折磨你，弄得你非孝敬他不可；不客氣的就乾脆把你開除。當時開除一個工人實在太容易了，只要工頭、職員有事沒事的找一個借口，說一句話，你就完了。<sup>92</sup>

由於僱傭和開除行為完全依賴工人和包工頭之間的主侍庇護關係 (patron-client relations)，雖然包工頭本人很早就不再下礦工作，但是工人們聽從來自他們黑幫老闆的命令，多於接受在場當值的煤礦管理職員的監管。由於洪幫擁有和運營的宿舍和食堂是大部分礦工休息和用餐的場所，這種依賴關係進一步加深。

儘管龍頭是煤礦公司的「顧問」，管理高層卻將這些黑幫包工頭視為勞動紀律的最大障礙。總工程師賴倫對這些工頭的勢力感到不安，一度曾試圖通過直接發放工人福利來削弱這些人對礦工的控制。一份同時代的文稿記錄了這次衝突的經過：

這些黑幫頭目只在每月第一天訂立合同日和第十五天發薪日來煤礦。他們穿着華麗的綢緞袍子，從萍鄉城用轎子抬過來。一個月裡的其他時間，他們都在城裡享樂，而由別人為他們工作。賴倫先生對此不悅，他意識到現在必須要打破這些工頭享有的權力。唯一可以打破這些包工頭控制工人的權力的方式，就是由煤礦給礦工們提供住宿，並且由煤礦出資向工人提供膳食。……

工人宿舍區在次年春節時幾近竣工，所有的礦工被告知每人的工資將按照本人工作量發放，無任何人有權壓榨他們。新年伊始，(賴倫)收到了來自 63 個黑幫頭目的一封抗議信，告訴他所有礦工都反對這種新舉措。有消息傳出，大年初五那天，礦工們聚集在附近的廟宇，有一個黑幫頭子告訴工人，所謂的新辦法會損害他們的

利益，他們應該聯合起來反對。如通常一樣，人們跟隨了煽動者，並請一位讀書人撰寫了抗議。他們都起了誓彼此不背叛。<sup>93</sup>

在這種情況下，賴倫打發了帶頭的人，成功地將工人們安置到新的宿舍。但是不久之後，這些黑幫分子重新恢復了他們對勞工群體的控制。這些煤礦經理們作為外來者，如若沒有包工頭相助，無法順利地招募新人和保留工人。而且，幫會的影響力延伸到礦區之外的範圍。周圍城鎮的主要商業場所，比如賭場和鴉片館、妓院和當舖等，都在洪幫的控制之下。<sup>94</sup>

儘管洪幫勢力影響很廣，秘密幫會也並不是安源當地唯一的一支力量。權威更加正統的機構，如官府、商會、宗祠、寺廟、教堂和學校等，也都有強大的影響力。<sup>95</sup> 同時，在上述事例中，黑幫分子在附近的廟宇聚集時還得到文化人的幫助，可見當地的精英人士和種種制度之間的關係十分複雜，且互有交集。

在二十世紀早期，安源最大最重要的機構之一是聖公會聖雅各堂 (St. James Episcopal Church)。<sup>96</sup> 1898 年，一位叫吳鴻景的中國聖公會牧師抵達萍鄉，計劃在此修建一座教堂。他發現在縣裡傳教收效甚微，於是多行了五里路來到安源，而此處新建的煤礦聚合了人數眾多、各色各樣的中外居民。這個新興城鎮裡迅速增長的人口，使得這個傳教士突然意識到這裡便是福音傳道的理想地點。會長吳鴻景牧師向設在漢口的湘鄂教區申請在安源修建一個教堂，獲撥一筆資金，購置了小山頂上俯瞰整個煤礦的一大片土地，計 2,800 平方米。這片開闊之地修建起一座可容納超過兩千名信眾的大教堂，在地方資助下於 1915 年竣工。其後又陸續建造了會長宅邸、教堂辦公室和禮拜堂。吳會長開創性的努力不久就成果豐碩，在寬敞的教堂內，座位上坐滿了信眾。每個星期天，聖雅各堂塔尖上大鐘洪亮的聲音在山區迴響，招引教徒來做禮拜。教堂的信眾大多為萍鄉煤礦的行政職員和技術人員及其家屬，他們主要來自江浙粵的縣鎮和城市。

中華聖公會和漢冶萍煤鐵廠礦公司在這片江西高地上都是外來機構，他們有共通的特點和考量。二者都是在上海這個國際都市設立總部，在漢口開設下屬辦事機構，所以負責安源分支機構運作的員工們認為，自己代表一個宏大的現代化文明任務，並不需要對當地利益負責。<sup>97</sup> 聖公會聖雅各堂和萍鄉煤礦公司由於擁有促進現代教育的共同興趣而使相互之間的紐帶緊密起來。1906 年，煤礦公司決定為公司職員的小孩開辦小學，以公司

收益的固定比例作為經費。隨着註冊學生人數猛增，1912 年公司將小學擴展，分為初級部和高級部，並開始收取學費。費用遠遠超過普通礦工所能負擔的數額，雖然公司答應為幾個天資聰穎的貧困學生提供獎學金，上學的幾百個小學生絕大多數仍是交得起高昂學費的電子工程師和高級技師家的子弟。1920 年 7 月，鑒於自己管理學校有諸多麻煩，煤礦公司決定委託聖公會承擔教育任務，每年給予補貼八百元。聖雅各堂視學校為傳播福音的理想場所，故而欣然地接受了這一建議。在新的校董事會中，組成成員包括董事長、副董事長和煤礦的審計員，再加上學校的校長和聖雅各堂的會長。之後數年，在新的董事會監督下，安源又增開了幾所新學校，招收近五百名學生。正如吳牧師早先期盼的那樣，這些學校成為擴大教會信眾群體的極佳途徑。課程講授大量的基督教信理，不久之後有超過半數的學生參加了主日學班。<sup>98</sup>

安源地區教徒人數顯著增長，由左翼主教吳德施 (Logan Roots) 統領的聖公會湘鄂教區因而從漢口向聖雅各堂區派遣來更多神職人員。於是甫從神學院畢業的牧師龍永鑒接管學校校長一職，繼而取代年老的吳鴻景會長成為新任會長。龍會長以將神學與有效教育法相結合而著稱，在福音傳播和教育知識兩個領域注入了新的活力。<sup>99</sup> 在龍永鑒靈活的指導下，安源地區陸續開辦了更多的學校以及下屬禮拜堂。

萍鄉煤礦總局十分感謝教堂為教育公司員工子弟所作的貢獻，但當地其他精英如儒家士紳階層和秘密會社頭領則有不同的反應。在他們眼中，礦局和教堂都是打破了原有勢力平衡的入侵者。萍鄉的教育之前統一由六堂辦學。六堂為當地幾個大家族興辦的慈善機構的統稱。<sup>100</sup> 地方士紳階層在教育上的壟斷權力遭到外來人的挑戰，而且學校講授的內容和形式，竟然與儒家標準截然不同，這些都讓鄉紳們大為不悅。

工業資本家盛宣懷和他的助理們在將安源定為新企業的地點後，不久就對煤礦運營重新作了一番調整，他們專橫傲慢的方式加深了本地人對煤礦公司的憤懣情緒。甚至曾經一度贊同支持的文氏家族也對之反感。儘管如此，由於盛宣懷從張之洞和其他朝廷高官那裡獲得官方庇護支持，當地的抵觸僅屬徒勞。對這一過程，一位歷史學家總結道：「就煤礦業而言，官辦利益將萍鄉鄉紳階層從該縣的決策位置排擠出去……因為文家和其他

鄉紳家族不能融入到現代經濟中，新的工業秩序使他們顯得冗餘。」<sup>101</sup> 煤礦公司的辦公大樓取代文家宗祠，成為萍鄉縣經濟的神經中樞。

在 1911 年辛亥革命之後不久，由於政治環境不明朗，江西官府基於地方利益試圖去奪取煤礦所有權。為防止煤礦公司落入地方士紳和官員手中，副礦長李壽銓在湖南友人的幫助下，在全礦大會上被推選為礦長。湖南籍的革命領導者黃興於八年前出於革命目的而招募過李壽銓，此時他專門去萍鄉表彰該地在萍瀏醴起義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黃興作為新創民國政府委任的國家礦務的督辦，對安源進行了一次高規格的考察，他的到訪使新選礦長李壽銓的威信大增。<sup>102</sup>

作為安源煤礦礦長，李壽銓心繫萍鄉的土地和民眾，致力於諸多公益事業。在公司創辦人盛宣懷和第一任煤礦總辦張贊宸離世之後，他修建了兩座宏偉的祠堂以紀念這兩位江蘇同鄉。他也沒有忘記他的湖南友人。1921 年，鄰近的湖南邊境上的醴陵地區乾旱異常嚴重，李壽銓遠赴上海為受災民眾籌得三萬餘元救濟款。儘管積極引用外國技術，李壽銓卻是一位毫不掩飾的愛國者。作為礦長，李壽銓站在工人的立場上，處理了數起工人同德國管理職員發生的衝突事件，1919 年他甚至決定將煤礦公司的外籍員工全部換成中國人。<sup>103</sup> 儘管後來在共產黨的正式歷史中，李壽銓被定性為一個冷酷無情的資本家和帝國主義走狗，他實際上對進步力量並不敵對。事實上，李壽銓本人的革命傾向，將會在湖南共產主義革命者們在礦區深入開展工作時發揮重要的作用。

至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安源精英階層之間既有紛爭，又互有合作，複雜的相互關係時常發生變動。萍鄉士紳最初憧憬官僚資本的大量湧入會為困頓的當地經濟帶來繁榮，但漸漸因煤礦公司過激的管理手段而生憎惡情緒。煤礦公司大肆吞併土地，高度依賴外國專業技能，並同聖公會形成親密良好的關係，諸如此類都引起了當地人的敵意。萍鄉煤礦總局和聖雅各堂在文化和體制上不與二者所處的本省，反而與湖南、湖北甚至上海更密切，亦構成令江西士紳感到氣憤的另一緣由。老派和新派精英人士爭執不休，關鍵的權力中介人這一角色就落到洪幫大佬手中。毛澤東與其他革命同志們在選擇安源煤礦作為發動革命勞工運動之地時，須處理的正是如此複雜的當地政治圖景。



## 革命的根基

安源擁有成為組織革命勞工運動發展前景絕佳之地的諸多特徵。礦工和鐵路工人總共超過一萬名，在此地悠久響亮的反抗歷史的影響下，他們願意傾聽提高無產階級地位的號召。從社會科學理論的角度來說，選擇安源是大有前途的方案。社會學家克拉克·克爾 (Clark Kerr) 和亞伯拉罕·西格爾 (Abraham Siegel) 在關於勞工衝突的經典跨國研究中指出，煤礦和鐵路是兩個最易於爆發罷工的產業，萍鄉路礦公司將這兩個行業結納於一體，如同引火上身。<sup>104</sup> 公司在穩定增長了二十多年之後，恰恰在毛澤東到訪此地之前剛剛經歷了嚴重經濟衰退的打擊，這也形成了另一個動盪的來源。<sup>105</sup> 近來令萍鄉煤礦苦惱的一系列嚴重工業災難事故，使礦工們的「相對剝奪」感更趨強烈。

然而，即使在火藥味最濃的環境下，勞工反抗也很少完全自發地發生。在二十世紀早期的安源，在一系列事件中將導火索點燃的乃是哥老會幫派。作為地方上主要的犯罪集團，幫會擁有足夠的強制力量，來保證人數龐大又形形色色的會眾一致服從。但是秘密會社並不單單依靠武力和製造恐懼來運作。控制也通過各種符號性標誌來實現，如入會儀式、立誓效忠、巫術符咒、武術練功、接頭暗號和隱語指令等。這些類宗教活動融合了當地民間習俗，保障了對幫會頭領命令的服從，強化了團體內部的手足之情，密切了普通成員之間的相互協助。

哥老會掌控着缺乏技能的勞工群體，成為萍鄉地區從十九世紀中期到二十世紀早期各種造反和群體暴力事件的主要肇事者。幫會也是擾亂萍鄉生活的大多數仇外事件和周期性罷工的催化劑。而且它也構成了廣招礦工參加起義的革命運動——如太平天國和同盟會——的重要盟友。但是秘密會社的忠誠度常常變幻不定，正如萍瀏醴起義所證明的那樣。

1906 年的萍瀏醴起義和由共產主義革命者喚起的 1922 年大罷工 (下章主題) 結局完全不同，可以很好地說明中國共產主義革命者如何成功動員了群眾。首先，這些在安源開創共產主義事業的年輕知識分子所屬的現代性質政治黨派，雖然將總部設於遙遠的上海，似乎和意圖發展的這片江西高地上的支持者們距離遙遠，一如之前的同盟會先驅。然而，與這些先輩截然不同，共產主義革命者力圖在精英和工人之間找到共同的亦是

更為穩固的基礎。秘密幫會是達成如此目的的一種重要跳板，但並不是共產主義革命者所採用的唯一方式。各種各樣的文化資源，無論精英形式的還是群眾形式的，都為他們所運用。

不同於以往的各色起義者，毛澤東和革命同志們大力在當地創設新的機構，如工人補習學校、工會、消費合作社、武裝糾察隊，以及社會主義青年團支部和共產黨基層支部等。這種做法最終將有力地挑戰當地已經存在的各路勢力並且取而代之。不過，他們在進行這項任務時需要異常小心審慎，借助親友和同鄉的關係去接近地方精英中的關鍵人物。在獲得有影響力的地方大人物的信任之後，他們才繼續下一步的行動。儘管最初共產主義革命者們將他們的活動與大家熟悉的一些形式相結合，但他們的遠大目標不僅在於利用安源的反抗傳統，而且要將之進行轉化。最終的目的乃是要對社會和政治系統進行天翻地覆的重新配置。

在安源這個男性比例過高的社會裡，要享有尊上的領導地位無可避免地需要具備陽剛的雄性氣概的多重標準特徵。雷金慶 (Kam Louie) 深入論述了在中國男性氣質的文化建造中，文和武所施加的二元重要性。<sup>106</sup> 儘管如此，雷金慶強調，在中國社會長期以來，平衡兩種權威性的理想類型之間一般多傾向於前者：「自中國哲學思想發端之時始，文就被視為比武優越。」<sup>107</sup> 按照他的解釋，西方對男性氣質的經典概念認識是更為推崇大丈夫氣概的男性，而與此不同，儒家傳統培養的是有修養的文人而非勇士。在這樣的一個文化背景下，即使是洪幫龍頭大哥的強健肌肉都不能使他們免於受到更高權威之人的挑戰。舉止優雅的文化人在中國社會所享的特殊地位，是年輕的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可資利用的一個重要資源，在他們將安源煤礦工人的流行暴力特徵加以重塑和重新引導的工作中得到充分應用。

共產主義革命者們從事的將社會徹底改變的任務之所以能夠取得令人震驚的成功，很大一部分得益於他們巧妙運用了精英人士的社會資本。利用社會上對儒家讀書人的尊敬仰慕，這些教育程度很高的年輕共產主義革命者們將他們的文化技能和人情關係轉化為革命力量。共產主義革命者先以受人尊敬的老師身份進入安源的社會之中，然後根本改變了安源的社會。他們的改造工程需要將一種主要是從蘇聯引入的新式革命文化灌輸給安源工人。這個工作是在課堂內和課堂外一點一滴地輸入的。為了完成屬

於外來性質的這個計劃，毛澤東和諸位同志們開始是以知識階層人士的形象出現在安源的。

精英階層和普通群眾對教育的共同尊重，對於動員過程至關重要。但是同樣重要的是他們致力於比同盟會前輩們更宏大的目標。共產主義革命者竭力跨越通常間隔在有學識的知識人士和無文化的工人之間的文化鴻溝，用普遍通行的傳統方式，淺顯易懂地傳授新的革命信息。儘管中國民俗在意識形態上被批判為「封建迷信」，早期的共產主義革命者仍然創造性地將民間宗教儀式活動服務於他們自己的政治目的。共產主義革命者建立的工人俱樂部，大力廣泛地吸納洪幫成員，然後逐漸勸說他們拋棄從前的幫會聯繫，以形成一個新的自我身份。

人類學家瓊·納什 (June Nash) 分析了另一種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中的礦工的戰鬥性：「反抗有多種形式，通常那些還沒有喪失自我身份認同的群體的自主決心將會使其加強。儀式和信仰的融合，會強化包含了其歷史的神話傳說，同時……培養其群體，以便某時他們能夠造就自己的命運。派性主義的政治領袖通常將儀式性的反抗視為越軌行為。然而，如果將其視為一種預演，保持着高昂的革命熱情直到一個合宜的歷史性時機到來，如此，其實它是在強化政治運動。」<sup>108</sup> 按照納什的解釋，在共產主義革命者到訪之前的一個多世紀裡，擾亂安源生活的一系列由哥老會發動的起義事件，好似政治大戲正式上演前的帶妝彩排。依據她的看法，革命者們通常傾向於輕視這些類宗教儀式的反抗活動，並稱之為「越軌行為」，或按共產主義詞彙被貼上「封建迷信」的標籤。當然，中國官方的共產主義正統學說對這些活動持批判的立場，富有理想主義的年輕的中國共產主義積極分子包括毛澤東在內，都強烈質疑秘密會社的力量和其他「封建殘餘」。毛澤東和其他諸位湖南同志相當熟悉當地民俗習慣，敏銳地認識到安源的反抗傳統對於新式革命運動所具有的價值以及存在着的可轉化性。洪幫的造反活動轉化為紅軍的革命活動並不會自動形成，亦非必然。<sup>109</sup> 積極的共產主義骨幹們匠心獨運，創造性地採取和運用文化置位方法，加上當地精英階層的關鍵性干預，是實現這一幾乎難以踐行的目標所必須具備的條件。



## 第二章

# 教導革命：1922 年罷工

儘管關於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學術研究成果日漸豐碩，我們卻依然難以提供一個有力的答案來解釋革命勝利的核心問題，即：創建中國共產黨的知識分子群體究竟如何得以在與自己全然不同、文化程度低下且又窮困潦倒的工人農民階層中，培養出一大群黨的忠實追隨者呢？

誠然，因為知識分子在全球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運動中都扮演着領導角色，對於其他很多革命我們都可能提出類似疑問。<sup>1</sup> 然而，對於中國，這個問題尤其令人困惑：由於儒家經典長期以來的灌輸，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存在鮮明差異的這個觀念深入人心。正如孟子云：「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文人士大夫享有高人一等的社會地位，是故「文化人」(cultured) 與「非文化人」(uncultured) 之間存在着巨大的社會政治鴻溝。此外，在二十世紀初，旨在破除儒家傳統的新文化運動，曾經啟蒙了包括毛澤東在內的眾多中國先進知識分子。這一運動前以無政府主義、後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否定了儒家思想的正統地位。儘管如此，這樣的激進觀念並未影響到普通工人和農民。民族主義有別於仇外情緒——開始僅是受過教育的精英階層才持有這一理念。<sup>2</sup> 對於大多數中國人來說，民族國家和構成民族國家的社會階級依然是陌生的概念。

從萍瀏醴起義的失敗(第一章)中可見，準革命者(would-be revolutionaries) 與可能的追隨者(purported followers) 結盟並非理所當然。集體抗議的肥沃土壤——比如安源——以及其固有的團結性和思維力量，並非輕易就能轉向服務於其他可能的政治目的。而同時，共產主義革命者們一開始就決心採用新的基層組織模式。1921年7月在上海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開篇即聲明「本黨的基本任務是成立產業工會」，<sup>3</sup> 接着解釋通過哪些具體途徑達成目標，並且強調教育在其中的關鍵

作用：「因工人學校是組織產業工會過程中的一個階段，所以在一切產業部門均應成立這種學校……學校的基本方針是提高工人的覺悟，使他們認識到成立工會的必要。」<sup>4</sup>

中國共產黨強調無產階級教育這一政策，借鑒了俄國革命的先例和同時期中國進行的諸多試驗。<sup>5</sup> 為工人辦學是布爾什維克策略的一個要素。在當時的中國，各種社會建設倡議的呼聲亦頗為高漲：比如晏陽初的平民教育運動、黃炎培的職業教育運動和梁漱溟的鄉村建設運動，這些嘗試都試圖提高民眾的文化水平，並且提供實用技能的訓練。這些倡議引發了中國年輕知識分子的暢想，他們之中的一部分日後成為共產主義革命者。<sup>6</sup> 此外，中國共產黨的教學任務之所以最終成功，還要歸因於長久以來教育在中國民間文化及政治文化中佔據着重要的中心地位。相信有教無類，認為知識分子有責任向教育程度低的人給予道德指引——這種觀念均深蘊於中國古代和現代的思想之中。<sup>7</sup> 帝國時代後期，科舉考試體系便是這種哲學的制度表現形式。科舉制度將政府官職頒授予遴選出的學識淵博的儒生的同時，也讓他們擔負起向管轄之內的老百姓進行道德教化的責任。<sup>8</sup> 對於有經濟能力的家庭而言，教育是走向仕途和成就名利的優越途徑，因為教育具備向上流動性的功用，所以多個世紀以來在中國倍受整個社會的推崇。<sup>9</sup> 在如此的語境下，「教導革命」將是一種頗有說服力的群眾動員方式。

五四運動之後，共產主義小組最初在北京、上海成立時，小組成員便致力於工人教育。在 1921 年 7 月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一年多，共產主義小組的學生們就已經在京漢鐵路的長辛店站建立了一所工人學校。幾個月後，學校的鐵路工人便組織起工會，為避免引起地方當局的懷疑而稱之為「工人俱樂部」。不久，上海的共產主義積極分子仿照長辛店模式，為上海紡織工人建立了一批工人學校，接着也成立了一些工會。<sup>10</sup> 群眾教育與基層組織之間的關聯，對於共產主義革命任務活動成功與否至關緊要。

## 選中安源

毛澤東在上海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後回到老家湖南，主持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勞動組合書記部位於長沙的湖南分部。他熱切地遵照共產黨的指示去動員無產階級。但是當時湖南省境內的工廠

總體而言規模尚小且分散，而且初期的工人運動帶有強烈的無政府主義色彩。<sup>11</sup> 緊挨湖南省邊界的江西省萍鄉縣的安源，則是一塊處女地。安源的煤礦和鐵路總共有逾一萬工人，人數密集，是區域內最大的工業企業。該地造反的歷史傳統名聲響亮，亦是一種強大的召喚力。

事實上，在中共一大之前，毛澤東就已經被萍鄉的革命潛力所吸引。1920 年 11 月他曾去那裡旅行一周，在欣賞清秀的山區景色的同時，也對當地進行調查。當時毛澤東在長沙第一師範學校當國文老師，但主要精力都投入到社會活動。儘管在第一次去萍鄉的旅途中，毛澤東似乎並未經過安源煤礦，但他強烈地意識到在此地進行群眾動員的可能性。幾個月之前，數千萍鄉農民多次在地主家「吃磨飯」，其中一次農民們縱火焚燒地主的房子，燒死了幾個地主的家人。從萍鄉回來後不久，毛澤東就撰寫了〈告中國的農民〉一文刊登於《共產黨》上，其中熱情地提及是次反抗：

萍鄉今年這件事，也是中國農民覺悟的一點曙光……正如昏天黑地之中，東方現出一線曙光是一樣的……自打出生你們就被逼着如同畜生一般工作……你們只要學萍鄉底農民一樣……自然有共產主義來幫你們的忙的……你們全都照着萍鄉底農民這樣行動，共產主義就能使你們脫出一切的痛苦，使你們享沒有享過的福。<sup>12</sup>

儘管毛澤東對農民階級蘊藏的力量萌發了興趣，但中國共產黨當時仍處於發展的早期階段，其工作的方向是動員無產階級而非農民。從一大會議回來後不久，毛澤東再次前往萍鄉，此次是專門對安源煤礦進行調查。<sup>13</sup> 1921 年秋天毛澤東着手此項調查任務時，適值一戰結束後煤礦因為用煤需求量大滑而遭受到嚴重的經濟困難。更雪上加霜的是，軍閥切斷了重要的株萍鐵路，還向工人強制徵兵以增補軍隊兵力。<sup>14</sup> 幾個受過教育的湖南籍鐵路工人自發寫信給共產主義勞動組合書記部，請求派人到安源協助組織工人運動，依此明顯可見，鼓動工人行動的時機已經成熟。<sup>15</sup>

但是要和礦工取得聯繫，需要有合適的介紹人。毛澤東初訪途中寄住在湘潭老鄉、在礦局擔任段長職務的遠親毛紫雲家中。毛紫雲擅長以中草藥醫治困擾眾多礦工的咽喉疾病，在替人治病過程中與許多安源工人相熟。毛紫雲的住宅正處在煤礦正門口外面，很方便他協助來自湖南的親戚。在這位遠親的屋子裡，毛澤東被介紹給幾位礦工認識，隨後他便大膽地下了礦井。

毛澤東這次到訪所遇到的那幾位礦工日後接受訪談時提到，毛澤東到安源時攜帶一把湖南油紙傘，穿着當時教書先生穿的藍色長衫。<sup>16</sup> 毛澤東的讀書人扮相給工人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們日後回憶道，看到一個身份優越的知識分子如此急切地想要和地位卑微的礦工交流，讓他們感到非常驚訝。儒家思想對於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區分，使得這種跨階層的交流至少可以說很罕見。礦工和這位年輕的湖南教師之間的文化差異，不光是礦工們感到衝擊。三十多年之後毛澤東為中央軍事委員會新任命的委員們舉辦宴會時，委員中就包括幾個當年的安源工人。席間毛澤東本人回憶起自己第一次到煤礦時的情形。一位曾親歷 1954 年這次宴會的人士後來寫道：

毛主席回憶起年輕時在萍鄉煤礦調查的事。毛主席說：「當年接受了馬列主義教育之後，總認為自己是個革命者了。可哪知道一去煤礦和工人打交道，由於自己還是一副學生腔，先生樣，工人不買帳，我們也不知道怎樣做工作。現在想起來真有意思，成天只知道在鐵軌上轉來轉去。這樣下去怎麼行呢？後來想了很長時間才明白過來，思想立場還沒有轉變過來嘛。一個人的思想總是發展的，立場是可以轉變的。立場轉變了，才會認為我們要自覺放下架子拜工人為師。也真靈哩，後來我們和工人一起聊天，談心，工人同志才慢慢地和我們接近起來，心裡的話才願意和我們講……」<sup>17</sup>

儘管文化上的差異令毛澤東和他日後的追隨者起初存在隔閡，他本人的農村成長經歷和一口方言，讓他和工人之間可以暢通地交流談話。大多數工人和他一樣來自湖南地區。在到達安源差不多一星期的時候，他已經把他教書先生的長衫換成了更便於下礦井的長褲。

在和煤礦工人的考察交談中，毛澤東先詢問了他們艱苦的工作和生活條件，隨後將話題轉向教育。考慮到毛澤東在湖南的平民教育運動中一邊教書一邊進行革命活動，因此他相當自然地將討論的主題引向教育。雖然中國共產黨開辦學校的這個官方政策是以蘇聯革命模式為參照，但是在一個教育被視為社會流動途徑的文化環境裡，這個政策得到尤其強烈的共鳴。毛澤東初次去安源時邂逅的一個礦工後來回憶毛澤東如何介紹教育話題的情形（他竟然將那時的毛澤東稱呼為「主席」）：

主席問我們讀不讀書。我說飯還沒得，還有工讀書？主席說：完全義務書，不要錢。我說如果不要錢當然有人來讀。我問主席什麼



時候開學。主席說：今年時間不長了，要到明年開學，明年會派人來開學。第二天，我又碰到了主席，當時主席對我說明年要多邀幾個人來上學。<sup>18</sup>

1921 年 12 月毛澤東再次來到安源，為在礦區開辦學校作具體安排。<sup>19</sup>同行者還有三個來自湖南的教育活動家，其中包括精力充沛的李立三。李立三留學法國兩年，剛回國不久，他在回湖南老家前在上海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除了毛澤東和李立三，這個先鋒隊還有一位湖南的小學教員宋友生和湖南勞工會評議幹事張理全。張理全時任勞工會刊物《勞工週刊》的編輯，同時在長沙的甲種工業學校任教。四個年輕人在煤礦附近的一家小客棧住宿了好幾天，他們邀請工人們下班後過去一起坐坐聊聊。<sup>20</sup>

起初，安源工人中對共產主義倡議反應最熱烈的是鐵路工人。鐵路工人的教育水平和文化背景，使他們同這幾個鄰省的知識青年們可以進行順暢的思想交流。其中最熱情的是株萍鐵路的總司機朱少連，他是湖南人，從湖北鐵路學校畢業後被分配到安源工作。當被問及工人們最迫切關心的事情時，朱少連和工友們再次談到他們的子女因為費用過高而無力負擔上學的難處。以前礦工們已經向毛澤東提及過這個問題。根據資料記載，毛澤東回答道：「我們所以吃虧，是因為沒有文化，我們不但要辦工人子弟學校，而且還要辦工人補習學校。」<sup>21</sup>

## 在安源辦教育

小組回到湖南後不久，毛澤東就告知李立三，他決定讓其去安源開辦工人教育。毛澤東囑咐李立三要小心謹慎地對待當地風俗習慣，特別提醒他需要警惕對工人有強大控制力的秘密組織洪幫。毛澤東強調由於煤礦的「反動統治勢力」和「社會環境的黑暗」，革命動員不便公開進行，因此他建議採用間接的方法。在李立三的計劃安排中首先是為工人及其子女開辦學校。在作為一個受人尊敬的教書先生取得礦工們的信任之後，他才可以將工人們組織起來，為公開的政治目的活動。<sup>22</sup>

新建立的共產黨在通過的《第一個決議》中，正式地將工人教育作為組建工會的基石。毛澤東在給李立三的具體指示中，重申了這些指導原則。李立三在多年後回憶道，儘管毛澤東之所以選定安源是因為安源存在

的特殊革命潛力，他仍提醒這位急切的熱血青年切莫冒進。李立三必須要循序漸進，首要的任務是從群眾教育工作着手：

在一九二一年十一月間，毛澤東同志派我們到安源去做工人運動的時候，他對於如何在工人中進行工作，如何把工人逐漸組織起來進行鬥爭，已經是胸有成竹。他當時告訴我們要開展革命工作並不是很容易的。首先應當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爭取公開活動，以便和工人群眾接近，發現他們當中的優秀分子，逐漸把他們訓練和組織起來，建立〔共產〕黨的支部。他要我們以辦平民教育的名義，由湖南平民教育促進會介紹到安源去。<sup>23</sup>

雖然當時年僅二十三歲，李立三卻是派去安源擔任教師的一位理想人選。他家位於距安源以西不到 30 哩的湖南醴陵縣，其父為清朝秀才，教授儒家典籍；在父親的堅持下，李立三本人曾在老家醴陵的一所小學任教一段時期，之後離家去北京讀書，接着又赴法留學。1921 年底，從法國里昂歸來僅數星期，李立三到北京會見湖南籍的中學老同學羅章龍。當時京漢鐵路長辛店站新建立了一所共產黨領導下的鐵路工人學校，羅章龍在那裡主持工作。李立三對此事觸動很深，迫切地想要在別的工業地區仿效羅章龍的先鋒做法。安源既有來自毛澤東老家湘潭的礦工，也有許多工人是來自於李立三的老家醴陵，這亦是吸引這位未來的工運組織者的一個因素。

遵照毛澤東的建議，李立三請湖南省平民教育促進會副董事長李六如手書一封舉薦信，信中強調李立三不同尋常的教育資歷。然後他攜帶此信以懷有熱切抱負的教師身份前往安源。儘管工人學校的理念來源於蘇聯經驗，李立三實踐這項工作時卻有意地運用了本土的文化傳統。他獲知萍鄉縣知事是舉人出身且堅決反對白話文，於是李立三便運用從小所受的國學訓練，寫了一篇辭藻華麗的古體呈文，請求縣府允許其在安源開辦學校。

和之前毛澤東一樣，李立三也是依托親友才得以進入當地的社會。多虧他父親的一位朋友，掌管安源商會的醴陵人謝嵐舫，李立三的呈文被直接送達縣知事手中。縣知事閱後，頗欣賞函中的古體文風和流暢齊整的書法，於是邀請這位醴陵的年輕人親自去商談辦學事宜。李立三同他談論了通過發展教育提高民眾道德的話題。這個倡議具有儒家特色，讓這位保守的縣知事大為高興，他立刻同意簽發一份支持創辦新學校的官方公告。公

告中引用了李立三的呈文：「幫助工人增加知識，發揚德性」。<sup>24</sup> 這位知事不知，這些儒家色彩的修辭語彙為共產主義革命鋪平了道路。

這位籍貫湖北的縣知事甚為重視道德風尚，他希望李立三用知識教化改善安源的民風。這個簡陋的小鎮名聲醜惡，充斥着妓院、鴉片館和賭場，卻僅有一所學校。該鎮居民人口達八萬，但唯一正常運作的學校是在礦局資助下、由聖公會聖雅各堂主辦的（見第一章）。學校收取高昂的學費，而授課內容充滿濃厚的宗教色彩。在這個教會學校讀書的多是高級職員的孩子。能夠有幸上學的這幾百個學生，主要是來自上海和廣州的電機工程師們的子女。安源的普通工人想讓自己或者子女受到教育的希望甚為渺茫，<sup>25</sup> 在縣知事看來，李立三倡議的開辦學校之法，可使儒學與當地教會傳授的基督教教義相抗衡。雖然知事想當然的看法是錯的。

在經毛澤東介紹認識的株萍鐵路總司機朱少連和其他幾位湖南鐵路工人幫助下，李立三租用鎮上一處房宅頂層的三間房作為學校，將縣知事支持他的公告醒目地貼在大門上。他還在鎮上各處張貼了告示，宣傳這個不用交錢的讀書機會。很快就有三四十個學生報名，幾乎全部來自鐵路工人家庭。<sup>26</sup> 李立三作為老師去家訪，認識了不少工人。穿着長衫一家又一家招收學生的李立三很受人注目，當地人稱呼他為「遊學先生」。<sup>27</sup>

作為實現宏大教育目標關鍵的第一步，李立三以書生形象和學識修養贏得了當地官員的首肯，但是他很快就表現出他並非一般的儒學先生。儘管穿着傳統服裝，李立三夜間家訪的時候卻總是興致勃勃地談論通過工人教育、組織和鬥爭活動去改善勞工條件的話題。開始時，受過一些教育的鐵路工人比沒文化的礦工更容易吸收他的資訊。一群湖南籍的鐵路機械工人，包括讓李立三借住在他家的畢業於湖北鐵路學校的朱少連，以及新近從進步的長沙甲種工業學校完成學業的幾位畢業生，成為李立三的小團隊的核心。在一兩周內，李立三發展了八個有潛力的積極分子，其中僅有一位不是鐵路工人。李立三說動他們和自己一起組建了社會主義青年團安源支部。按照李立三的指導，這些團員將教育工友作為首要任務。李立三不久就讓青年團員中六人成立了共產黨支部。白天供工人子弟上課用的教室，在晚上則是工人夜校的課堂。<sup>28</sup>

夜校起初只有幾個鐵路車間工人，但規模很快便擴大到幾十個工人。李立三在教授基本文化知識的同時，也傳遞革命資訊，這種生動活潑的教

學方式很受工人歡迎。他用秘密會社算命時常用的將漢字拆解重組的測字法，告訴他們橫排的「工人」兩個漢字被豎直連起來便是一個「天」字。他向工人講，若工人站立起來，便能得到上天的保佑。他也善於將抽象的概念化為通俗易懂的比喻。很多年以後，一位當年的安源學生依然能清楚地記得李立三如何講解無產階級團結的重要性：「有一次，李立三同志講工人只有團結起來和資本家進行鬥爭才有力量時，拿來一根筷子和一把筷子作示範。一根筷子一折就斷了，一把筷子捆在一起就不容易斷。這個簡單的比方，發人深省。」<sup>29</sup>不久中國共產黨又派了另一位湖南的年輕教師蔣先雲來給工人子弟上課，讓李立三能夠將全部時間用於做工人教育的工作。<sup>30</sup>最初的八九位工人學生，比如組建安源社會主義青年團和共產黨支部的那幾位成員，大都是在甲種工業學校上過學的湖南鐵路機械工人。

這些湖南籍的工程技術員和機械工人對共產主義號召傾心接納，並非是安源所獨有；在中國的其他地方，相同的籍貫和教育背景讓技術型的男性工人特別響應共產主義活動。<sup>31</sup>雖然中國許多工業企業中職業技能與性別、出生地之間存在高度關聯，安源的情況要更為複雜。紡織廠和煙草廠中從事非技術性工作的人員，多是不說當地方言的外來女工，與之相反，安源煤礦的勞動力群體全為男性，所招收的搬運工、挖掘工和鐵路工程技術員，都來自本地方言所覆蓋的區域。從事非技術性工作的礦工大部分都同從事技術性工作的鐵路工人一樣來自湖南省。在這一點上他們與來自遙遠的廣東、江蘇、浙江省份中心城鎮的高級職員及電機工程師迥然相異。湖南的礦工們與從萍鄉縣附近村莊招來的礦工之間區別也很顯著，這些萍鄉人雖然屬於少數，卻是重要的群體。儘管湖南和萍鄉在語言和風俗上都非常近似，但自開建先進煤礦，長期以來，許多當地人對湖南人侵入本地的經濟和政治一直心存不滿。

李立三從一開始就清楚地認識到，要在安源取得成功必須獲得人數將近十倍於鐵路工人數目的煤礦工人的大力支持。雖然鐵路工人的教育程度高於礦工，幸而兩個群體擁有共通的方言和文化，便利互相交流合作。因此，李立三鼓勵鐵路工人主動聯絡礦工中的幫會兄弟，因為其中一些鐵路工人有洪幫背景。儘管他期望共產黨組建的機構最終要取代掌控工人的洪幫，如同毛澤東早前所警告過的，李立三明白若在此初期階段便與秘密會社發生直接碰撞，將會導致不利的後果。於是，工人們如果要上李立三的

學校，首先需要徵得他們的工頭的同意，而顯然幾乎所有的包工頭都是哥老會頭目。<sup>32</sup>

在李立三最初下礦井號召工人去上課的時候，作為知識分子的他行動如此古怪，竟招致工人們七嘴八舌的嘲弄和懷疑：「是不是福音堂來講福音書本的啣？」、「是不是聖公會天主教來講耶穌哩？」、「是不是青紅幫又要來招兵買馬呀？」<sup>33</sup> 儘管人們用那些慣常的組織體制來看待他的革命行動，李立三並不灰心氣餒。他堅持不懈，勸說每一個新加入的夜校學生招呼幾個朋友來。不久以後，工人學生群體人數大增，成分也更為多樣。當參加的工人多達六十名時，原來租用的教室已經容納不下。李立三組成了校務委員會，包括他和另外一位老師、鐵路工程技術員朱少連加上一位礦工，負責將學校搬遷到一個更大的場所。工人子弟學校和工人夜校都搬進了一棟更寬敞的樓裡，設有好幾間教室，另外還新增設了一間陳放左翼刊物的閱覽室。<sup>34</sup>

除場所問題之外，李立三還面臨着為他的教學活動準備合適授課教材的難題。為工人子弟上課可以使用平民教育促進會之前協同基督教青年會編纂的一些基礎教科書，課本內容為初級入門的語文閱讀和算術。然而安排工人們使用的教材的難度更大，除了教他們識字，上課的最終目的是要給工人們灌輸革命階級意識。李立三日後講述他用官方認同的課程作為掩護，逐步向工人們介紹反抗思想：「補習學校的課本有兩種，公開用的是平民教育課本，實際用的是我們自己編寫的，每次上課都宣傳一點馬列主義基本知識，主要講世界上的財富都是我們工人階級創造的。」<sup>35</sup> 官方教材是一本平民教育千字課本，開篇第一課由一句毫無危害性的話開始：「一人兩隻手，兩手十個指。」不過，未經批准的教材則含有講述階級衝突的內容，使用的是「工人與資本家」之類的標題。<sup>36</sup> 傳統教材和非正規教材一同使用，方便學生們進行偽裝。其中一個學生回憶道：「李隆之（譯者註：指李立三）……開學時我參加了……課本是千字課本，講工人受壓迫，受剝削的情況。恐怕外人聽見，門口派人看着，以後又印了油印的馬克思學說發給我們學習。倘外人來了我們就用千字課本蓋着。」<sup>37</sup> 毛澤東得知對課堂材料存在迫切需要以後，於 1922 年春天派湖南省平民教育促進會的副董事長李六如前往安源，專門給工人補習學校編寫合適的教材。正是這位李六如的介紹信幫助李立三叩開了當地官場的大門，而李六如於不久前

剛被毛澤東吸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李六如參觀了礦井和宿舍，親身察看了工人們的工作和生活條件，之後編纂了一套四冊的《平民讀本》，向工人們介紹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入門思想。<sup>38</sup>

租教室、印教材、買課本自然都需要錢，而為此類教育活動籌集足夠的資金是李立三面臨的另一大挑戰。最初，安源學校的資金由上海的勞動組合書記部和長沙的湖南省平民教育促進會提供。<sup>39</sup> 但是這些資助力量距離遙遠且各有迫切緊急的要務，完全依賴他們顯然會讓工作的進展受限。李立三又一次去找當地的達官貴人商談，運用他的儒家邏輯強調教育對道德修養的益處，很快學校得到了當地精英人士的慈善捐款。此外，工人學生們還象徵性地支付一點點學費。李立三的一個醴陵老鄉陳盛芳手藝精湛，在煤礦上擔任建築施工的工頭，尤其慷慨資助。<sup>40</sup>

## 安源工會

情況的發展正如共產黨預定的方針，安源工人補習學校成為組建其他勞工組織形式的跳板。一天晚上，幾位工人在學校的閱覽室看到一篇雜誌文章，介紹上海的紡織工人最近成立了「俱樂部」來推進他們的共同利益，而俱樂部這種稱呼其實是工會的代名詞。工人們向李立三詢問在安源是否也可開展類似的行動，這一建議自然讓這位年輕積極的共產主義革命組織者非常高興。經過兩次籌備會議，李立三、朱少連和其他幾位工人向萍鄉縣政府遞交了一份呈文，請求官方批准成立一個「工人俱樂部」，而成員僅限於鐵路工人和煤礦工人，並明確表示公司的職員是被排除在外。俱樂部以「聯絡感情，涵養德性，團結互助，共謀幸福」為宗旨，似乎並無危害，於是得到了縣知事的首肯，他未與萍鄉路礦公司商討便批准了這一請示。<sup>41</sup> 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籌備委員會成立起來，李立三為主任，鐵路工程技師朱少連為副主任，總部設立在租用的湖北同鄉會會館，而工人夜校的課室也隨之搬進了這個更為寬敞的場館。<sup>42</sup>

雖然工會的引入是一項新舉措，但是工會的組織和運作都受到了當地一些歷史先例的啟發。和萍瀏醴起義（見第一章）中的洪江會一樣，俱樂部的成員編組採取十進位。在每個車間都是每十人組成一個十人團，而每個車間由一位首領負責該部門裡所有的十人團。<sup>43</sup> 與洪幫分堂類似，工人

俱樂部也有自己的暗號隱語。俱樂部公開的宣言從表面上看似乎不具危險性，故而立刻獲得縣知事支持，但是新成員要發誓保密的內部宗旨，其實才反映了工會組織的真實目標：「保護工人的利益，減除工人的壓迫與痛苦。」同其他秘密會社一樣，成員需要繳納入會費。新成員立下團結互助的莊嚴誓言後，需要交納相當於一天工資的費用。此後，每個月都要交少量適度的會費，以維持俱樂部基本運作。<sup>44</sup> 即使如此，俱樂部的財務仍然是個問題，在最初的六個月，工人俱樂部收入 206 元中有 90 元是李立三自己借助給俱樂部的，幾近俱樂部經費的一半。<sup>45</sup>

依賴眾所周知的秘密會社習俗來建立新的革命組織，並非單獨只有李立三和初創的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在同一時期，從事農民運動的活動家彭湃大量借用三合會傳統，在老家廣東海豐縣建立了一個激進的農會。費爾南多·加爾維亞蒂 (Fernando Galbiati) 如此描述那些前三合會成員成群結隊地蜂擁加入彭湃新建的農會：「在他們眼裡，此二者並無甚區別。」<sup>46</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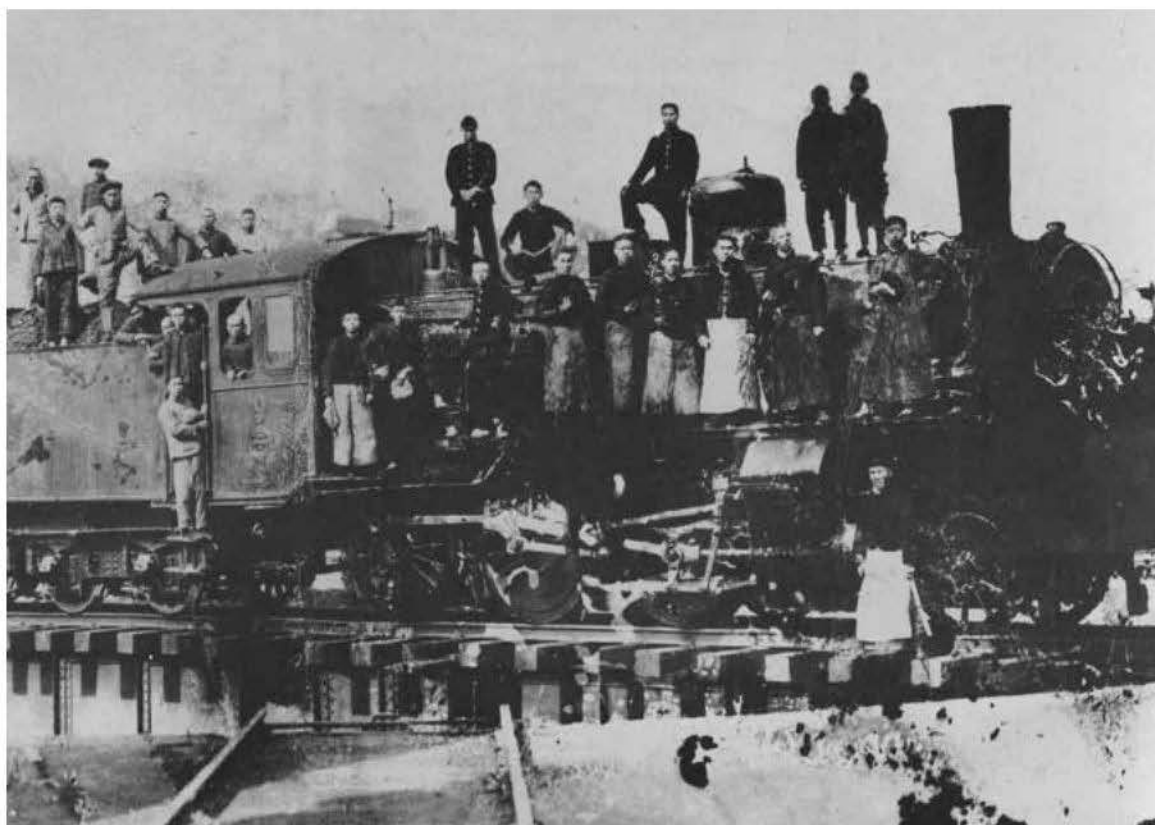


圖 3

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籌備委員會。李立三站在火車頭的中間一排，右起第五人。朱少連從機車窗口探身向外望。

共產主義革命者在建立新組織時發覺對他們頗有幫助的地方機制，不僅僅限於秘密社團的行為習俗。李立三在文化置位方面利用了民眾熟習的各種風俗儀式。例如，李立三為了激發群眾對工人俱樂部產生更為濃厚的興趣，決定工人夜校於一年一度的元宵燈節舉辦舞獅活動。依照當地的民俗，元宵燈節傳統上是當地達官顯貴出資籌辦武術表演的日子，武術師傅們通過生龍活虎的舞獅表演，展現高超的武功，以便吸引新的弟子。剛被李立三吸收進俱樂部的一名新成員西從乃，是個技藝超群的舞獅表演者，他被說動率隊表演。西從乃是洪幫的一個下級頭目，其武藝在幫中無人匹敵。他穿戴上當地手藝人為此次舞獅活動特別製作的色彩鮮豔的演出服裝，在喧鬧的鑼鈸和爆竹聲中，一路神氣地從煤礦舞到火車站，沿途在煤礦公司總部、商會、聖公會聖雅各教堂、湖南同鄉會、湖北同鄉會，以及洪幫頭領們住所前停下賣力表演一番，以表示特別的敬意。如計劃的一樣，表演吸引了一大批興高采烈的群眾一路跟隨這個騰挪跳躍的舞獅高手，一直跟到工人俱樂部，希望知道如何才能拜他為師。然而大家未曾預料到，這位武術師傅向聚集的人群說，「夜校李先生教我們從今以後不要學打了，也不再教拳了，只有讀好夜書，才能走正路，要讀書就跟我們去。」<sup>47</sup>

這些共產主義革命者迅速表現出在他們思想裡面並非傳統的教導內容，即並非是儒家宣導的文，也並非是武術推崇的武的種種形式。正如舞獅師傅西從乃對着想拜他為師的人群所說的，「我們的師傅家住在醴陵陽三石（李立三家鄉），我們的師公那就住得很遠很遠呀！找他還要飄洋過海去喲，他現在有百多歲了，他的名字叫馬天師（馬克思），是個大鬍子老公公。」<sup>48</sup>

李立三富有想像力的招募方式，吸引了大批新成員加入工人俱樂部，不過節日的氛圍並未就此消散。1922年5月1日，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宣佈成立，舉行了盛大的慶祝遊行活動。成百上千的工人跟隨着李立三，揮舞着紅旗，高喊着革命口號：「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勞工萬歲！」「工人俱樂部萬歲！」「打倒軍閥！」「共產黨萬歲！」再一次，李立三巧妙地展示了他利用傳統的風俗活動為新的動員目的而服務的天資。人群中，武師們抬着敞露的轎子。通常在宗教節慶中以這種轎子抬着神像繞境（見第一章），但是這次轎中所抬的尊貴客人，卻是距離七個海洋之遠的大鬍



子老公公卡爾·馬克思的半身像。<sup>49</sup> 李立三在文化置位上的創舉，將人們所熟習的民間儀式轉化成了革命招新的方式。

在工人俱樂部這場熱鬧的慶祝活動過去數周後，毛澤東前往安源察看勞工運動的進展。毛澤東對近期的發展表示總體滿意，但是對遊行的口號中含有「共產黨萬歲」作了尖銳批評。在剛創建的黨支部開的一次會議中，毛澤東重點強調在公開共產黨的角色之前，對黨內事務嚴格保密的重要性與加強勞工運動組織基礎的必要性。毛澤東又一次重申他之前作出的指導意見：動員必須循序漸進，要防止任何不必要的、不成熟的冒進主義。<sup>50</sup>

毛澤東對安源的活動組織者的嚴厲訓誡，說明處於早期階段的中國共產黨已不放心李立三動員群眾所採取的自由方式。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領導人張國燾日後如此評價李立三：「他是個熱情奔放的漢子，只求工作實效，不慣組織的約束……他老是以『急待解決』為理由……」<sup>51</sup>

無論是個性還是工作方式，李立三都易於衝動且不自我克制，他的浮誇行為，對於普通工人具有一種吸引力，然而對黨的上級領導來說則是一件麻煩事。李立三在塵土飛揚的安源煤礦小鎮上神氣地走來走去，或是身著長衫，或是西裝革履，刻意以時髦的打扮引人注目。他把在法國得到的一枚閃亮的金屬徽章佩戴在胸前，由此眾人傳言他「刀槍不入」，這種傳聞久久不散，而他卻並不關謠。相反，由於哥老會龍頭的威信建立在擁有超自然神力的名聲上，他從中受到啟發，竭力鼓勵有關他在外遊歷時獲得「五國洋人」保佑之傳言的散播。<sup>52</sup> 在這個男性人數佔據壓倒性比重、女性稀缺的環境裡，即使是他拈花惹草的名聲也增添了他的領導光環。<sup>53</sup> 不過，當然李立三之所以受安源工人的愛戴，最主要還是他對工人們的事情十分盡心，無論是擔任老師，還是組織工會活動都全力投入，孜孜不倦。

儘管加入工人俱樂部的工人約數百人，僅是安源總共一萬三千多勞工很小的一部分，但他們的火熱幹勁和富有組織性讓路礦公司擔憂，公司將俱樂部視為趨於擴大的嚴重威脅。在公司看來，工人俱樂部最令人不安的一個舉動是消費合作社的建立。1922年7月，由工人俱樂部開辦的一家合作社商店開業，向會員提供低息貸款，設定優惠的銀元兌換銅元比率，以低於市價出售諸如油、鹽、布、米等等基本生活必需品。合作社最初會員只有三十名左右，啟動資金僅一百元，是工人補習學校之外開展的一個小規模運營組織。合作社的第一任總經理由李立三擔任。雖然合作社剛初具

規模，路礦公司便意識到它撼動了自己掌控工人生計的壟斷地位。李立三以簡短的「可買便宜貨」這個口號招攬顧客，對大家極有吸引力。只有加入工人俱樂部成為合作社的會員才有資格享受合作社的誘人優惠，因此大批新成員踴躍地加入俱樂部。<sup>54</sup>

煤礦公司的另一層擔憂，是工人俱樂部的結構仿照洪幫，組織自己的武裝隊伍。這個武裝力量稱為「監察隊」，主要招募武術功夫精湛高強的洪幫成員。監察隊負責保護工人俱樂部以及共產黨領導人員的警衛工作，搜集煤礦公司的管理情報。他們手持木棒巡邏，定期在工人夜校訓練。隊長周懷德同毛澤東一樣是湖南湘潭人，出名愛跟人比武，在哥老會中活躍近二十年，後來加入共產黨。周懷德曾經參加過萍瀏醴起義，1906年期間在洪江會當過小頭目。他在煤礦常動用拳頭以武力反抗外國職員，多次襲擊德國的顧問和工程師，類似衝突不斷，直至外國人於1919年全體離開。由於功夫高，他經常被叫去調停工友之間的口角。由於好鬥，在工人中的地位高，周懷德成為李立三吸納新成員工作的特別對象。他先參加了工人夜校，之後被吸收加入共產黨，而同為幫派兄弟的舞獅師傅酉從乃，以及監察隊副隊長謝懷德亦是如此。<sup>55</sup> 情況類似的還有袁品高，一個來自李立三老家醴陵的年輕礦工，同樣以特別精湛的武術聞名。他被李立三勸說參加工人夜校學習，之後加入工人俱樂部以及社會主義青年團，最後加入了共產黨。袁品高是監察隊的一名主要成員，在劉少奇到達安源之後，成為了他所信任的貼身警衛員。<sup>56</sup>

有發展潛力的人員被挑選出來加以招募，之後再把他們帶進共產黨體系自然水到渠成。一名當時被吸收的成員回憶道：

李立三辦工人補習學校，我們在補習學校讀書，我是在罷工以前入黨的，是李立三介紹，我和易紹欽兩人同時入黨的。在五福齋巷子裡抽上房間宣的誓，牆上掛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盧森堡、李卜克納西的像，宣誓的誓詞是：犧牲個人為群眾謀利益，嚴守秘密，不對爺娘妻子說，守紀律，為革命奮鬥到底！<sup>57</sup>

對於李立三招收的許多成員來說，之前加入洪幫時曾經歷的入會儀式讓他們在入黨過程中彷彿似曾相識。事實上，加入共產黨所需的資格也相當類似加入洪幫的條件。加入共產黨時，安源工人並不需要表現出掌握了多少馬克思主義理論，或是有多信奉馬克思主義。其中一個成員日後被問及入

黨的資格條件時，他回答「主要條件就是守秘密，為群眾謀利益，犧牲自己」。<sup>58</sup>

即使加入共產黨的工人在觀念上並未有根本性改變，仍然保有過去秘密幫派的信仰和行為，但是共產黨日益壯大的情形使萍鄉煤礦公司焦灼不安，他們擔心這將會形成一支武裝的無產階級隊伍。同十五年前的萍瀏醴起義時一樣，在對於工人的不安分而造成的問題上，煤礦公司的高級管理層內部存在分歧。當時規模浩大的一波罷工浪潮正衝擊中國各地的工廠，所以工人隊伍的組織性可能會日漸加強，從而無法掌控，<sup>59</sup> 煤礦公司該如何應對，主管們卻意見不一。礦長李壽銓的革命同情心使他傾向於妥協與和解，但副礦長舒修泰的態度卻十分強硬。故而，公司的方案猶猶豫豫，生硬地試圖收買工人俱樂部的領導，繼而空泛地以鎮壓相威脅。當對李立三和朱少連的利誘和威逼均以失敗告終，公司向縣知事和鎮守使遞交呈文，請求派遣官兵運用武力強行關閉工人俱樂部。<sup>60</sup>

## 1922 年大罷工

在此關鍵節點上，毛澤東又一次到訪安源。他獲悉李立三在教育和動員路礦工人的工作上取得進一步的進展，共產黨支部現已超過三十個成員，工人俱樂部日益快速壯大。毛澤東得出結論認為，在安源組織一次大罷工的時機已經成熟。萍鄉路礦公司因為煤的價格下跌已經拖欠了數月工資，此事激怒了全體工人。再者，公司出手鎮壓工人俱樂部的拙劣行徑，亦是發動罷工的一個絕佳契機。回到長沙後，毛澤東在致李立三的一封信中總結了自己的建議，要求當時在醴陵老家的李立三立刻回到安源，組織一次有秩序的罷工，以博得廣大民眾的同情。毛澤東從富有傳奇色彩的道家思想家老子的名言「哀兵必勝」中汲取靈感，自己創制出「哀而動人」的短語作為指導罷工的策略思想。<sup>61</sup>

遵循毛澤東的指示，李立三立刻趕回安源，動員追隨者們準備一次總罷工。同時，他強調保護煤礦基礎設施的重要性，這樣可以避免損害礦井的生產能力。一名參與者回憶道，「只有兩天要罷工的時候，我參加了一次由李隆之開的工人俱樂部會議。是晚上開的。有百多人參加，都是讀夜書的。李隆之說三個地方不罷工，電燈房、鍋爐房、打風機就不罷工。」<sup>62</sup>

鍋爐房和通風室持續工作，這樣使得防止礦井被水淹浸的水泵和防止發生瓦斯爆炸的風扇仍保持運作。為整個安源鎮提供照明和自來水的發電室也將照常工作，以避免全鎮陷入黑暗而引發公眾不滿和製造混亂。<sup>63</sup> 這些重要工作崗位由來自江南一帶和廣東地區的技術人員擔任，而湖南來的共產黨員們基本不吸收他們，故而這也許是將這些部門排除在罷工之外的另一個考慮因素。總而言之，除了保證基礎設施持續運轉的員工外，一共將有逾一萬名路礦工人集體參加罷工。

由於安源在歷史上因暴力事件多發而聞名，毛澤東擔心行動中可能無法保證井然的秩序，在最後的緊急時刻決定增派另一位來自湖南的同志劉少奇前去領導和規範即將發動的罷工。<sup>64</sup> 劉少奇在長沙與毛澤東於同一所中學讀書，之後於 1921 年前往蘇聯在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學習。劉少奇剛從莫斯科回國，以秉持紀律嚴格的列寧主義工作方式而著稱。是故毛澤東認為他可以牽制李立三的衝動性格。<sup>65</sup> 李立三與劉少奇兩人一道聯合工作，確保即將開始的罷工完全遵照黨的指導而進展。一位參與準備工作的礦工解釋道：

罷工前一個晚上，俱樂部領導成員開了整整一個晚上的會，定下罷工決策，研究種種罷工事項。當時資方把俱樂部看作眼中釘，把威信很高的李立三同志看作肉中刺，揚言對他下毒手。會上，大家一致認為李立三同志不應在罷工期間出頭露面。由誰擔任談判代表呢？會上產生了很激烈的爭論。……最後，李立三同志決定說：「罷工是黨領導的，劉少奇同志是黨派來做領導工作的，當然應該由他當談判代表。」會議最後決定李立三同志擔任罷工總指揮，劉少奇同志任全權代表。開會的另一個議程是討論談判條件。在這個問題上，也同樣引起了很大的爭論，有些工人代表提出了不切實際的過高要求。在李立三和劉少奇的耐心說服和解釋下，才使一些工人代表放棄了提出的一些過激的要求。<sup>66</sup>

在李立三和劉少奇的共同指導下，安源罷工的工人們向路礦兩局遞交了一系列要求，雖然要求有些高但卻還是可以辦理的，包括發放拖欠的工資，改善工作條件，改革用工制度，以及保證承認新建立的工人俱樂部，並在財務上給予支援等數個條款。共產黨領導人認為，最後一點乃是最為重要的內容。

在毛澤東的經典誠示「哀而動人」的指導精神下，李立三為罷工提煉了一個激動人心的口號：「從前做牛馬，現在要做人」。將技術能力低下的勞工指稱作「牛馬」是一種慣常使用的比喻，但號召「牛馬」站起來做人卻是如此新穎和引人矚目。<sup>67</sup> 為博取廣大民眾對工人罷工原委的同情，李立三起草了一份罷工宣言，將工人的強烈抗議作了詳細的解釋。<sup>68</sup> 按照歷來抗議請願狀的傳統，<sup>69</sup> 罷工宣言強調了參加行動的工人們絕望的自衛性動機。重要的是，這段論述並不是鋪陳在階級鬥爭的框架下，而是表達他們渴求做人尊嚴的心聲。

我們的工作何等的苦呵！我們的工錢何等的少呵！我們時時受人家的打罵，是何等的喪失人格呵！我們受的壓迫已經到了極點，所以我們要「改良待遇」、「增加工資」、「組織團體——俱樂部」。……我們要命！我們要飯吃！現在我們餓着了！我們的命要不成了！我們於死中求活，迫不得已以罷工為最後手段。……我們要求的條件是極正當的，我們死也要達到目的。……大家嚴守秩序！堅持到底！<sup>70</sup>

正如罷工宣言內所提之言，公眾對罷工支持與否，取決於罷工工人能否維持良好的秩序。其時，大約有五千名無業人員在安源鎮上遊蕩，特別使人擔憂有可能會出現罷工工人與破壞罷工的搗亂者之間發生暴力對抗。

同之前的毛澤東一樣，李立三和劉少奇也都意識到，維持社會秩序的關鍵在於與洪幫建立合作。於是，大家同意在俱樂部工人糾察隊隊員也是洪幫成員的周懷德和西從乃的陪同下，由李立三前去拜訪當地的洪幫龍頭，指望他從中協助。李立三帶着一瓶老酒和一隻公雞，這是三合會入會儀式的基本物件，和陪同者們於某天晚上前去洪幫分堂所在地。他們事先得知洪幫頭子當晚要舉行入會儀式。李立三毫無畏懼地大踏步邁進大堂，重重地將他的禮品擱在祭壇上，然後用預先學的哥老會幫派行話道明他欲與之結交。洪幫頭領懷疑李立三的誠意，周懷德急忙辯白道：「不瞞你們兄弟，李先生全中國各大小城市口岸都走遍了，不光跑過江湖，還漂過好幾個國家，參拜過馬胡子（馬克思）恩胡子（恩格斯）為師，身受他們兩個外國大人物的保佑。」西從乃補充道，「誰跟李先生交朋友，誰就能時來運轉。」龍頭老大聽信了兩位下屬的擔保之言，就接納了李立三帶來的禮物，讓他說出來意。<sup>71</sup> 李立三提出了三點請求：在罷工期間暫停賭博

活動，關閉鴉片煙館，以及不發生搶劫案件。洪幫老大連拍三下胸脯作保證，答應了這三項請求。然後罷工便只待開始。

李立三日後表示，此次去聯絡洪幫對於安源罷工取得勝利格外重要，並說明了他是如何用符合秘密幫會規矩的方式贏得龍頭老大的默許的。

我們很注意做紅幫的工作。工人中間加入紅幫的很多，紅幫頭子是礦上的顧問，包工頭大多數是他的徒弟，礦上資本家利用他們壓迫工人，他們又以「義氣」、「保護窮人」、「為窮人謀幸福」等欺騙工人。在我們的爭取下，有一兩個紅幫小頭目入了黨。罷工前，我們最擔心的是紅幫破壞罷工鬥爭，所以劉少奇同志指示我，找兩個受我們影響的紅幫小頭目帶我去見紅幫頭子，我買了一點禮物就去了。紅幫頭子見我去很高興，稱我李主任（俱樂部主任），喝完雞血後（我帶去一隻雞），我說我們要罷工，又講一些罷工是為窮兄弟謀幸福，保護窮人等等道理，提出要他講義氣，多幫忙。他拍着胸脯說「我一定幫忙」。我立即提出罷工期間的三個要求：1、鴉片館關門；2、街上的賭攤收起來；3、不發生搶劫案。他連拍三下胸脯說「第一點我包了，第二點我包了，第三點我也包了」，並將一、二兩點寫在佈告上。這三件事情的實現，在社會上發生很大的震動，甚至一些資本家和知識分子也都認為俱樂部了不起（因為這三件事是多年不能解決的，工人罷工後就完全實現了）。<sup>72</sup>

在得到極為關鍵的洪幫願意合作的保證之後，罷工於 1922 年 9 月 14 日凌晨二時正式啟動，先從共產黨最可靠的群眾基礎鐵路工人群體開始。就在兩個小時之內，按照事前的精心安排，罷工擴展到其餘的工人部分。在四十餘個工作場所的每一處，飄揚着上有「罷工」兩個字的黃色三角旗幟，並且有糾察隊員駐守以確保無人進入工作場所。工人們被通知回家去或是返回宿舍，以減少引發混亂的可能。<sup>73</sup> 在街道、所有居民區、工人宿舍、火車站以及礦井的入口處都貼有敦促全面合作的佈告：「候俱樂部通告方准開工！」、「各歸住房！」、「不得擾亂！」等。<sup>74</sup>

全體工人行動一致罷工，有一些工頭擔心一旦罷工工人們達成所主張的要求，自己賺錢謀利的生計手段便就此完結，於是想要去干涉。總監工王三鬍子（參見第一章）領頭擾亂罷工活動。劉少奇和朱少連如此描述王三鬍子失敗的動作：

是故工頭對於此次罷工，當然有切膚之痛。於是百計從中破壞，思借此以自保。其中尤以由賣工頭職位每月收入數千元〔的〕總監工

王鴻卿（鄂人）為最厲。大罷工實現後，王即召集全體窿工工頭會議，商議破壞罷工方法，議定由各工頭各去請其親屬的工人數人，許以入窿不作工，仍照常給價。有少數工友為親誼及金錢所惑，頗思照計而行。但是工人監察十分嚴密，不許其入窿。<sup>75</sup>

工人俱樂部的糾察隊擴大了打擊破壞罷工行為的職責範圍，進一步增加人數，擴大規模。除了監視防範破壞罷工者，糾察隊的另一主要職責是夜間巡查工人宿舍，確保停工的工人呆在房間內，沒有賭博或者其他視為違反罷工紀律的活動。罷工期間，到晚上八九點以後，平時安源鎮上熱鬧的街道巷弄此時空空蕩蕩，僅有工人糾察隊的隊員。工人糾察隊員胳膊上佩戴紅袖章，揮舞白色旗幟，手拿木棒鐵棍，同時也為保護與路礦當局談判的劉少奇和李立三，宣示他們如鐵拳般的威力。通過李立三的醴陵老鄉、煤礦的建築工頭陳盛芳通消息，罷工工人得知有企圖暗殺李立三的陰謀，便組成了特別警衛隊，全天候加以保護。不止一次，工人俱樂部糾察隊威脅稱，若路礦當局拒絕罷工要求，他們便會破壞公司財產。此舉加快了談判的進程。<sup>76</sup>

停工造成了不可避免的社會緊張，於是罷工工人繼續強調他們抗爭行為背後的自衛性動機。罷工到中期時，安源工人俱樂部在李立三的指導下向「各界的父老兄弟」發表了第二份宣言：「我們從前過的生活，簡直不是人的生活，簡直是牛馬奴隸的生活。天天在黑暗地底做了十幾點鐘的工，還要受人家的打罵，遭人家的侮辱，我們決不願再過這種非人的生活了……各界的父老兄弟們！我們兩萬多人快要死了！你們能忍心見死不救嗎？」<sup>77</sup> 連續不斷地表達他們渴求做人尊嚴的呼聲，以博取父老鄉親們的同情心，最終證明極有說服效力。罷工五日之後，沒有發生傷人事件也沒有重大的破壞財產行為，罷工工人提出的所有要求幾乎都得到了同意。同期在中國其他地區的勞工運動都被當局鎮壓，然而安源罷工卻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在中國共產主義革命史上佔據着標誌性的地位。中國共產黨的工人運動組織活動家鄧中夏在其撰著的影響甚廣的中國勞工運動史中這樣描寫安源：「在罷工中表示群眾高度的熱忱與勇氣，經過五日，終使路局屈服，承認工人十三條件，最主要的是承認工人俱樂部有代表工人之權及增加工資，完全勝利。」<sup>78</sup> 即使是對共產主義運動並不友善的一位勞工歷史學家也承認這次罷工具有的重要性：「在中國勞工運動史中最著名的

罷工事件便是九月在安源及株萍鐵路發生的罷工，人數多達兩萬名礦工和一千五百名鐵路工人參與……安源和株萍的工人們開始組織起來，並建立了名稱為俱樂部的機構，其實乃是工會組織。」<sup>79</sup>

歷史學家和活動家們將安源的勝利歸功於工人群體在罷工中團結一致、富有戰鬥性的表現。但是領導者的作用也是關鍵。正如毛澤東的預計，李立三富有創造性的脾性和劉少奇從控制大局出發而施加約束的操作，是成功的組合。因為有暗殺威脅，李立三被迫在罷工期間隱蔽了一段時間，而由劉少奇肩負談判的日常事務。李立三仍兼任安源黨支部書記與工人俱樂部主任之職。他不僅撰寫了罷工宣言，代表工人簽署了最終協議，還親自主持了慶祝罷工運動勝利的盛大慶典。<sup>80</sup> 李立三所運用的文化置位方式，將舊有的與新穎的內容進行融合，將刀槍不入形象的觀念以及師徒關係這些人們普遍擁有的認識進一步發揮，譬如他創造性地宣稱擁有自海外獲得的力量。他形成的這種領導模式相當有吸引力，效果顯著。劉



圖 4

1922 年 9 月 18 日安源大罷工勝利慶祝大會



少奇嚴格規範秩序，防範暴力行為從而贏得公眾對罷工的支持，這個部分的作用也十分重要。

李立三在商會的辦公室內簽署了罷工協議書之後，隨即便在鎮中心開闊的操場上召集了一次盛大的露天慶典活動。在雷鳴般的掌聲中，李立三登上臨時搭建的高臺。他開始發表演講，聚集的人群鴉雀無聲，傾聽他講的每一個字。「我們這一次罷工勝利，全在各位齊心。希望各位將此種精神永遠保持着。」<sup>81</sup> 李立三在演講末尾大聲呼喊那句振奮人心的口號「從前是牛馬，現在要做人！」。群眾們也此起彼伏地高呼這句口號，如洪鐘般的聲音震耳欲聾。<sup>82</sup> 群眾感受着勝利的喜悅，燃放起爆竹，遊行隊伍沿着安源鎮的大街行進。活動結束後，頒佈了由李立三擬撰的標誌勝利成果的上工宣言。

罷工勝利了！……從前是「工人牛馬」，現在是「工人萬歲」！……我們得了蕭鎮守使及戒嚴司令的維持，與紳商學各界的調停得力，使我們的條件完滿解決，我們深深地謝謝他們！……我們這次罷工是安源工人出頭的第一日，是露佈安源黑幕的第一日。我們從今日起，結緊團體，萬眾一心，為我們自己權利去奮鬥。我們現在要祝「工人萬歲！」「工人俱樂部萬歲！」<sup>83</sup>

如他一貫奉行的自我克制的列寧主義工作方式，劉少奇以平淡的基調總結了罷工取得的成就：「這一次大罷工，共計罷工五日，秩序極好，組織極嚴，工友很能服從命令。俱樂部共費計一百二十餘元，未傷一人，未敗一事，而得到完全勝利，這實在是幼稚的中國勞動運動中絕無而僅有的事。」<sup>84</sup>

## 精英人士的參與

在中國共產黨史上，安源罷工被描繪成一個純粹的無產階級英勇事蹟的光輝典型。而實際的情況其實要更為複雜。知識分子、地方士紳、軍官、商人、洪幫龍頭老大以及教會牧師俱為這次罷工勝利有所貢獻。正如我們所見，1922 年的大罷工是由外來的知識分子發動和領導的。另外，最後雙方能以非暴力的談判方式，迅速達成慷慨的協議，正是得益於大批本地精英人士報以同情之心而多出面參與。李立三後來回憶道，在這個階段

時期的中國革命仍可以用提倡「教育救國」的策略取得士紳的合作。<sup>85</sup>萍鄉縣知事樂意准許李立三所倡議的辦學事宜，從而為整個動員工作搭建起了平臺。在罷工爆發後，萍鄉縣勢力最大世家的族長文仲伯發出呼籲，敦促滿足工人們的大部分要求以便迅速解決事件。<sup>86</sup>文仲伯之所以採取此種立場，極可能是源於當地鄉紳長期以來對現代化煤礦公司積聚了不滿情緒。但捲入參與的精英不僅僅限於士紳階層，甚至連「資本家」也願意背離他們的社會階層身份。正如李立三講述的，「連礦長李鏡澄（譯者註：李壽銓字鏡澄）家裡的人都參加了俱樂部」。<sup>87</sup>

地方精英中另一個威力強大的勢力成分是軍隊，他們站在同情的立場上推動了罷工的和平解決。罷工剛開始之時，礦局說動了贛西鎮守使在安源宣佈戒嚴。贛西鎮守使每月定期從礦局收到一筆不菲的薪俸，但負責執行戒嚴令任務的旅長李鴻程對工人俱樂部糾察隊卓有成效的工作深受震動。糾察隊紀律嚴明，遠勝於他自己率領的散漫無章的隊伍。於是，他下令軍隊不要插手罷工運動。而士兵們聽聞李立三刀槍不入的神奇傳言，均樂意遵守命令。<sup>88</sup>軍隊的安排受到劉少奇的讚賞：「李旅長蓋亦知工人此舉在要求改良生活，非武力所能解決，因而對於這次罷工，後來反積極維持，出力甚多。」<sup>89</sup>

工人俱樂部列舉了罷工所要求的數項條件，在遞交給路礦兩局的同時，也各呈交了一份給萍鄉縣署和贛西鎮守使署，還附函說明：「如欲調商，即請派遣正式代表由商會介紹與俱樂部代表劉少奇接洽。」<sup>90</sup>起初，罷工談判中路礦當局的代表是新任命的副礦長舒修泰。他希望以不讓步妥協的立場討好漢冶萍煤鐵廠礦公司的高層，以便日後可以接替礦長李壽銓之職。但迫於商會以及地方士紳們再三強烈敦促，李壽銓礦長親自出面調和磋商，達成了事件的和平解決。<sup>91</sup>

李立三父親的朋友安源商會會長謝嵐舫，之前曾幫李立三將倡導辦學的請示呈文遞達縣知事，他在說服路礦兩局同意罷工工人所提要求一事上扮演重要角色。<sup>92</sup>李立三解釋道：「後來談判……是商會調解。……我們與商會搞的好。我利用我父親的一個朋友，是姓謝的。」<sup>93</sup>謝嵐舫並不是一位無關聯的調解人。他在贛西擁有多間雜貨商鋪，安源的工人及其家人是這些店鋪的主要顧客群。毫無疑問，這位生意人自然樂意工人的工資上漲從而增加商鋪的銷售收入。在罷工工人和路礦兩局之間充任調停者身份

的人，除謝嵐舫外，還有來自李立三醴陵老家的陳盛芳。陳盛芳工匠出身，後來成為地主和資本家。他同罷工領導者以及路礦當局雙方都有緊密的關係。在關鍵的節點上，陳盛芳在他安源的住所安排了談判。他警告礦長李壽銓，除非路礦兩局答應罷工工人的要求，不然李立三會被迫屈從於罷工工人的意思，只好由工人們用暴力來解決事件，他講的這番話加快了商談的進程。<sup>94</sup> 甚至連聖公會聖雅各教堂的會長本人，也以安源煤礦子弟學校校長的身份主動參與調停工作。他的教區內有許多教民是罷工中的活躍人物。禮拜堂的管理員是一位專業攝影師，應工人俱樂部之邀，前去拍攝罷工勝利後舉行的慶典活動，是有關此事件而留存於世的僅有的幾張照片。<sup>95</sup>

1922 年安源大罷工是早期中國共產黨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李立三等同志一道，不足一年便將人數眾多、不守規矩、起初大多數缺乏教育的工人群體動員起來，開展了一次極為成功的抗爭運動。安源尤為適於革命行動，因為當地擁有造反的歷史傳統、集中居住和工作的生活環境、與湖南的聯繫以及地方精英的合作，更何況還有李立三卓越的組織工作，這些諸多因素是相互結合在一起的。雖然如此，在日後共產黨員的活動一直以安源為標準，遵循着安源的基本模式。

革命方案部分承襲了蘇聯革命的經驗，但也展現特有的中國風。共產主義革命者將儒家賦予文化教育者的文化資本加以特別利用，向他們的工人學生「教導革命」。他們穿着文人服裝，言談舉止富有文化，借助於精英階層及民眾對知識分子的尊崇敬仰，領先開展了極其成功的非暴力運動。武術功夫傳統和地下三合會的關聯對於動員工作極為關鍵，但這些「異端的」紐帶被他們納入更宏大的「正統的」教育策略。李立三技巧地結合文和武的權威，成功地在煤礦工人和鐵路工人這種男性群體中樹立起自己的領導資格，同時又得以從各種地方精英獲得支持。

將罷工行動表述為要求做人基本尊嚴的主張，乃是毛澤東在文字上的巧妙構想，而具體操作由李立三付諸實施。李立三將此概念轉化成通俗易懂的響亮口號，要讓從前的「牛馬」現在要做「人」。費約翰 (John Fitzgerald) 在對中國民族主義的研究中闡述道，對於尊嚴的要求是中國二十世紀政治話語的核心，由於在國際上遭受到屈辱不公，一次又一次造成抗議的怒潮。<sup>96</sup> 同樣，史蒂夫·史密斯 (Steve Smith) 關於上海勞工運動

的研究，揭示工人階級抗爭與民族主義之間的聯繫，在於強調為人的尊嚴，卻也響應了古老的價值觀。「國家認同和〔工人〕階級認同之間形成的散漫聯繫，主要是圍繞着人道待遇的問題。工人拒絕被當作牛馬來對待，是由於一種新的強烈的尊嚴感，儘管它對應了傳統的『面子』觀念。」<sup>97</sup> 將罷工要求的條件表達成一種渴求做人尊嚴的自衛性呼聲，是一種團結策略，既安撫了地方精英，對於苦難深重的煤礦工人又具有號召力。地方上各種力量協調一致的行動，對於快速而又順利地解決衝突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sup>98</sup>

毛澤東階段性的介入也極其重要。毛澤東的指導完全按照着共產黨正式制定的政策。在同時期全國各地出現的由中國共產黨發動的工人抗爭運動中，工人補習學校、精英聯盟、對秘密會社的吸納以及由工人糾察隊保證罷工的秩序，構成基本的要素。毛澤東等同志都認識到，開展動員安源工人的工作，需要聯合當地長期以來對勞工群體施加有效文化控制的各派勢力人士，這樣他們幸而避免了激進外來者試圖將煤礦工人組織起來而通常遭遇到的慘敗結局。譬如美國阿帕拉契亞山谷 (Appalachian Valley) 的例子，積極而專注的活動家們多次努力聯合礦工們成立工會，都因為當地的一些力量而受挫。正如約翰·葛溫塔 (John Gaventa) 解釋道，

那些來自北部的自由主義者和激進的馬克思主義者們，試圖改變礦工被壓迫的境況，他們的努力都失敗了，其中部分原因在於他們並不完全了解他們企圖要改變的力量格局情形……極端者試圖培養革命的階級意識，但他們錯誤地理解所遇到的塑造意識的力量擁有的先導作用。而山區的地方精英知道，在他們自己的文化中如何最佳地運用權力來實施控制。他們大大利用了這些人所犯的錯誤而從中受益。<sup>99</sup>

而安源的案例則與上述通常出現的場景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作為文化圈內人，毛澤東、李立三和劉少奇敏感地意識到需要發揮地方勢力人物的控制影響力，並進而架空他們的力量。年輕的共產主義革命者們在既存的權力結構中展開活動，借助常用的符號比喻修辭方法博得廣泛支持。他們成功動員了一次獲得重大勝利的罷工，由此在安源開啟了新的工業秩序。

所有的記載都顯示，1922 年的大罷工讓安源工人收穫頗豐。一位參與者回憶道：

安源罷工的勝利，顯示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工人階級的巨大力量，給工人以巨大鼓舞。我印象最深的是，罷工前和罷工後大不一樣，工人的生活有了明顯的改善，俱樂部各種組織工作有了很大發展。這時候，工頭和職員再不像從前那樣神氣了，也不敢隨便打罵工人。工人爭得了一些政治權利和經濟權利，普遍增加了工資。罷工前，我每月工資三塊錢，罷工後立即增加到四塊五。罷工餐宿處的伙食也比以前好些了，再不像從前那樣經常吃發霉的紅米飯、黃菜菜了……<sup>100</sup>

由於明顯感受到物質條件的提高，令部分工人的思想更為堅定。這些人積極地參與活動，塑造了新的革命文化。

一首按照「春籮」詩歌體編成的敘事民謠反映了這種社會氛圍的變化。「春籮」歌謠體的形式為打油詩式的押韻頌文，吟唱時擊籮伴奏，一般流行於贛湘邊境地區，歌謠的吟唱向人們宣佈春耕農活的開始。1922 年罷工勝利之後，一首關於罷工的民謠在安源工人之間迅速地流傳開來。得以流傳下來的有三個版本，都在 1925 年記錄成文字，而且每一個版本的長度都達數百節，某些文字和順序各版有稍微出入。不過每一版本都將李立三作為受大家愛戴的罷工領導人而大加歌頌，讚揚他讓安源的礦工們接受教育並組織起來，他以新穎的指導方式將工人們說動，為着改善工人自己的命運而行動起來。歌謠裡僅簡短地提到劉少奇和朱少連，而整個敘事明確突出「李先生」乃是安源勞工運動的真正英雄。<sup>101</sup> 面對資本家和軍閥的威脅，李先生的決心並未有絲毫動搖。李先生配戴的金屬徽章有受五國庇護的刀槍不入的法力，嚇得鎮守使向他投降。李先生告訴劉少奇協助幫忙的最佳辦法。歌謠唱道，多虧李立三精力充沛地鼓舞和指導工人，工人們才贏得了重大的政治勝利，他們的社會地位和經濟收入才顯著提高。無論如何，正是李立三的功勞讓安源工人們擁有了尊嚴感和自我價值。

工人受苦難盡表，  
有個英雄天下少。  
名號能致〔至〕李先生，  
出洋俄〔法〕國轉回程。  
年幾〔紀〕只有二十四，  
祖居湖南醴陵住。  
他從長沙到萍鄉，  
要救工人出牢牆。

工會湖北來辦起，  
 勞動工界結團體。  
 能致〔至〕安源辦學堂，  
 先稟知事到萍鄉；  
 知事替他出告示，  
 准他辦成俱樂部。

……

能致〔至〕就對礦長表：  
 「……依我條件把錢加，  
 不然與你結冤家！」

……

不依條件會罷工，  
 那時莫怪我無情！」

……

先生開口說當祥〔端詳〕。  
 弟〔第〕一團體要結緊，  
 團體就是工人命。  
 我們工友算齊心，  
 罷工勝利果然成。

……

先生對〔吩〕咐工友道：  
 「隨我口號喊三聲，  
 大家齊喊要同心。」  
 一聲就喊要齊隊，  
 中華民國萬萬歲；  
 異口同心喊一聲，  
 猶如白日打雷公；  
 二聲俱樂部萬歲，  
 這喊得中〔真〕有味，  
 三聲工友萬歲身〔聲〕，  
 個個喊得笑音音〔盈盈〕。  
 喊完三聲亭〔停〕了講，  
 巴掌打得應山響。  
 能致〔至〕先生下了臺，  
 操坪一路去遊街；  
 一路護送回了部，  
 個個稱贊李能致〔至〕：

「不料年佑〔幼〕手段高，  
他在此處有名叨。」<sup>102</sup>

這首以當地方言唱誦的民謠題名為「勞工記」或者是「罷工歌」，為 1922 年罷工勝利後礦工們興致高昂地集體創作而成，在工人中間傳唱多年。這首歌謠流傳如此之廣，說明李立三技巧高超的文化置位方式，已經從精英的先導階段過渡到工人們自身積極主動地接受和推進的階段。他們對充滿影響魅力的領導者形成的虔誠信仰，在工人們身上注入了一種對自身能力的確信。

共產主義革命者在安源將傳統的文化權力成分加以轉化，從而服務於新的革命目的，在全國其他地方亦有類似成功事例。在同一時期，農民運動組織者彭湃被家鄉海豐縣當地農民稱呼作「彭菩薩」，成為神化的中心，幾近於「拜神」的程度，從而極大地推動了他建立農民協會的工作。彭湃後來向質疑這種做法的幹部隊友解釋他的理由，

我們在農村開展工作，第一步就是要取得農民的確信……而如果你攻擊他們對神的信仰崇拜，則無法取得他們的信任。有時候我們不光不能開罪他們拜的神，甚至還要同他們一起信神。這並不代表我們屈就於他們的宗教迷信，那只是有必要做一些妥協以便開展我們的工作。<sup>103</sup>（譯者註：此處引文為原著所引英文文獻的中譯。）

這種靈活變化的方式在工人和農民群體中十分受歡迎，但是在當時不適宜的政治環境中卻難以長久維持。安源罷工勝利之後僅數月，確切日期是 1923 年 2 月 7 日，共產主義運動進入了一個更艱難的新階段。當日，軍閥吳佩孚對長辛店同京漢鐵路線其他車站鐵路工人發動的罷工進行了血腥鎮壓，是一個標誌重大倒退的歷史事件。全國各地的共產主義活動人士被緝捕並殺害，而他們組建的工人俱樂部和工會組織都被強制關閉。

在其他各地降臨到勞工運動溫床上的這場災難中，由於自身相對偏遠的山區地理位置，以及地方精英的容納，安源得以倖免於難。坐鎮湖南的軍閥趙恒惕和贛西鎮守使岳兆麟都曾表示，他們並不反對安源工人俱樂部所宣導的社會主義。那時他們真正擔憂的乃是國民黨，而非共產黨。<sup>104</sup> 而且，安源工人俱樂部令人矚目的教育工作被廣泛地認為是促進社會穩定的因素，而並非對政治秩序的威脅。正是地方強權人物的包容，提供了讓

共產主義試驗得以成長的空間。在前期的各個勞工運動中心，唯獨安源在二七慘案之後不但倖存，而且蓬勃發展。1922年罷工的偉大勝利，加強了共產主義革命者的力量。在劉少奇的領導下，他們開始公開表達擁護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忠誠信念和理想抱負。

與李立三不同，劉少奇是在蘇聯得到培養的。當他接替李立三成為煤礦的共產主義運動領導人之後，他竭力在工作中表現出列寧主義的標記。在劉少奇的指導下，安源在進步團體中被冠以「中國的小莫斯科」而聞名。在這裡，從政治組織到建築風格，都以蘇聯為學習的榜樣。儘管宣佈依照蘇聯的做法，安源的革命傳統中依然顯示了帶有本土色彩的群眾動員模式的印記。工人俱樂部儘管按照莫斯科大劇院的式樣重新進行修建，以此表達劉少奇的懷念之情，但仍然作為傳授新的革命資訊的課室，借助於熟習的文化媒介向群眾廣泛地傳播革命內容。



## 第三章

# 中國的小莫斯科

1922 年大罷工取得勝利之後，安源擺脫了「小上海」這個舊日的綽號，而以「中國的小莫斯科」之名著稱於世。當時，中國其他各地的共產主義革命人士遭遇嚴重的打擊迫害，特別以京漢鐵路二七慘案為突出的代表性事件，而在這種形勢下，李立三、劉少奇以及安源的同志們卻贏得了顯著的勝利，將這個煤礦小鎮變成受布爾什維克主義啟發的勞工組織活動大本營。自 1922 年 9 月至 1925 年 8 月這三年期間，安源是中國最活躍的共產主義勞工運動中心。黨中央稱安源為「無產階級的大本營」，這一評價反映出這個中國的「小莫斯科」在中國革命中佔據着特殊的重要地位。<sup>1</sup> 李立三在安源最早發展的黨員是鐵路工程技師朱少連，他不僅成為第一個進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工人，還是當時僅有的九位常務委員會委員之一。<sup>2</sup> 安源煤礦對全中國以及國外的左翼活動家產生了磁鐵一般的吸引力，不計其數的進步人士紛紛前來安源朝聖，以觀摩和借鑒安源在革命動員方面的經驗。<sup>3</sup>

正如新綽號明確顯示之意，當時安源的革命活動類同於俄國模式。那時「小莫斯科」的許多共產主義革命者都曾在蘇聯接受過培訓，並且，在煤礦工作中有傑出表現的一些共產黨幹部會獲得去蘇聯深造的嘉獎。剛從莫斯科歸來不久的劉少奇，尤其熱衷於引入蘇聯的經驗。在擔任安源工作指揮領導的三年期間，劉少奇為達成他的這一熱望辛勞工作，然而他所做的努力將頻頻面臨打擊。<sup>4</sup> 列寧主義的紀律規範並不全然適合於安源煤礦工人，而且在日後安源之所以被紀念，更主要是因為安源對於獨特的中國革命傳統的形成有尤其突出的貢獻，而並非是因照搬蘇聯模式。安源工人俱樂部的教育工作除正規課堂教學外，還通過一系列創新的教育形式

進行，運用戲劇、演講、歌曲、電影等文化媒介，影響效力甚為顯著。其實，教育活動乃是構成安源貢獻的核心部分。

## 工人俱樂部的重組和重建

由於富有同情心的地方顯要人物出面干預，1922年大罷工最後簽署了慷慨的協定。因而共產主義革命者們可將聯絡當地精英這種工作減少，而將注意力更多地投入到在安源及其周邊地區建立基層組織的工作上。根據罷工協定條款，萍鄉路礦兩局將每月提供多達1,100元的補助以資助工人俱樂部的運作。當時，俱樂部蓬勃發展，幾乎安源所有工人都加入了俱樂部。路礦公司資助的這一大筆金錢，加上俱樂部會員的入會費和按月繳納的月費，結果在會計的收支平衡表上，帳目數字令人驚歎。<sup>5</sup>截至1923年夏天，工人俱樂部的正常年收入高達兩萬多元，而這並不包括指定為救濟用途的捐款部分。<sup>6</sup>擁有如此巨額的收入，俱樂部不僅成為安源勞工運動重要的資金來源，甚至也為廣大地區範圍的共產主義運動提供了資金支援。李立三以前的同學羅章龍曾在長辛店建立鐵路工人俱樂部，後來擔任中共中央會計的職務，他如此解釋：

一九二三年黨的「三大」以後，我擔任中央局秘書兼會計，經管全黨活動經費。當時，除共產國際定期撥給一部分經費外，黨的活動經費的主要儲備點，在北方是全國鐵總，在南方是安源。安源在取得罷工勝利後，積累了比較雄厚的工會基金，除自己舉辦了頗具規模的工人消費合作社和工人教育事業外，常給各地工會提供經費援助。<sup>7</sup>

1922年罷工結束之後不久，為了更好地管理猛增的經費和分明職責，俱樂部進行了一次根本性的重組。儘管繼續使用「俱樂部」這個中立的名稱，重組之後的這個勞工聯合會，實際上變成一個強大的經濟、文化和政治實體，在整個小莫斯科時期儼然成為安源的統治權威機構。正如李立三日後所言：「說蘇維埃的雛形也可以……但工會的確是半政權性質。」<sup>8</sup>以前由當地精英人士調停的糾紛爭端和各種緊迫問題，現在則是在工人俱樂部解決。重組後的工會在表面上仿效俄國革命的工人代表蘇維埃制度，不過本土的一些成例也為其所用。

安源工人俱樂部的基本單位仍然沿用自建立時所設的「十人團」形式（詳見第二章），到此時這一結構已經擴展到更高階的層級。這種十進位的等級制度仿效 1917 年彼得格勒蘇維埃的建制，在這種蘇維埃制度下工人們分別按照十名、一百名和一千名的層級單位依序進階建構組織。<sup>9</sup>但是在本土其實早已存在這種建制結構的諸多先例。類似的結構設置，曾為中國身份地位迥然相異的不同主體提供了組織架構。一方面，中華帝國時期歷朝施行民眾互相監督的保甲制：將每十戶人家編成最基礎的單位，一百戶人家為中級單位，而一千戶人家則作為第三等級的單位。另一方面，至少在原則上，1906 年萍瀏醴起義中造反的秘密幫會團體以及 1919 年五四運動中的抗議學生，都按照十進位的等級將參與群眾進行編組。<sup>10</sup>從行政管理方面而言，安源工人俱樂部的結構設置同當地的先例也是一致的。俱樂部起初設立了八個管理部門，分別為教育股、互濟股、庶務股、會計股、文書股、講演股、遊藝股和交際股，這種分工與洪幫香堂的「內八堂」相似。<sup>11</sup>同洪幫的外堂在地理範圍上擴張勢力的做法相似，安源工人俱樂部也在周邊的贛西和湘東地區的一些城鎮建立了附屬分會，設立有紫家沖、湘東、醴陵、株洲等數個分部。<sup>12</sup>

重組後，工人俱樂部有清晰明確的結構，但是在目標上卻並未似這般清楚。俱樂部的共產主義組織者們引入了蘇聯和巴黎公社的無產階級專政經驗，毅然同舊有的中國傳統決裂。就在罷工後的第一個月內，安源工人俱樂部多達一萬三千餘名成員參加了第一次代表直選，成為隨後一系列直選的開端。俱樂部裡 1,382 個十人團各自選出一名「十代表」；然後大約 140 個百人小組再各自選出一名「百代表」；最後，路礦公司的 45 個工作部門都各自選出一名「總代表」。總代表每月開兩次會，組成相當於最高蘇維埃的最高商議機構。然而，這一機構的決策需要得到每月舉行一次會議的百代表會議批准。李立三被推選為百代表會議的首任主任。在百代表會議上獲得批准的決定，會傳達給每隔三月召開一次的十代表會議。<sup>13</sup>

每年的年度選舉擬定在臨近大罷工紀念日的夏季舉行，選出各個層級的代表。1925 年 8 月舉行了第四輪也是最後一輪的選舉，距離小莫斯科慘遭覆滅僅數周。<sup>14</sup>在該選舉機制實行期間，群眾不時發出改革的呼聲，要求增加最基層的「十代表」的權力，因為「除便於十代表收納常月費外，毫無其他作用」。<sup>15</sup>然而，這類提議從未受到接納，因為共產黨高層領袖的顧

慮是一千多名未經培訓的、毫無紀律性的工人所組成的這種會議，不適合於討論或者決策主要議題。<sup>16</sup>

劉少奇本人崇信列寧主義，這種思想在他於任期內撰寫的一系列關於安源工人俱樂部的文章中清晰可見。他在一篇文章中寫道：「工會的組織必須十分嚴密，極有統系，和軍隊一般，如此，在工作上才能完成他的使命。」<sup>17</sup> 然而劉少奇後來意識到，儘管他自己強烈傾向於「民主集中制」，但事實上安源工人俱樂部遠遠未達到這一標準。他寫道：

俱樂部的組織，本來多係採取蘇維埃俄國的成例；但因為事實上的困難所限制，從前許多地方都只得委屈遷就。所以現在俱樂部的組織，就現時中國國內的各工會說起來，雖然是比較進步些，嚴密些，有系統些的一個；可是和無產階級的祖國——蘇維埃俄羅斯——的原型與精神比較看起來，便只是一個極幼稚的，鬆懈的，沒有系統的罷了！<sup>18</sup>

儘管劉少奇急切地要按照蘇聯的藍圖去開展活動，可是當地的實際情況讓這番雄心壯志難以達成。當初毛澤東在認定安源煤礦將是一個大有前途的革命動員地點時，便已提醒李立三，當地情況十分複雜，作為未來的組織活動者，要具有十足的耐心和靈活變通能力。

偏袒照顧同鄉為當地的一個風氣，即使在劉少奇看來，亦可以在這方面讓步。儘管共產黨在官方指示中，將這種行為譴責為是過時的「封建主義」表現，但是同鄉情誼在共產黨做動員工作時發揮了關鍵作用，在安源是如此，在其他地區亦然。<sup>19</sup> 劉少奇將俱樂部重組之後，擔任最高領導的三十人中有二十五位來自湘東地區，即毛澤東、李立三和劉少奇三人的成長之地，其餘五人來自相鄰的湖北省。裡面沒有一個江西本地人。<sup>20</sup> 俱樂部利用同鄉情誼去招募成員，而這種領導模式自始至終貫穿於「小莫斯科」的全部時期，導致俱樂部內部的江西本地人心存不滿。安源絕大多數工人來自湖南省，但仍有為數不少的工人是從周邊村莊招募的。來自萍鄉的本地工人佔安源勞動力總數的 30% 到 40%，而他們明顯察覺到自己被排除在共產黨的領導層之外。萍鄉籍和湖南籍工人之間經常毆鬥，反映出當時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緊張關係。1923 年春天，劉少奇在處理完一起工人糾紛事件之後，鄭重地宣告要加強工人俱樂部的組織工作和教育工作，以期克服「工人中還存在着的同鄉觀念和宗派情緒」。<sup>21</sup>

儘管安源工人俱樂部未必達成劉少奇的列寧主義理想抱負，但可觀的收入至少為開展一系列活動提供經費。劉少奇考慮到隨着工作事項不斷增多，對於服務設施的需求必會上升，因此他提議每個工人從由罷工爭取來的相當於半月工錢的年終獎中，捐出七天半的工資以修建一個工人俱樂部新樓。<sup>22</sup> 這次強制性的「捐贈」籌到總計三萬元的經費，而這筆款項構成此龐大建築工程的核心資金。修建工程於 1923 年秋天動工，俱樂部會員們利用工餘時間義務參加施工，趕在次年五一勞動節就職慶典之前竣工。<sup>23</sup> 建成的新建築為四層樓房，高 17 米，十分壯觀氣派。

同俱樂部的組織形式和運作方式一樣，重修後的工人俱樂部大樓在建築設計方面也反映出從蘇聯藝術和中國傳統兩方面汲取了靈感。主廳的一樓設八百個座位，另外還有可容納五百五十人的三層樓座。這棟建築模仿的是莫斯科大劇院，但屋頂上翹的形狀毋庸置疑屬於典型的中國風格。建築的內部裝飾明確表明安源工人俱樂部的哲學思想為馬克思列寧主義。舞



圖 5

安源工人俱樂部近照，大樓右面立着劉少奇塑像。照片為作者拍攝。

臺上方懸掛了一塊寫着「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呵！」的橫匾，演講台正面牆上掛着馬克思和列寧的巨幅畫像。兩側牆壁掛的紅布上是粗黑體漢字標語：「有團結精神有階級覺悟；是勞工保障是人類福星」，為傳統的中國對聯格式。除通常的工會職能之外，借助良好的設施條件，俱樂部成為一個公共演出場所，為工人們表演革命戲、電影、藝術節目以及演講活動。這座綜合大樓不僅為職員和巡邏隊員們安排了辦公室，而且也為會員們準備了娛樂活動或是小型會議的房間。<sup>24</sup>

重修後的工人俱樂部取代原先聖公會聖雅各堂成為安源最龐大的公共建築。事實上，這棟建築的規模尺寸和宏偉程度，意味着俱樂部大樓在落成之後將是小莫斯科新的精神中心。1924年春天，嶄新的俱樂部大樓向公眾開放。之後，安源的青年團員和黨員人數均急劇上升。截至1924年12月，安源黨支部成員數目約有兩百名，人數比六個月前增長三點五倍，成為國內成員人數最多的黨支部，其成員成分亦是最「無產階級」的支部。當時全國黨員總人數尚不足千名，是以安源支部的人數就佔了五分之一以上。在1924年底，安源共青團員人數達到245人。儘管這個數字僅佔全國團員總人數的十分之一，但安源共青團同安源的黨支部一樣，在全國亦是人數最多的一個支部，而且亦是成員成分最為「無產階級」的一個支部。<sup>25</sup>

儘管有如此重大發展，但是這並不必然代表安源工人們在思想上有實質突破。這種文化置位方式依靠人們熟習的韻文和儀式以便能夠順利培養新的集體身份認同，而參與群眾未必全然理解明白。工人們以前接觸到的外來組織者，僅是哥老會頭領或者聖公會牧師這些人物，所以共產主義活動從宣誓到神聖莊嚴的標誌符號，經常被工人誤以為是這些組織的活動。甚至連入黨儀式也可能讓新黨員產生困惑。一位曾經拜五位師父學習武術，並以高強的武藝受眾人景仰的工人回憶道：

李立三和劉少奇又介紹我入黨。與我一起入黨的九個人都是洗煤台和洋爐煉焦處的工人，我們在小洗煤台宣誓，我看見黨徽以為是十字架，就很不高興。他們問我怎麼了，我說這個組織是傳基督教的。他們耐心解釋說，這是鐮刀、斧頭組成的黨徽，說明共產黨是代表廣大的工人、農民的利益。<sup>26</sup>

李立三和劉少奇在安源工作期間，將主要的精力都投入到將當地傳統習俗活動轉用於新目標的工作上。與此同時，他們也試圖闡明所傳播的革命信息，有別於那些早先就在當地為人所熟知的三合會以及基督教的信仰內容。當然，接受共產主義的新人產生疑惑其實可以理解，畢竟，令中國共產主義革命者受到啟發的蘇聯模式有東正教的強烈影響。<sup>27</sup>

## 革命領袖地位

李立三在罷工勝利數月後就離開了安源，到主要工業中心武漢和上海等地，向其他勞工運動組織活動家介紹他在安源開創的成功經驗。在接下來的近三年時間，劉少奇留在安源任工人俱樂部主任。李立三原來擔任的另一職務共產黨安源支部書記，則由第一位被他吸納入黨的工人朱少連繼任。外向開朗的李立三在工人群眾中人緣極好，而劉少奇嚴肅刻板，堅持紀律和約束，他接替充滿魅力的李立三離開後留下的空缺，但工作並不太順利。儘管這兩位革命先驅為發動一場激進的工人運動同樣努力工作不辭辛勞，但在領導方式上有諸多不同。原是一名安源礦工，後來被授予人民解放軍中將軍銜的韓偉，如此回憶李立三在工人圈中超乎尋常的受歡迎程度：

工人們傳神般地說：李主任有五國洋人保護，刀槍不入。因為他是從外國留學回來的，平時穿長大褂，胸前佩戴着一些金屬製的徽章，顯得非常精神。傳說他「刀槍不入」，這表達了工人們對自己領導者的愛戴，對反動勢力的嘲弄。由於萬餘名工人緊密團結，服從指揮，路礦當局沒有辦法對付，被迫答應同俱樂部談判。<sup>28</sup>

李立三大膽借助民間宗教和武術功夫，在聯絡秘密幫會頭領時又毫無畏懼之色。與李立三隨心所欲的方式不同，劉少奇採用的是一種更為克制的文化置位模式，因此也就不似這般受歡迎。劉少奇秉持列寧主義紀律，渴望將中國工人的「幼稚的，鬆懈的，沒有系統的」傾向改造成他認為的更優越的蘇聯組織形式。

劉少奇在李立三的工作基礎上繼續向前開展，在工作上遇到更多問題是源於個人氣質和工作風格上的差異，而並非是由於有根本的哲學思想分歧。李立三的个人魅力和豐富想像力，使他廣受礦工愛戴。相比之下，

劉少奇是一個「好強迫壓制的角色」，帶有那種使人厭煩的「重繁文縟節，輕靈活創造」的傾向。<sup>29</sup>張國燾是劉少奇在莫斯科留學時的同學，他回憶青年時期的劉少奇與同輩之間有着鮮明的區別：「1922年，共產主義革命者們充滿激情和狂熱，而他〔劉少奇〕卻罕有表現出興奮的模樣……有些人……覺得他有點太沉鬱，缺乏青春的活力。」<sup>30</sup>而另一位舊時的同學回憶，劉少奇在莫斯科時期曾經在一齣由學生自編自演、以中國工廠罷工為內容的劇目中飾演一個工人，雖然他表現了該角色對目標執著認真的特點，但表演卻相當刻板僵硬。<sup>31</sup>

安源工人深深折服於李立三的個人魅力，對他的離開感到不捨，是故讓他們把忠誠轉移到新領袖身上，是有些勉為其難，而且劉少奇是一位在感情上有距離的領袖。劉少奇痛苦地意識到自己在工人圈中不受歡迎，便向李立三求助，讓他幫忙說服工人們接受他的領導。距他離開煤礦已經數月，李立三回覆了一封致安源工人的公開信，敦促他們要明白信仰的對象應該是社會主義而不是他個人。李立三在信中解釋了他在武漢的新任務的重要性，並強調他將來「肯定」不會再回到安源了。他總結道：「我是相信社會主義的人。社會主義就是工人的主義。現在俱樂部的辦事人，也都是信仰社會主義的，他們努力於無產階級的團結和利益，都和我一樣。工友們只要認識了社會主義，便不要認識哪一個人了。」<sup>32</sup>隨即，劉少奇對礦工們作了一次講演，傳達相似的訊息：「我們都是相信社會主義——工人的主義——才到安源來幫大家做事的……倘使各工友只相信一個人，不找這個人的來歷及為甚麼使大家相信，這是很危險的，因為一個人不能守着大家做幾十年幾百年的事……不能永遠靠一個人的。望各工友相信社會主義者，相信自己的團體。」<sup>33</sup>

工人們之所以不情願向新領袖或新組織表示效忠，其實不光是因為劉少奇平淡乏味的性格。這亦是一種普遍存在的主從庇護 (clientelist) 文化的症候表現，在勞工合同關係活動以及秘密會社的網絡關係中，都有如此的表徵。在這種文化關係中，從屬的一方忠心於「主人」身份的一方本身，而非依據於抽象的理念或機制。作為工人俱樂部的創始人，李立三享有成員們自始至終忠誠於他本人的特殊權力。但李立三的名聲在工人團體中長盛不衰的原因卻不光是由於他早於劉少奇開始勞工運動組織活動的工作。工人們不願意減弱他們和李立三之間的紐帶，也說明李立三採用的勞工運



動動員模式更具吸引力。他巧妙地利用了大量的文化符碼和風俗習慣，來培養工人們形成新的政治身份認同。

與李立三相反，無論是個人氣質還是領導風格，劉少奇都是一個傳統的列寧主義者。他過度追求政治正確，而且他的個人生活和職業表現，均體現出他視工人俱樂部以及社會主義原則高於一切的工作精神。但約束嚴格的組織紀律有時反遭工人誤解，劉少奇為安源工人俱樂部和革命目標而自覺律己的行為，讓他們覺得冷酷、不近人情。新俱樂部大樓一落成，劉少奇就從他到安源後一直居住的住處，搬進了俱樂部樓裡。<sup>34</sup>不久之後，劉少奇在俱樂部舉辦了婚禮，這更進一步說明他個人對組織的認同。然而，劉少奇儉樸的婚禮非但未能使他在團體中增進同志間的友情，反而起了反作用。劉少奇的妻子何寶珍是位湖南同鄉，是第一個到安源黨校教書的女性。劉少奇堅持摒棄傳統婚禮中大擺婚宴、新娘花轎以及其他各種花費過大的繁複儀式。他們舉辦了一場儀式從簡的「文明婚禮」。這一做法令俱樂部成員們大為失望，紛紛埋怨，因為他們原本以為是一場喜慶熱鬧、排場盛大的婚禮，故而長時間以來一直翹首以待。<sup>35</sup>

劉少奇從不隱藏他在安源的工作目標，是要在工人內部推廣社會主義。1923年9月，劉少奇撰寫了著名的〈對俱樂部過去的批評和將來的計劃〉一文，在文章開篇便明確提出他對安源工人俱樂部意識形態的見解：「我們抱定社會主義的思想。」<sup>36</sup>同月，正值紀念大罷工勝利一周年之際，工人俱樂部散發了有關的宣傳單。傳單封面上醒目地印着安源工人俱樂部的新標記，一個大錘和丁字鎬交叉相疊在一個火車車輪上，象徵着礦工和鐵路工人團結一致。<sup>37</sup>傳單的內容詳細具體地闡釋了劉少奇對於社會主義的理解：

社會主義是什麼呢？社會主義是擁護全工人階級的利益的主義；是主張工人團結起來，向軍閥資本家進攻，打倒資產階級，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把世界所有的生產機關——土地，工廠，鐵路，輪船，礦山等——收歸無產階級公有，建設無產階級的國家，實行「不做工不許吃飯」的法律，使世界上個個都變成平等的，自由的，自己生產自己消費的工人，這就叫做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工人真正的目的，最後的勝利。……工人應該相信社會主義，應該替社會主義犧牲，努力，奮鬥！<sup>38</sup>

為了貫徹他心中人人平等的社會主義理想，劉少奇以巴黎公社為榜樣，堅持要求包括他本人在內的所有幹部，必須嚴格遵照生活節儉的規矩。當時的一位同志後來談及這項規定要求在物質條件方面的犧牲：

我們在安源工人俱樂部工作的同志，按照巴黎公社的組織原則，每月工資不超過工人中的中等水平工資，也就只有五塊錢，交了飯費以後，所剩無幾了。那時我們都很明確，就是真正為工人階級的解放而工作，誰也沒有講究生活待遇的想法。少奇同志的愛人何寶珍同志那時也在安源，她剛生了小孩，和少奇同志住在工人俱樂部的樓上，他們也同樣過着十分簡樸的生活。<sup>39</sup>

這份回憶在某種程度上誇大了共產主義革命者們自發的節儉程度。很多回憶錄中都記載，劉少奇以及其他的一些革命幹部將他們的薪水定為每月十五銀元，即一個技術工人的月薪，而非普通礦工的工資數額。而且工人俱樂部的帳本也證實了這個較為慷慨大方的薪資。<sup>40</sup>此外，工人俱樂部還負責為劉少奇承擔規模不小的醫療開銷費用，在李立三離開安源後一年多的時期內，俱樂部償還了向他借貸的部分資金。<sup>41</sup>雖然如此，上述基本觀點仍是正確的。工人俱樂部的領導們多出身於殷實的家庭，在劉少奇的堅持下，他們過着簡樸的生活，以證明他們和工人階級之間有一致的身份認同，從而有助於鞏固團結。

然而，劉少奇為減少幹群之間的經濟差距所付出的辛苦努力，有時反而帶來事與願違的結果。由於工人們更適應李立三豐富多彩的自由風格，而不是這位繼任者陰沉單調的辦事作風，他們起初竟懷疑劉少奇樸素的節儉行為背後藏有隱秘的動機。劉少奇後來回憶道：

罷工勝利以後，工人選我當俱樂部總主任，要給我二百元銀洋一個月。當時我只要十五元錢生活費就夠了，工人對這件事還有議論。有的說一不圖名，二不圖利，是不是因為錢少了，還要給我增加一百元。我還是不能要，工人就懷疑我到底搞什麼名堂。以後就召開黨內外積極分子會議，給他們講清道理，我們搞革命是為了要解放全中國，要建設社會主義，搞共產主義。道理講清了，工人才相信我們。<sup>42</sup>

部分由於他這種樸素的生活方式，劉少奇發現自己與工人們的偏見和抵觸曠日持久作戰。在一次坦誠的自我批評中，劉少奇承認自己內心深處

抗拒同工人之間的親密互動，令工人對他產生了「誤會」。<sup>43</sup> 對於親切友好的李立三而言，和工人們建立聯繫是一件簡單而令人愉快的事。而劉少奇冷淡拘謹的性格，是實現他的革命抱負的一個障礙。

雖然這兩位安源的開拓者在個人天資和領導方式上存在明顯的差異，劉少奇在李立三之後依然繼續強調工人教育，以之作為進行社會主義試驗的核心要素。儘管他間歇地號召工人們「打倒資產階級」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劉少奇實際上採用的動員策略依舊圍繞課堂教育，而並非是開展階級鬥爭活動。

## 革命教育

在安源作為「中國的小莫斯科」期間，工人俱樂部開展的勞工教育成果斐然，引起了國內和國際上的廣泛關注。美國記者尼姆·威爾士 (Nym Wales) 後來採訪了赴延安的一批前安源礦工，她在所著的中國勞工運動史一書中寫道：

最活躍的中心是湘贛交界處的安源煤礦。那裡的兩萬名礦工在 1922 年取得了罷工的勝利。工人們建立的組織擁有十分強大的力量。他們設立了學校，甚至招收礦工子弟上學，在 1923 年至 1925 年期間，煤礦的教育工作一直在開展。<sup>44</sup>

1923 年初，安源又開辦了兩所工人學校。當年，逾三百名工人和近五百名工人子女在這三所學校學習。對應於父母的工作崗位，工人子弟的入學情況也大相逕庭。鐵路工人大多為機械師和白領工人，儘管他們僅佔安源工人總數的 8%，但他們的孩子在註冊學生人數中佔 14%。那些在地面上工作的煤礦工人主要是機械師，他們佔安源工人數量的 32%，而他們的子女佔在冊學生人數的 50%。安源工人中情況最差的，是那些在地下礦井作業的煤礦工人，他們在路礦兩局整個勞動力群體中佔 60%，但是他們的子女卻只佔學生總數的 36%。當然，這些明顯易見的比例不均，也許不是因為不同工種工人的子女獲得就學機會存在差異所致，也可能只是由於無技能的工人單身率更高。此外，資料還顯示出存在明顯的性別失衡現象，將近 70% 的在校學生都是男孩。<sup>45</sup>

1924年11月，中國共青團常務委員會特別派遣了一名工作人員到安源，考察當地的教育狀況。此行的一項重要成果便是總結了一份報告，為其他地區的革命組織活動提供指導作用。這份報告總結安源教學工作有四個目標：識字、常識、促進階級覺悟和訓練戰鬥能力；階級覺悟被突出地強調為是「教育的生命」。<sup>46</sup> 儘管成人教育的首要目標是灌輸一些馬克思列寧主義，安源的課程內容也重視基本的閱讀技能。初級班的學生按照要求應掌握一千個漢字，中級班的學生需要再多認識一千個漢字，而高級班的學生需要掌握足夠的漢字以便能夠寫作一些簡單的作文。<sup>47</sup> 根據工人俱樂部的報告，截至1924年末，已有四分之三的安源工人掌握了初步的讀寫能力。儘管如此，工人俱樂部對尚有四分之一工人仍為文盲的情況不太滿意，故而鄭重地宣佈，為了提供更多的教育機會，俱樂部將會在離礦工的工作站和生活區更近的位置增開學校和閱覽室。<sup>48</sup>

截至1925年，由安源工人俱樂部主辦的學校增加到七所，有將近一千五百名工人和兩千名孩子入校學習。這七所學校每晚給工人們上兩小時課，周日休課。夜校用的教科書以及課堂上的講課內容，均向工人們灌輸大量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公共演講也是值得注意的一項重要內容。工人們被要求就一些主題作即席演講，談論如私有財產和階級體系的罪惡、無產階級應該如何推翻壓迫並奪取政治權力等等問題。在工人子弟的班上，除了教授基礎的語文知識和算術能力以外，教學重點圍繞公共禮儀和責任感培養。為了避免孩子相互競爭，學校不進行考試。<sup>49</sup>

在這七所學校以外，安源還建立了十三個開設識字課的閱覽室，以及一個圖書館。<sup>50</sup> 為了讓安源的婦女也參與其中，所有的學校都開辦了職業縫紉班。<sup>51</sup> 這些女裁縫師傅不光縫製中式服裝，也製作西式服裝，然後通過消費合作社銷售。<sup>52</sup> 俱樂部當時開展多種活動來發動婦女們參加安源的婦聯組織，縫紉班就是其中的一項。安源的婦聯支部在頂峰時期達到一百多名成員。<sup>53</sup> 雖然幾乎所有當地居民都明顯歡迎得到受教育的機會，但那些辛苦地從事挖掘和拖運作業的年輕礦工對上課不感興趣。他們明顯更願意將有限的工閒時間輕鬆地消磨在賭博等一些格調不高的活動上。<sup>54</sup> 而一旦發現有工人不樂意自發地去上課，劉少奇就會按照列寧主義的例行辦法，指揮工人俱樂部糾察隊運用武力來保證出勤率。<sup>55</sup>

儘管偶爾需要硬性地強迫一些不情願的學生接受教育，教學工作的成效十分卓著，說明在中國農村群眾們渴望獲得教育的現實狀況。此外，這一經歷在從中受益的學生身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有一名來自附近村莊貧苦農民家庭的工人，1924年才九歲就開始在煤礦的鍋爐房做童工。安源工人俱樂部提供的教育機會讓他激動不已，他回憶道：

那時候，俱樂部號召工人們參加夜校讀書，受革命的啓蒙教育。我聽後，高興極了，雖然白天做工有些累，但是去學習文化知識，受革命的教育，要求是迫切的。……那時讀夜校不需要辦什麼手續，老師只問了問我的名字，在哪個工廠做工及所住的地址，問了之後，就發給了課本。……那時學習條件差，每天晚上兩小時課，從晚七點到九點，燈也不亮，但大家學習很認真，缺課的很少。我在夜校學習了三年多，很少缺課，能認幾個字，又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心裡非常高興，心情很激動。<sup>56</sup>

雖然學校設施簡陋，但學校的運作依舊需要耗費資金。而工人俱樂部承諾向所有工人提供免費教育，所以它必須承擔學校的所有費用。俱樂部財政支出平均每月約 1,500 元，結果絕大部分都用於開展教學活動。俱樂部每月都會在教育事項上撥發 950 多元，相當於俱樂部月開支總額的三分之二。這筆經費中，三十名老師的薪水計 450 元，生活補貼計 205 元，七所學校總體僱傭的十一名工人的工資計 55 元，此外學校的基本運營費用和設備支出計 200 元，這筆開支包括教室租金、油燈的煤油、教學材料、作業本和郵資等。<sup>57</sup>

教育工作發展快速，亟需補充新的穩定的師資人員。為此，俱樂部開辦了一個教師培訓班，共有四十名學員。由於最初的學員們都只是學生背景，對於工人階級問題鮮有第一手的認識，於是俱樂部又從工人中間挑選了三十名天資較高的人員參加一個為期四個月的特別教師培訓班。這些被選中的工人有一點少額的獎金，俱樂部並允諾在他們順利結束培訓之後，可獲得工人學校的教職。

安源的教育工作蓬勃發展，規模不斷擴大，為了滿足日益增長的課程需求，安源工人俱樂部決定出版自己的教科書，供工人以及工人子弟使用。1924年，俱樂部為小學生編輯了一套名為《小學國語教科書》的教材。課本內的閱讀材料介紹了基本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涵蓋了詩歌、

哲學和自然科學等內容。這套教科書明確地反映了共產黨認為對於培養革命新一代具有重要作用的一些文化價值觀。書本中強調男女平等，例如，特別描述了傳奇人物中國女戰士花木蘭的故事。重要的是，傳統儒家文化中重文輕武的思想被反覆強調：

武人的武器是杆槍，文人的武器是支筆。槍的能力是殺人，效力是到不了距離以外……筆的能力是攻心，能發揚人的本能，能振作人的正氣！……文字在空間是毫無界限的；世上只有受筆所指揮的槍，沒有受槍所指揮的筆。<sup>58</sup>

許多安源子弟小學的畢業生，日後在中國革命事業中擔任了重要的角色。被稱為「中國的保爾·柯察金」的著名工人作家吳運鐸就是其中一位。<sup>59</sup>

1925年俱樂部又出版了兩套面向工人的新教科書。這兩套教材都旨在培養基礎閱讀能力的同時，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意識形態灌輸給讀者。其中較為簡單的一套，即大家所知的《工人讀本》，分為三冊。每一冊都是按照由易到難循序漸進的順序，教授漢字和講解概念。第一冊開篇是：「人生在世上，個個應該讀書。個個應該作工。不讀書，無知識；不作工，是廢人。」最初的幾課反覆強調尊嚴和勞動的價值：「工人和農人，是最尊貴的；如果沒有工人農人，就沒有世界。」幾節課之後，教學內容上升到階級剝削的問題：「資本家，不作工，穿得好，吃得好，他的衣食哪裡來？勞動者的汗和血。」再過幾課，階級鬥爭的概念被引入：「馬克斯，是共產主義的開山祖，高呼無產階級革命，推翻資產階級的社會。列寧是無產階級的先師，他領導俄國的無產階級，實行無產階級革命，建設（立）了勞農政府。」讀本還介紹了基礎的中國歷史和地理知識，並且譴責民間宗教的破壞性以及帝國主義的罪惡。課本一次又一次反覆重提此書的主題：唯有工人革命才能將中國從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雙重壓迫中拯救出來。<sup>60</sup>

第二套教科書名稱為《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工人補習學校補習教科書》。這套書分四冊，每冊二十五課。第一冊雖然通篇注重介紹詞彙和基礎知識，但也沒有迴避直接的政治內容。此冊第十九課向工人們講授為何有必要進行革命：

革命是「流血的恐怖主義」，普通人聽見「革命」兩字常常害怕！那末我們為甚麼主張革命？因為人類有一種痛苦，除了革命外，再無別的方法可以解除，所以馬克斯在一八四八《新萊茵報》上說，「祇

有一個方法才能將舊社會死滅的痛苦，新社會產生的痛苦縮短起來，簡約起來，這一個方法便是革命的恐怖主義！」<sup>61</sup>

第二冊介紹世界勞工運動史，重點講述俄國革命。第三冊概述中國當前的經濟和政治狀況，並再次強調無產階級革命的重要性。第四冊主要圍繞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在世界各國的發展情況來講解知識。書中形容馬克思為「開山祖」，用「先師」來形容列寧。雖然這些稱呼來源於人們熟習的宗教和秘密會社的特定用語，但背後的目標明確向工人群體灌輸新的革命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意識形態。

除提高學員們的識字能力和革命意識外，工人教育還有更實用主義的目標，即選拔和培養共青團員和共產黨員。教師們定期向工人俱樂部匯報學生們的學習習慣和行為表現。那些被認為有發展前途的學員則會成為共青團和共產黨吸納的對象。<sup>62</sup>「表現」這個概念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在評價和安排學生和工人的事項上得到廣泛應用。但顯然「表現」並無與之對等的蘇聯體系概念。其實這個名詞似乎反映的是儒家思想根深蒂固的一個觀念，即人的外在行為彰顯其內在的道德水準。<sup>63</sup>而劉少奇將他在蘇聯學到的經驗，大力發揮在培訓黨的工作者上。來自全國各地的黨員和共青團幹部先被派到安源接受培訓，然後再分配到其他崗位。<sup>64</sup>共產黨在安源開設了第一所地區黨校，由劉少奇任首任校長。黨校課程包括政治經濟學原理、俄國共產黨史和國際青年運動等內容。黨校教材的一大主題，是講述勞工運動和民族主義運動間合理的相互關係，幹部們被要求在確保勞工運動處於正確的領導下，要保證民族主義運動有充分的「革命性」。安源黨校的優秀畢業生被選派去蘇聯深造學習，是為一種嘉獎。<sup>65</sup>

## 文化動員

除了正式課堂教學之外，工人俱樂部還組織了很多教育性和寓教於樂的活動，向廣大群眾傳播革命思想。安源工人俱樂部下設教育股，專門負責協調各種正式或非正式教學項目，其職能頗似後來的宣傳部。雖然離共產黨掌握中國政權尚有二十五年時間，但中國共產主義革命者們已經積累了建立政治文化的寶貴經驗。儘管受到蘇聯榜樣的強烈影響，這一政治文化歸根結底是孕育於中國的自身經歷，充滿獨特性。

工人俱樂部在所有的學校和工地都設置了閱報欄，以便讓剛學會識字的工人們了解時事。最新出版的左翼刊物，比如《工人週刊》和《勞工週報》等，均張貼於此。消費合作社也銷售這些刊物以及其他進步書刊，包括《嚮導》、《新青年》、《先鋒》等。<sup>66</sup> 為進一步啟迪工人，除舉行一些常規講座外，俱樂部還舉辦特別講座系列。常規講座的講演者是當地的工人和老師，而特別講座則邀請社會名流主講。這些演講都由講演股負責協調。講演股是「直接訓練工友的機關……使其明白各項計劃的意義，糾正工友的錯誤思想，引導工友走入正當的路道」。<sup>67</sup> 如當時蘇聯的標準做法一樣，俱樂部收集了當地群眾參與共產黨協辦的這些宣傳活動的統計數據。<sup>68</sup> 根據講演股的匯報，從1923年8月到1924年7月期間，該部門一共舉辦了129場常規講座，聽眾人數達一萬多人次。<sup>69</sup> 演講的題目包括諸如「什麼是階級？」、「什麼是工會？」、「什麼是國民革命？」、「什麼是共產黨？」等等，清楚地反映了安源工人俱樂部力圖向工人們傳達的訊息內容。<sup>70</sup>

然而，此類正統意識形態的文章和講演，不盡然是吸引工人的最佳方式，特別是對於那些年輕工人受眾而言。青年工人在煤礦的無技能勞動力群體中，佔相當大的比例。因此，俱樂部花了不少精力創新一些更生動活潑的文化交流形式。於1924年至1925年期間任職的遊藝股主任如此解釋道：

我在安源工作的這一年，主要是做宣傳工作，工作的對象主要是青年工人。我們經常把青年工人組織在俱樂部中，通過唱歌、演戲、學文化、搞各種娛樂活動，向他們灌輸革命思想，將青年工人團結在黨的周圍，成為工人運動的骨幹力量。那時安源工人俱樂部大廈剛剛落成，我們每個星期都在這裡組織文娛晚會，演戲。那時演戲沒有什麼劇本，都是自編自演的。……看戲的人很多，除了工人以外，周圍的農民都來看戲，人很多，宣傳效果最好。<sup>71</sup>

當時年僅十歲的一名童工觀看了這些演出，在幾十年後依舊記憶如新：

遊藝股還組織青年排演文明戲，演出時，俱樂部大廳裡總是坐滿了人，點着汽燈。演出的節目中，許多是反映井下工人勞動生活的。記得一天晚上，我在俱樂部大廳裡看了一個新劇，是工人階級在資本家皮鞭下的悲慘遭遇。大鬍子馬克思是怎樣從事革命活動的。俄國工人階級拿起武器同資產階級鬥爭的情況。劇中情節感人，深



深地打動了我們的心，我非常羨慕工人階級不畏強暴敢於鬥爭的精神，使我受到一次馬克思主義教育，盼望着有一天我們也能拿起槍來，跟路礦資本家作鬥爭。<sup>72</sup>

更具創意的是，工人俱樂部還主辦了三十一齣由工人們自編自演的「化裝講演」。這種表演糅合了戲劇和講演，屬於寓教於樂的結合。化裝講演大多採用說教性的標題，如「覺悟之路」、「嫖賭之害」、「愛國賊」、「我們的勝利」等。到晚上表演的時候，工人俱樂部大會堂內座無虛席，擠滿了上千名熱情的觀眾。<sup>73</sup> 一個工人回憶道：

那時，安源的工人運動開展得轟轟烈烈，辦起了多所工人補習學校。我在第三校讀書學習，並且參加了三校組織的化裝講演團，有二三十人。我們演《嫖賭之害》，目的在於戒嫖賭，還演過一些工農要團結起來的劇目。我演滑稽角，演過美國鬼子。化裝講演團不只在安源演，還到株洲、醴陵等地去演。<sup>74</sup>

安源工人俱樂部採用的這些文化動員方式，受到蘇聯的強烈影響。蘇聯的工會也希望「藉工人活動家、巡演劇團和演講者將無組織的民眾」鼓動起來。<sup>75</sup> 此外，由於地方戲曲互古以來在中國鄉村地區極受民眾的歡迎，所以「化裝講演」具有強烈的吸引力，雖然這種表演方式是中國共產黨將原有的蘇聯模式加以適應性的改造轉化而成的。一名前安源工人回憶起「化裝講演」的情形：

為了取得廣大農民對工人運動的同情和支持，俱樂部遊藝股股長蕭勁光同志星期天帶領我們到附近鄉村演講。每到一個地方，奏樂組先敲鑼、打鼓、吹號、吹笛子，把群眾吸引過來，接着演節目，然後講演，講資本家怎樣剝削工人，地主怎樣剝削農民，打倒帝國主義和軍閥等，深受農民群眾的歡迎。<sup>76</sup>

巡演的化裝講演同中國農村的地方戲一樣，往往在廟宇前的空地上演出。而按照傳統習俗，通常是在這些空地上舉辦宗教節慶典禮和集市活動。

在國際工運和中國工運史上，那些具里程碑意義的標誌性事件的周年紀念日和重大節日，例如勞動節、馬克思和列寧誕辰，以及巴黎公社建立周年紀念日、羅莎·盧森堡殉難日、安源工人大罷工紀念日、京漢鐵路大屠殺周年祭等日子，俱樂部都會組織全體工人參與大型遊行活動。他們在公共建築的牆上張貼政治海報，組織集體遊行，在街上向公眾發表演講，

散發傳單。這種集體活動在 1925 年 5 月「宣傳周」達到高峰。在長達十天的活動熱潮中，工人俱樂部組織了五次大型集會遊行，分別為 5 月 1 日紀念五一勞動節、5 月 4 日紀念五四運動六周年、5 月 5 日紀念馬克思誕辰 107 周年，以及 5 月 7 日和 5 月 9 日紀念兩個國恥日。五一勞動節那日，遊行隊伍吸引了一萬五千多名參加者。<sup>77</sup>

音樂是這類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由工人俱樂部和工人學校組織的樂隊和合唱隊，為慶典增添了節日的色彩。在遊行中高唱《國際歌》是必不可少的特色環節。<sup>78</sup> 工人俱樂部也譜寫了自己的主題歌。李立三為這首歌創作了歌詞，這是他努力培養成員的自豪感和自信心的工作部分。<sup>79</sup> 一名工人後來回憶道：

參加工作後不久，我便加入了工人俱樂部。我印象較深的是，第一次參加俱樂部活動是學唱工人俱樂部部歌（也叫勞工歌）。歌詞大意是：創造世界，是我勞工；被人剝削壓迫，是我勞工；世界由我們去創造，壓迫由我們來解除；創造世界，除壓迫，團結我勞工。<sup>80</sup>

雖然中國歷史上不乏大規模的抗議事件，<sup>81</sup> 不過，這一時期在各個革命里程碑事件周年紀念日定期舉行的集體慶祝活動，顯然是以蘇聯的活動模式為榜樣。彼得·凱內茲 (Peter Kenez) 認為，蘇聯的那些紀念活動是布爾什維克刻意舉辦的，目的是為了建立一個新的公民信仰 (civil religion) 以取代舊有的教堂活動。興起的蘇維埃宗教的中心特點便是「對列寧的個人崇拜日益增長」。<sup>82</sup> 與之相反，在中國的小莫斯科，受崇拜的是工人自身和他們的俱樂部。雖然李立三廣受愛戴，但後來官方力推的那種與安源革命傳統緊密相連的領袖個人崇拜，在當時卻還不是安源模式的一部分。

儘管尚無個人崇拜，中國共產黨在安源的政治儀式借用了共和模式和蘇聯模式的成分，已然顯示出一種公民信仰興起的某些跡象。<sup>83</sup> 1924 年 9 月，在大罷工勝利兩周年紀念日，礦局宣佈當天放假，方便所有員工參加工人俱樂部舉行的慶祝活動。早上十點，典禮在洪亮的鐘聲中開始。儀式顯露出明顯的宗教氣氛。唱完俱樂部之歌和罷工歌後，數千名與會人員莊重嚴肅地朝俱樂部旗幟三鞠躬。接下來是發表演講，結束時，全場齊聲高呼「罷工勝利紀念萬歲！全世界無產階級團結萬歲！俱樂部萬歲！」報道這一活動的新聞記者根據觀察，認為「工人對於俱樂部十分信仰」。<sup>84</sup>

激進的政治運動逐漸擴散到贛西和湘東農村地區，這一網絡日益擴大，而安源工人俱樂部在其中充當了中心點。為了將激進訊息傳播到周邊鄉村，安源的教師們頻頻造訪萍鄉高中，鼓動縣裡一大批學生去農村做志願活動組織者。至 1925 年初，高中生們組成七支「化裝講演」隊，每一隊各五十餘名學生。他們經常性地到本地區的各個村莊去表演。通常村裡都有幾百個農民趕來觀看這種情節劇。他們還不停地向表演者問一些自己迫切關心的問題，比如如何躲避戰事，或是如何避免服兵役等。<sup>85</sup>

在農村舉行的這些講演活動，反對外國帝國主義的愛國主義主題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 1924 年至 1925 年期間，幾名朝鮮的民族主義人士來到安源，向大家講述了他們在日軍佔領下過的悲慘生活。其中一名朝鮮人在萍鄉高中生活了一段時間，他把學生們鼓動起來，發起了一場抵制日貨的運動。<sup>86</sup> 事實上，萍鄉發生的這起抵制運動實則屬於當時席捲全中國的反日運動中的一部分。這場範圍更為廣大的運動呼籲消費者購買國貨，以表現他們的愛國熱忱。<sup>87</sup> 而民族主義和工人抗爭之間這種爆炸性的協同作用，不久就導致了 1925 年上海五卅運動的爆發。這時，李立三和劉少奇結成的富有活力的二人搭檔組合，在這場史上罕見的洶湧的工業工人罷工浪潮中，再一次扮演了至關重要的領袖角色。<sup>88</sup>

## 經濟動員

在安源，消費者民族主義有非常制度化的表現，即在李立三創辦的消費合作社裡銷售的商品全屬國貨。在 1922 年安源工人大罷工勝利兩個月之後，毛澤東就派遣他的弟弟毛澤民到安源去監督合作社的運營和擴展。毛澤民到達後不久就向毛澤東報告合作社的發展情況如下：

安源路礦工友自去年組織工人俱樂部以後，即着手辦過工人消費合作社。當時是少數人組織的，集資僅百元，不能獨開門面，僅附設於工人補習學校內。此時規模雖不甚大，而合作社的意義與利益，卻已深深印入工友的腦筋中了。

去年九月罷工勝利以後，俱樂部辦事人深知要減輕工友生活負擔，唯有擴充消費合作社一法，於是重新提議，添加股本。工友們亦以自身利益所關，特別踴躍投資，除捐助舊年年終夾薪一部分外，每人更認股若干，至今年已共集資一萬餘元，中國僅有的一個安源路礦工人消費合作社遂於二月七日開始營業了。<sup>89</sup>

消費合作社以低廉的價格向工人俱樂部成員銷售國貨，體現了共產黨對國家和無產階級的雙重責任。這一新穎特殊的機構，依舊借用了人們熟習的動員方式。與原先洪幫香堂向秘密幫派成員和賭徒「放票」的做法類似，工人俱樂部發行了票證，會員憑票可以購物或借貸，或是按優惠比率兌換現鈔和銀元。合作社也願意按面值接受礦工領到的作為工資發放的「礦票」，而不像當地其他商鋪在兌換時，將礦票按一定折扣計算現金給礦工。<sup>90</sup>



圖 6

安源工人消費合作社大樓，於 1922 年開始營業，是共產黨所辦的工人俱樂部吸引新成員的辦法。照片為作者拍攝。

合作社是工人俱樂部的財政支柱。然而，作為由中國共產黨運營的第一個商業機構，合作社遇到了一些可以預料到的問題。按照時刻保持高度警惕性的劉少奇的建議，1923年工人俱樂部對合作社的帳目進行了一次徹底清查。結果發現服務股經理挪用資金達千餘元，並且有數名工人俱樂部幹部向合作社借款逾期未還。俱樂部解除了這個經理的職務，並對幾個違規的幹部處以罰款和懲罰，除此之外，領導們堅持要求他們必須償還挪用和拖欠的全部金額。為了合作社的財務能夠長期保持健康，更重要的措施則是推行了一個全新的透明問責制度。從此以後，合作社的每一個員工都需要一位擔保人，由擔保人交納500元押金以確保員工的人品操守。俱樂部的審計組將每月檢查合作社的帳本，然後經官方蓋章確認後，將這一報告結果張貼在俱樂部的大門上，這樣凡俱樂部會員都可以了解俱樂部的交易情況。至1924年末，群眾對消費合作社的信賴程度大為增加，合作社商店也從一家擴張為三家分店，僱用了四十名職員以及一些其他工作人員。<sup>91</sup>

除消費合作社外，俱樂部還建立了一個職業介紹所，幫助失業工人找到新的工作。根據1922年安源工人大罷工後雙方簽訂的協議，礦局允諾日後凡是招募員工都要經過工人俱樂部同意。理論上，該條款給予俱樂部相當大的人事權力。然而實際上，在這個煤礦小鎮裡，保證為失業工人提供一份工作並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儘管在消除工頭的勢力這一點上，礦局和工人俱樂部利益相通，但包工頭仍對勞動力隊伍繼續實施控制，這讓職業介紹所的工作進展格外困難。曾經一度，140餘名要求立即安排工作的俱樂部成員在包工頭的慫恿下，接連兩周時間持續在俱樂部和公司辦公大樓示威，最終這些示威者全部被俱樂部開除。<sup>92</sup>至1923年8月，介紹所收到197份無業工人的申請，其中只有36人成功得到了新工作。在此後的十六個月中，成功率有所上升。在介紹所的推薦下，154名申請者中有46人找到了新工作。儘管成功就業的資料有些不盡如人意，不過職業介紹所對工人俱樂部的長期會員給予優先幫助，這也是俱樂部努力保障工人福利的一個顯著標誌。<sup>93</sup>

更能反映俱樂部致力於保障工人經濟福利的措施是成立了幫助工傷者及其家屬的互濟股。儘管起初工人俱樂部希望建立一個將公司全部工友囊括在內的救濟性機構，但很快他們就發現不同工種發生工傷和患病的概率

不同，因而很難說服那些工作環境危險性較低的工人為那些工作環境危險性高的工人支付費用。僅洋爐煉焦處、食宿處、電機處、洗煤台、公事房和修理廠這六個工作部門同意建立撫恤故工會，餘下的絕大多數礦工不受保護。在這六個其實相對較安全的工作單位中，工傷死亡的補償金由組內其他工人每人上交等同於一天工資的金額集資而成。互濟股對事故逐一進行詳細的個案調查，然後提出處理方案。儘管在一段較短時期內，這種互助形式覆蓋到八個工作單位，但是即使在發展的最高峰階段，也有約四分之三的工人未得到保護，其中包括最容易傷病的那些在地下作業的礦工。<sup>94</sup>

### 地方權力經紀人：中國共產黨

由於在當地的影響力不斷增長，安源工人俱樂部日漸具有威脅性，與之相比，地方精英的權威漸漸黯然失色。由於擔憂有如此的發展局面，1922年安源工人大罷工勝利後不久，來自李立三家鄉醴陵的一個鄉紳代表團到訪安源。他們為家鄉晚輩惹事生非的搗亂行為，向萍礦礦長李壽銓致歉，同時希望說服李立三返回家鄉。畢竟，李壽銓在去年為醴陵籌措了三萬多元的賑災救濟款。但是李立三這位年輕的共產主義動員家，當時正因最近的罷工勝利處於激動喜悅之中，絲毫沒有打算在這個歷史緊要關頭放棄自己的革命事業。<sup>95</sup> 工人俱樂部通過強制性的手段，增強了在文化和經濟上的力量。儘管俱樂部在1922年安源工人大罷工結束之後，隨即解散了武裝糾察隊，但是很快又恢復了糾察隊的編制。在中間的過渡時期，有幾名包工頭糾集一道謀劃組建一個可與共產黨匹敵的對立組織。他們招募了一些無業工人，加上本地惡棍組成了一個名為遊樂部的團夥。工人俱樂部得知這個新生的對手組織圖謀暗殺李立三的消息後，巡邏隊立即恢復活動，執行了一次行動，成功滅掉了這個對手。<sup>96</sup>

工人俱樂部監察隊重新啟動的巡邏活動肩負雙重任務：「對內監察工友之行動，對外偵察和防禦破壞本部之圖謀和行動。」<sup>97</sup> 安源的每個工作站都要派一名或以上的工人參加巡邏隊，是以巡邏隊在安源總共有逾一百名糾察隊員，附屬的三個分支機構還有一百名隊員。儘管這一職務並不發放工資，但是巡邏隊員有統一的制服，還配備了鐵棒和鐵矛作為武器裝備。

在修建新工人俱樂部大樓的過程中，巡邏隊員守衛着工地，以防物資材料被人盜竊。在舉行大型集會或是其他重大活動的時候，公共安全保衛也需要得到相應加強，於是俱樂部從工人中間召集一些臨時糾察隊員，承擔短期任務，以補充常規隊伍，因此巡邏隊的規模大大擴充，總人數竟高達一千六百人。在「小莫斯科」階段的大部分時期，每天晚上都會有十二名或以上的巡邏隊員在工人俱樂部站崗。他們的任務是在宿舍區進行巡邏，檢查工人是否有賭博、爭吵打架或其他「不當行為」。無須說明，自然並非全部工人都喜歡連他們放工後的活動都要受道德監督的管制。對於一些工人而言，比夜巡隊員更面目可憎的人，是每日白天在礦井入口處站崗的糾察隊員，這些執勤者的任務是防止礦工早退。<sup>98</sup>

秘密幫派對工人們的控制力衰減下去，這也推動共產黨的地位得到相應的提升。在 1922 年安源工人大罷工結束時，本地的洪幫老大同意離開，李立三贈送他一筆酬金作為回報。李立三後來回憶道：「罷工勝利後，資本家想以洪幫為借口破壞俱樂部，我送他些路費，把他送走。工人運動興起後，洪幫就瓦解了，不瓦解，工人組織是不會很好建起的。」<sup>99</sup> 隨着洪幫龍頭老大離去，李立三與諸位共產黨員同志變成安源佔中樞地位的權力經紀人 (power broker)。

力量愈大，肩負的責任也就愈大。工人俱樂部需要解決的糾紛爭端和待處理的破壞事件數目之多以至應接不暇，於是在 1923 年 5 月設立了一個裁判委員會，由最高代表大會的七名成員組成。委員會不光負責處理俱樂部會員之間的矛盾，還包括會員與非會員之間的衝突。在最初的兩個月中委員會就處理了 98 個事件。從 1923 年 12 月至 1924 年 9 月共九個月的期間，委員會處理的事件數量翻了四倍，總共計 432 件。處理的事件包括各種各樣的不良行為，比如違反俱樂部的規章制度、吵架鬥毆、經濟違規、盜竊、偷工減料、賭博、干擾秩序以及不遵守工廠制度等等。<sup>100</sup> 工人俱樂部取代了地方精英，成為當地群眾解決矛盾的主要仲裁者。

李立三和劉少奇明白煤礦是工人的生計飯碗，於是利用他們新樹立起來的威望直接與公司的管理層磋商，期望達成既不損害煤礦的資金支付能力，又可以執行罷工協議條款的一套方案。在罷工結束後到李立三離開安源奔赴武漢共六個月的期間，李壽銓礦長在日記中記載與李立三舉行了不下三十五次長時間的會談，商量包括公司建設事項到工人紀律等諸多內

容。李立三離開安源之後，劉少奇繼續與之協商。1923年6月11日至20日這十天時間內，李壽銓礦長在日記中記錄了和劉少奇的八次長談，大部分都圍繞着工人漲工資的要求和公司愈發棘手的財政困難這兩者如何協調的問題。<sup>101</sup> 會議舉行的頻率和討論的主題不僅表明地位迅速上升的中國共產黨在經濟和政治上的影響力，已經蓋過了當地精英階層，也反映出資本家和共產黨幹部在保持安源煤礦發展這個問題上利益相通。

所有當事方都認識到，當時的經濟形勢十分嚴峻。由於一戰結束後對鋼鐵產品的需求量急劇下滑，萍鄉路礦公司的母公司漢冶萍煤鐵廠礦公司瀕臨破產。由於主要買家漢陽鐵廠的情況岌岌可危，安源礦局面臨需求減少的問題，而與此同時，下面那些膽量壯大的工人們又強烈要求加薪。作為長三角地區主要的家用和工業煤產品供應商，安源礦局的境況雖然不如母公司糟糕，但煤礦公司的年產量在「小莫斯科」階段還是持續下降，1922年產煤827,870噸，1923年生產666,939噸，到1924年產量則為648,527噸，在1925年下降至512,300噸。<sup>102</sup> 相比產量的縮減，利潤的下降更為迅速，是故為了要支付工人工資，副礦長舒修泰絕望地採取了加印更多礦票這一策略。可是這一措施並未讓公司逃脫向當地商家和鄉紳階層借款的境地。<sup>103</sup> 更令人憂心忡忡的是，礦局現在正處於依靠工人俱樂部來安撫那些蠢蠢欲動的員工這樣一個尷尬位置上。1925年6月，情況惡化到極致的地步，以致於當時的一位代理礦長在與時任公司總經理的漢冶萍公司創始人盛宣懷之子盛恩頤的一次秘密通話中，竟然提議將公司的管理權交予工人。<sup>104</sup>

## 與工人的矛盾衝突

然而，即使在「小莫斯科」光芒的巔峰時期，共產黨領袖們開展工作也不是完全沒有一絲反對聲音。大罷工之後很快就出現了針對共產黨計劃的尖銳挑戰。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質疑不是來自那些很大程度上被工人俱樂部取代其權威的地方精英人士，而是來自工人群體自身。罷工的勝利讓工人們得意地認識到他們自身的強大力量，也讓他們熱切地希圖得到更多。隨着地位的翻身，礦工們可以隨心所欲地向那些今不如昔的職員揮舞拳頭。<sup>105</sup> 據這段時期的回憶錄記載，在罷工勝利之後，那些遭到壓制的地



方精英和礦局行政管理人員，通常恭敬地稱呼安源工人們為「萬歲」這個曾經是帝王專用的至尊稱號。<sup>106</sup> 工人的伙食改善，穿起了好衣服，反映他們社會地位的提升。依照罷工協議條款發放給工人們的獎金，讓他們中的許多人在 1923 年過春節時得以人生中第一次品嚐到香腸的滋味，因此他們帶着感激之情把香腸叫做「罷工肉」。<sup>107</sup> 同時，一些年輕工人用獎金購買了藍色制服和皮鞋，把自己打扮成學生的模樣。<sup>108</sup> 工人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是建立在工頭的經濟損失之上的。罷工後，包工制儘管沒有被完全廢除，但受到一定限制。工頭對工人的「壓榨」此後被限定為工人獎金的 15%。<sup>109</sup>

工人們的地位急劇提升，壯大了他們的膽量，產生的預期也愈來愈高，以致於有時超過了共產黨能夠達到的範圍。劉少奇曾寫道：「工人罷工後，生活大加改善，地位大加提高，人皆稱工人為『萬歲』……即使這樣，工人還不滿足，還要更前進。」<sup>110</sup> 工人們日益增長的胃口，與共產黨普遍施行的政策發生衝撞。在勞工運動遭遇到全國性危機而安源經濟受到威脅的緊要時刻，共產黨採取了謹慎的立場，選擇鞏固已有的成果，而不是冒險地進一步發起武力挑釁。「二七」大屠殺事件中數百名京漢鐵路的罷工者慘遭軍閥吳佩孚殺害，之後不久李立三就前往長沙去尋求毛澤東的指示。毛澤東引用韓愈的一句詩「挽弓待發」，說明有必要暫時忍耐克制。<sup>111</sup> 4 月底，李立三被調到武漢去重建因二七慘案被破壞的當地黨支部，毛澤東則前往安源，在工人俱樂部發表了幾次演講。他強調加強防衛的重要性，預備在可能的軍事襲擊到來之時保衛俱樂部。<sup>112</sup>

毛澤東的警示與劉少奇天生的謹慎傾向其實是一致的，但是並不是安源的每一個人都願意克制。1922 年罷工的成果令工人們期望更大，許多俱樂部成員希望逼迫礦局作出更多讓步。一名幹部後來回憶道：

我記得在安源大罷工勝利以後，在工人領袖和黨內的一些同志中，滋長着一種「左」的情緒。他們認為向資本家提出的要求愈高愈好……當時黨對工人運動的指示精神主要是……維持安源煤礦的生產，不使工人失業，保護工人的基本利益；要充分利用工會的合法性開展鬥爭，保存力量，為全國培養和輸送工會工作幹部。少奇同志堅決執行了黨對工會工作的指示，對這些「左」傾情緒進行說服教育。但這些意見被一些有「左」的情緒的人認為是右傾。當時工人俱樂部的副主任陸沉就反對劉少奇同志的意見。還有一個工人

叫謝懷德，高個子，是工人糾察隊隊長，鬥爭很堅決，在工人中很有影響，但思想也比較「左」。曾經有一段時間，由於這些「左」的思想提出一些不符合實際的過多的要求，不斷組織工人進行罷工、遊行、示威，致使煤礦生產處於癱瘓狀態，有的工人被開除，有的工人生活無法維持，工會漸漸有脫離群眾的傾向，工人俱樂部內意見也不統一。在這種情況下，少奇同志很着急。<sup>113</sup>

謝懷德當時是糾察隊副隊長，以前參加過秘密幫會，後來由李立三吸納加入了工人俱樂部。他為人莽撞急躁，在 1923 年 6 月，他挑唆一群工人鬧事，威脅若工資不大幅上漲就要罷工。這一行徑公然違抗劉少奇的命令。謝懷德又指控安源路局站長把穀麥運往別的區域而使糧價被抬高。被工人們稱為「謝猛子」的他，狠狠揍了站長一頓，情形變得更加動盪。<sup>114</sup>在一片混亂中，謝懷德的支持者們聯繫李立三，請求這位領導 1922 年大罷工的英雄回到安源，帶領他們發起新一輪罷工。儘管那時李立三早已被派到武漢，但俱樂部依舊向他發放工資。在劉少奇的敦促下，李立三趕回煤礦，試圖平息這場風暴。李立三堅持遵照黨的政策，建議工人們放棄鬥爭，保證煤礦生產。這顯然不是那些不滿現狀的工人們所期待的訊息。工人中的某些好鬥者甚至連受尊敬的領導人李立三出面安撫都不願意接受。口頭上的勸說沒有生效，李立三很不情願地訴諸武力。<sup>115</sup> 劉少奇後來回憶道：「李立三親自帶領去阻止，工人要打他。我批評工人不要過分，工人要打我，說我被資本家收買。」<sup>116</sup> 這次衝突對於李立三和劉少奇二人均是一件痛苦的事，使得兩人在很多年以後回想此事時，都露出哀然之色。劉少奇發覺，安源礦工們的好戰傾向不是能輕易遏制：「我們工友有些……或者以罷工來對待俱樂部……望各工友切不可輕於動武，不要拿武器殺自己家裡的人。」<sup>117</sup>

這次衝突的結果是礦局和工人俱樂部簽訂了一份新的臨時協定。由劉少奇出面協調並商定了一份含七點內容的協定。根據協定，礦局保證給工人們適度加薪，俱樂部相應保證每日煤產量達到一定噸位數量，且同時嚴格執行工作紀律。<sup>118</sup> 然而，麻煩並未就此結束。幾個月後，「謝猛子」又捲入一場爭端。這次是和本地的一個商鋪老闆發生爭執。受委屈的商鋪老闆到工人俱樂部抱怨，尋求解決。劉少奇覺得衝動莽撞的謝懷德招惹是非太多，儘管謝懷德同時身兼俱樂部糾察隊副隊長與交際股股長，在工人中

間頗有威望，劉少奇還是下令讓謝懷德離開安源。因此，謝懷德被派回他的老家湖南衡山負責動員農民。次年，軍閥進攻衡山，迫使謝懷德逃亡。他試圖到安源避難，但劉少奇拒絕憐憫他，以致謝懷德別無選擇，只能在山上一個洞穴中藏身，直到他能夠平安返回湖南。<sup>119</sup>

劉少奇因工人動武打鬥的事件而沮喪，但不單是因為謝懷德一個人。1924年，在上交的一份關於安源工人俱樂部狀況的報告中，劉少奇抱怨工人們普遍缺乏紀律：「我們工友在去年以來有些以為『現在我們有了俱樂部保護，闖出禍來有俱樂部承肩』」，「有些工友以為廠規是資本家訂的，不管他正當與否，故意不守，工頭職員在工作上正當的指揮，也故意不聽」。<sup>120</sup> 1924年6月劉少奇發表了一篇題為〈救護漢冶萍公司〉的文章。在這篇受人注目的文章中，他對工人們的批評更為尖銳。劉少奇稱安源煤礦的母公司漢冶萍煤鐵廠礦公司是東亞「物質文明」的根基，但是指出公司的發展前景堪憂。為了將這個國內最大的工業聯合集團公司從破產的邊緣拯救出來，劉少奇建議挑動美日兩國的經濟力量相互對抗，以期保證中國能夠掌控公司的所有權。由於劉少奇是「小莫斯科」的「社會主義」領袖，他對工人的尖銳批評特別具有巨大的效應。他還引用了一句俗話「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來批評中國工人沒有公德。劉少奇警告，如果工人們不能共同擔負起保護他們的生計來源的職責，那麼正在苦苦掙扎的漢冶萍煤鐵廠礦公司將難逃厄運。此外，公司本身沒有關注過工人的教育，而且工人和管理層之間的敵對又達到了警戒程度，這對公司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sup>121</sup>

儘管共產主義革命者在安源做的教育工作卓有成就，但是事實上，要讓工人們聽從勸告遵守紀律，依舊困難重重。劉少奇擔心，工人們近來滋生的狂妄自大加上舊有的惡習，將會敗壞安源工人俱樂部的社會形象。是故工人俱樂部的最高代表機構頒佈了一份通告，嚴禁賭博和鬥毆。鑒於夜間巡邏並不能完全消滅這些惡習，總代表們答應由他們去監督工作站執行禁令的情況。一旦發現有違反規定的情況，他們就會立刻向俱樂部領導反映。輕微的違規行為由俱樂部處以罰款，而這些罰款將用於為工人圖書館添購閱讀材料。情節嚴重的事件將會移交警署裁定懲罰。然而，因為賭博在當地文化中根深蒂固，代表們要把這一惡習完全消除似乎不太現實。<sup>122</sup> 1924年春，安源黨支部報告稱「工人賭（賭）風頗盛，總代表百代

表亦不能免，工會禁賭，極感困難。……又工人犯事，每每由俱樂部罰工，因此，工人也不滿意」。<sup>123</sup> 工人俱樂部頒佈規章對於一再違規者實施的懲罰措施逐步升級，這表明俱樂部的一般成員和普通職員仍舊沉迷於賭博。普通工人若第一次觸犯規定，罰一天工資，第二次罰兩天工資，第三次罰四天工資，第四次罰八天工資。若是第五次違反禁令，則將其開除出俱樂部。對工人代表和俱樂部職員採取的懲罰措施要更為嚴厲一些：初犯者罰兩天工資，第二次違規罰四天工資，第三次犯規罰八天工資，第四次違反禁令則取消代表或職員職務，第五次犯事則被開除出俱樂部。<sup>124</sup>

對於一些工人而言，賭博並不算是他們最壞的惡習。儘管當地的幫會頭子已經離開，但令人沮喪的是仍有一千多名工人是洪幫成員。共產黨警告他們，工人俱樂部不會保護任何參與持械搶劫活動的工人，反而要將他們移送官府。<sup>125</sup> 根據工人俱樂部裁判委員會報告，每月處理的大約五十件爭端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涉及到嚴重的人身傷害。<sup>126</sup> 互濟股撫恤故工會也發現，有必要規定工傷賠償不適用於因鬥毆引致的傷害。<sup>127</sup>

## 與地方精英間的衝突

相較於工人俱樂部遇到的問題，公司管理層遇到的問題更為嚴重。為平息任期內發生的大規模罷工，令李壽銓心力交瘁。煤礦以及母公司經濟低迷，作為管理高層他也需要承擔一定責任。因此罷工協議商談之後，李壽銓就向萍鄉路礦兩局請辭，不過漢冶萍煤鐵廠礦公司在一年多之後才勉強答允。1923年11月，在安源煤礦服務數十年之後，意興闌珊的李壽銓返回家鄉江蘇。<sup>128</sup>

主管的人事更替使劉少奇等各位同志面臨更為複雜的情況。思想進步開放的李壽銓願意與共產黨進行商談，然而繼任者漢陽鐵廠副廠長黃錫庚採取了強硬路線。黃錫庚向上級保證，在半年內摧垮工人俱樂部。在他的鼓動下，成立了一個名為「職工協濟會」的組織來挑戰俱樂部的勢力。這個新組織取得了活躍的聖雅各堂會長龍永鑒牧師的支持。自1923年春天起，一個無政府主義黨的一些成員試圖在安源組織活動，不過成效甚微。職工協濟會聯合了這批人。這些聯合在一起的敵對力量被共產黨抨擊為資本家、聖公會教徒和無政府主義者的「三角聯盟」。而這個聯盟則指責共

產主義知識分子控制了工人俱樂部。他們大擺宴席請工人們無拘無束地喝酒，目的是和俱樂部形式簡樸的文化娛樂活動競爭。為了在工人階級民眾中孤立共產主義教育者，這個新聯盟慫恿工人們吆喝「穿長衫的滾出工會去」。<sup>129</sup>（一幅安源工人俱樂部教師集體合照顯示其中的多數老師，包括劉少奇，都穿着傳統的中式長袍。照片攝於 1924 年 6 月 15 日。）

工人俱樂部面對多股勢力的聯合挑戰，作出了積極有力的回應。首先，俱樂部明確宣佈，任何參加無政府主義黨的工人將會失去俱樂部會員的全部權利。這一決定導致無政府主義黨迅速瓦解。然而，教堂方面的對抗力量要更為強大一些。儘管龍會長曾經同多名本地精英對 1922 年安源工人大罷工給予支持，但之後他與共產主義領導者的關係相當冷淡。<sup>130</sup> 聖雅各堂曾經自詡聚集數千名安源居民參加禮拜儀式活動，而此時卻要同工



圖 7

安源工人俱樂部學校的老師們，日期為 1924 年 6 月。其中多數穿着文人的長衫。第三行右起第二人站立者為劉少奇。

人俱樂部一道進行直接的競爭，既要爭取信徒到教堂來活動，也要爭取學生到教會學校註冊入學。曾經在「小莫斯科」的鼎盛時期到訪安源的一名美國聖公會傳教士記載了這種敵對競爭。富豪斯·汀 (Walworth Tyng) 牧師在 1924 年 10 月到煤礦視察參觀，他描述道：

布爾什維克的宣傳從俄羅斯流傳到了中國。這裡和鐵路上的人都參加了工人俱樂部，成員人數大概有一萬三千人。俱樂部的領導者是一些年輕的鼓動者，擁有的激情比他們的智慧多。一進入俱樂部大樓就會看到馬克思的巨型畫像。若是你到文書的辦公室去同他談話，就會看到牆上掛着一幅稍小的列寧畫片。大樓的禮堂能容納兩千人左右，在這裡向工人們宣講反對資本主義的內容。我們發現，認為自己窮得沒法向教堂交錢的那些人定期自動地從他們的工資裡繳納費用給俱樂部。在某些有益的方面，俱樂部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力量。俱樂部所得收入大部分用於運營有上百名孩子上學的學校。但是在某些方面俱樂部也是一個危險因素。工人們的工作標準下降了。<sup>131</sup>

聖雅各堂為礦局的職員和技術機械師的子女開辦學校已經很長一段時期，現在，在公司的積極鼓勵之下，聖雅各堂辦學的課堂又向普通礦工子弟開放。礦局總結認為，在控制勞工隊伍方面，基督教的教育不及共產主義教育的威脅性大。因此，公司的管理層主動提出由公司負擔礦工子女的所有教育開支，以減弱工人俱樂部的「赤色教育」在工人間受歡迎的程度。<sup>132</sup>

劉少奇意識到敵對的教堂與礦局勾結，將會對俱樂部的宏大目標造成一定的挑戰。因此他組織了一次揭露資本家和基督教士罪行的公開教育運動。教育講座和諷刺劇以「為什麼反對基督教？」和「基督教的罪惡」等為題目。活動每晚都會吸引千餘名好奇的觀眾到俱樂部來觀看。此外，反基督教的小冊子和傳單也到處散發。俱樂部在公眾中開展的活動有效地沖淡了教會在工人群體中的影響力。<sup>133</sup>

雖然面臨諸多挑戰，俱樂部依舊能夠培育並且保持成員對組織的忠誠。其中一個關鍵因素是，工人俱樂部是一個提供全面服務的機構。俱樂部不僅提供教育和文娛活動，還提供以前由當地精英人士把持的各種實惠利益和貨品雜物。消費合作社讓工人們能夠獲得低息借款，並且以低於市場價購買基本生活必需品。俱樂部下的故工撫恤會設立了互濟股，專門負

擔因工業事故死亡的工人的喪葬費用。俱樂部的職業介紹所向失業工人提供可能的工作機會。俱樂部設立了裁判委員會，調解處理各種勞務糾紛。一千多名工人「糾察隊員」組成的保衛隊伍配備槍和棍棒，負責維持公共秩序。工人俱樂部經常在各個革命性的周年紀念日舉辦隆重的慶典活動，表明俱樂部成為安源的主要文化和儀式權力中心，在當地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sup>134</sup>

由於未能削弱共產黨領導的工人俱樂部的權威，1924年9月上任尚不滿一年，黃錫庚就氣惱地辭去了礦長職務。對煤礦的最高管理一職覬覦已久的副礦長舒修泰，獲提拔為代理礦長。舒修泰目睹黃錫庚的強硬攻擊路線徹底失敗，採納了容忍妥協的路線。舒修泰認同共產黨的影響力和權威性，接着恢復了李壽銓先前的做法，頻繁地同劉少奇以及俱樂部其他幹部進行商談。

1924年12月，工人們發動罷工索要欠餉，這一事件再次展示了工人俱樂部的強大力量。由於漢冶萍煤鐵廠礦公司無法向日本人償還所借款項，陷入嚴重的債務危機，瀕臨破產，因此安源煤礦一直拖欠工人的工資。當公司宣佈將不遵守1922年安源工人大罷工協議的規定，取消發放兩個月工資的年終獎金時，工人們異常憤怒。幾千名內心不滿的工人事前未經籌劃便進行罷工，由此拉開抗議活動的序幕。然而經過數周，群眾的罷工活動毫無收穫。工人俱樂部擔憂可能會釀成一次暴力事件，也認識到1922年大罷工爭取到的成果此時已快前功盡棄，於是決定作為抗議群眾的代表介入此事。劉少奇召集了一次公開大會，一位親歷者回憶當時的情形如下：

到那裡一看，熱鬧極了，到會的人特別多，幾乎擠滿了會場，其中有年老的，也有年輕的，還有婦女。台上掛着馬克思的像，人們看後議論說，這個大鬍子是誰呀？他在什麼地方？正在這時，只見會場中央出現了一個穿長衫衣服的成年人，他站在台子上說，這大鬍子是個好人，他叫馬克思，是為窮人謀利益的。接着，他又說，現在資本家為什麼不發工資？為什麼要發給我們蟲米？這就是資本家們對我們的剝削，對我們的壓迫，我們各位工友一定要團結起來，堅決和他們作鬥爭。他的講演，不斷激起人們的掌聲，工友們聽了心裡熱乎乎的。那講話的人是誰，我當時不大清楚，後來聽人講，他就是劉少奇同志。事隔不久，一場震驚中外的安源第二次罷工鬥爭爆發了。<sup>135</sup>

劉少奇的動員工作不光只是針對騷動不安的工人。依照他之前來煤礦指導工作的 1922 年安源工人大罷工的模式，劉少奇再次把重點放在贏取當地精英中關鍵人物的支持上面，尤其是安源商會人士和鎮守軍官。工人俱樂部召集了一千五百多名武裝糾察隊員維持公共秩序。在當地精英人士的幫助下，俱樂部經過交涉，成功地替權益遭受侵害的工人們討回了全部的欠薪。1925 年 1 月中旬，罷工工人品味着成功的喜悅，宣佈勝利，然後復工。<sup>136</sup>

### 「小莫斯科」的影響範圍

共產黨在安源展開了高強度的動員活動，在三年中組織了兩次大型罷工活動，並且為數千名工人提供了受教育機會，在安源進行的這場試驗受到國內和國際的廣泛關注。就連美國政府都不得不試圖去了解這個以前還是默默無聞的煤礦小鎮上發生的事情。一名有鮮明反共產主義傾向的美國領事在 1925 年初被派到安源進行調查。他沮喪地報導了工人俱樂部對勞工隊伍的控制約束情形：「我剛剛從萍鄉的安源煤礦返回……那裡的技術員工都是中國人，看起來似乎無精打采。他們完完全全處於工會的掌控之下。」<sup>137</sup>

工人俱樂部的力量也影響到周邊的城鎮和農村，俱樂部也很樂意向他們伸出援手。安源工人俱樂部向贛西和湘東地區各個行業的勞工群體提供經濟資助，並且派遣訓練有素的組織者和教師前去這些地方。安源的積極分子們經常到附近地區舉行化裝講演和其他形式的宣傳活動，那些地方的民眾往往會請求俱樂部協助他們建立分部。以安源工人俱樂部為榜樣建立的工會如雨後春筍般在周邊地區湧現。這些新建的工會發動了一系列罷工，安源工人俱樂部則對這些罷工活動給予資金援助。<sup>138</sup>

這些工會只是單純地照搬工人俱樂部的模式，所以，相較而言，對中國革命的未來發展產生更深遠影響的是農民協會的出現。當然，農會也是以安源為榜樣。安源工人和他們農村老家的聯繫十分緊密，因此變得激進起來的工人把新學到的知識傳授給老家的鄉親們，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首先展現出這種知識擴散效應的地方，是湖南衡山縣的白果鄉，這裡既是巡邏隊員謝懷德的老家，也是湖南省省長軍閥趙恒惕的家鄉。謝懷德



因自己的野蠻闖禍行為在 1923 年初被安源工人俱樂部逐出，返回老家幫助當地鄉親成立「岳北農工會」。按照安源模式，每十戶農家選出一名「十代表」，每百戶人家選出一名「百代表」，縣裡每個區選出一名總代表。1923 年 9 月 16 日農工會正式成立，有三千多戶農家參加，人員數量超過一萬名。為了表示祝賀，安源工人俱樂部不僅向農工會發來賀電和標語橫幅，還資助了一筆大額經費。儘管這個協會很快就被軍閥趙恒惕動用武力強行解散，但是這個組織標誌着著名的湖南農會運動的開端，而毛澤東也就是在湖南農民運動中，開始了他的農村革命道路。同安源工人俱樂部一樣，農民協會也開辦識字課程、消費合作社，並向貧苦農民提供經濟和文化福利。但是，由於他不用受劉少奇和安源共產黨紀律的約束，謝懷德帶領一群農民攻打地主富戶，進行了血腥暴力的屠殺和洗劫。而這種事情是安源工人俱樂部領導不能容忍的嚴重違規行為，違例者是要被開除的。<sup>139</sup>其他的安源「畢業生」也都效仿謝懷德的做法。汪先宗是煤礦的一個挑煤工，來自毛澤東的家鄉湖南湘潭。他曾經在安源工人俱樂部株洲分部的工人學校學習過。1925 年 5 月，他在湘潭建立了一個農民協會。不久他就帶領五千名農會成員洗劫了當地地主豪紳家的財產。<sup>140</sup>

## 「小莫斯科」的結束

安源工人俱樂部的工作取得豐碩的成果，影響力擴散到廣大的區域，而俱樂部領導們對獲得的優勢地位的利用非常有節制，是以共產黨在安源的工作堅持了相當長的三年時間。但是最終，他們還是未能抵擋住更強大的政治勢力的陰謀暗算。1925 年 4 月，劉少奇被調離安源，到其他地方去組織勞工運動。劉少奇離開之後僅僅數月，他所熱愛的工人俱樂部就遭到致命的打擊，從此再不能重振舊日的輝煌。

1925 年秋天，萍鄉路礦公司所屬的母公司漢冶萍煤鐵廠礦有限公司的總經理，決定從公司總部所在地上海到安源去視察。總經理盛恩頤乃是三十年前開辦安源煤礦的創始人盛宣懷之子。盛恩頤在德國工程師賴倫的陪同下來到安源。後者受盛恩頤之父的邀請，於二十年前便開始了在安源的工作，後來在 1919 年民族主義熱潮中被趕出安源。他們到達安源之日，碰巧便是罷工勝利三周年紀念。他們親眼目睹工人俱樂部組織的盛

大慶典活動。雖然鎮守使事先已經警告過俱樂部，最好降低慶典的規模以免激怒盛恩頤，但是俱樂部還是組織了許多慶祝活動，包括一系列化裝講演，還有演唱劇團的節目。由於小心謹慎的劉少奇不在此地，他的克制原則也無法施行。一萬多名礦工湧出煤井參加熱鬧喧嘩的慶典，顯示了俱樂部的力量。前面的遊行隊伍舉着紅色橫幅，工人們跟隨在後，高喊「打倒資本家！」等煽動性口號。<sup>141</sup> 盛恩頤對無產階級展示的強大力量感到震驚，決定進行鎮壓。賴倫試圖勸阻他，向他強調「資本家們必須和工人合作。世界上的每個國家都有工人運動，這是消滅不了的。用武力進行鎮壓是自尋死路。」<sup>142</sup> 但是盛恩頤絲毫不為所動，他指示鎮守軍隊全面進攻安源工人俱樂部及其所屬學校。三名工人在襲擊中死亡，幾十人受傷。五名工人自殺。工人俱樂部被關閉，而學校和消費合作社被包圍起來進行搜查。教師和俱樂部員工一共七十多人被軍隊逮捕拘押。被拘禁者中有共產主義革命教師黃靜源，他兼任學校校長和工人俱樂部副主任。就在俱樂部大樓前面的大操場上，黃靜源被槍決。江西督軍方本仁親自監督行刑。此人與總監工王鴻卿交往密切，長期以來一直是王三鬍子的靠山。<sup>143</sup>

三年前，李立三、劉少奇同數千名礦工和鐵路工人一道在這裡喜悅地慶祝他們的非暴力罷工的勝利。而三年後的這一天，此處卻是革命者的殉難地。在共產黨幹部的帶領下，安源工人對黃靜源的犧牲舉行了哀悼。黃靜源是安源勞工運動中第一位被正式追認的「革命烈士」。工人們的行動展現了政治資訊如何與宗教儀式結合成為一種情感強烈的力量集合體，而這種結合存續的時期更長久，超越了安源試驗的存在期。黃靜源被處決三天後，他的親戚們聚集在醴陵縣城迎接他的靈柩回老家安葬。群眾遊街示威，聚集在醴陵火車站向從安源運來的靈柩致哀，而報紙在報導中稱之為「湖南史無前例」之事。群眾高呼「黃靜源不死，黃靜源萬歲」的口號，然後在棺木面前嚴肅地深深三鞠躬。來自安源的工人和醴陵各界代表作了兩小時的演講，在場「聽者無不感泣」。然後，在震耳欲聾的爆竹聲中，靈柩被抬回火車上，接着開往湖南省會長沙。途中，火車在株洲停留了兩個小時。群眾在株洲火車站月台上搭建了一個祭台，學生和工人們按照祭奠規矩宰了兩頭豬作為牲禮以祭奠黃靜源在天之靈。在公眾演講和哀悼之後，火車載着黃靜源的遺體繼續開往長沙。逾兩萬名群眾在長沙火車站迎接，他們連續三次高呼「黃靜源精神不死」。人們鄭重地從火車上抬下靈柩，

往長沙教育會方向走去。抬棺遊行沿途，圍觀的群眾們高呼「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打倒資本主義」、「恢復安源工人俱樂部」、「黃靜源精神不死」等口號。靈柩抵達目的地後，群眾們繞棺木三周，行三鞠躬禮，表達哀悼之情。全國性大報《申報》如此報導這一事件：「似此熱烈情形，黃靜源真可謂不死矣。」<sup>144</sup>

然而在安源，由於敵人為攻打工人俱樂部而駐紮了壓倒性的強大軍隊力量，悼念黃靜源的活動不得不悄然進行。不過，追悼儀式還是體現了安源勞工運動自開展以來一直突出的極具創新的文化置位特色。一個工人回憶：「記得就在長沙召開黃靜源同志的追悼大會後，安源的工人舉行了悼念活動。一天黃昏，在黃靜源同志的就義處，有道士念經，燒一些香和紙錢，喊口號……以後知道，裝扮道士的就是修桶房的工人，共產黨員陳春生。」<sup>145</sup> 即使安源精神得以保存，但是 1925 年 9 月的軍事進攻給小莫斯科帶來的打擊十分慘重。這個事件後來在中共黨史中被稱為九月慘案。慘案之後，數千名安源工人由於被指控為具有共產主義傾向而被路礦兩局解僱。在安源工作的一萬兩千名煤礦工人到 1926 年秋天之時只剩下八百名保有工作，而留下的鐵路工人更是屈指可數。<sup>146</sup> 安源煤礦的產量跌到了近二十五年來的歷史最低點，從 1925 年的 512,300 噸煤暴跌至 1926 年的 75,715 噸。<sup>147</sup>

被解僱的工人大概有一萬名，其中約有兩千名工人俱樂部積極分子被強制遣送回他們的湖南和湖北老家。驅逐遣送的目的是為了沖淡小莫斯科的激進主義氣氛，然而意想不到的，共產主義運動於是從安源擴展到周邊的農村地區。湖南農民協會很大程度上就是這一過程的產物。而後不久就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湖南農民協會聞名天下。這些被解僱的工人和教師們紛紛回到家鄉，嚴格依照他們親身經歷的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的模式組建了一大批農民協會。<sup>148</sup>

中國共產主義革命於是就從初期的無產階級運動走上了農民運動的道路，而這個轉型與小莫斯科的失敗結局存在密切關聯。在中國這個農業國家發生的這次轉型，對於革命的最終勝利至關重要，但是付出的代價也十分高昂。安源試驗的顯著特色是紀律性和約束控制，在農民協會的紅色恐怖中消失殆盡。暴力逐步升級，愈演愈烈，在農村開展的軍事化過程中誕生了紅軍。下一章將詳細介紹，前安源工人在創立紅軍的過程中扮演了主

要角色，但環境同之前做動員工作時的情形已經全然兩樣。與此同時，無論是從經濟方面還是政治方面而言，安源已然凋敝衰落。一直到四十年之後，文化大革命爆發，紅衛兵發起了「新長征」運動，安源這個煤礦小鎮才又一次成為吸引激進知識青年蜂擁而至的地方。

安源試驗在當時被稱為是「中國的小莫斯科」，後來則被概括為「安源革命精神」。安源的革命活動在某些方面反映了中國共產主義革命最好的部分。儘管存在諸多缺點，在安源進行的動員工作為成千上萬的工人、農民以及他們的家人帶來了教育機會，建立了組織，樹立了自尊。安源工人俱樂部的成功，乃是個人領導風格顯著不同的革命領袖們為了共同的目標齊心協力合作的結果。毛澤東的戰略指導，李立三極具個人魅力的創新，還有劉少奇紀律森嚴的統率，三者協同，形成了一種威力強大的群眾動員模式。曾經一同共事過的同志張國燾後來評議李立三和劉少奇道：

李立三和劉少奇是工人運動中的極佳組合。劉少奇曾經表示李立三身上有一股強大動力，他善於宣傳動員，他能夠發起攻勢，能夠搶佔陣地。但是，他發起的活動通常一片混亂，需要劉少奇費心費力地梳理工作，使群眾組織起來，使活動有條不紊地進行。<sup>149</sup>

在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早期階段，黨內還未出現後來導致分裂的殘酷的領導權力鬥爭，這些革命者們共同攜手投身於改變工人階級悲慘境遇的宏偉革命事業中，獲得了令人矚目的卓越成就。此外，安源試驗的意義不只是局限在安源一地。李立三將安源工人大罷工的一些成效顯著的工作，比如夜校、工人俱樂部和要求做人尊嚴的非暴力罷工等，作為基本經驗，後來在上海成功地開展了由共產黨領導發動的歷史性的五卅運動。<sup>150</sup>

安源不光是對將來如何組織勞工提供了示範樣板，還在行政管理方面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儘管共產黨員們為避免警醒當地精英而未將重組後的工人俱樂部命名為「蘇維埃」，俱樂部的公開活動卻是幾年後在贛東地區成立的江西蘇維埃的歷史先聲。譬如，在金融方面，毛澤東之弟毛澤民基於自己管理安源消費合作社的經驗，開辦了江西蘇維埃的第一家銀行，成為施行共產主義計劃經濟的先驅。<sup>151</sup> 劉少奇在負責主管安源第一所黨校期間積累的經驗，為日後不斷進行的幹部培訓和思想整風運動開創了先河，譬如從江西蘇維埃開始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早期的延安整風運動，以及二十年之後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sup>152</sup>

「小莫斯科」的政策在很多方面照搬了蘇聯的政策。在蘇聯接受培訓的劉少奇是一個堅定的列寧主義者，虔誠地信仰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和遵守紀律。在他領導的時期內，安源工人俱樂部採用明確的社會主義形式。1923年2月後，面對軍閥的進攻，中國共產黨的主導政策是採取克制忍讓的方式，劉少奇遵照政策暫緩了他的宏偉革命目標，轉而把精力放在教育和組織工作上，而不是進行暴力的階級鬥爭。除因應時局的必要性之外，中國共產黨對於文化動員的強調重視，其實符合了當時列寧為蘇聯構思的工作思想。在生命的最後階段，列寧開始提倡他稱之為「文化革命」的工作。1923年1月，他寫道，

我們對社會主義的整體展望出現了一個幅度相當大的調整修正。這種巨大的調整修正就是：過去，我們強調的是，亦是不得不強調，政治鬥爭、革命和奪取政治權力等。現在強調的重點正在變化，向和平的、有組織的、「文化」工作轉移；我應該說重點正在向教育工作轉移……然而，我們現在面對的正是這種文化革命。<sup>153</sup>

當然，在1917年十月革命發生好幾年之後，列寧呼籲的文化革命在他看來並非意味着就排除了在某些革命階段進行暴力階級鬥爭的必要性，他強調的是社會主義的實現，必須要高度重視依靠教育工作的文化轉型。

就在劉少奇將安源工人俱樂部建設成基層教育和文化活動中心的這一時期，蘇聯在列寧推行的新經濟政策下，同樣建立了鄉村閱覽室、文化俱樂部、小學和地方黨校等機制，旨在消除文盲和提升人民的革命道德水平。在中國，這些工作由於契合老百姓的態度和追求，因而受到農村群眾的普遍歡迎。然而，在蘇聯列寧的措施卻招致相反的反應，因為群眾們認為布爾什維克主義悖離了普遍的社會規範，所以十分抗拒。<sup>154</sup>

劉少奇等同志在安源開展的「文化革命」被視為是將來的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塊基石。然而，在當時他們儘量避免採用暴力手段，而偏向於做依照列寧的用語是「和平的、有組織的、『文化』工作」，目的是培養一批受過教育的工人和農民，使他們對自身的階級利益有覺醒意識，並且自願積極地參與群體行動，實現自身階級利益。儘管這種教育工作在意識形態方面符合列寧的思想，且在實際運作上與中共的全國性政策相符，安源工人俱樂部的革命活動在設計和內容方面實際上還大量借用了當地的風俗。毛澤東、李立三和劉少奇三人來自湘贛邊境上緊鄰安源的湖南省的不同縣，

他們都相當熟習此地的習俗。個性和領導風格截然不同的三人卻都贊同為實現新的社會主義目標，需要將這些傳統習俗加以利用，雖然各人的接受程度和敏感程度存在某些差異。

安源試驗在「小莫斯科」的整個過程中都表現溫和，這個特點完全遵從了中國共產黨當時的指導方針。毛澤東向李立三建議「挽弓待發」，這個謹慎指示是對當時危險局勢下共產黨採取的明智對策的一種概括。為了避免招惹軍閥發動如京漢鐵路二七慘案那般殘酷的鎮壓，共產黨在這一時期採取了防禦姿態。

數十年後，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對「文化革命」和「安源革命傳統」二者的解讀發生了劇烈的變化，以期契合於毛主席發動的暴力階級鬥爭。但是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期，劉少奇採取的約束克制路線實際上與共產黨當時的官方路線是一致的。他的頂頭上司，負責勞動組合書記部湖南分部的毛澤東，曾經明確地傳達過政策。儘管劉少奇的謹慎天性使他與工人俱樂部裡動武好鬥的一些成員之間關係緊張，但是這一個性也使他成為在嘗試階段執行溫和策略的一個理想人選。此外，作為安源工人俱樂部主任，劉少奇的功勞不光在對工人隊伍的激進莽撞衝動加以遏制約束。劉少奇在李立三積累的堅實基礎上，在「小莫斯科」階段進一步鞏固了俱樂部這個基層組織，為工人階級群眾提供了非常有價值的服務，涵蓋教育、文化、政治以及經濟諸多方面。

在劉少奇的督導下，安源工人俱樂部以及附屬機構作為重文輕武的社會主義試驗，蓬勃發展。雷金慶和李木蘭 (Louise Edwards) 運用文武二元論來闡述中國人關於男性氣質的觀念，而這一理論也可以被運用在更廣的範圍上，來理解既相互補充又相互對立的文化和政治權威基礎。<sup>155</sup> 這種區分在中華帝國時期的政治管理制度上表現得十分鮮明。這種制度既同時倚重文官和武官，但在二者之間又有着非常嚴格的劃分。<sup>156</sup> 但這不是一種簡單的官僚制度中的勞動力分配；反映的是相互區別又相互輔助的不同文化權力形式，其一來源於文藝的才能，另一來源於武術的功力。共產主義革命者們在「小莫斯科」的成就，反映當地勢力格局發生了變遷轉換。在過去，長期以來都是秘密幫派頭領和武術高手在施展權力。而變化導致的結果，就是教育和文娛活動取代武力威懾，成為統治的主要手段。

1925年4月，劉少奇在安源已經工作了近三年的時間，他即將離開煤礦。他帶着大家可以認同的驕傲，總結了自己認為是在任期中取得的一些重大成就：

現在安源的工人，作完了工可以讀書，可以看戲，可以聽講，又可以做各種遊藝。子弟讀書不要錢，秩序有自己的糾察團維持，不受兵警的蹂躪；犯事有自己的裁判委員會裁判，不致受腐敗法庭的虐待；青年工人有工會的青年部遊戲教育，不致年長失學；買東西有自己工會的合作社，不致受商家的剝削。<sup>157</sup>

儘管取得了如此重大的成就，正如我們所見，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安源並不是無產階級的天堂。在這個粗陋的煤礦小鎮，即使是在「小莫斯科」的鼎盛時期，工人之間也經常爆發衝突，在工人和共產黨領袖之間偶爾也會出現矛盾。但是，根據大量的第一手資料顯示，在1922年大罷工之後和北伐之前這段時期，在安源上萬名被壓迫的煤礦工人看來如同得到解放一樣。儘管安源革命傳統的意義，在以後的年月裡因為政治姿態和個人崇拜而變得模糊並且遭到扭曲，但是通過教育工作和基層組織建設來實現做人尊嚴訴求的寶貴經歷，被許多親歷者一直銘記在心。

如今，驚駭於後來發生的一些事件，我們難以用同情的眼光看待中國革命歷史中的任何一部分。故而，張戎 (Jung Chang) 和喬·哈利戴 (Jon Halliday) 合著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一書把革命描述為一項自始至終都是憤世嫉俗而又殘忍暴虐的大工程，該書為何在當代讀者群中引起強烈的共鳴，就很容易理解了。<sup>158</sup> 但是當時親眼目睹了該過程的觀察者們，包括許多對共產黨懷有敵意傾向的人，都表示安源進行的共產主義試驗令人讚歎，特別是群眾教育和組織領域的成果最為突出。

說明共產黨在安源的成功的最好證據便是來自共產黨頑固敵人的檔案材料。1928年9月，就在國民黨打擊共產黨的白色恐怖高峰時期，國軍司令部曾準備了一份華中地區鄉村合作運動進程的絕密備忘錄。由於肅清工作在安源遭遇到頑抗，國民黨不情願地承認了他們敵人的成就：

安源共黨之所以有根深蒂固的基礎，確實是過去共黨在安源有充分的「赤色教育」。過去六七年前前的安源工人，都是土頭土腦，不知道怎樣是叫做開會，也無人能在開會的場中說一篇話，演一篇講，更無人知道什麼叫做團體的組織。迄自共魁李隆邛（譯註：即李立

三)等，前往安源組織工人俱樂部後，把那些組織團體的常識都輸入了。從前不會說話的人，公然能在大會場中說起話，演講起來！……

上表已可證明，共黨在安源對於教育宣傳工作的注意了。但是他們的教育和宣傳工作，並非很機械的去宣傳共黨主義，如傳教師式的去注入一種信仰於工人的腦海中。他們是首先注重工人的識字及增高其普通常識。每週對工人有政治報告、通俗講演及化裝講演、工人辯論會、研究會等，共黨主義即在這些機會中，傳播到工人群眾中去。所以他們在安源工人教育中的形式，完全是啟發式的，是用燦爛奇離的魔術手段去教育一班工人，所以能使一班工人均入其彀中，受其麻醉而不自覺！

安源的共黨既能以巧妙的手段訓惑一般工人，所以安源能成為共黨的「小莫斯科」。湖南全省各縣農協的重要分子，幾乎無處不是安源的工人。……

這樣看來，過去共黨在安源的教育工作，確有一部分是對的，我們不能將其一概反對；如注意工人識字，及提高工人的普通常識，這確是在工人中最要緊的教育。我們現在每與安源的工人談話，他所表示的多很明白，不是土頭土腦，毫無常識似的。這也是過去受過那些教育的結果。<sup>159</sup>

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使得安源在「小莫斯科」時期的鼎盛日子一去不復返。但是數以千計的安源工人和他們的子女通過教育覺醒了，再也不復是原來「土頭土腦」的樣子。<sup>160</sup> 安源工人俱樂部的教育使他們獲得了能量，這些小莫斯科的「畢業生」們已經做好準備為中國革命事業作出重大貢獻。無論結果是好是壞，這些被政治打上烙印的前煤礦工人，將在從無產階級革命轉向農民革命的過程中扮演主要角色。就是在這個關鍵的轉型過程中，溫和謹慎被軍事武裝鬥爭替代。



## 第四章

# 從動員群眾到軍事武裝鬥爭

「小莫斯科」遭到鎮壓而結束，不僅是安源工人運動發展史上的一個重大轉捩點，從更大範圍而言，亦是中國革命史上的一個標誌性轉折。1925年秋天安源試驗遭到破壞之後，冷酷無情的報復行動以及發展軍事武裝成為隨後一階段的特點，中國共產黨以前強調的勞工教育和組織活動，被武裝階級鬥爭的號召取代。在此號召之下，許多前安源工人和農民盟友狂熱地開展了暴力血腥的行動。然而，他們的行動不光意味着在黨的指導宗旨發生改變時他們基於忠誠服從而作出應有的盡職反應，亦標誌着在共產黨誕生之前農村存在已久的不受控制暴力模式一度復熾。秘密會社的武功高手和幫派成員動武鬥狠的風氣，曾一度受李立三和劉少奇的嚴格約束壓制，而現在管束變鬆，風氣又恢復。毛澤東過去對這種危險十分警惕，此時卻給予容許。軍閥、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暴力行為愈加升級泛濫，相互之間的武裝攻擊和反擊接連不斷，往來復去，惡性循環。

### 否定安源模式

在 1925 年 9 月大屠殺事件之前，安源工人俱樂部擴大了定期巡邏的規模，從二百名糾察隊員增加至五百人，以便抵禦漢冶萍煤鐵廠礦公司可能發動的進攻。即使如此，對於盛恩頤向他們發動的剷除性鎮壓（見第三章），共產黨的準備並不足夠。盛恩頤認定，受共產黨控制的安源對於他的經濟帝國是一個麻煩，毫無裨益，決意動用壓倒性的軍隊力量進行鎮壓。他們調派去一千五百名荷槍實彈的士兵，如此數量，煤礦上的工人組織根本不能抵擋。<sup>1</sup>

於是，由此導致的經濟蕭條突然降臨安源，對當地居民造成了十分嚴重的打擊。工人俱樂部和消費合作社被強行封閉。原先合作社發行的票證是購買低價商品和低息借貸的有效法定貨幣，現在則分文不值，多名工人因無法維持生計而自殺。而礦工們並不是貨幣失效的唯一受害者，在安源經營店鋪的商家，由於大量囤積的這種票證變得一錢不值而陷入破產境地。安源經濟崩潰，使周圍農村的農民和手工業者也連帶遭遇嚴重損失。經濟災難蔓延四處，不得不由私人出資在安源設置了兩個施粥地點。很快，無助的老百姓靠此度日者每天多達一萬一千名，而安源總人口還不足八萬。<sup>2</sup>

比起嚴峻的經濟衰退，對共產主義革命的未來產生更為深遠影響的，是「小莫斯科」覆滅之後政治形勢的明顯逆轉。學校校長黃靜源被處決，成千上萬名安源工人俱樂部積極分子被拘禁並被遣返，這一切使得安源的共產主義活動遭受慘重打擊破壞。同時，此事也對中國共產黨的戰略前景規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就在九月慘案發生後的當月，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北京舉行的一次會議上作出了明確否定安源經驗的決定：

擴大會議聽了湘區報告，發現湘區工作在組織方面之優點，同時亦發見在政治方面之缺點，並且是很危險的。這缺點之嚴重的表現，即在各種運動及工作中都有規避爭鬥而習於和平發展的傾向。……安源萬餘路礦工人，在我們領導之下做了三年經濟的鬥爭，未曾做過政治的工作……又工會成立三年，雖時常處於風雨飄搖之中，迄未有秘密組織的準備，以致此次高壓來，一敗塗地。……以後湘區必須改正這種傾向，才能使我們成功布爾什維克化的群眾黨。<sup>3</sup>

遵照毛澤東的要求，劉少奇在領導安源工人俱樂部期間秉持「非暴力」和活動公開的方式。而在此時上級否定了這種做法，提出代以更武力和更隱密的動員模式。中共湘區黨委作出了進一步的決議，重申如此的結論：

安源第一次罷工勝利後，工人運動走進了和平道路，只知發展教育，改良經濟生活，而忘了政治爭鬥。……本黨應完全負其責任。安源俱樂部的組織，自上自〔至〕下完全是公開的，不止組織公開，連負大小責任的人都是公開的。在反動政局之下，這完全是不適於爭鬥所需要的組織，所以一經壓迫，……而無法復舉反攻。<sup>4</sup>

雖然劉少奇在俱樂部失事之前五個月就離開了安源，有一些黨的高級幹部在回顧往事時，將失敗的責任歸咎於他恪守教條的做法。在「小莫斯科」開始到終結過程的同時期，李維漢一直擔任中共湘區黨委書記，他本人在 1986 年的回憶錄中如此表示：

安源大罷工取得勝利以後，工人俱樂部在政治上取得合法地位，在經濟上也得到一定利益，由此我們產生了和平麻痹觀念，對可能發生事變，缺乏警惕性。……一九二三年九月，我去安源參加罷工勝利周年紀念活動，許多幹部如李求實、吳化之等都曾向我反映安源工人俱樂部的工作只注意合法的公開活動，什麼都要廠方同意，不注意非法的秘密工作。我把這些意見向劉少奇講了。一九二四年春，少奇離湘去廣州路過長沙，我和何叔衡、郭亮又同他談到這個問題，少奇不以為然，因而發生了爭論，無結果而散。<sup>5</sup>

雖然在文革期間，劉少奇恪守教條主義的做法被當作是他早期犯「右傾主義」錯誤、反對毛澤東的「革命路線」的證據，但是在當初，他的這種傾向與毛澤東本人的表態是高度一致的。甚至在整個小莫斯科存續期間，毛澤東都堅持如此的溫和立場。1925 年 7 月，劉少奇已離開安源有數月，毛澤東再次到訪煤礦，會見領導俱樂部的共產黨幹部。距九月慘案爆發還有兩個月的這個時刻，毛澤東仍告誡大家「左傾主義」的危險性，強調要充分利用工會的合法地位進行公開的活動。<sup>6</sup>

無論安源工人俱樂部是否確實因為「教條主義」的做法導致過早隕落，被鎮壓破壞後，黨的最高領導層不再容許以劉少奇主持小莫斯科期間的開放風格開展工作。中央政策的這一急劇轉變，將在中國革命歷史上寫下更為血腥的新篇章。而很快，劉少奇以列寧為楷模，面對敵人的封鎖打擊，組織秘密黨支部開展工作，取得突出的成果而成為傑出的中共地下黨領袖人物。<sup>7</sup>

中國共產黨的活動從公開轉向隱密，對於階級鬥爭也更為重視。1925 年 10 月 10 日，中國共產黨向中國工人發表了一份聲明，表明新的武裝鬥爭立場：

在這黑暗可怖的社會裡，資本家與工人利益始終是衝突的，絕無調和之餘地……現在萍礦工友，因受此無理摧殘，全體激憤，已於二十一日舉行同盟罷工了。……他們今天的流血，即是我們全國無產階級未來成功的種子……工友們，事急矣，容不着我們遲疑

了，起來援助，大家起來援助我們的營壘——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sup>8</sup>

中國早期共產主義勞工運動要求做人尊嚴的溫和訴求方式，至此完結。取而代之的是號召進行激烈的階級鬥爭，排斥與當地精英進行合作的可能性和可取性。當共產黨和國民黨聯手起來，以武裝力量反對軍閥時，農村的整個社會秩序便陷入劇烈動盪。

## 組織農民運動

在 1925 年 9 月慘案發生兩個月之後，湘區黨委派一名原安源共青團領導成員去聯絡安源工人俱樂部流散的餘部，以便重建共青團組織。他不光動員了八十餘名團員，還建立了一個株萍鐵路沿線的秘密通訊管道，在安源和其他共產主義活動地點之間往來傳遞重要的文件和信件。次月，安源的共產黨組織也重新組建起來。原是安源煤礦工人的劉昌炎被派回安源擔任黨支部重建之後的支部書記。1923 年他在安源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第二年他作為積極分子受到嘉獎，被派去蘇聯學習。劉昌炎不光聯繫了散落在煤礦小鎮周邊各處的原共產黨員們，還在株萍鐵路沿線村莊組織村民。1926 年夏天，第一個農村黨小組在萍鄉縣成立了。很快，一個農民協會就秘密地成立，準備攻打奪取地主土豪的財產。<sup>9</sup>

經歷過「小莫斯科」的畢業生紛紛返回老家，他們有意把在安源（甚至是蘇聯）獲得的經驗在當地實踐，萍鄉的做法在江蘇西部和湖南地區廣泛播種。儘管由於政治形勢不利，中國共產黨不可能嚴格掌控這些具體實踐過程，不過湖南和安源的共青團和黨組織確實間斷地向這些返回老家的活動分子提供後勤支援。而且，共產黨還把一些原安源幹部委派到他們家鄉之外的地方，以期他們把革命事業盡量擴散到遠處。比如，因魯莽闖禍被趕出安源的武功高手謝懷德，在老家成立了湖南的第一個農民協會，然後黨便把他從衡山老家派去湘南地區，協助當地剛興起的農民運動。由下而上和自上而下這兩套方法同時兼用，成效十分顯著。原是鐵路工程技師的醴陵人朱少連在安源的時候曾與李立三和劉少奇緊密合作，在 1926 年 5 月召開的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上，他作為湖南總代表匯報了家鄉的情形：「最近湖南各縣之農民運動，其主持與幫助者，完全是戰敗的安源路礦工

人。湖南農民運動，在兩個月之期間，已有高速度的發展（已有組織者二十九縣，人數廿餘萬多）。」<sup>10</sup>

一年後，在一份報告中，湖南共青團強調安源工人在農民運動中作出的持續貢獻：「而且安源工人在湖南革命鬥爭中非常重要，不僅在工人階級本身說，就是許多地的農民運動也是安源工人做起來的，遠的岳北農民暴動，近的農村鬥爭，最發展的醴陵與挨近的萍鄉，都是很多安源工人在那裡的影響。」<sup>11</sup> 安源工人俱樂部開辦的學校不僅教會學生們讀書識字，還讓他們得到了政治訓練。在 1925 年 9 月慘案前夕，學校總共有逾一千三百名工人和二千三百名子弟學生。這些「小莫斯科」畢業生受到的培訓，完全足以使他們在即將來臨的革命重頭戲中擔當重要角色。<sup>12</sup>

安源工人散佈到湖南各個農村去建立農民協會，後來農會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廣為人知。起初，安源工人嚴格採用他們在「小莫斯科」時學到的教育方式和基層組織方法。但很快，農民協會就走上更為暴力的道路，遠離了安源工人俱樂部的教條主義及和平主義原則。「謝猛子」謝懷德在衡山創建了第一個農民協會，湖南和江西的農民協會效仿了他的做法，所以湘贛地區的農會也以兇猛的武裝力量為人所知，而並無文教成就的特徵。這個新的發展方向，與黨的政策轉變是一致的，與當地眾所周知的反叛歷史傳統亦有關係。

## 北伐的暴力表現

北伐是國共雙方聯合起來為打倒軍閥、統一國家而發動的一次軍事行動。北伐標誌着基層革命組織的基本特徵從文轉向武。在這片土地上，以往曾發生過多次大規模武裝對抗，較近的有十九世紀中葉的太平天國運動，以及二十世紀早期的萍瀏醴起義。與這些戰爭一樣，北伐戰爭引發了群眾暴力。報復性的流血事件往往借革命的合法名義，趁機解決累積的夙怨。

在這一革命新階段中，一位原安源工人幹部的歸來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小莫斯科」以失敗告終之後，他南下廣州在毛澤東主辦的農民運動講習所裡學習，又在周恩來負責的黃埔軍校受訓。這兩個機構設立於 1924 年，是國共兩黨合作的革命統一戰線建立的重要表徵。兩個機構成為新的

國民革命軍的徵募及培訓中心。新組建的國民革命軍隊伍很快便揮師北上，征討各路軍閥。原安源積極分子們在廣州的這兩個機構中接受了政治和軍事培訓，其中許多人從勞工組織者轉變為革命戰士。例如，煤礦工人周懷德原是一名洪幫成員，他武藝高強，在 1922 年罷工期間擔任武裝糾察隊隊長。在廣州受過軍事訓練之後，1926 年他作為國民革命軍的一名宣傳隊長返回湖南家鄉。<sup>13</sup> 國民革命軍中最重要的一支隊伍，是葉挺的第四軍獨立團。這個集體以堅定的毅力和頑強的鬥志贏得了「鐵軍」的稱號，其中近三分之二的士兵原先曾當過安源工人。這些士兵在廣州的黃埔軍校或是農民運動講習所培訓過一段時間，就參軍入伍了。<sup>14</sup>

由於安源工人在北伐戰爭中的貢獻十分突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於 1926 年 9 月訪問煤礦。歡迎蔣介石的群眾超過一萬四千人，當地的十多個民間組織也派去了歡迎代表。在工人俱樂部前方的開闊操場上，李立三曾經在此主持過 1922 年罷工勝利慶祝大會，三年之後黃靜源在此被執行槍決。蔣介石就站在這同一操場上稱讚安源工人的革命精神，並要求他們向資本家進攻，直接奪取煤礦的控制權。他的號召比以往共產黨提出的建議都更為激進。<sup>15</sup> 但是蔣介石到訪之時，煤礦已經陷入破產境地，仍留在這裡的工人人數寥寥，生活困窘，絕望無助，對於他發表的激勵講話置若罔聞。而且他操一口大家並不熟悉的浙江口音，對於他宣講的訊息，群眾不知其意。一名工人回憶說：「蔣介石也經過安源，由國民黨安源市黨部召開了群眾大會歡迎他。他講了話，我們聽不懂。在講台周圍佈滿了持衝鋒槍的衛隊護衛着，戒備森嚴。」<sup>16</sup> 雖然蔣介石未實現挑動工人起來反抗的目的，但是他並未就此放棄在安源工人和管理人員之間製造階級衝突的打算。

數天後，蔣介石親自批准處決大家痛恨的安源煤礦總監工王鴻卿（見第一至三章），執行者是先前的礦工、現在成為國民革命軍的將士們。<sup>17</sup> 人稱王三鬍子的王鴻卿在新余縣被原安源工人俱樂部巡邏隊員認出捉拿下，儘管他在逃命的途中試圖偽裝遮掩，把顯眼的鬍子都剃掉了。百餘名原先的安源工人向蔣介石請願，要求把王鴻卿押回安源再處決。考慮到押送時間問題，蔣介石下令當場進行公開處決。在行刑隊執行結束後，蔣介石向安源各個民間團體發去一份電報解釋。他在電報中譴責王鴻卿「勾結軍閥，摧殘工人，罪無可逃」。<sup>18</sup>

蔣介石的這些激進言論究竟是出於真正的革命同情心，還是純為實用主義的目的，尚且不知。次月，中共湘區委員會書記李維漢向中共中央提交了一份報告，他認為蔣介石對安源工人的支持實屬政治伎倆：

蔣介石自離鄂入贛，見得自己軍事上的弱點，很想在政治上提高自己的地位。他到安源時，在群眾大會上極力稱讚安源工人，說要把萍礦收回交給工人辦；他到袁州槍斃了去年破壞俱樂部之工賊王某，他發表告全國民眾書，十分之七以上是從我們中局及湘區對時局主張抄下來的。這都可看出他很想從政治上取得地位。<sup>19</sup>

無論蔣介石的真實目的是什麼，在盤算把安源變成政治爭奪的一個血腥遊戲的絕非蔣總司令一人。

北伐戰爭的發展被方德萬 (Hans van de Ven) 稱為是「卑鄙的暴力文化特徵」。<sup>20</sup> 在北伐過程中，由安源活動分子建立的農民協會變成了恐怖專政委員會，在 1927 年初引起毛澤東的關注，促使他提筆寫下了或許是其最令人印象深刻和最廣為引用的文字段落：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質言之，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非如此決不能鎮壓農村反革命派的活動，決不能打倒紳權。<sup>21</sup>

毛澤東在其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考察了五個縣：他的老家湘潭以及衡山、醴陵、湘鄉和長沙。原安源工人在這五個縣均建立了兇猛好戰的農民協會。毛澤東在報告中熱情洋溢地稱讚這幾個縣境內發生的暴力事件，包括農民對本地宗教習俗和場所的攻擊等。然而，毛澤東並不建議黨的幹部親自發起這種攻擊。他批評某些急於破除舊習的革命同志說，「菩薩是農民立起來的，到了一定時期農民會用他們自己的雙手丟開這些菩薩，無須旁人過早地代庖丟菩薩。」然後，毛澤東引用孟子的一句話表示：「共產黨對於這些東西的宣傳政策應當是：『引而不發』。」<sup>22</sup>

雖然毛澤東讚賞紅色暴力，但據近期披露的當時中共內部文件顯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 1927 年下達了一系列指示，要求各級組織停止暴力行為。<sup>23</sup> 甚至毛澤東本人對農民協會的過激行動持有的熱情也很快減退。歷史學家韋思諦 (Stephen Averill) 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進行了深入仔

細的研究，他指出，早在 1928 年 1 月，毛澤東就已經質疑紅色恐怖是否明智有效，並主張回到溫和的路線以便保存農村的經濟實力。<sup>24</sup> 然而，一旦血債血償的連環開了頭，就不是共產黨的指示能輕易加以規範和遏制的，況且當地人歷來也有報仇雪恨的風氣。

## 紅色恐怖

由於共產黨的政策在隨後的革命進程中曾經有過多次調整，也曾數次矯正到相反的方向，故而堅持認為北伐設定了一條不能回頭的道路，讓其後的革命注定充斥愈演愈烈的暴力，顯然是過於簡單化的歷史認識。同樣顯而易見的是，在調查報告中受到毛澤東褒獎的湘贛兩省的農民協會製造的紅色恐怖，成為一個重要的轉捩點，在此之後，殘酷暴力成為共產黨革命行動的重大主題，國民黨革命亦是如此。這一惡性變化，再加上當地長期存在着糾集滋事的秘密會社以及在不同群體間以牙還牙的風氣，故而一旦生事，就難以緩和事態。

1926 年 9 月，由於北伐部隊逼近，軍閥方本仁帶領他的北洋軍隊撤離安源。數天過後，留在安源煤礦的千多名工人衝入煤礦公司的常務辦公室，打死了三名礦警。<sup>25</sup> 趁此機會，中共地下黨組織派了黨員和團員滲入警隊，並掌控了力量衰弱的員警勢力。其中一名親歷者回憶道：

(1926 年) 九月，安源共青團動員、組織青年工人到礦警隊當兵。礦警隊是礦局的武裝警察，保衛煤礦和工廠的。礦警隊原來大部分是北方人……當國民革命北伐軍一來，這些北方兵都拖槍逃跑了。我們黨利用這個機會動員一批工人去礦警隊當兵，成為黨掌握的一支武裝力量。<sup>26</sup>

向敵對的准軍事隊伍進行滲透這種做法，屬於這一時期共產主義更宏大戰略的一部分。周恩來在上海時也鼓勵此種做法，另一些幹部亦是如此。這種做法促成中共轉向決定性的「紅色恐怖」之路。<sup>27</sup> 在安源，由共產黨控制的煤礦警隊很快就開始執行新的革命任務，他們十分熱衷於報復打擊「土豪劣紳」，鎮壓「反革命」，並進攻地主的武裝團練。在此期間有五十多名工頭被打發掉。<sup>28</sup>



繼煤礦被控制之後，安源黨委把目標擴大到整個萍鄉縣境。1926年10月，共產黨鼓動發起了一系列針對萍鄉精英階層頭面人物及其機構的武裝衝突。這些運動鬥爭在全縣範圍有三個重要目標：其一是劉增華，萍鄉最大的地主之一；其二是六堂，該縣傳統上的私人慈善機構和教授儒家學說的學校；其三是葉紫屏，萍鄉最臭名遠揚的地方勢力之一。

地主劉增華不光擁有大片田產，還在萍鄉和安源鎮上開設有綢緞莊、布店等商鋪。他同北洋軍閥司令官方本仁有密切的勾結。由於特殊的社會關係，劉增華一度當上南昌縣知事，並兼任江西造幣廠廠長。雖然他在北伐軍抵達之前試圖逃到外地，但還是被革命部隊迅速緝捕，財產也被一一清算。他的幾間店鋪被改做服務工人的消費合作社。劉增華被打倒之後不久，運動的目標便轉向「六堂」這個由當地大宗族控制的慈善機構。六堂的產業悉數全歸新成立的萍鄉縣公有財產管理委員會管理。這個委員會將其中大筆收入作為新開設的數十個工農夜校的經費。<sup>29</sup>

在共產黨領導的這一系列行動中，最重大的事件是公開處決土豪劣紳葉紫屏。此人與北洋軍閥勾結，仗着這層保護關係為非作歹，劣跡斑斑。1926年12月22日，成千上萬人冒着暴風雪去觀看葉紫屏的群眾審判大會。主審劉昌炎為湖南籍安源煤礦工人，剛從蘇聯學習歸來，任安源黨委書記。工人糾察隊和農民自衛軍手持長矛和刀劍維持秩序。劉昌炎首先向大家列舉了葉紫屏的一長串罪狀，然後一些受害人被請上來講述他們被這個惡霸欺凌侮辱的苦難。聚集的群眾有許多人在脖子上圍着紅巾，揮舞着小三角旗子。群眾們聽了這些控訴，情緒激憤起來，高聲要求將葉紫屏處死。葉紫屏當場被子彈擊中頭部而亡。<sup>30</sup>

處死葉紫屏在全縣掀起一股暴力風潮。事後一個親歷者描述當時的情景道：「毛澤東同志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指出的農民運動的十四件大事，萍鄉農民運動大體都做了……諸如押地主遊街、罰款、沒收財產、減租減息、減押、反對苛捐雜稅、清匪反霸鬥爭等等都開展起來。」<sup>31</sup> 1927年4月成立了萍鄉人民審判土豪劣紳特別法庭，快速且毫不留情地懲治了全縣境內共計四十餘名「反革命分子」。隨着狂熱鬥爭進一步升溫和擴散，傳統儒家權威的各種符號象徵如祖先牌位、甲第坊、忠孝坊、功名榜、貞節牌等，都被狂暴的農會成員搗毀拆除。<sup>32</sup> 農民群眾攻佔糧倉後開倉放糧，租約和借條都被扔入火中燒掉。<sup>33</sup>

婦女解放亦是革命浪潮的一個重要關注部分。<sup>34</sup> 領導萍鄉婦聯組織之人是原安源煤礦一名工人的女兒，曾在工人俱樂部一間學校學習過，還是一支化裝講演隊的骨幹成員。她在縣裡各區都召集了群眾大會。<sup>35</sup> 在這些集會上，婦聯成員情緒激動地號召婦女姐妹們「放足」、剪髮，從「封建枷鎖」中解放出來。積極分子組成的小組，其中通常有幾名當地女子學校的學生，挨家挨戶去落實這些措施。<sup>36</sup>

安源被普遍地認為是這一時期革命風暴的典範。激進的安源工會聽從了蔣介石早先的建議，在那一年中大部分時間，煤礦的運營都處於工人的全面控制之下。這是中國工人管理企業的第一次實驗。雖然這一臨時階段十分短促，但是那時所有的重大預算決定、採購和銷售協議、建設規劃和人事都歸工會統管。<sup>37</sup>

在紅色恐怖發展到高峰階段之時，左傾的《漢口民國日報》以稱讚的口吻做了報導：

萍鄉安源黨務以及工農運動，極形發達，素稱江西之冠。自去年以來，工作成績，如組織慰勞隊幫助革命軍北伐，統一地方公產，修築道路，肅清土匪，清丈田畝，接濟武漢煤炭，打倒劣紳，均能予革命民眾以實際利益；其內部工作如建設工人生產消費合作社，組織工人糾察隊，農民自衛軍，開辦農民銀行，農村消費合作社，黨務訓練班，農運訓練班等等，均有可觀。<sup>38</sup>

與毛澤東在其著名的調查報告中具體描述的情形一樣，整個湖南省境被狂暴猛烈的運動席捲。根據中共領導人張國燾的記載，李立三本人的父親那時候被打成「土豪劣紳」。雖然正是「溫文爾雅」、「心地善良」的李父與安源之間的關係，幫助其子成功展開群眾動員工作（見第二章），但是結果李立三之父依舊被當地農民協會處決。張國燾解釋說，李立三曾寫了一封信保證其父「不會有反對農協的態度和行為」。此信由湖南區委轉到醴陵縣的農民協會，但是在當時的「瘋狂」形勢下毫無作用。張國燾形容「李立三遭逢了這個變故，一時顯得甚為難過，但他咬緊牙關，再也沒提過這件事。我也曾為之傷感良久……」。<sup>39</sup>

## 白色恐怖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製造了令人震驚的「四一二」政變，紅色恐怖從高峰轉入低潮期。這一事件不僅導致國共兩黨統一戰線正式分裂，同時亦使局勢陷入可怕的白色恐怖反撲。<sup>40</sup> 先前在紅色恐怖中被打擊的地主和大宗族展開報仇行動。1927年6月，萍鄉的地主豪紳率領鄉勇團練組成的聯合武裝隊伍，襲擊了安源黨組織、工會和農民協會總部，殺害了四十多名共產主義活動分子，並抓捕了百多人。長期領導共產主義活動的湖南人劉昌炎和周懷德在武裝衝突中犧牲。安源被圍困長達十餘天，敵人試圖用斷糧的手段來逼迫安源居民屈服。萍鄉當地居民和外來的湖南籍工人之間的地域矛盾，可以追溯到1898年這個現代化煤礦創建之時，當地的地主階級充分利用這種對立，帶領地方武裝在襲擊安源的行動中打出了諸如「萍鄉的煤要有萍鄉人來挖」，以及「趕走湖南人」的口號。反湖南人的舉動不僅表明江西地方精英階層的經濟保護主義立場，同時由於安源的工人運動是由湖南的共產黨組織起來的，地主階層的反撲亦是反共產主義傾向的表達。前一段時期，萍鄉地方精英遭受到湖南共產主義革命者領導的運動打擊，讓這種反共情緒變得更加強烈。<sup>41</sup> 然而，由工人糾察隊和礦警隊組成的聯合武裝力量，使用手榴彈和由煤礦的機械車間生產的武器，最後成功打破包圍，使安源的共產主義組織免於全部覆滅。

就在安源被敵對地主武裝隊伍包圍的時候，湘贛兩省的農民協會也遭到攻擊。參與共產主義運動的團體和個人受到嚴重的打擊報復。放了足和剪了短髮的婦女是紅色恐怖的代表特徵，成為報復性攻擊行動的特別目標。在安源打破敵人包圍後，安源便充當了身處險境的農民協會成員們的避難所。周邊五個縣的一些農民戰士在原安源工人的率領下撤退到這個煤礦小鎮。他們與糾察隊和礦警隊聯合起來，組成約一千四百人、武器裝備超過一千支來福槍的新力量。這支隊伍構成了1927年9月秋收起義的中堅力量，而秋收起義這個事件將成為中國革命的下一個里程碑。<sup>42</sup>

## 秋收起義

秋收起義的策劃和發動地點是在安源第一所黨校所在的場所內。秋收起義通常被視為由毛澤東領導的連串農民革命運動的開篇。秋收起義的運動中心，正是為 1911 年辛亥革命奠定基礎的萍瀏醴起義所覆蓋的三個縣。秋收起義掀起了更為波瀾壯闊的革命浪潮。根據羅伊·霍夫海因茨 (Roy Hofheinz) 的評論，雖然毛澤東本人只是部分促成了黨的政策巨大轉變，但秋收起義是「中國共產主義革命者第一次將他們在農村的影響力轉化為政治力量，以農民組成的武裝隊伍來反抗社會精英，並且試圖在政府管轄力不及的農村地區建立獨立領地」。<sup>43</sup> 共產主義革命者現在將民國旗幟棄而不用，高舉起自己的鐮刀斧頭旗幟，並公開宣稱他們的目標是要建立一套徹底重新分配土地的制度，用農村蘇維埃政權代替以前的縣政府。

儘管這個時刻轉而強調農民階級是革命的主要力量，不過根據各種紀錄顯示，在秋收起義中最堅實的隊伍仍然是之前在安源當過工人的那些戰士。1927 年 10 月，湘區黨委向中共中央報告，「在秋收暴動經過中，湖南的無產階級——安源工人、鐵路工人等的奮鬥精神特別表現得十分堅固和勇敢，確是革命的先鋒隊」。<sup>44</sup> 兩個月後，黨中央對這一評價作了肯定的批覆：「秋暴的事實已告訴我們，攻打萍鄉、醴陵、瀏陽，血戰幾百里的領導者和先鋒，就是訓練有素的安源工人。……可以說秋暴頗具聲色，還是安源工人的作用。」<sup>45</sup> 安源工人分散在手榴彈隊、大刀隊、警衛團、宣傳隊和其他一些戰鬥和後勤支援隊伍中，人數總共逾一千名。<sup>46</sup>

雖然安源工人在起義中英勇奮戰，但是在國民黨和地主階級的聯合攻打下，秋收起義部隊很快便敗落下來。事後來看，中國共產黨當時的實力明顯尚不足以用武力奪取城鎮。秋收起義的敗局，迫使毛澤東撤退到江西境內偏遠隱僻的井岡山區，在那裡組建了新的紅軍隊伍，最後率領這支武裝奪取了國家的政治權力。<sup>47</sup> 隨着紅軍部隊發展壯大，安源工人在毛澤東領導的革命中所佔的比例和重要性自然便逐漸降低。到二次世界大戰行將結束之時，紅軍的規模急劇膨脹到五十餘萬兵力。不過，以前曾做過安源礦工的一大批將士，不僅在戰爭期間承擔重要的軍事任務，戰爭結束之後在軍隊中亦是身居要職。

安源當地的情形深受當時經濟和政治形勢不利的影響。儘管在秋收起義前夕，煤礦工人總體已達七千餘人，但是起義事件造成經濟衰退，有近兩千名工人被公司解僱。<sup>48</sup> 在之後的十年期間，煤炭年產量只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年產出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sup>49</sup> 曾經親歷過「小莫斯科」的工人只剩下大約一千名仍留在煤礦工作，共產黨原先在工人圈中的主導控制力已經大為衰減。一份黨的機密報告指出，1927年10月所觀察到的安源現狀是：「工人對我們全無認識，致現在反動宣傳以來，大多數工人也跟着反對共產黨。」<sup>50</sup> 煤礦的工人們事前未經計劃就發起了一次罷工，共產黨試圖將罷工鬥爭的對象轉向國民黨設立的清鄉局，卻未能實現目的。<sup>51</sup>

在秋收起義之後的這段困難時期，無力掌控安源工人的並不只是共產黨一方。大面積的失業造成嚴重的社會不滿和社會動盪，讓當地的精英階層很是棘手。由於工人俱樂部式微，之前的競爭對手聖公會聖雅各堂日漸活躍起來。教區會長龍永鑒牧師和身為教友的新一任礦長凌子真緊密合作，試圖安撫緩解社會上的躁動不寧。美國聖公會期刊《宣教精神》(*The Spirit of Missions*) 報導稱，「由於工會的存在以及煤礦工業陷入凋敝破產境地，安源成為危險中心。此處我們有一位仁慈的善人……我們在安源的牧師擔當了急需的調解人角色。」<sup>52</sup> 然而，伴隨着煤礦經濟趨於惡化，騷亂的態勢日益擴大惡化，調解工作並未取得效果。

1927年11月，在一位新近自湖南來的共產黨幹部鼓動下，工餉極低的骨幹礦工發動了罷工，抗議扣發工資，並要求年終薪酬。對比鮮明的是，這次反抗並沒有像安源以往由共產黨領導的歷次罷工一樣，用要求基本生活和做人尊嚴的呼籲來加以表述，從而盡可能贏得廣大民眾的支持。這時高呼的是帶攻擊性的標語口號，比如「打倒新軍閥！」、「反對新軍閥戰爭，變新軍閥戰爭為革命戰爭！」，以及「殺盡一切破壞罷工的反動派和工賊！」等，表現出最近幾年出現的政治化與激進化的傾向。<sup>53</sup> 工人們連續停工六天，但未取得重大勝利。儘管罷工協議同意工資將會適度提高，但罷工工人的經濟要求並未得到滿足，共產黨組織者希望罷工演變為一次武裝起義的政治宏願亦沒有實現。<sup>54</sup> 其後，在煤礦小鎮以及周邊發動武裝鬥爭的工作，最終釀成災難。<sup>55</sup> 然後共產黨在萍鄉的工作重心便主要放在組織農民游擊隊的工作上。游擊隊在原安源工人帶領下，以地主的財產和人身為目標發動了零散的攻擊。

## 局勢的逆轉

秋收起義事件發生一年之後，國民黨軍隊在湖南和贛西地區開展了一場清鄉運動，以期根除當地殘留的共產主義影響。根據國民黨的內部檔案，在這場運動中被處決的「共匪」總共 937 名，其中多人與安源有關聯。<sup>56</sup> 國民黨在術語和戰術上都沿襲了之前共產黨用過的群眾動員做法。<sup>57</sup> 之前在北伐戰爭中聯手合作的革命兄弟黨，現在卻分裂為敵對的兩方，彼此將手中原來一致瞄準軍閥的槍口調轉過來，相互廝殺。

1928 年 9 月，國民黨的一支宣傳大隊肩負着「將工人們從錯誤幻覺中拯救出來」的任務來到安源。宣傳大隊先是在煤礦和小鎮周邊張貼了政治海報和標語，然後分為幾個小組，分頭在各個集市和工作地點調查工作和生活情況。安源反共委員會在召開成立大會之時，邀請萍鄉和安源的一些民間組織派代表前去參加。迫於強大的社會壓力，六百多名工人出面承認他們以前和共產主義革命分子之間有交往聯絡。由劉少奇設計的安源工人俱樂部大樓是「小莫斯科」的符號象徵，此時被國民黨轉用作他們自己的宣傳平台，上演詆毀共產主義的新劇。戲劇表演完之後，便是以反共產主義為主題的演講。根據紀錄，觀看演出的政府機關與非政府組織的人員總共逾三千名。宣傳大隊只停留了五天便離開，但是一些國民黨工作人員繼續留在安源做調查工作，負責赦免那些宣告與共產黨脫離關係的幾百名工人。自首人員逐一被登記在案，湘贛兩省剿匪總指揮部印製了官方的《自首證》，填發給每個自首人員。<sup>58</sup> 國民黨幹事繼而將這些洗心革面的工人分編為十人一組，以方便進行動員和相互監視。國民黨的這種做法，令人聯想起他們的對手。<sup>59</sup>

曾是「小莫斯科」工作中心的機構場所現在有了新用途，至少表面如此。1926 年秋天，北伐部隊到達安源後駐紮於數間學校，使學校嚴重毀壞。這些學校一直到 1928 年才重新復課。礦長凌子真和聖公會聖雅各堂會長龍永鑾牧師共同督導學校的教學工作。學校在重建後開設的課程，充斥着反共產主義的內容，並且教授國民黨的黨綱理論三民主義。在秋收起義期間幾乎被共產黨全部繳械的礦警隊重又組建起來，並裝備了武器。<sup>60</sup>

## 組建紅軍

儘管白色恐怖沉重地打擊了安源勞工運動，一些忠心耿耿的煤礦工人仍然繼續支持共產主義事業，並提供關鍵性的幫助。安源恰好處於長沙和井岡山中間的戰略性地理位置上，在 1928 年至 1930 年期間安源充當了關鍵通道，保障了毛澤東所在的山區根據地和中國其他共運地點的交流。以安源為中介，井岡山和其他各地的黨小組之間進行信件、補給與人員的傳輸。並且，由於煤礦瀕臨破產，安源工人普遍生活艱難，成為毛澤東發展壯大紅軍規模的穩定兵源。安源黨委一名成員如此回憶這段時期：

上海中央的文件是由安源轉送到井岡山的，井岡山的文件也是由安源轉送到上海中央的。安源市委的交通員王枚生，是個二十多歲的青年，長沙人，在安源做工，他是專門負責轉送文件的交通員。中央的文件有時候裝在留聲機的盒子裡，有時放在酒瓶子中由交通員帶來，市委內的人將文件內容用竹紙抄寫好，裝在雨傘的竹柄裡再由交通員經過蓮花、遂川送往井岡山。

毛主席要安源市委派工人到井岡山去當紅軍中的下級幹部。我在安源時，市委曾派過一批人去。<sup>61</sup>

當時的紅軍正努力在最初佔領的據點基礎上擴大地盤，所以曾接受過訓練並且意志堅定的安源工人加入革命隊伍，被黨的領導層視為天賜良機。與湖南地下黨組織商量之後，中共中央於 1928 年 6 月 4 日給井岡山的毛澤東和朱德去信，建議吸納一批安源工人承擔重要的軍事任務：「安源是無產階級的大本營，許多工人同志具有很多鬥爭的經驗和黨的訓練，你們應與湖南省委商量調一部分活動分子到各軍中擔任政治及黨的工作。」<sup>62</sup> 五個月後，毛澤東在井岡山向中共中央回信道：「湖南省委答應送安源工人來此，亟盼實行。」<sup>63</sup> 其中許多原安源工人已成長為經驗豐富的共產黨幹部。在其後兩年間，有數百名原安源工人在紅軍隊伍中擔任政治指導員和部隊政委等職務。

1930 年，毛澤東、朱德、彭德懷和其他一些紅軍將領共四次長途跋涉去安源。他們除修理武器和補充軍備外，還招募失業工人參軍。期間，煤礦的機械鋪變成了紅軍部隊的軍火庫。繼之前已參軍的數百名工人，又新增三千餘名原安源工人加入紅軍。<sup>64</sup> 當時入伍的一名工人回憶道：

(在群眾大會上)聽了毛委員的講演和號召，我和一千多名安源路礦工人兄弟一起，參加了紅軍。那時，工友們報名參加紅軍的情景是十分熱烈感人的。記得，毛委員動員後，紅軍的各部隊在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前廣場上設立了許多擴紅點，每個點都擠滿了踴躍報名參軍的路礦工人和附近鄉村的農友們。有父子倆，兄弟倆同時報名的，有光腳赤身的小娃娃纏着紅軍幹部要求准予他們參軍的，還有的小娃娃因沒被批准而在一旁哭泣的……在這股熱潮中，我也在紅三軍團的報名點報了名。<sup>65</sup>

然而，對於毛澤東的到來，並不是所有的安源居民都如此這般正面評價。1930年5月紅軍第一次在安源停留過後，在當地充當教育者和調解中間人重要角色多年的聖公會聖雅各堂會長龍永鑾牧師，便離開安源躲到較為安全的長沙。數月後，漢口的一位聖公會神職人員造訪了安源，目睹遭紅軍數次洗劫後的煤礦公司和教堂的殘破慘狀，哀痛不已。聖雅各堂連同會長住宅的窗戶、門扇以及地板都被竊走，由煤礦公司與教會聯合管理的學校的房舍則化為一片廢墟。此人在1930年12月中華聖公會主辦的《聖公會報》上如此報導：

紅軍到安源一共有四次。第一次是五月十六號清早，當夜即退。這一次來的人數，大概有三千之譜。凡屬礦上職員，均遭搶劫。礦務局局長及科長股長，一共有二十人被殺。第二次是六月二十七號來，二十九號退走。大概也有三千多人。這一次就完全搶奪商家。第三次是七月九號來的。隊名是赤衛隊，殺了一二百人。後來聽說有正式軍隊來，他們在該地停留不過一小時之久，即行退盡。第四次是九月十七到九月二十七，這十天當中住在安源的有一萬人。經過安源的如赤衛隊紅軍等將近十萬。搶聖公會是九月二十一日早十點鐘，係紅軍第五軍彭德懷部下。這十萬軍隊就是朱毛彭黃四人的隊伍。據云當日到堂時，提着洋油，是預備將禮拜堂住宅一起燒掉。忽有人大聲喊叫，龍會長從前很幫我們的忙，此堂萬不可燒。因此未付丙丁。但搶就不能制止了。雖有數友在旁目觀，亦不敢多言……

雖紅軍四次犯安，然教友中除凌子真礦長以外，再沒有一個被搶的，或被殺害的。也沒有直接受損失的。但間接中自然是仍有影響。現在該地最難的，就是礦上不能開工，工人困難非常。<sup>66</sup>

由於煤礦公司的業務蕭條頹敗，並且共產黨連續多次來此招募士兵，至1930年底，更多的安源煤礦工人加入紅軍隊伍離開了安源。



從礦工轉變為士兵身份，不是一個簡單容易或無需蛻變的過程。即使是後來獲擢升授勳的某些人民解放軍將領，例如王耀南少將，最初也並未立刻喜歡上軍旅生活。王耀南在安源煤礦開始做工時年僅八歲，被安排做爆破煤層的工作，他在十五歲那年參加了秋收起義。雖然已經過去幾十年，他仍然記得那時作為一名年輕士兵，內心強烈地想家而無法抑制，令他輾轉痛苦，茫然不安。

我父親王樹善當過井下的支部書記，賀湘龍講過。我父親從來未和我講過他是共產黨。30年第二次打長沙我負傷，我父親看我，(我想他說)其他的我不要，還是回去算了吧，你還小，還可以革命。我父親說：你怎麼了，我說掛彩了(想他說我回去)，他說，沒有關係，革命不流血不犧牲還算什麼革命，要革命就有流血犧牲。並說我不要回去吧，他說，你是個傻孩子，回去幹什麼，你還沒有挨餓，皮鞭嗎？你只有跟毛委員，跟共產黨才有出路，你要好好跟毛委員共產黨鬧革命，到共產主義的時候。我不理解父親為什麼這麼講，我送他時流淚了，他說你不要哭，我若不是有工作的話，我還願意去呢。好好養傷，傷好了趕緊回部隊。直到後來，賀湘龍才告訴我，他是摩天嶺的支書……我父親不同意我回去，也是最後見到父親一面。<sup>67</sup>

安源工人轉型成長為士兵付出了巨大的個人犧牲，而他們為共產主義事業作出的貢獻也同樣重大。正因為他們以前在煤礦做過工，精於運用炸藥，紅軍部隊中重要的爆破任務和工兵種工作，都由他們來承擔。他們亦將安源工人俱樂部教授的政治課程內容付諸應用。一名在1930年加入紅軍的煤礦工人在四十年之後官居安徽省軍區副司令員的要職，在回顧他的工友們在紅軍發展過程中起到的作用時道：

安源工人是紅軍中的新鮮血液，工人在部隊中的政治地位相當高，起了骨幹作用。當時毛主席對安源工人是很重視的。安源工人在參軍後不久，就有不少工人吸收到了黨組織，加強了黨對軍隊的領導，經過一個很短的時期，並提拔成了初期幹部，如班長，排長，甚至連長，起的作用很大。安源工人在鬥爭中作出了很大的貢獻，有很多同志付出自己的生命，安源去了幾千工人，經過幾十年的鬥爭，現在剩下的不是那麼多了。安源工人參軍，增加了部隊的一個兵種(即爆破隊)……攻城時，安源工人先挖好地洞，用棺材裝炸藥進行爆破。這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工程兵的始祖……安源工人在

部隊裡和黨內擔負的工作比較多了，做政治工作，特別是1930年冬天的肅反中，安源工人極大多數參加了肅反委員會，掌握肅反工作。<sup>68</sup>

總而言之，安源工人在軍事上和政治上都作出了關鍵性的貢獻。

## 被破壞的安源

安源工人對於紅軍的成長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大批工人入伍參軍，讓安源這個煤礦小鎮面臨艱難的處境。成千上萬名工人成為紅軍戰士離開安源，使當地日漸陰鬱凋敝。洪幫重新活躍起來，迅速填補了留下的真空。自1933年起直至1949年共產主義政權建立，秘密會社再一次成為當地的主要地方勢力。<sup>69</sup> 1935年江西省政府在一份調查文件中，報告了安源的蕭瑟衰敗。共產黨和國民黨的軍隊混戰多年，血腥的殘殺導致人口數量急劇下降，道德風氣敗壞。由於當局對當地居民傾向共產黨的疑慮未消，安源居民仍受到嚴密的監視，並被嚴格限制流動。煤礦工人數目如今已不足三千。他們被公司拖欠工資，自殺和賣妻賣子的現象十分普遍。<sup>70</sup>

三年之後，鑒於對日戰爭的緊迫性，國民政府當局意識到，明智的做法是大力提高煤礦的產出。政府出於戰時舉措，接管煤礦同其他關鍵工業企業。<sup>71</sup> 1938年1月，國民政府下屬的資源委員會將安源煤礦的控制權執掌在手，並在安源設立了自己的管理機構。<sup>72</sup> 次月，資源委員會任命留學美國的工程師王野白為新一任安源煤礦礦長。這位新礦長以提高生產效率為己任，帶領緊急招募來的一批湖北工人抵達安源，隨即宣佈大量裁員和大幅減薪，同時確立更嚴苛的行政規章以管束餘留的全體勞工。讓工人們尤其厭惡的措施，莫過於被要求在頸部佩戴金屬身份標牌，每日必須與煤礦入口處帶照片的證件相符才允許下井。新政策在那些經歷過安源大罷工的老礦工中激起了強烈的反感。如同繫上狗牌，不由得讓他們回憶起1922年之前做牛馬的不愉快經歷。<sup>73</sup>

在幾名留守的中共地下黨員領導下，一些老工人發動了一場罷工，抗議這些不受歡迎的規定。罷工行動取得了一定的勝利，王野白被迫收回新政策。共產黨員們於是有意繼續往前推進，他們派了一個工作人員到共產主義革命之都延安去徵詢意見。1938年6月，中共中央根據劉少奇的建

議，派遣原先也是安源工人的一位共產黨員袁學之作為特別代表，去恢復安源黨組織的工作。袁學之的父親和兄長之前都曾在安源做工，他與煤礦的聯繫仍然十分緊密，故而劉少奇認為這有助於他釐清安源錯綜複雜的政治問題。<sup>74</sup> 袁學之一回到安源就立刻着手做調查。他發現一些原來的共產黨員雖然在白色恐怖威逼下作了悔罪，但是內心裡他們仍然傾向於革命事業，應當歡迎這些人回到黨組織。由於這一寬宏大度的決定，袁學之在安源重新組建起的黨支部擁有超過一百名成員。<sup>75</sup>

這一成就對於共產黨是一個良好的發展勢頭，但時間並不持久。由於國民黨擔心日本人佔領煤礦，所以安源煤礦在 1939 年 4 月全面停工。國民黨士兵搬走了發電機，並且封閉了通往礦井的東西兩個出口。<sup>76</sup>

煤礦關閉後，中共地下黨安排失業的安源工人加入新四軍。新四軍的前身是北伐期間享有「鐵軍」稱號的部隊，而安源工人在這支隊伍中發揮了突出的作用。<sup>77</sup> 不久，「平江慘案」發生，國民黨軍隊在 1939 年 6 月 12 日攻擊位於湘贛邊境的一處共產黨根據地，殺害了大約 140 名共產黨革命者。這一事件迫使安源的共產主義活動全面停頓。<sup>78</sup> 安源勞工運動的輝煌歲月至此終結。

## 內戰

1946 年 1 月，在採煤作業中斷近七年之後，安源煤礦重新開工。國民政府十分支持安源煤礦，並委派專人管理，以便讓煤礦在國共對決的戰爭中助其一臂之力。然而，重新運營之後的安源煤礦，徒令人唏噓追憶往昔的鼎盛。由於經年累月的廢棄，煤礦的破壞程度十分嚴重，主要的礦井都被水和土淹埋。工人只好用原始方法來開採礦區內分散的小型礦井。在 1898 年這個現代化煤礦創建之前，當地千百年來一直沿用的採煤方式如今又成為普遍做法。<sup>79</sup> 在工頭們操作下，洪幫捲土重來，把持了安源，礦工們受制於洪幫勢力的情形，彷彿 1922 年大罷工之前的歲月。

在如此複雜的形勢下，在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工作的王野白繼續擔任原來的職務，在合併組建了贛西煤礦局之後，他的職權範圍進一步擴大。<sup>80</sup> 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在對日作戰期間領導戰時經濟的發展，現在亦要求工業提供支持，為內戰效力。隨着國共兩黨相互廝殺的戰線逐日向南

推進，安源煤礦作為長江以南唯一擁有豐富煤層的煤區，所儲的礦藏被視為關鍵的軍備生產資源。1948年6月，資源委員會認為王野白的工作成效不盡如人意，於是委派郭象豫擔任新的贛西煤礦局長，以期保障國民黨在該地的經濟利益。<sup>81</sup>

在負責的國民黨官員人事發生更替之時，兩名共產黨員來到安源，在工人中間秘密開展活動。這些幹部依循革命前輩近三十年前的做法，最先關注的工作便是勞工教育。開始的時候，他們動員技術工人組成學習小組，一起討論剝削和階級鬥爭的意義。年底，共產黨在淮海戰役中令人震驚地擊敗了國民黨。消息傳至安源，工人們揣度在當前進行的內戰中共產黨即將取得勝利，所以他們對地下動員工作的興趣變得更加濃厚。於是，湖南省黨委派遣一名經驗豐富的幹部來指導蓬勃發展的革命運動。他不光教育工人和發展可靠的黨的群眾基礎，還肩負保護煤礦生產能力的職責，以便保證共產黨能夠順利地接管煤礦。1949年5月，礦區成立了一個地下黨工作委員會。他們開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招新活動，動員工人們——尤其是那些曾經參加過革命活動的工人——加入中國共產黨。<sup>82</sup>

國民政府下令要求保證煤礦的正常運作，以滿足國民黨軍隊的物資需求，於是郭象豫設立了一個官方的維持委員會來維持秩序。共產黨運用過去與准軍事敵對勢力鬥爭積累的經驗，迅速向該委員會進行滲透。儘管郭象豫親自領導這個委員會，對委員會中大部分成員其實都是地下黨員他竟一無所知。委員會借着自己的官方地位向礦警隊要求配備一批來福槍，擁有了武裝實力，成為共產黨保衛繼而佔領安源煤礦的主要力量。<sup>83</sup>

安源的共產黨工作人員在解放軍取得節節勝利的激勵下，鼓動一群礦工起來反抗一名態度惡劣的工程師。工人們把這名工程師綁縛起來帶到公司總部大樓，要求公司按規章懲處此人。警覺的礦警建議開槍鎮壓反抗的工人，不過一個傾向共產主義的警隊官員出面干預，使得事件向有利於工人們的方向發展。結果，工人們從礦警隊武器庫取走多枝槍械。公司管理層得知工人們擁有武裝後十分懼怕，便向參與抗議的工人們贈送美酒賠禮道歉，然後才收回了工人們手中的槍支。風暴暫時平息，然而這無助於打消工人們對自身力量日益增長的自信。<sup>84</sup>

隨着人民解放軍部隊向南方挺進的步伐，贛西煤礦局收到了大量的傳單。傳單宣傳解放軍獨具特色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以及解放軍佔領城市

的具體政策，同時要求廣泛散發給當地居民。煤礦局被告誡要保護好礦區，郭象豫及其屬下得到保證，只要他們完好無損地交出安源煤礦，他們就會得到寬大處理，職務和薪水也將維持不變。<sup>85</sup> 郭象豫在彼時局勢下，同意遵照共產黨的全部號令，並支付了 1,200 銀元讓國民黨軍隊撤出安源。

1949 年 7 月 25 日，共產黨的軍隊未遭到一兵一卒的抵抗便開進了安源。迎接他們的是歡快的秧歌舞蹈、一片紅色旗幟的海洋以及震耳欲聾的鞭炮聲。儘管解放軍抵達時下起了滂沱大雨，當地居民仍然蜂擁上街歡迎解放隊伍的到來，人們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毛澤東萬歲！」「中國人民解放軍萬歲！」。<sup>86</sup> 在中國的「小莫斯科」階段結束後，這個煤礦小鎮未曾出現過如此盛大的狂歡。

然而，二十五年的時光流逝已讓世事發生了巨大的變遷。毛澤東與曾是「紅色文人」的革命同仁們以一身戎裝換下了昔日的長衫。這些共產主義革命志士，早已從天真的青年書生成長為久經沙場的老戰士，歷經秋收起義、長征、抗日戰爭以及與國民黨對決的內戰等多次考驗。在這些九死一生的鬥爭過程中，毛澤東躍升為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袖，而劉少奇作為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副主席成為配合他工作的搭檔。在毛澤東極具智慧的戰略思想指導下，農村革命成功，全中國得到解放，毛澤東本人倍受崇拜和敬仰。而劉少奇自他在安源工作的時期開始，就始終如一致力於制度建設和嚴肅黨的紀律工作，從而贏得了卓著的聲譽。<sup>87</sup> 如果說毛澤東是中國農民運動無可爭議的領袖，則劉少奇被普遍認為是一位傑出的勞工運動組織家。而與此形成強烈對比的是，李立三曾經是中國無產階級運動的首要領導人，1928 年時在黨的排名位列毛澤東和劉少奇之上，但是在黨損失了城市據點之後他仍然固執地倡議發動工人起義，以致 1931 年被放逐到蘇聯。<sup>88</sup> 李立三不得不在蘇聯度過了長達十五年的政治流放生涯，1946 年才獲准返國，因為那時中國共產黨準備重返城市卻發現經驗豐富的勞工運動幹部人手嚴重不足。

李立三在政治上犯了錯誤，並長時期遠在異國他鄉，致使曾經一同共事過的革命同志非議他在早期合作中所任的角色。1936 年，在同美國記者愛德加·斯諾 (Edgar Snow) 的一次談話中，毛澤東如此評論他與李立三的第一次會面：「李立三聽了我要講的一番話後，並沒有提出任何具體意見，我們之間沒有深厚的友誼。」<sup>89</sup> 李立三從前在安源的所作所為後來也遭

到批評。1941年，劉少奇在華東黨校講授「戰略與策略」一課時，將自己勤懇工作的領導風格與他這位行事張揚的同事作對比，他說：「領袖來自於群眾。在安源時，拋頭露面的是李立三，埋頭苦幹的可就是我。」<sup>90</sup>這些看似不經意的評價之語，其實預示着在共產黨國體制下，安源歷史將很快依權威意圖被重新書寫。中華人民共和國展開的文化操控方式儘管在某些方面衍自曾經推動安源實驗蓬勃發展的文化置位方式，然而，鑒於其與強大的國家宣傳系統之間的聯繫，文化操控其實是一種更強制性的現象。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後期發生的舉世震驚的暴力事件，也許並非無可避免亦非無法逆轉，但是卻成為中國革命道路上的關鍵節點。1925年成立了由國共兩黨共同指揮的國民革命軍，而兩年之後共產黨則單獨創建了紅軍隊伍，標明革命目標和革命行動在根本上被重新確定了方向。文和武的鐘擺徹底從非暴力的文化動員這邊蕩向了另一邊的武裝戰鬥。自此開始，主要由農民士兵構成的軍事團隊，取代了工人學生活動的學校和工會，成為組織工作的主要部分。當革命的國共兩黨將手中原是對準軍閥的槍口調轉過來互相殘殺，軍隊便成為革命活動的關鍵所在。

這個軍事轉向對於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未來走向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但是對於安源工人的思維影響卻不甚明晰。1927年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曾經採訪過一名安源礦工。在當時激進的環境下，工人們奪取了管理煤礦的大權。然而，接受採訪的一名工人表達出明確的非革命化願景則令她十分驚訝。這名受訪者叫唐守義(音譯)，他曾參加過1922年安源大罷工，後來在廣州加入了國民革命軍，接着隨部隊北伐打軍閥，之後才返回安源。然而，過往的經歷似乎對他本人的影響並不太大。據斯特朗敘述，唐守義在1927年之所以參加接管煤礦管理權的行動，純粹是受飢餓驅動而非基於宏大的革命志向。斯特朗在文中描寫道：

他出生於一個落後的農民家庭，沒有文化，常年在地底下工作，仍舊是按清曆法算時間。在他的頭腦裡似乎並沒有樹立起社會主義或者工團主義的觀念。雖然如此，他是屬於中國革命的一部分。他和他的工友們在飢餓驅使之下控制了空蕩蕩的煤礦，由他們自己管理，自己開工，即使他們一邊還在懇求資本家回來。<sup>91</sup>

他有如此保守的前景展望的同時，卻有如此激進的行為，簡直令人難以置信。於是斯特朗詢問唐守義安源工人奪取煤礦是否是為着他們自己。

他顯得十分驚詫。「不，不是，」他回答道，「這個煤礦屬於漢冶萍公司。他們只是不願讓煤礦運轉起來，因為他們害怕大兵。所以我們才自己來運營煤礦，因為我們沒工可做。我們希望國民政府能夠盡快結束現在這種軍閥混戰的局面，把秩序恢復起來，這樣漢冶萍公司就可以回來，然後有足夠的錢讓煤礦全面開工。我們自己的力量不夠，只能管一丁點」……唐守義的要求是如此溫和、如此非暴力。他從光緒年間就開始在煤礦做工，頭腦裡毫無社會主義和工團主義的觀念……他對於人生的全部要求就是安詳平靜的生活，一份穩定的工作和適度的薪水，以及組織工會的權力。然而在中國現時的狀況下，這些合理適度的要求使他成為了革命的一部分……為着食物的需求，他和煤礦上的工友們一道控制了煤礦並開工作業……他們將自己武裝起來，如軍人一樣地戰鬥。<sup>92</sup>

當然，去深究普通安源工人的精神層面十分困難，若不是毫無可能。但是唐守義的看法在工人中間其實非常典型普遍，安源工人似乎更傾心於共產主義革命者在「小莫斯科」的最初計劃，即「安詳平靜的生活，一份穩定的工作和適度的薪水，以及組織工會的權力」，而並非是後來軍事化和激進化了的革命運動。

然而，正如斯特朗所言，時勢的緊急通常逼迫這些普通工人勉為其難地成為革命軍人。自 1926-1927 年的北伐戰爭開始，到 1937-1945 年的抗日戰爭，再到 1946-1949 年與國民黨作戰的內戰時期，成千上萬名原安源工人在共產黨紅軍隊伍發展壯大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美國記者尼姆·威爾士曾經到共產主義革命之都延安採訪多名原安源煤礦工人，發現其中大多數都於十多年前曾經參加過國民革命軍。他們主要集中在由葉挺指揮的享有「鐵軍」稱號的第四軍，並被認為是北伐戰爭中的精良部隊。1938 年，葉挺改編並建立了共產黨的新四軍，其名稱源自以前第四軍的番號。這支部隊在華中地區對日軍展開游擊戰爭，其中有大批安源老兵。<sup>93</sup> 1949 年國民黨軍隊被打敗，不過安源戰士的參與並未就此結束。在新的共產主義政權建立後的第一個十年，指揮人民解放軍的將領中有十二人原來曾是安源工人，他們在秋收起義期間或起義之後參加了紅軍隊伍。<sup>94</sup>

安源對共產主義所作的長期貢獻，不只是輸送了大批將士。參加紅軍的原安源工人中，有許多人後來擔任重要的政治職務，比如政委和宣傳幹部。他們將以前參加安源工人俱樂部時學到的文化動員方式，應用於具體的工作任務中。教育實踐行動是「小莫斯科」之所以成功的核心要素，雖然後來因軍事韜略部署安排而長年式微，但早期安源實驗中的關鍵要素得以保持並被包涵在共產黨後來的諸多政策和舉措之中。

在紅軍以及後來的人民解放軍擁有的眾多武器中，文化宣傳是一枚重要的利器。洪長泰在對戰爭決定性階段的研究中指出，與敵對的國民黨領導人不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者們「是技術高超的工藝師，運用豐富多樣的群眾文化開展抗戰，贏得民眾的擁護，而最重要的是，傳播革命理念和社會主義改革」。<sup>95</sup> 為什麼共產主義革命者比競爭對手更善長於開展文化動員工作？對於這一令人好奇的問題，洪長泰並未提供答案。或許導致這種差異的一個可能解釋是，與那些國民黨領導人的背景相比，共產黨領導者通常更普遍地來自農村地區。<sup>96</sup> 正是因為這些背景，共產主義革命者們能夠更準確地把握農村民眾的脈搏，這是他們在安源以及日後擁有的一大優勢。結果便是他們使用的深受湘贛地區民間傳統影響的文化動員模式更為有效，遠非他們的城市對手之力可及。<sup>97</sup> 這一早期經驗的影響，具有十分深遠重大的意義。眾所周知，中國共產黨的「紅色劇院」與安源地區的化裝講演十分類似。「紅色劇院」成為共產黨宣傳活動的一個主要形式，從江西蘇維埃時期開始，至少一直持續到文化大革命期間。<sup>98</sup>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設立的工人文化宮也不僅僅只是在表面上簡單模仿安源工人俱樂部。<sup>99</sup> 1925年9月慘案之後，共產黨從動員群眾轉向軍事武裝鬥爭，這確實是一個重大的徹底轉型，然而早期實踐工作的影響並未被完全抹掉。

這並非意味着中國共產黨的文化戰略從早期革命年代至毛澤東時期一直是保持穩定或是靜止不變的。這也並非說明中國共產主義革命者在文化置位和文化操控方面的所有嘗試行為，在安源時期或者以後，對於他們的目標群眾都同樣有感召影響力。面對這一挑戰，許多共產黨幹部顯然與國民黨對手一樣笨拙遲鈍。早期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瞿秋白曾經批評一些同志存在貶低中國民間文化力量的傾向，而推崇被瞿秋白批評為不適合中國國情的「歐洲資產階級文化」。<sup>100</sup> 毛澤東本人對這一問題的論述同他對於許多問題的說法一樣，前後並不連貫一致。但是他曾經多次反覆強調，在動



員民眾的過程中必須尊重「本土特色」的重要性。<sup>101</sup> 正如我們所知，即使是在紅色恐怖的高峰時刻，毛澤東也勸誡那些狂熱的共產黨幹部對於正面攻擊民間宗教要慎重行事。無論是在江西蘇維埃政權時期還是延安時期，他都曾激烈地批評某些同志——特別是那些曾在蘇聯受過培訓的同志——推崇外國觀念高於本土方式。<sup>102</sup>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毛澤東建議「將中國舊傳統進行創造性的改造，作為未來中國的國家文化基礎」。<sup>103</sup> 而普通民眾對此號召的響應方式，預示了日後的發展情形。例如，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早期，一場乾旱襲擊了延安革命根據地，那些過於急躁的地方幹部希望引導村民們拋棄民間宗教，於是便「將菩薩塑像從基座上分離並將神像頭部砸爛」。可一旦饑荒過去之後，「竟有不少農民家庭在家中神龕上原來泥塑神像所立之處放上毛澤東的小型畫像」。<sup>104</sup> 在日後由國家政權引導掀起的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熱潮中，將會是司空見慣的這種儀式其實在這一自發地「改造中國『舊傳統』」的行動中早已顯露出端倪。正如毛澤東與許多同志都體會到，宗教信仰和宗教習俗對於他們自己的宏大政治目的來說，既提供機會，亦構成阻礙。



## 第五章

# 築造革命傳統

如同任何從革命鬥爭中孕育的國家政權，新創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面臨在宣傳權力獲得過程的合法性的同時，避免向不受羈束的民眾傳遞煽動性觀念這個棘手難題。由於中國共產主義革命歷時非同尋常地漫長，過程非同一般地曲折豐富，為鞏固新的黨國體制統治權威而構築一個神聖純潔的革命傳統，在中國尤其複雜艱難。全國各地存在大量的革命舊址，但是其中許多地點因與特定的時期、政策或人物密切相關以致地位受限。有鑒於此，安源便成為一個格外引人注目的歷史關注對象。

安源與其他大多數革命中心之間的區別，在於安源既是無產階級運動也是農民運動的搖籃。安源在中國革命發展歷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時間較長，從中國共產黨建立到組建紅軍隊伍總共長達十年。安源的革命往事不僅豐富多樣，亦是相當安全的一個典範，所以在後革命時期被人們廣泛紀念和效仿。雖然安源試驗以激進的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但作為中國的小莫斯科卻是以非暴力的教條主義方式這一特點而著稱。在安源，工人俱樂部的教育和文化活動曾一度壓制了秘密會社犯罪團體的好鬥動武之風，即「文」勝於「武」。雖然 1922 年大罷工被視為英勇的無產階級一次重大勝利，安源卻是作為基層教育和文化動員中心而聞名，表明與現時的鞏固政權目標高度一致。此外，安源的一個獨特優越之處在於現在的中國共產黨領袖人物之中，有相當多的人曾經在此工作過一段時間，其中最著名的是中共主席毛澤東和副主席劉少奇二人。

雖然正是由於安源與黨的高層領導之間存在的歷史淵源，令安源突出地成為重塑革命傳統的重點，然而在向當代民眾解釋歷史往事時亦因之受限，並因之更為複雜。1949 年 10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典禮上，曾經領導過安源勞工運動的三位革命家毛澤東、劉少奇和李立三一同站立在天安

門城樓上，然而團結的表象只維繫了一段時期。在後來的年月中，圍繞着無產階級運動領導地位歸屬問題爭論不休，安源歷史被不同的人解讀成截然不同的面貌，在激烈的鬥爭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新政權剛剛建立，安源的「光榮革命傳統」所蘊含的價值便得到了公認。共產黨接管萍鄉數月之後，礦區重新建立了工會。在蘇聯度過十五年流放生涯的李立三在新的共產黨政府中擔任第一任勞動部長，並成為全國總工會的實際領導人。他向安源工會發來了賀信，並號召安源工人「繼承革命傳統精神」。<sup>1</sup> 依照文字表面來看，李立三的鼓勵之語簡單、直白。然而，隨後數十年的歲月將顯示，繼承安源的革命傳統絕非如此簡單。

## 文化操控

革命傳統的重塑並不一定要求歷史準確性，與民眾記憶一致，更重要的是必須符合當代政治形勢。新的共產主義秩序確立之後，中央政府與省級政府官員主導和扶植了觀點對立的不同解讀。這些行為受到某些隱秘不宣的動機驅使，通常即使是那些任務執行者也未必清楚明白。但是文化操控並非只是一個自上而下的過程。地方部門和普通群眾也積極大力地開展這種活動，希望藉此受到上級的關注並獲得資源。

享有小莫斯科之稱的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開展的早期文化動員模式，在新的共產主義政權的實踐活動中得到拓展和改進。然而現在卻有一些重要的變化。從前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的工作目標是為了喚醒無產階級革命性的集體意識，而此時的文化行動則是為了擴大統治權力部門和主體利益。結果便是對於安源革命傳統的解讀前後有所不同，以前是一種要求做人尊嚴的吶喊，而現在卻是在宣稱精英人物的合法性地位。

在新中國的第一個十年，共產黨重組了文化領域，進而黨國體制本身便成為文化領域的主要操控者。在結構調整之後，文化系統為宣傳部門所主導，而宣傳系統由於在群眾運動中處於領導地位，從而享有相當大的特權。<sup>2</sup>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宣傳系統從制度和運作上均效仿蘇聯模式，與布爾什維克政黨的區別，在於毛澤東等同志在建立共產主義黨國體制之前的近三十年時間裡，不斷對該體系調整改動，於是享有巨大優勢。洪長泰根據觀察認為，在中國，「從來都不是一味地盲目模仿蘇聯模式，並且在

很多情況下，中國官員或是不予以採用，或是甚至用於一己之私利。」<sup>3</sup> 而且，中國本土素來擁有審查和文化控制的豐富歷史。張伯賡 (Julian Chang) 在比較中蘇兩國的國家宣傳系統的研究中總結道，「中國共產黨的全國宣傳系統是在將蘇聯模式調整適應中國國情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更重要的是建立在帝國時期、國民黨時期和延安時期的公共交流傳統的基礎之上。」<sup>4</sup> 安源革命傳統的締造者們借鑒了蘇聯的許多經驗，但是他們在其中加入了顯著的中國特色。

在中國，文化操控手段的運作者效仿許多蘇聯成例，其中問題較大的一個是，為鞏固和加強最高政治領袖的權威而掀起對領袖的個人崇拜，儘管表現形式有所不同。眾所周知，之前蘇聯以國家之力開展對斯大林的英雄崇拜（對列寧的崇拜在程度上較輕一些），而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則是將這種蘇聯政治儀式發展到極端地步的表現。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早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已現端倪，到文化大革命時期達至頂點。當中國不再依從於蘇聯之後，祖先崇拜和尊奉皇帝的本國傳統引導了全國的阿諛奉承之風。然而，少為人知的是，對毛澤東的這種個人崇拜並非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傳體系構築的唯一一個。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十多年中，為鞏固劉少奇作為毛主席接班人的合法地位，展開了對副主席劉少奇的個人崇拜。雖然最終以失敗為結局，在劉少奇運作的文化操控活動之中，安源的歷史佔據着核心位置。

## 鞏固安源的新秩序

與接管全國其他工業機構一樣，共產黨高度讚揚接管安源事件，表彰為一個新時代的突然來臨。然而，向另一種社會主義秩序轉型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同國民黨統治時期一樣，最初的考慮仍然是保障經濟生產這一保守目標。人民解放軍未遇一兵一卒的抵抗便開進了萍鄉，確保了權力平穩過渡。新駐紮的軍事部隊兌現了戰時承諾，原有的管理職員皆得到留用。在隨後的三年之中，原先在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工作的郭象豫擔任了領導職務，負責將安源煤礦整改為服務於共產主義政權的廠企。<sup>5</sup>

這並不意味着工業關係依舊保持不變。長期沿用的包工制，早在 1922 年大罷工之前就被共產主義革命者批判為「封建剝削」。在安源礦區被接管

後僅幾個月，這項制度就被正式廢除。新制度是件工制，規定工人的工資根據每人的產出量計算，中介人無任何抽成。然而，這項改革措施未受廣泛歡迎，因為在這個制度下，工人為了增長工資，必須承受生產更多產量的巨大壓力。而且，原先的工頭中有許多人仍繼續在煤礦中做監工，由於與殘餘的秘密會社和其他武裝組織之間保有聯繫，他們仍然對普通工人施加相當大的影響力。<sup>6</sup>

為了消滅這些組織的殘餘力量，新設立的公共安全機構將在萍鄉地區活動的軍事武裝團體設定為打擊目標。至 1950 年末，一共有十二個土匪隊伍和地主武裝兵團被清剿，其中大約有 1,900 名成員被關進監獄，另有 262 人自動投降。<sup>7</sup> 共產黨將縣裡主要的武裝敵人剷除之後，注意力便轉向煤礦本身。自 1950 年 12 月至次年，同中國當時的其他廠企一樣，舉國一致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也在安源展開。<sup>8</sup>

鎮壓反革命運動經過精心籌劃和部署，由中央統一協調。然而，運動形式還是使人聯想起二十五年前紅色恐怖時期的群眾公審大會。在安源，由二十多名幹部組成的一個工作隊開啟了這項運動。工作隊去了每一個開工地點，向工人們講解鬥爭的意義及目的，並在工人中間挑選出一些「積極分子」和「骨幹分子」，由他們帶頭去批鬥被揪出來的鬥爭對象。之後很快便陸續舉行了三場激烈的群眾批鬥大會。每一次舉行大會時，到場的群眾逾三千人。在這些群情激憤的大會上，工人及其家屬們控訴平日作威作福的工頭們如何欺侮他們的諸般惡行。積極分子和骨幹分子們按照事先的演練，揭批這些惡霸的罪行。群眾在憤怒情緒感染下，也講訴了他們遭受毆打、虐待以及強暴等各種悲慘遭遇。會後，有七名工頭被行刑隊處決，十三名洪幫頭領被判處終身監禁，九個小頭目被罰去勞改。<sup>9</sup>

事後看來，在歡慶全國解放之後不久便展開的鎮壓反革命運動相當嚴酷兇猛。一位觀察家認為，對於一個已經穩固了軍事勝利的政權來說，這是一個過度殘忍的運動。當時在一種偏執的戒備心理影響下，社會籠罩在相當緊張的氣氛之中。人們被要求時刻警惕「隱藏的反革命分子」和「特務人員」的政治顛覆陰謀得逞的可能性。<sup>10</sup> 但值得一提的是，當時的現實情況確實使這些可怕的警戒顯得有憑有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早期階段，共產黨對政權的控制力，其實比人們通常認為的要軟弱一些。全國各地爆

發了無數的衝突和對抗事件，使得地方部門基本上以防禦為主。<sup>11</sup> 而且，這種對抗也充分說明中國的革命傳統可以適用於另一種可能的解讀。

1950年8月，湘贛邊境區域正遭受着一場嚴重的乾旱。萍鄉公安局獲知了「華中反共救國軍」計劃要發起一次造反的風聲。根據消息來源，這個自稱「革命」的組織讓成員四處散播可怕的謠言，宣稱「第三次世界大戰發生了；美國已用了原子彈把北朝鮮打敗了，佔領了東北三省」，「英、法、日本一齊出兵來打中國，國民黨很快要返回來了」，而且大肆傳言「快土改啦，過去在舊政府及軍隊幹過事的人和二流子都要被抓起來」。準備領頭造反者中有幾位是當地的洪幫頭領，他們在舉事之前，依照三合會的規矩秘密地舉行了立誓的儀式，飲了雄雞血酒，一同結盟拜把子。<sup>12</sup>

結果發現，這些洪幫頭領中有一名安源礦工張光馨，在共產黨即將佔領安源的前幾個月加入了地下黨組織，之後不久便參加了以工人為對象的一次歷時四十三天的政治培訓。但他未能被分配到煤礦幹部的職位，於是輕易地受到調唆。據張光馨後來對員警招認，他是被一名前國民黨小官招攬進這個醞釀中的陰謀。這個人到張光馨家向他講了極具說服力的一番話：「有一個組織是有把握的，有無線電，槍由台灣可以運來，現在是時勢造英雄。你以前拼命做革命工作，現在連工也沒有做，將來是有苦受，你可以去參加這個組織。」<sup>13</sup>

恰好，張光馨的哥哥張富生當時擔任萍礦工人糾察隊隊長。叛亂者們計劃先說動張富生交出糾察隊的槍支，然後鼓動一些支持他們的礦工去奪取礦警隊的武器，接着攻佔礦區幾個主要礦井，再全體集結向萍鄉縣政府所在地進軍，最後佔領縣城。張富生聽從了這個主意，召集多名糾察隊員帶着槍支武器，在深夜靜等進一步的指示。然而，等待的信號一直沒有出現。與此同時，公安機構知曉了這一陰謀，張氏兄弟同煤礦上的三十名同謀者在還未行動時便被制服。<sup>14</sup> 總之，軍隊和公安機關展開了一次圍捕行動，將準備造反的五十多個主要頭目一舉抓獲，其中十八名後來被處決。<sup>15</sup>

雖然「華中反共救國軍」的反叛行動在起事之前就被撲滅，但仍令地方官員緊張不安。隨後的審訊揭露出參與反叛事件的九百人之中，竟有多名政府官員和普通工人。捲入者中竟包括一名萍鄉公安局的工作人員，後來他坦白說加入是聽信了謠言，說所有礦工都已經組織起來參加這場起

義，而且凡幫助攻打萍鄉的都有豐厚的獎賞，每月發二十銀元，還有大量食物和衣料。<sup>16</sup>

更進一步的調查表明，陰謀策劃者在礦工中確實做了大量的動員工作，借助工人們對近來強行實施的件工制的抗拒情緒，造反者批評新的薪酬制度比以前的包工制剝削更深。尤其令地方官員惱火的是，反叛者對於安源革命傳統別有用心的發揮運用。將反抗不公的申訴表達為一種對於做人尊嚴的要求，李立三在 1922 年為大罷工製作了「從前是牛馬，現在要做人！」的口號。那些準備起來造反的人利用神秘的測字法（將漢字的組成部分拆解分析以發現其中隱含之意）煽動礦工們對件工制產生強烈的反感情緒。他們指出漢字「件」裡含有一個「牛」字，意味着在新制度下工人的生活不會好過「牛馬」。而相反，舊的包工制則更為人性化些，因為「包」字裡含有代表自己的「己」字。在造反宣言中，反叛者號召進行「第二次解放」，將工人們從件工制的暴政中解放出來。<sup>17</sup>

造反者所用的文化置位手法，雖然富有創意和吸引力，但利用安源革命遺產的方式顯然並非國家所希望鼓勵的。在「華中反共救國軍」被消滅後數月，鎮壓反革命運動便開始了，以防再次出現此類對於新政權的挑戰。在安源，緊隨打擊工頭和秘密會社頭子的行動之後，是歷時兩個月之久的取締非法毒品交易和吸毒的密集行動，由此破壞了洪幫的主要經濟支柱。截至 1952 年秋，數十個販毒者和吸毒者被萍鄉公安局緝獲，而大量的鴉片、海洛因、嗎啡和其他毒品被沒收。<sup>18</sup> 安源地方上對政權當局不利的潛在威脅力量被清除了，而且還通過群眾運動挑選出和培養了一批青年積極分子，依靠他們的力量貫徹黨的政策。在運動過程中，安源礦區發展了 4 個新黨員以及 323 名青年團員。<sup>19</sup>

鑒於安源歷史上是秘密會社組織造反叛亂的中心之地，暴力犯罪活動素來猖獗，故而新政府破除舊習俗的工作遭遇到一定程度的抵制，並不令人詫異。實際上，據萍鄉公安局的報告顯示，毒品、賭博、盜竊、嫖娼、「迷信」活動以及其他大家熟知的惡習，在之後多年一直令地方當局頭疼。<sup>20</sup> 但是，這場鎮壓反革命運動，成功消除了迫在眉睫以顛覆新政權為目的的大規模反叛威脅。<sup>21</sup> 公共秩序得到保障，國家便開始重新構建自身版本的安源革命傳統。



## 重拾革命記憶

由於多年戰亂加上長期荒廢，安源經濟遭受重大損失。雖然如此，安源煤礦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卻得到廣泛認可。因而地方政府和國家都有共同的意願，讓煤礦恢復舊日的輝煌。1954年10月，黨中央下達指示，要求重開在革命時期一直使用的採礦坑道和直井。由於關閉了近十五年，採礦通道的破損程度十分嚴重，經過數月艱苦修復，終於重新投入使用。政府在全國範圍內招募了一大批技術業務幹部，派遣他們到安源指導困難且危險的工作。毛澤東和其他共產黨領袖三十年前曾經到礦井下面去動員工人。他們當年下過的中央礦井於1955年11月重新開始工作。由於礦井的結構比較脆弱，修復工程幾乎全是徒手進行。經過一年修復，安源煤礦東邊的老礦井於1956年初重新開始使用。1957年2月，西邊的礦井也恢復了生產。<sup>22</sup>

原有的礦井恢復了生產，新開的一些礦井也開始運作。安源煤礦與其他六個煤礦組成了萍鄉礦務局。礦務局的產煤量穩步增長，截至1957年年產量達到180萬噸，是1949年之前的年產量的兩倍。<sup>23</sup>勞動力人數也隨着產量的增加而上升，截至1957年底，職工人數達12,870名，幾乎等同於大罷工時期的工人數量。<sup>24</sup>與1925年被關閉之前的情形一樣，萍鄉煤礦在產量和勞動力兩個指標上都再次成為長江以南地區最大的煤礦。但是，由於國家投資和蘇聯支援更多地投入中國北部和東北部省份的煤礦，安源煤礦在國民經濟中佔的地位卻不如往昔輝煌之日顯著。<sup>25</sup>

除了原煤礦恢復生產，對於復興安源革命傳統至少同等相關的，是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的重新開辦。工人俱樂部是李立三為準備1922年大罷工而做的開拓性組織工作的一塊跳板。後來在劉少奇領導下，工人俱樂部成為小莫斯科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一直到1925年9月大屠殺事件為止。工人俱樂部是安源革命傳統的一個核心的實物象徵。

安源鎮工會揣想劉少奇對他的工作舊地可能懷有某種特殊的眷戀之情，在1952年春天直接向劉少奇寫了一封信。信中提到為紀念往日的革命英雄事蹟，希望將現在破敗陳舊的工人俱樂部大樓按照劉少奇1924年的建築設計原樣修復，重現昔日的宏偉壯觀面貌，他們熱切盼望得到批准。三個月後，他們收到了一封令人鼓舞的回信。這封信確認了副主席與安源革命歷史間的個人關聯。

安源鎮工會  
諸同志們：

你們四月八日給我的信，收到了。謝謝你們！你們所請增加工會兩個脫產幹部及修輕便軌道事，已轉江西省總工會及鐵道部酌情辦理。我曾在安源工作過三年，安源的許多事情，至今我還記得很清楚，俱樂部的大會場還是我經手修建的。過去的許多革命同志，如黃靜源、周懷德、謝懷德、劉昌炎等烈士，我記得他們很清楚，應該在安源建立一個紀念碑，並舉行追悼會，以紀念安源一切死難的烈士們。此事望你們商同萍鄉縣政府酌情辦理。

敬禮

劉少奇

七月八日<sup>26</sup>

劉少奇對他過去在安源經歷的認可，帶來了實實在在的結果。一位老工人在三十年後回憶往事時，心存感激地說道：「劉少奇給安源鎮工會的信，我們都知道。關心老工人。我們都在民政局領了錢。」<sup>27</sup>

得到國家權力第二號人物的關注，令當地官員雀躍，一心一意要恢復安源的革命舊址。然而，在當時的經濟緊縮時期，主要障礙是資金匱乏。由於縣裡和省裡都難以提供額外資助，他們便向更高層求助。郭清泗是安源一個斯達漢諾夫式的勞動模範，用手鎬創下了國家採煤新記錄。1954年，郭清泗利用自己當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代表之機，去尋求中央資助。準備去北京參加代表大會之前，郭清泗同萍鄉礦務局黨委成員進行了會談。他們建議他直接向劉少奇副主席提出這些請求。郭清泗僅僅上過專門為工人開設的基礎識字課程，於是他請黨委書記寫下幾個談話要點，好讓他帶到北京去。書記便提筆寫了一些請求，除了尋求修復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的資助之外，還希望將安源大罷工周年紀念日9月13日定為國家節日，以此紀念煤礦工人的事蹟，另外還懇請劉少奇為地方日報《萍礦工人報》題寫報頭，並為修繕後的工人俱樂部書寫匾額。<sup>28</sup>

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周恩來在開場演講中提到國民經濟環境是如何惡劣，郭清泗聆聽之後便躊躇着是否要提出財政援助的請求。然而，在他同江西省委書記一道受劉少奇會見時，副主席當面表示，對於惠及江西的這個提案，國務院一定會通過。這次會談令郭清泗大受鼓舞。果然，提案獲得了國務院批准，1955年1月下撥三萬元財政經費，用於進行這個重

建工程。一年後，修葺完工的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向公眾開放。為此當地還特別製作了一份紀念冊，廣泛地向群眾分發。該紀念冊主要收錄了劉少奇 1952 年寫給安源鎮工會的信，劉少奇在信中還批准修復從萍鄉到安源的鐵路線。這條線路也幾乎同期完工。在從縣政府所在地到煤礦的鐵路線沿線上舉行了一次盛大的慶祝典禮，吸引了成千上萬的本地居民。出席慶典的有國家級和省級的代表，他們提高了這次慶典的政治檔次。<sup>29</sup>

許多官員出席了工人俱樂部重新開放的慶典儀式，說明江西在尋求獲得高層的關注和資助方面，安源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借助安源的革命貢獻去索要特殊關照，是這一時期江西省政治和經濟整體策略中的一個重要環節。根據馮崇義的解釋：

在 20 世紀 50 年代和 60 年代的時候，江西的省級領導與北京的領導高層保持着緊密的政治聯繫和私人交往。他們與中央政府密切合作，以確保本省受到優待和爭取資源。作為「中國革命搖籃」的江西常以此為理由，例如 1956 年中共江西省委第一書記楊尚奎在第八次共產黨代表大會上作報告時指出，江西理應得到特殊的關注以及被分配更多的資源，因為本省經濟落後的局面很大程度上是為革命付出了沉重的代價而造成的。江西在毛澤東時代顯然經濟發展良好。<sup>30</sup>

在毛澤東時代的大部分時期，江西利用本省的革命經歷成功地獲得中央政府眷顧。修復革命舊址的要求，其實蘊含江西省與北京領袖之間的歷史紐帶。由於安源在文化和經濟上同湖南的聯繫，比與江西的關係更為緊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安源勞工運動實際上是在湖南共產黨的指導下展開的。儘管如此，新的黨國體制官僚邏輯所制定和推行的正式行政區劃，卻高於其他先前存在的關聯。為了將自己的政治地位更好地加以利用，江西省指示下屬的宣傳部開展系統性的宣傳工作，廣泛宣揚黨的高層領袖在本省革命歷史中的突出貢獻。<sup>31</sup>

這種舉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創建之後不久便開始了，在毛澤東時代一直持續展開着。1951 年夏，在共產黨建黨三十周年節慶前夕，當地歷史學家彭江流被從萍鄉宣傳部調到南昌的《江西日報》編輯部，負責編寫一份簡短的安源歷史，重點突出「領導與群眾之間的光榮的、正確的關係」。隨後數年，彭江流對安源老工人進行了大量訪談。這項工作的政治任務，明

顯是為了說明毛澤東和劉少奇對安源勞工運動作出了偉大貢獻。<sup>32</sup> 來自南昌的這種特別關注讓安源的老工人和老居民明白，作為中央領導昔日功績的倖存見證人，他們本身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價值。

1956年1月，修葺一新的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打開大門，正式向公眾開放。雷鳴般的鞭炮響聲震天，伴着高亢激昂的武樂，紅旗迎風飄揚，在行進的隊伍中有一群老工人，他們手中舉着據稱是毛澤東和劉少奇在安源之時曾經用過的各色物件。<sup>33</sup> 一位老奶奶慷慨激動的講話讓慶典活動達到高潮。她的女婿叫做楊士傑，原是俱樂部成員，也是一名共產黨員，在1928年白色恐怖中不幸犧牲。<sup>34</sup> 這位譚老太太手上展示着一件沾染了血跡的襯衫。為緬懷亡故的女婿，她將這件襯衫保存了幾十年。她高聲講訴：

我這個七十五歲的老婆子，眼睛蒙了，腿也走不動了，反動派叫我「土匪婆」，我這個「土匪婆」對這個「土匪窩」，對我們的俱樂部，比誰都更了解，比誰都更珍惜，我的女婿楊士傑就是為工人運動犧牲的。

這個俱樂部呀，有我親人的血。……過去我每次走過俱樂部的時候，就心痛得流眼淚，俱樂部是工人的家，可是卻讓敵人佔用了，我盼望着共產黨早日回來，讓俱樂部早日恢復。今天我的願望實現了。雖然我眼蒙看不清，我一樣能夠感覺到俱樂部比以前更好了。從此我經過這裡，再也不會流淚了……我想起了毛主席臨走說的一句話：共產黨會回來的，要好好撫養大孩子，繼承烈士遺志。今天我要告訴毛主席：我堅持住了，孩子帶大了，……我的幾個孩子，沒有白犧牲，他們都在九泉之下看到今天，也會笑的。<sup>35</sup>

老奶奶飽含深情的一番表證，令在場的許多年輕人心情澎湃。他們莊嚴地列隊宣誓，要跟隨烈士的腳印，遵照共產黨的指示，全身心投入到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去。<sup>36</sup> 重修的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完全忠實地依照劉少奇1924年設計的建築藍圖。當年劉少奇設計時以莫斯科大劇院作為參考模型，但是這座新的建築在功能上卻與以往完全不同。當年在小莫斯科時期，工人俱樂部曾經是活躍的工會活動中心，不僅增進工人的經濟利益，而且還在對工人進行教育、組織和文化動員的工作方面進行了開拓和創新。但是現在的俱樂部則成為一個紀念偉大的共產黨領袖的革命活動場館。



圖 8

少先隊員們在標示 1925 年黃靜源被殺害之地的石碑前宣誓忠於共產黨。安源工人俱樂部大樓在後面的背景中。

正因為擔負着新角色，重新開放的工人俱樂部吸引的注意力，遠遠超出了江西省境的範圍。1956 年，在國家級的一本旅行雜誌中，刊登了一篇安源遊記。此文向全國各地計劃旅行的遊客們推薦去安源觀光遊覽，親身感受一下「毛澤東、劉少奇和其他同志播下革命種子」的地方。這篇文章附上了最近剛剛重新開工的煤礦以及剛開放的工人俱樂部的一些照片，並對一位老工人進行了採訪，老工人詳細回憶了 1922 年大罷工的經過情形。<sup>37</sup> 幾個月後，新華社在一篇新聞報導中宣佈，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重新向公眾開放，是劉少奇同志革命功績的最好見證。該報導被翻譯成多國語言，並通過無線電波向世界各地播送。<sup>38</sup>

俱樂部作為安源在中共黨史上光輝篇章的中心象徵符號，在修葺完工之後，本地的工會組織和政府部門繼續將之資本化。他們在修繕後的工人俱樂部的第二層和第三層臨時佈置了一個革命物品展覽，很快每月來參觀的民眾便達到三四千人。1957年5月1日是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建立三十五周年紀念日，紀念活動特別精心安排佈置了講述安源勞工運動史的一個展覽，吸引了大量的國內外遊客。當地的一些「革命」地點如毛澤東和劉少奇曾經在安源訪問過或者工作過的地方，都被江西省長方志純定為保護遺址，成為展覽的擴充部分。將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變成國際觀光景點的努力，取得了成功，至少在共產主義兄弟國家中是如此。過了不久，蘇聯和北越的代表團來煤礦參觀便成為司空見慣之事。他們紛紛在據稱是毛主席曾經坐過的椅子上落座體驗一下，還明確表示安源工人的革命成就在他們自己的國家中已是家喻戶曉，令東道主十分歡顏。<sup>39</sup>

## 政治趨於複雜化

甚至在構建安源革命傳統的初期階段，複雜的政治就已籠罩着這一過程。儘管劉少奇在1952年寫的信件中指示要修建一座安源烈士紀念碑，但是一直到三十六年之後，這個項目才最終完成。<sup>40</sup>由於在白色恐怖中喪生的許多人也同國民黨有關係，所以為了確定哪些名字可以刻在石碑上而進行的調查工作和激烈爭辯長達數十年，期間隨着政治風向的轉變又頻生變數。更為複雜的是，政治爭議並不僅僅囿於逝者。1922年大罷工的主要功勞歸於李立三，在安源煤礦工人圈中他享有如傳奇人物一般的威望。然而，因為鼓勵工人階級獨立自治，使黨的威信降低，他後來在政治上失勢。

李立三寄居蘇聯十五載之後才被允許返回中國。一回國，他仍孜孜不倦地繼續宣導無產階級的力量。1949年9月在北京召開的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毛主席宣佈佔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國人民終於「站起來了」，而這句話成為廣為傳誦的一句名言。李立三本人在發言中強調他希望無產階級在新的國家秩序中扮演特殊的角色：「我們工人階級以國家主人翁的最高覺悟，繼續發揚英勇鬥爭的革命精神，負起這個建設新國家、新社會的

艱巨責任。」<sup>41</sup> 李立三長期以來對中國無產階級都抱有堅定的信念，而這點與劉少奇在數月前表達的懷疑看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工人是必須依靠的。但工人是否可靠呢？馬克思主義認為，工人階級是最可靠的。這是一般說的。具體的說，則還有問題，因此，我們必須努力工作，使工人階級完全可靠。如我們疏忽，不做工作就去依靠，那是靠不住的。<sup>42</sup>

兩人在安源工作時運用的勞工組織方式截然不同，令二者的差異更大。對於李立三來說，中國共產黨面對的挑戰並非是去管束這些素無紀律的工人，而是要通過提高政治地位和改善生活條件，來褒獎他們的虔誠忠心和付出的犧牲。李立三在新的共產黨政府中擔任第一任勞動部部長。他很快便開始起草非常有名的勞動保險法，為國有企業的職工們制定了優厚的福利待遇，涵蓋醫療經費、工作保障、住房津貼、上調工資收入以及退休金等項目。<sup>43</sup>

但是，在新的共產主義政權建立後最初幾個月內，大規模的工人罷工浪潮席捲了中國多處工業中心。李立三作為全國總工會的實際負責人，也因此陷入麻煩。<sup>44</sup> 李立三因領導安源大罷工和上海五卅運動而享有盛名，因此他發覺自己處於一個尷尬的境地，需要在宣導工人權利和告誡工人行使這些權利造成的弊端之間仔細權衡：

罷工是可以禁止的嗎？這不可能也不合適。罷工是工人的權利，但是今天工人不需要這種手段。在過去他們沒有選擇只能罷工；但是今天他們可以運用理智的手段來解決事情。如果談判失敗，他們可以去勞動局……舊的手段不僅無益並且有害。這是新的形勢的階級鬥爭。否認階級鬥爭是錯誤的，但是階級鬥爭以許多形式發生。（譯者註：此處引文按原著英文翻譯，原始中文資料現存上海市檔案館）<sup>45</sup>

罷工的問題說明在新的政治秩序中，工會的角色定位開始自相矛盾，實際上，無產階級的定位亦存在相似的矛盾。

爭論在 1951 年 12 月達到了高峰，李立三被抨擊為「代表落後工人」和「提倡工團主義」，讓工會凌駕於黨的監管之上。<sup>46</sup> 1950 年到 1951 年期間，獲得李立三首肯而頒佈的幾份地方工會章程在條款中並未說明工會要在黨的領導下開展工作。<sup>47</sup> 原來和他一同共事的勞工運動組織家劉少奇秉

持正統的列寧主義，長期以來一直強調嚴格加強黨的控制。劉少奇因為工會在當前的罷工潮中起了突出的煽動作用而感到惱火，直接發表了聲明黨的地位至高無上的言論：「工會不是工人先鋒隊的組織。」<sup>48</sup> 1951年12月在全國總工會黨組擴大會議上，因鼓勵工人自治，脫離黨的控制，李立三被解除了全國總工會的領導職務。三年之後，即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准在財政上資助安源修繕路礦工人俱樂部項目的會議上，李立三發現他擔任的勞動部部長一職也被免除了。

李立三由於在政治上失勢而情緒沮喪。闊別三十年後，他第一次重返湖南家鄉。儘管李立三的老家醴陵距離安源僅數里路程，他卻決定不再踏上那片舊地，以免招致其他宣稱在安源有革命功績的政治大人物的不快。相反，他從煤礦邀請了幾位老工人到他家追憶往事。<sup>49</sup>

儘管官方批判他犯了「經濟主義」和「工團主義」的錯誤，李立三在工會圈子和工人群體中仍然甚受歡迎。1957年春天，中國產業界迎來了又一波全國性罷工。有許多工會成員認為黨對李立三的定論不公正，於是在列出的要求之中表示希望李立三能得到平反。<sup>50</sup> 但是，在當年夏天的反右運動中，中央重申黨的權威高於工會，於是李立三重為工會首領的希望悉數破滅。1957年8月17日，中華全國總工會對之前解除李立三職務一事公佈了官方文件，批評這位前負責人過分關注勞動保險，不抓生產，並且罔顧共產黨的政治領導地位。簡而言之，1951年12月李立三因犯「經濟主義」和「工團主義」錯誤而被免除職務的決議是完全正確的。<sup>51</sup> 全國總工會工作的頭等大事是黨的權威，而不是工人的福利。

## 政治聯繫

1957年正值安源大罷工勝利三十五周年。儘管當時李立三也被邀請書寫賀函以表慶祝，但那年春天工人俱樂部在展覽中陳列的卻是其他兩位前安源革命家、當時掌握國家最高領導權的毛澤東主席和劉少奇副主席的事蹟。<sup>52</sup> 為討好當權者而將歷史事實進行某些改動似乎顯得無足輕重。

在重塑安源革命傳統的內容中，劉少奇這個中心人物的作用特別突出。在修繕後的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來參觀的觀眾首先在大廳門口會看到一幅身穿傳統文人長袍的青年劉少奇巨型油畫。四周牆壁上張貼着從副



主席的文章和演講中摘錄的語句。進入俱樂部大樓後，參觀者們隨着導覽路線的指示依次參觀劉少奇以前住過的辦公室和臥室，房間內陳列着據稱是劉少奇在安源時使用過的傢具、書籍、被褥以及其他物品。展覽中還陳列了劉少奇青年時期的一些相片，以及他早年創作於安源的一些文章的副本等。<sup>53</sup>

劉少奇被塑造成是安源勞工運動，乃至中國無產階級運動的最高領袖，一時成為風潮，而且這個潮流並不僅僅囿於工人俱樂部陳列的展覽。就在安源開放展覽的同一時期，標題為「劉少奇一身是膽」的兒童故事被列為全國小學課本的一篇必讀課文。這個故事以戲劇的表現方式，描繪劉少奇同資本家談判時如何勇敢爭取 1922 年安源大罷工的勝利。儘管根據歷史資料，在整個罷工時期李立三才是安源工人的首要代表，教材的內容卻隻字未提。相反，在這個故事中，工人們對李立三的溢美之辭和愛戴之情全部都轉移到劉少奇身上。當工人們驚歎於劉少奇的勇氣，因而詢問他的無畏是否來自於所佩戴的十二克拉（在其他某些版本中則是十三克拉）金盔甲。在實際中，李立三有意放任關於他具有刀槍不入的神力的傳言愈傳愈盛，從而為他增添領袖魅力。有別於此的是，故事中的劉少奇謙虛地表示唯一給予他保護的是團結的工人階級。<sup>54</sup>

在共產黨領導下，其他文化媒體在表現安源勞工運動歷史時也同樣片面。在新中國成立後僅數年，文化部對各地的地方戲劇進行了一次全國性普查，官方承認了萍鄉傳統的採茶戲。在本地戲曲資格被確認的鼓舞下，江西宣傳部在 1956 年 6 月創作了一齣名為《安源大罷工》的採茶戲。<sup>55</sup> 值得注意的地方是，這齣戲完全沒有提及李立三或者毛澤東。組織和領導大罷工的全部功勞，都歸於劉少奇同志一人。作為工人俱樂部老師，散發着磁石般吸引力的是劉少奇，而非李立三。劉少奇單槍匹馬同資本家談判，簽署了勝利的罷工協定，保障了工人的權益。採茶戲的結尾部分唱頌劉少奇的勇敢精神。這部分的合唱部歌唱劉少奇佩戴着傳聞中的十二克拉防身鎧甲，劉少奇則回應唱道：「你們的力量就是我的膽；你們的決心就是我的護身牌；今後更要團結緊，爭取更加美麗的明天！」然後合唱部歡快地唱道：「革命勝利已實現，光榮傳統要發揚，工人勝利萬萬年！」<sup>56</sup>

將劉少奇刻畫為安源大罷工的唯一領導者，悖離真實的歷史。雖然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起就在工人中間傳唱的那首民歌，有可能將廣受愛戴

的李立三發揮的作用作了刻意誇張，但是依據觀感不同的親歷者留下的資料，如當時的新聞報導以及安源煤礦礦長的日記，都清楚地反映出工人贏得勝利主要歸功於李立三，而不是劉少奇。據礦長李壽銓在罷工時期的日誌顯示，劉少奇作出的僅有貢獻就是將管理的三大基本要求知會工人，即：保護鍋爐和通風室，保證電力運行，並維持公共秩序。發起談判並且最終贏得談判勝利之人是李立三。李立三的不屈不撓最終迫使公司接受了罷工工人提出的要求。罷工期間，李壽銓在日記中記載：

據李隆邛云，條件無可再讓步，允則開工，不允則走開，離安源，聽眾工所為等語，即是聽其暴動。……事急如此，設有暴動，千數百萬之產業，即不能保，我何以對公司？……派代表與李隆邛訂條約。……明日開工。<sup>57</sup>

採茶戲《安源大罷工》名為講述安源大罷工的故事，卻完全只表現劉少奇一人的事蹟。1959年1月，李立三在觀看了此戲的一場表演之後，評論說：「昨天我去看戲，不大對頭。」<sup>58</sup> 當年稍後，劉少奇在看過這齣戲後，甚至連他本人都給予了保留的評價：「當時的歷史不是這個樣子的。」<sup>59</sup>

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湧現了許多以誇張的戲劇表現手法重現安源大罷工故事的演繹。這些演繹在細節部分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差異。但是，各種版本都一律將劉少奇描繪成反抗資本家壓迫和剝削的無產階級勇敢鬥士。安源煤礦副礦長舒修泰在這些敘事中被刻畫為冷酷無情的資本家化身。劉少奇毫不動搖的無畏勇氣，是挫敗舒修泰惡毒的陰謀詭計的決定性因素。對安源的情形作如此黑白分明的敘述，不僅從歷史上說不準確，而且正如劉少奇清楚意識到的，亦與當前的複雜現實相去甚遠。當時在上海的舒修泰由於經濟窘迫，在1956年5月1日提筆給劉少奇寫了一封信，追憶在安源之時他經常請求劉少奇幫助他解決問題。他讚頌了毛澤東和劉少奇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並表示他近來開始接受馬列主義真理。然後舒修泰解釋由於他與一直接濟他的海外親戚失去了聯繫，難以養活一家十口人，懇請劉少奇在上海文史館給他安排一個工作，可以每月領取固定工資，使他的家人不致挨餓。幾周之後，劉少奇批覆了舒修泰的請求，並且指示上海黨委給予適當安排。劉少奇在5月26日批示的信函中指出，舒修泰在1925年9月大屠殺事件前早已離開安源前往上海，與安源烈士黃

靜源的犧牲無關。由於劉少奇的干預和澄清，原屬「資本家」身份的舒修泰不久便被上海文史館錄用，工資可觀，每月 70 餘元。<sup>60</sup>

## 文化操控

共產主義革命者們之所以在安源取得傳奇般的勝利，更多是由於當地精英人士通力合作，而並非主要依靠劉少奇反抗資本家的超凡勇氣。安源大罷工的正統解讀以階級衝突為故事線索，並未因以上情況而變得溫和。這種簡化不僅反映了北京方面編纂官方黨史的敘述方式，同時也體現了當地官員為爭取中共副主席的關照而精心盤算和動作。劉少奇先前對修繕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給予支持，江西官員受此鼓舞，他們將劉少奇同安源之間的歷史關聯，看作為艱苦的本省爭取額外資源的有利契機。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大部分時期，江西宣傳部副部長李定坤都在負責從多方面宣傳劉少奇過去在江西的革命事蹟的項目。<sup>61</sup> 李定坤是位富有經驗的記者、小說家和劇作家。他將自己豐富的經驗和充沛的精力都投入到這一文化操控任務中。在李定坤的帶領下，當地的工人積極分子、老工人以及安源煤礦的黨史學家共同努力，創造了大量視覺藝術和文學藝術的文化產品，通過博物館展覽、兒童故事、戲曲表演、詩歌、繪畫和電影等形式刻畫副主席在小莫斯科時期的革命功績。

在這一時期，劉少奇偶爾會親自出馬，進一步強調他和安源革命傳統之間的個人關聯。劳模郭清泗曾懇請劉少奇為安源的新聞日報題寫報頭。在 1954 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的最後一夜，劉少奇拿起毛筆寫下多幅《萍礦工人報》五個大字，橫排和豎排的格式皆有。新的報頭在 1955 年 10 月 1 日作為國慶典禮儀式的一部分正式公佈於眾。<sup>62</sup> 《萍礦工人報》是全國唯一一份將劉少奇的書法印在首頁的報紙。該報長期不斷刊登標明副主席和安源勞工運動之間有長久淵源的「摘錄語」、故事和相片等，一直到十年後文化大革命爆發，這份報紙被關閉為止。<sup>63</sup> 重建歷史的企圖昭然若揭，不光美化劉少奇率領無產階級運動的領袖資歷，還進一步提升安源連同江西省的政治和經濟地位。

高層的關照令安源的居民雀躍不已。他們進而試圖利用當地的歷史往事，為現在謀取實惠。郭清泗去參加 1954 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時成功地

爭取到中央的撥款。受此鼓舞，四十四名安源老工人代表組團於次年奔赴北京，向劉少奇請求解決退休礦工的經濟困境。<sup>64</sup> 當直接的方式沒有奏效後，他們採取了迂回委婉的做法。那時，劉少奇在安源勞工運動中最親密的合作夥伴之女將去北京升學，老工人們便鼓動她去拜見副主席，借會面之機替他們講話。朱子金的父親是鐵路工程技師朱少連，他是李立三開設夜校時的第一批學生，在小莫斯科時期一直輔助劉少奇工作。當安源人試圖將歷史淵源變現為現實援助時，朱子金在其中扮演了一個角色。她後來回憶：

我從安源到北京煤炭工業學校來學習的時候，有些老工人曾經親自到我家裡再三囑咐：「你到了北京，可要代表我們去看看少奇同志。他和我們雖然已經分別了三十多年，但我們卻在時刻想念着他。」……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我們正在學習的時候，突然來了電話。我接過電話來一聽，是一位湖南口音的同志，說：「你是朱子金同志嘛？劉少奇同志叫我問你，今天晚上有時間沒有，請你到懷仁堂來談談。」這個意想不到的消息，頓時使我興奮得跳了起來。

下午功課結束之後，我就匆忙地走出了校門，乘上從郊區開往城裡的公共汽車。汽車在飛快地前進中，同車的人們談笑着，而我卻獨自默默地沉入了在對過去的回憶裡。外祖母和老工人對我說過的關於少奇同志在安源領導工人舉行罷工鬥爭的故事，好像電影一般，在我頭腦裡一幕幕地閃現着。……

這次罷工終於獲得了勝利。工人們對於少奇同志在這次罷工鬥爭中所表現的英勇行為，極為欽佩。至今有些參加過當時罷工鬥爭的老工人還念念不忘地說：「少奇同志渾身是膽，真是我們工人的好領袖。」

到了懷仁堂……少奇同志把我拉到電燈下面仔細地看了一遍，又說：「很好，你長得很像你媽。」……

少奇同志對安源的情況非常關心。他問我八方井還在生產嗎？原來的直井還存在嗎？每天全礦能生產多少煤？還煉焦嗎？我告訴他，在過去罷工時插大白旗，工人從礦井裡蜂擁而出的那個總平巷，現在就從那裡進去採煤；另外，還新開了一個直井。現在礦上正在進行基本建設。少奇同志聽了，滿臉堆笑地說：「安源的礦井我都下去過。」

朱子金期望劉少奇對安源的情分可以為她家鄉的工人們帶來額外的中央資助，然而她的想法卻落空了。副主席強調，安源當地的困難要依靠本地人解決：

少奇同志接着向我打聽那些老工人的生活情況，礦上對他們有沒有照顧。我說照顧是有的，可是做得不夠好，還有些老工人沒有得到適當的安置和救濟。少奇同志立刻很鄭重地問：「為什麼沒有做好？」我說因為礦上沒有這筆開支，報請上級幾次都沒有批下來。少奇同志聽後態度嚴肅地說：「……礦上……還可以寫一封信，請當地人民政府照顧他們，這都是你們應該和必須做的。……沒辦法，就要依靠群眾。工人群眾是有很高的階級友愛和互助精神的。你們有困難，可以把問題交給工人同志去討論、研究，他們會想出解決問題的方法來。比如：動員工人互助，義務勞動一天，多生產一些煤；或者是發動工人捐一天或半天的工資，不就把問題解決了嗎？這是正大光明的事情，也能增加新老工人間的團結，我想任何人都會樂意的。安源有那麼多工人，只要相信群眾，有事多找工人商量，辦法是很多的。你說對不對？」<sup>65</sup>

儘管安源居民希望利用本地過去為革命作出的犧牲，從中央部門獲取物質上的酬庸，但他們指望的恩主卻對此有不同看法。副主席拍着這位年輕客人的肩膀，和藹地向她建議道：「你就帶個頭，告訴青年工人，你們將來也會老的，安源俱樂部的大講演廳不就是工人自己捐了工資建的嗎？這樣既不增加國家負擔，又幫了老工人的忙，不是很好嗎？」<sup>66</sup> 劉少奇為確保他強調自力更生的話不被曲解，便拿過朱子金的筆記本在上面寫下他的建議：「由工會號召在業工人每人捐出一天或半天工資交工會保管，作為救濟和解決老工人困難的問題。」<sup>67</sup> 他叮囑朱子金一定要將他的這些話轉述給安源工人。

之前副主席在中央撥款資助修繕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一事上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畢竟因為俱樂部與劉少奇本人的革命聲望密切相關。雖是如此，他在讓國家向老工人施與援助的要求上卻不願跨越界限。所以，他提出群眾自己要作出一定的犧牲。劉少奇不冷不熱的回應說明文化操控作為工人們獲取經濟收益的一個管道，其作用是有限的。但這件事並未讓地方為爭取中央支援的舉動就此消停，亦並沒有使中央減少關注與地方之間的淵源。

劉少奇拒絕為以前一道工作過的革命同志的福利提供經費支援，並不表明他對安源革命往事的興趣不大。事實上，當他和朱子金的談話從要求國家援助老工人的話題轉移到 1922 年大罷工的往事時，副主席的談興轉而變濃。他甚至借貶抑他人來誇讚一己之功：「我是在罷工前幾天去的，我一去就積極主張罷工。李立三還有點猶豫不決。罷工後，李立三躲起來了，我擔任路礦兩局工人全權代表……我去談判時，敵人的軍隊很多……當時我也不怕。」<sup>68</sup> 江西宣傳部門在描繪他的安源功績時進行了誇大，而副主席本人親口確認了這些塑造的故事。

## 工人們的反應

與此同時，修復後的安源工人俱樂部成為當地響應中央發起的連串運動的中心活動場所。<sup>69</sup>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 1956 至 1957 年的百花齊放運動中，群眾們正是在這座俱樂部大樓宣洩心中的不滿，比如抱怨老工人的福利待遇不夠，以及幹部領導方式專橫粗暴、工作環境惡劣等，這些怨言日漸熾盛。<sup>70</sup> 在工人俱樂部大樓外面豎起一面 240 米長的巨大通告欄，滿滿張貼着無數為響應運動而寫的大字報。為了使許多不識字的工人也能參與批判運動，煤礦設立了四處書寫工作站，指派九名老師全時辦公，這樣可以讓受委屈的工人口訴的抱怨被寫成大字報貼出來。這一便利做法的成果便是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時期，短短幾日之內就張貼了三千餘份大字報。然而，到 1957 年夏天反右運動席捲全國之時，有一些大字報上的內容被認為是犯了錯誤，作者本人因之受到批判。對福利體系的怨言現在則被攻擊為是對共產黨的領導沒有感恩戴德。一位政治正確的老工人在批鬥所謂右派分子的群眾大會上，對這一問題如此表示：

過去我們在劉少奇同志親自領導下，流血犧牲，和官僚資本家作鬥爭……我們為了保衛獲得的勝利果實，一定要和右派分子鬥爭到底。我們深深的體會到共產黨帶來的好處。我們年老能夠退休吃勞保，這不是共產黨領導的嗎？<sup>71</sup>

事實上，退休工人享受的由國家發放的這些福利待遇，完全得益於當時政治上失勢的李立三起草的勞動保險法。劉少奇本人在他們的物質福利方面作的貢獻，就只有他讓當地人做慈善捐助這一倡議。朱子金返回安源

傳達了劉少奇敦促年輕人擔負起養老費用的要求後，安源工人們自己為此捐獻了總共三萬餘元的工資收入。即使如此，他們的付出也成為他人的功勞。安置參加過 1922 年大罷工的退休老工人的養老院，是用從青壯年工人的工資中扣除的這筆款項建成的。搬入這座設施的一名退休工人緊緊握住朱子金的手，萬分感激地高聲說：「毛主席、劉主席是青天，我們世世代代也會記得這個恩情。」<sup>72</sup>

將地方上取得的成就歸功於中央領導的這種風氣，是共產主義黨國體制下政治操控行為自然而然的副產品。高層關注的任何跡象，比如最突出顯著的是劉少奇與勞模郭清泗以及革命烈士之女朱子金的會面，傳到安源後都會被視為是預示外來資源將流入這個貧窮煤礦小鎮的好兆頭。由於有這種目的，凡是宣稱與中央權威人物之間存在一定可信關係的人，都被提拔到當地的主要職位上。

安源工人們用自己捐獻的工資建成一座敬老院，以安置參加過大罷工的退休老職工。管理敬老院的是在小莫斯科時期擔任過劉少奇警衛員的袁品高。儘管據說袁品高同參加安源革命的許多人一樣，在 1928 年白色恐怖的高峰時期投靠了國民黨，可舊主人還是十分懷念他。劉少奇在同朱子金的會面中得知，自己以前的警衛已經回到鄰近的醴陵縣老家生活。醴陵也是李立三的家鄉，而且是李立三最先招納袁品高參加共產主義活動。劉少奇建議將袁品高調到安源，與朱子金一起在重新開放的工人俱樂部工作。1958 年初，袁品高回到安源，被任命為俱樂部的副館長，而朱子金此時已是館長。袁品高同時也是敬老院的負責人。從前是武術高手的袁品高利用手中新的權威，在其他老工人面前作威作福，招致當地一些居民的怨恨。不過他是一名忠心耿耿並且能說會道的吹捧者，大肆宣揚他在北京的這位恩人的革命資歷。<sup>73</sup>

被大家熟稱為袁伯伯的袁品高返回安源之後，擔當了講述當地革命故事的首要講解員。當時還是小孩子的一名安源居民回憶：

俱樂部的袁伯伯，為少先隊員上隊課，講的也多是「劉代表」在安源的故事。那時的俱樂部院子裡，有兩棵高大的梧桐樹，樹下立着一塊紅牌，上面寫着：少奇同志當年親手栽種。袁伯伯的故事也大都從這裡開始講起。<sup>74</sup>

去安源參觀最精彩的部分，便是有機會坐在工人俱樂部門口兩棵茂盛的梧桐樹的樹蔭下，聽袁品高親自講述劉少奇「一身是膽」的故事，如何堅定地維護工人的利益、反對資本家的壓迫。<sup>75</sup>

繼承安源革命傳統漸漸與紀念中共最高領導人的昔日功績等同，同時也演變為響應時局的活動。在 1958 年 5 月召開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劉少奇提出「為了適應技術革命的需要，必須同時進行文化革命」。<sup>76</sup> 與其他地方一樣，安源響應劉少奇發起的進行文化革命的號召，狂熱地開展了掃除文盲的活動。考慮到在火熱的「大字報萬歲」的氛圍下，對書寫人員的依賴給不識字的工人造成一些屈辱和不便，安源煤礦成立了直接由黨支部領導的掃除文盲委員會。然而，與三十年前李立三和劉少奇開辦的夜校有別，在後來這一通過列寧式文化革命來掃除安源工人文盲的活動中，他們指望可以一蹴而就。有兩千多名職工參加了密集強度的正規課程，其中 726 人完全不識字。除此之外，黨委書記和其他幹部也都加入到非正規的不分晝夜的教授識字行動中，在整個礦區到處設置黑板，變成臨時的教室。經過六周的狂熱活動，正如那個時代典型的誇大之風，安源黨支部宣稱安源已掃除了所有文盲，成為一個「文化煤礦」。<sup>77</sup>

雖然很難認定在這個冒進運動過程中提升的文化程度是否足以讓工人自己撰寫大字報，但是大字報的數量以指數方式持續增長。據資料報告，在 1958 年 3 月這一個月內，在煤礦張貼的大字報總數達到驚人的十萬多份；當月有一個車間每個工人平均貢獻了 153 份大字報。儘管噴湧的數量十分令人震驚（或許也令人生疑），但是這些大字報上提出的建議範圍實際上卻非常有限。前一年反右運動的經歷，令公眾批評黨的政策的热情受到抑制，這新一波大字報浪潮的內容，主要集中在如何做到流線型生產和減少浪費諸方面。現在由英美「帝國主義」勢力取代共產黨幹部成為政治攻訐的唯一安全對象。<sup>78</sup>

即使工人們學會將他們的關注點以政治權威可以接受的用語表達出來，但是他們並沒有丟棄改善自己的困境的想法。1958 年夏天，上海工人在「要政治掛帥，不要鈔票掛帥」這一大躍進口號下從官方得到了支持。知曉這個消息後，安源工人們看到一個推進自己計劃的契機。他們以上海的口號為由，喧嚷着要求將不受歡迎的件工計酬制度廢除。作為回應，當年 11 月，安源的主礦井進行了一個嘗試，根據工人工作的小時數而不是



生產量來計算工資。最初的報告顯示工人們非常滿意這個新安排，生產水準確實提高，於是這個時薪制度很快便在整個煤礦實行開來。<sup>79</sup>

件工制被廢除是大躍進給安源帶來的變化之一。全國對鋼產量的追求帶動了對煤的需求幾乎無窮盡，使得安源的勞動力人數激增。1957年，安源煤礦職工總數略低於13,000人，與三十五年前大罷工時期相當。然而，1958年這一年招錄的工人就達到9,968名。截至1960年，整個勞動力群體翻了一倍多，達到27,526人。<sup>80</sup>規模的快速擴大使得性別組成產生了巨大變化。許多新的職位是由女工來充任，其中甚至包括一些在地下礦井作業的崗位，這些辛苦勞累的活以前只由男性來做。然而，急進提高煤產量的勢頭未能持續下去，年產噸量陡然降低，1962年煤礦遭受到最慘重的損失。生產下滑在職工人數上得到反映。<sup>81</sup>安源的主礦井在1961年有4,818名礦工；在1962年職工數降為3,130人；截至1965年下降到2,219人。<sup>82</sup>大躍進造成中國農村地區發生了可怕的大饑荒。在這一時期，儘管安源的工人同大多數的產業工人一樣，比他們在農村的許多親友要幸運得多，然而這座煤礦小鎮遭受到的經濟衰退仍是相當嚴重。

## 重寫革命歷史

在這個全國性的危機期間，工人們的要求自然集中在改善他們及其家庭的生活條件這一當務之急上。但外界的各方由於意識到安源礦工在革命史中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他們急切地想要發掘更多意識形態上的動機。當中國擺脫蘇聯而走上自己的發展道路，本土的革命歷史被視為寶貴的政治資產。那一年，為了更好地收集和宣揚安源勞工運動的革命貢獻，幾大口述史項目開始啟動。

這些項目屬於全國性的編纂「廠史」和「革命史」計劃的一部分。這一全國性計劃是為了說明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壯大是正當合法的，並鼓舞群眾將革命熱情發揮於現時的任務上。「黨史」專門講述黨的政策以及黨的領袖和黨員們獻身革命的事蹟。與之有別，這幾部口述史編撰項目則屬於「革命鬥爭史」這個新文體，重點突出群眾的「急迫要求」和他們的「英勇行動」。多個調研組深入到選定的廠企去採訪老工人的過往經歷，並引導他們感慨「解放」帶來了許多好處。這種工作的任務是要將人民群眾的長

期反抗傳統編撰成通俗易懂的故事，不僅證明共產主義的必然性，同時也說明借助中國獨特的革命經歷來推進未來的社會主義事業快速發展存在極大的潛力。<sup>83</sup> 1958年春，負責主管宣傳與文化的中央領導陸定一和周揚共同發出「牢記革命史，讚頌大躍進」的號召。江西宣傳部副部長李定坤多年以來一直積極鼓勵出版地方革命史的書籍，以便提升本省在全國的地位。他率先響應這個中央號召，立即召集江西本地歷史學家和作家開會。在會上，他敦促萍鄉礦務局的代表要加緊開展安源罷工英雄事蹟的撰寫工作。<sup>84</sup>

在這段時期，中國明確標示着要走屬於自己的革命路徑，並不跟着蘇聯亦步亦趨。相應地，大躍進令中國式的審美標準和美學實踐活動複雜，重新得到發展。在藝術和文學上，以往受蘇聯的影響而倍加推崇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socialist realism)，被毛澤東號召的「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方法取而代之。<sup>85</sup> 其目的是以中國豐富的群眾反抗歷史為題材，創作出通俗易懂的文化產品，從而發動群眾參與當前的經濟發展任務。在官方提倡下，發掘地方革命史和傳奇故事的工作在各地廣泛展開。

大躍進對於革命往事的關注，激發人們對安源產生了格外濃厚的興趣。多個調研組深入這個煤礦小鎮收集資料。例如，一群北京大學歷史系的學者於1958年至1959年期間花費數月時間在安源訪談了二十多個參加過1922年大罷工的老工人，以便收集安源勞工運動史的詳實資料。<sup>86</sup> 此外，湖南師範學院的一群師生於1958年也在安源進行了田野調查，之後編寫出一份長達224頁的礦史。<sup>87</sup>

大躍進期間，安源的革命歷史受到高度重視，由此有大量的產品問世，其中最具影響力的是在江西宣傳部直接領導下出版的大眾讀物《紅色的安源》。《紅色的安源》以訪談為基礎，敘述了煤礦的「革命鬥爭」經歷。江西人民出版社最初在1959年發行了一個長達630頁的繁體版本。1960年，此書發行了簡體字版，縮減為401頁。1961年再版時此書由北京著名的作家出版社發行。《紅色的安源》由李定坤和江西黨委直接領導的中共萍鄉煤礦委員會宣傳部編撰。該書由一系列短小的民間故事組成，初版時共計95篇，在第二版、第三版中篇數為53篇。書中按大事年表排序，記錄了時間跨度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工人武裝鬥爭活動，從萍瀏醴起義一直到大

躍進的啟動。編纂這本書的作者是一個四人寫作小組，以原煤礦工人、現任安源煤礦黨委副書記彭永輝為首。小組的其他成員分別是劉少奇為之題寫報頭的《萍礦工人報》總編輯張振初；革命工人朱少連之女、擔任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紀念館館長的朱子金；以及安源煤礦副礦長黃振輝。他們每人都是本地積極宣揚安源革命聲譽的活躍人物。四人在 1958 年受江西黨委和萍鄉黨委的委派，共同編寫這部官方廠史。<sup>88</sup> 此書在出版之前曾由李立三和劉少奇審查了樣稿，在《萍礦工人報》的文學故事欄目首先進行長達六個月的連載。<sup>89</sup>

《紅色的安源》的首篇文章是 1952 年劉少奇致安源鎮工會的一封信，信上提議修建紀念革命遺產的場館。雖然這部廠史有談及毛澤東、李立三以及其他早期共產黨領導人，但是讚頌劉少奇的文章佔了最大的篇幅。這本書於 1959 年 10 月首次出版發行，正值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十周年之際。此書明確地表示要用先輩們的「革命精神」教育年輕工人，號召他們「發揚光榮傳統」，「在生產上再接再厲地創造着奇跡」。<sup>90</sup> 除此之外，該書還有一個非常明顯的目的，即突出宣傳當時被普遍認為是毛澤東接班人的劉少奇的領袖資歷。《紅色的安源》頃刻名滿天下，主筆彭永輝頓時成為國家名人。1959 年，彭永輝成為中國作家協會的成員，並被褒獎為「全國群眾英雄」。<sup>91</sup> 次年，他作為享受特權的一個革命作家代表團的成員，出訪蘇聯和東歐國家。<sup>92</sup>

《紅色的安源》通過口語的方式力圖原汁原味呈現老礦工們的口述，旨在表現安源勞工運動的歷史，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源泉。在書中，一篇題為「老礦工歸來」的故事非常具有典型性，裡面講述了袁學之近期回到煤礦訪問的事。袁學之是安源人，從前當過煤礦工人，與劉少奇關係密切。袁學之在 1930 年參加紅軍離開了此地，後來根據劉少奇的建議，1938 年從延安回到安源做重建黨支部的工作（詳見第四章）。二十年過去後，已是湖南省總工會副主席的袁學之帶着他的兩個兒子高調回到安源，一是向老工人們拜年，二是以煤礦的革命歷史教育他的後代。《紅色的安源》在文中細緻地描述了袁學之 1958 年的回鄉之行。這位重返家鄉的幹部，讓自己的孩子們在工人俱樂部大樓前嚴肅地脫帽低頭，向革命烈士致哀。他解釋道：

這就是過去毛主席、劉少奇同志親自領導工人向資本家作鬥爭的指揮部。那時候，我也只有你們這麼大，我看見劉少奇同志親自站在這平台上給工人們講話。那時候工人的生活很苦，沒吃沒穿，還要挨打，我這個背上就捱過工頭的鞭子，好多同志為了大家過好日子自己犧牲了。現在毛主席領導我們翻了身，過幸福的日子，我們就不能忘記這些烈士。<sup>93</sup>

袁學之重返安源的這則故事被收錄進《紅色的安源》的諸個版本中，但是另一些故事則僅見於 1959 年的初版中。也許，刪減故事只是為了編排一本便於流通傳播的更精短、更易讀的書。然而，某些省略似乎是基於刻意的政治衡量。

被《紅色的安源》第二版棄而不用的文章之中，有一篇標題為「不是神話」的短文，或許是由於讚頌了李立三和蘇聯而被略去。故事發生在大躍進開始的時候，一天早上，一位叫做譚老太太的老婦聽孫子興奮地講了一個消息。這位老奶奶即是前一年在工人俱樂部重新開放的場合上展示她女婿沾有血漬襯衫的老婦人。孫子跑來告訴她一個消息，由於設立了人民公社，現在吃飯吃菜都不要錢。她的孫子為她讀了一篇新聞報導，證實他所言不虛後，譚老太太的思緒回到了大罷工時期。當時敵人以六百塊光洋懸賞李立三的腦袋，李立三於是藏在她家以躲避暗殺。她記得李立三跟她說，他所做的一切便是為了建立一個美好的世界，人人平等，有好的食物、衣服和住所，接受良好的教育。那時候，她取笑這位年輕的共產黨幹部是天真的幻想家，所想的是不可能在世上實現的事。但是李立三告訴她，事實上有一個國家已經將他的幻想變為現實，那就是蘇聯。這位老婦人回憶，在聽了李立三的解釋後，她每日向菩薩禱告，保佑李立三等同志免於災禍，讓他們可以完成他們的神聖使命。在李立三即將離開安源之前，他向老太太保證，一個更美好的世界正在形成，而且她很快就能看到。根據她的敘述，大躍進就是對李立三所作的預言的一種證明：「他講的，都在共產黨和毛主席領導之下一一地實現了。可不，現在人人平起平坐了，人人有事做，有飯吃，有衣穿，有書讀了。今天，吃飯吃菜不要錢，只管一心一意做事了，往後，我們的國家還要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哩！」<sup>94</sup>

到 1960 年《紅色的安源》修訂版本出版的時候，大躍進造成的毀滅性後果愈加明顯，演變為一場大災難。千禧主義式的願望被可怕的饑荒現實打破。李立三和蘇聯雖無須為這個大災害擔負罪責，但是他們已不再被視為適合群眾去敬仰的對象。相反，國家的宣傳部門正勤懇勞碌地掀起對一手釀成大躍進災難的領導者們的個人崇拜。

## 美化劉少奇的無產階級形象

安源工人向中國共產黨表達感激之情，而他們感恩行為的首要受惠者毛澤東主席和劉少奇副主席正積極地推行欠缺周詳考慮的政策，造成上千萬的老百姓在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大饑荒中餓死。<sup>95</sup> 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開始直至今日，重寫安源革命歷史的活動，反映出工人們溫和樸實的願景和最高層領導狂妄的雄心壯志之間存在脫節。儘管改動史實的部分責任應當歸咎於地方政府為貧困的家鄉爭取高層的關照而故意迎合中央權威，但是最高領導們卻也禁不住誘惑，通過重寫過往經歷而使自己擁有最燦爛的政治光環。

例如，獲悉他在 1923 年安源大罷工勝利周年紀念之際撰寫的三篇文章被湖南歷史資料刊物選定進行重新發表時，劉少奇副主席對文稿從頭到尾認真仔細地做了檢查，刪改了多處文字。1957 年 11 月，劉少奇在信中表揚了該刊的編輯同志，稱讚他們不辭辛苦尋找到他存量極少的文稿，並授權他們重新刊發這些刪去了某些「不重要細節」後與最初原稿不完全相同的文章。<sup>96</sup>

然而，如果將 1958 年的重印版本與最初的原文作細緻的比對，則會發現改動之處並非所謂的細枝末節。重印版的編者序誇大了劉少奇對安源革命試驗作出的貢獻。儘管事實上劉少奇一直到 1922 年 9 月中旬才開始參與影響深遠的共產主義教育工作，數天之後就爆發了共有一萬三千名工人參加的大罷工行動（見第二章），編者序中卻聲稱「1921 年冬中共湖南黨組織派毛澤東、劉少奇、李立三同志到安源發動和領導工人運動，主辦工人夜校，對工人進行教育。次年 9 月領導安源路礦舉行了近兩萬人的大罷工。」<sup>97</sup> 在毛澤東的階段性指導之下，本是李立三做了長達九個月充滿活

力、富有創新性的動員工作，為安源大罷工奠定了根基。在這次的歷史事實改動中，這一功勞不合實際地被劉少奇分享了。

比編輯的這些美言更為直露的是劉少奇原文一些關鍵部分的刪減。在1958年刊印的《對俱樂部過去的批評和將來的計劃》一文中，劉少奇原文中關於安源工人俱樂部領導個人的坦白評語消失不見了。在文章的1923年版本中，劉少奇稱讚李立三在工作中「辦事能力甚大，長於應付」，並委婉地批評他的這位前任不注重細節和程式。劉少奇對自己的評價更為嚴格，未作任何的自我表揚，而且還坦率地承認自己「過於謹慎」，「平時對工友之交際和談說，都表現一種不願意的懶散態度」，以及「到後來對俱樂部事務不十分負責，以致引起工友的誤會」。<sup>98</sup> 如此的坦承並不能有助於增添劉少奇作為無產階級領袖的形象魅力，因此未被收納入1958年版本。在這一後來的版本中，同樣消失的還有在劉少奇指導之下制定並頒佈的安源工人俱樂部規章中的一則條款。該條規定允許工頭參加俱樂部。在1958年重印版本中更顯著突出的是，劉少奇撰寫的《俱樂部組織概況》一文中關於蘇聯優越性的大量討論被刪掉了。1923年的原文承認安源工人俱樂部未能完全複製蘇聯的成例，他在文中號召「在未來的一年中，即催促俱樂部的組織更走近於它的母親——蘇維埃俄羅斯的組織」。<sup>99</sup> 三十五年之後，當中國在大躍進自給自足的旗幟下走自己的社會主義道路時，中共副主席顯然不宜將蘇聯公開吹捧為正確的效仿對象。

隨着大躍進的嚴重負面效應日漸顯著，毛澤東決意退出日常的經濟決策。1959年春劉少奇當選為國家主席，之後營造劉少奇革命領袖形象的行動愈演愈甚。儘管中蘇之間的裂痕日益加深，劉少奇並不排斥對內援用蘇聯的先例。事實上，他非常明確地表示過，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大有裨益。在1959年9月中央軍事委員會擴大會議上，他詳細地闡述了在中國為何需要對領袖進行個人崇拜：

所謂個人崇拜，在蘇共一九五六年二十次代表大會反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以後，那時候，在中國也有人要反個人崇拜。……我這個人，歷來是積極的提倡「個人崇拜」的……我在很長時期就搞這個事情。在「七大」以前，我就宣傳毛主席……現在我還要搞，還要搞林彪同志的、小平同志的「個人崇拜」。你們不贊成我搞，我也要搞的，我也不一定要人家同意的。我就是這麼搞的。我以後是不是還要搞別的同志的「個人崇拜」？也可能的。這完全不是

為了那一個人，更不是為了我個人……不把資產階級的威信和它的領袖的威信打下去，把無產階級的威信和它的領袖的威信提高，……無產階級就不能得到勝利……我們黨是由中央委員會領導的，中央委員會有政治局、書記處，政治局常委，有主席、副主席這麼一些同志來辦事。因此，沒有個人的威信，沒有若干個人的威信，黨的、無產階級的威信就不能建立起來。……斯大林的個人威信是很高的，他的個人威信中間，有一少部分不是那麼健康的。……而毛主席和黨中央則早就把這些不健康的東西否定了。<sup>100</sup>

不久，事情的發展便顯示出，以提高無產階級威望為名而要大家對之進行個人崇拜的那位「無產階級領袖」，正是劉少奇本人，而修訂安源勞工運動歷史為這種誇大粉飾的動作提供了諸多素材。

編纂《紅色的安源》一書的安源煤礦四人寫作小組，現在忙着編輯講述 1922 年大罷工的長篇敘事民歌，一直追溯至小莫斯科時期（見第三章）。儘管這個民歌現存於世的三個早期版本是 1925 年由三位不同的作者分別譜寫的，但各個版本均將李立三作為主角，劉少奇和朱少連二人為配角。彭永輝和他的寫作小組對歌詞做了根本改動，將劉少奇寫成運動的英雄。<sup>101</sup> 小學教材中「劉少奇一身是膽」的課文被長篇鋪陳擴展，成為這首民歌的中心部分。劉少奇以前的警衛員袁品高在這首民歌的早期版本中並沒有任何戲份，但現在是安源敬老院的負責人，同時也是宣講劉少奇在安源煤礦的革命事蹟的首要活躍分子。新訂版本增添了他的戲份，並稱讚他是一個勇敢聰明的策略家。<sup>102</sup>

注重於展示劉少奇在安源的英雄角色的一切做法，顯然激發了國家主席心生重遊他青年時代創功立業之地的願望。1960 年 5 月 20 日，萍鄉黨委收到一個令人振奮的大消息：正在湖南對大躍進經濟後果做全國性調研的劉少奇，打算順道路過安源。興奮的地方官員馬上行動起來，為劉少奇的專列可以暢通無阻地從長沙經萍鄉到達安源做出必要安排。劉少奇即將來訪的消息傳開後，整個煤礦小鎮一片歡騰熱鬧。小孩子和老工人們都被動員起來到安源火車站，準備舉行一個英雄歡迎儀式。但是等了一整天卻毫無劉少奇專列的蹤影，極度失望的群眾最終在傍晚時分被通知回家。萍鄉黨委書記李樹家回到家後不久便接到一個電話，解釋劉少奇因緊急事務被電召回長沙。因陡生波折而情緒低落，黨委書記當晚便休息了。然而，

幾個小時後，國家主席的專列正駛入萍鄉的消息將他驚醒。李樹家帶上幾個市級官員急忙趕到萍鄉火車站。第一個下車的是劉少奇夫人王光美。她簡略通知當地官員她的丈夫第二天要參加在杭州召開的政治局會議，無法在萍鄉過夜，更不能重訪安源。也許意識到這對他的政治吹捧者太過簡慢，劉少奇本人很快便親自出來會見失望的准東道主。當劉少奇得知前來迎接的官員中有萍鄉煤礦黨委書記時，他握着這位幹部的手請他向安源煤礦工人們轉達問候。劉少奇簡單地問了幾個關於當地經濟狀況的問題後，指示萍鄉黨委書記要「繼承安源革命傳統」，然後結束了會面。他指出安源的老工人為革命作出了很多犧牲，敦促當地部門要妥善安排他們的退休生活。停留了約半小時後，劉少奇的專列就開走了。<sup>103</sup>

當地官員、學者和普通居民為宣揚劉少奇的安源英雄形象不辭辛勞，故而國家主席路過而無暇訪問煤礦令他們沮喪就不難理解了。但這件事情並沒有讓當地人停下繼續出產在史實上問題百出的吹噓劉少奇革命功績的文本。1962年，萍鄉市黨委編纂了一部官方的「革命鬥爭史」，過度刻畫劉少奇在1922年大罷工中的角色。在謬誤百出的書中，由李立三構思的那句激動人心的罷工口號「從前是牛馬，現在要做人」這一功勞，全部被安放到劉少奇身上。<sup>104</sup>

美化劉少奇在安源的經歷，不僅限於文字資料的修訂；視覺藝術至少也發揮了同樣重要的作用。後來擔任北京中央美術學院副院長的美術家侯一民，在1961年創作了一幅名為《劉少奇與安源礦工》的巨型油畫，在天安門廣場剛開放的革命歷史博物館展出。侯一民的這幅紀念畫作是那時近十年期間各種工於算計和量身剪裁做法的又一產品。<sup>105</sup>據藝術史學家梁莊愛倫 (Ellen Laing) 記載，這幅畫在國家級博物館揭幕開放典禮上初次向世人展示時，引起了大家的「特別注意」。大家之所以對侯一民的畫作產生濃厚的興趣，不光是因為其巨大的尺寸，更是因為他用十分醒目的藝術手法來表現劉少奇的革命領袖身份：

在一篇報導中，這幅油畫的作者侯一民講述了他在創作這幅歷史題材油畫時遇到的難題：比如……如何在意識形態上正確地描繪領導人和群眾之間的相互關係的問題。在油畫的最初草稿中，劉少奇被置於油畫的一側，帶領着一群工人前往商議解決1922年煤礦工人大罷工的談判。在第二個版本中，藝術家在視覺效果上更突出劉



少奇，從前方看去，他被安排在油畫的中心位置上，他周圍三面圍繞着一群年輕礦工，一起正朝談判地點走去。<sup>106</sup>

此畫從歷史事實的角度來說並非是準確無誤的，因為沒有資料表明如油畫所描繪的那樣是劉少奇帶領着礦工們走出礦井。雖然如此，1961年6月29日革命歷史博物館正式向公眾開放時，這幅油畫被顯眼地陳列在博物館的一面牆壁上。根據六年之後一個紅衛兵的敘述，正是在鄧小平的堅持下，這幅表現劉少奇革命功績的巨幅油畫被安排在博物館揭幕展的中心位置上展出。<sup>107</sup> 無論是否是鄧小平本人對展覽的安排作出了指示，藝術史學家安雅蘭 (Julia Andrews) 作出的結論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這幅油畫在1961年之所以倍受矚目，是源於當時對黨史寬泛的詮釋更契合了劉鄧的看法，而不是毛澤東主義。」<sup>108</sup>

侯一民的這幅油畫，描繪劉少奇在一群礦工簇擁中邁步走出安源煤礦，令人不覺聯想起一幅在對斯大林個人崇拜中極其關鍵的視覺藝術作品。古斯塔夫·克魯西斯 (Gustav Klutsis) 在1931年創作了這幅非常著名的海報，描繪斯大林與一隊礦工共同前進的情景。社會學家維多利亞·邦耐爾 (Victoria Bonnell) 解釋說，這幅具有經典代表性的蘇聯海報「在朝着新的神聖中心前進的道路上刻下一個重大標記。斯大林與礦工們出現在一



圖 9

油畫《劉少奇與安源礦工》，作者侯一民，1961年繪。圖片由汪悅進 (Eugene Wang) 提供。

起，標示英雄的無產階級逐漸被斯大林個人取代的這個過程開始了。」<sup>109</sup>據邦耐爾的觀察，斯大林在蘇聯受到的崇拜敬仰含有一種類似於崇拜基督的宗教內涵。<sup>110</sup>

《劉少奇與安源礦工》這幅油畫屬於當時剛剛萌動的對劉少奇個人崇拜的一個組成部分。這一點在藝術家本人關於畫作的問世經過及其現實意義的討論中得到反映。侯一民著文講述了此畫的創作過程：

隨着反覆研究歷史材料，並到安源去生活了一個時期，我進行着對主題及人物的探索。……領袖的青年革命家的形象……勢將倒轉乾坤的怒潮，不時地出現在眼前，使我很少平靜。……應該在當時真實形象的基礎上，賦予理想的成分，使之與今天的觀眾心目中少奇同志的形象相吻合。……

二十三歲的青年革命家抱着對階級的赤膽忠心，為科學共產主義思想所武裝，知彼知己，掌握着鬥爭的戰略與策略，因而就比別的工人顯得格外明朗、從容、嚴肅而自然。從這一方面看，領袖和群眾又是有區別的。<sup>111</sup>

侯一民長久思索着如何去描畫礦工形象的問題，甚至以劉少奇在安源期間與他親近的幾個工人作為真人模特畫入畫中，但是此畫的最後定稿十分清楚地顯示，礦工是烘托畫布上中心焦點人物劉少奇同志的一個背景。

四十年之前，劉少奇費心盡力地試圖縮小他作為一個年輕城市知識分子和安源工人之間的鴻溝。但是在躍進災難的現時形勢下，作為國家主席的他急於樹立自己作為毛澤東接班人的資格，於是傾向於呈現一種更威風的氣勢。這幅油畫描繪了劉少奇作為無產階級領袖的英雄形象，而革命歷史博物館將此畫隆重展示在顯眼位置上，對於事情的進展發揮了重要的奠基作用。從 1962 年至 1965 年這段時間，是劉少奇政治地位躍升的高峰時期。在此期間，人民美術出版社將油畫《劉少奇與安源礦工》製成各種藝術形式向全國發行，數量龐大，有記錄顯示高達 172,077 份。<sup>112</sup>

儘管侯一民的經典畫作得到廣泛認可和欣賞，但這種熱度在表現劉少奇安源英雄形象的另一視覺作品大熱時便褪卻了。1962 年，電影《燎原》在全國各地上映。這部電影將劉少奇（在電影裡化身為主角「雷煥覺」）刻畫為安源勞工運動的唯一領導者。此片由上海天馬電影製片廠拍攝，向全國發行。曾經負責領導萍鄉煤礦的《紅色的安源》寫作小組的彭永輝為編

劇。電影在安源進行了實景拍攝，安源煤礦工人歌舞團以及江西劇團參與了演出。<sup>113</sup>

為上海電影攝製組提供歷史情況的最主要的一名當地人，是劉少奇以前的警衛員袁品高。他自然將 1922 年大罷工勝利的全部功勞都歸到自己的恩人身上，將本是毛澤東和李立三定下的口號和策略都歸功於劉少奇。電影攝製組的一名成員回憶：

特別是老礦工袁老倌子，據說他的經歷富有傳奇色彩，少奇同志幾次來安源都是他隨從左右，護衛少奇同志的安全。他身材瘦小，臉膛黝黑，引領着我們沿着革命先輩們在安源播撒革命火種的足跡，走遍安源礦區的角角落落。我們聆聽他描述少奇同志一到安源就脫下長衫一溜短打……詳細了解情況，縝密地制定鬥爭策略。說到罷工前夕少奇同志如何處驚不亂地對付工頭、監工的破壞搗亂時，他總是那樣神采飛揚。當然，這位袁老倌子講得最動情、最自豪的還是少奇同志代表萬名礦工到安源礦工事房談判時大無畏的精神，他用濃重的鄉音一字一頓地迸出在安源廣為流傳的「一身是膽」四個字。當時的十里礦區怨聲載道，礦工們要行動起來，已是一觸即發之勢。少奇同志因勢利導，以「哀而動人」的「從前是牛馬，現在要做人！」的能博得社會各界廣泛同情支持的口號，引導礦工向資本家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sup>114</sup>

這部電影嚴格依照袁品高對安源罷工的片面描述。開場一幕描繪作為劉少奇化身的年輕英俊的雷煥覺坐火車初訪安源的場景。雷煥覺在銀幕上第一次出場時是在武功山的秀麗景色中，他身著文人長衫，手持一把湖南油紙傘，明亮的陽光傾瀉在他的頭上。劉少奇被賦予救世主式的光環，這僅是這部電影諸多虛構元素中的一個。一些與史實不符之處，比如，將冷酷無情的煤礦業主錯誤地設定為日本人而不是中國資本家，可以視為事後的文學改編而不必深究。然而，其他一些對於歷史事實的改動則太過膽大妄為，招致凡是熟悉安源故事的人的注意。最值得一提的是，這部電影未曾為李立三或者毛澤東設計任何角色。儘管這部電影的名字《燎原》來源於毛澤東 1930 年 1 月所寫的一封信。在此信中，他引用了一句古老的中國諺語「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來預言「革命高潮」即將來臨。但是此片絲毫沒有提及毛澤東的貢獻。而每一個成就，包括工人學校的開辦、安源工人

俱樂部建成開放以及大罷工勝利等，都歸功於一人。<sup>115</sup> 劉少奇被表現為中國無產階級的唯一先知和唯一大救星。

這部電影的情節，大部分圍繞着作為劉少奇化身的工人夜校教師雷煥覺細緻耐心地發展和培養一名以武功高超聞名的熱血青年礦工的工作而展開。他說動這名赤熱心腸的青年參加他專門為工人開設的夜校。文質彬彬的雷老師規勸這名粗魯的礦工改掉自己好鬥的個性，加入工人俱樂部，參加非暴力的罷工活動。雖然劇中所虛構的名字是易猛子，這名武術高手的角色被廣泛認為是袁品高的化身。袁品高現在是安源工人運動紀念館的副館長，並且是劉少奇安源經歷的官方講解員。正如電影中劉少奇的角色將事實上本是李立三所做的開創性教育工作據為己有一樣，劉少奇的老部下袁品高竊取了本屬與劉少奇格格不入的安源工人糾察隊副隊長、衡山農民協會創始人謝懷德（謝猛子）的英勇無畏和兇猛好戰的美名。為免有人忽視雷煥覺和劉少奇之間以及易猛子和袁品高之間的象徵關係，紀念館館長、彭永輝的合著者朱子金發表了好幾篇文章，並到處巡迴演講，再三強調這部電影的政治寓意。就在幾年之前，朱子金根據劉少奇的建議安排袁品高返回安源工作。<sup>116</sup>

《燎原》的電影劇本其實並非單是袁品高出於私心片面講述的結果。在劇本最終定稿之前，寫作歷時長達四年，修改多達七次，文化部副部長夏衍親自主管這個項目。儘管在初稿中有二十一處提及毛澤東的領導作用，但在最終的定稿中涉及毛澤東的情節都被省略了。<sup>117</sup> 正如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一樣，這不單是一個自我誇大的行為，從更大的層面而言，這是通過拔高無產階級領袖形象來加強群眾對黨和國家的擁護的政治行動。歷史學家大衛·布蘭登伯格 (David Brandenberger) 指出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被當作一種政治動員機制，通過宣揚一個超凡偉岸的英雄形象，足以體現蘇聯試驗的威力、正當合法性和魅力」。<sup>118</sup> 根據布蘭登伯格的研究，在蘇聯，共產黨的思想理論家在 1929 年後轉向個人崇拜，將之作為鞏固國家權威的新手段，其原因是諸多傳統方式都未能有效地維持群眾的熱情。<sup>119</sup>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三十年之後，中國擺脫了蘇聯的強勢主導影響，轉而走自己的道路，當損失慘重而亟需團結群眾獲得支持時，中國的宣傳工作者從斯大林主義的劇本中抄襲了這一頁。

電影《燎原》標誌着這種宣傳工作的升級。電影的高潮部分集中在劉少奇為解決安源大罷工與資本家進行的談判上。正如大家熟悉的小學課文「劉少奇一身是膽」描繪的那樣，這部電影刻畫了一個毫不畏懼的劉少奇。儘管資本家向他施加了巨大的武力威脅，他仍然拒絕在工人提出的要求上作出任何妥協。劉少奇輕蔑地表示「槍是嚇不倒我的」，然後他為罷工工人贏得了完全的勝利。在電影末尾是他鏗鏘有力的話：「我們要做國家的主人，要做世界的主人。」

數年後，這部電影因吹捧劉少奇而遭到猛烈抨擊，編劇彭永輝便聲明主角雷煥覺實際上是劉少奇、毛澤東和李立三的一個綜合體，是為了突出戲劇效果才濃縮為一人。然而，當電影在1962年底公映時，恰逢劉少奇最著名的文章《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修訂版正高調展開發行活動，故而幾乎無人質疑雷煥覺的角色就是指劉少奇。在進入影院上映之前，這部電影先是在安源工人俱樂部大樓前面的操坪上首映，一連放映七個夜晚。蜂擁而至的觀眾紛紛感歎主演王尚信酷似青年劉少奇。而在俱樂部大廳的顯眼位置上，掛着一幅劉少奇身著文人長衫的圖畫。<sup>120</sup> 然而，這種關聯的存在不單只有安源人察覺，著名歷史學家顧頡剛在青島的療養院中休養時，在1964年10月3日的日記中記述：「看電影，燎原。燎原系寫江西安源煤礦工人與資方鬥爭事，領導之者則工人俱樂部主任劉先生也。此即指劉主席，備見勇敢機智。」<sup>121</sup>

在電影《燎原》首映式之後不久，無人可比的安源權威李立三的一篇影評發表在《人民日報》上。李立三的評論以維護毛澤東思想的重要性為基調。李立三指出，電影的名字來源於毛澤東著名的革命警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根據李立三的文章，安源發生的事件是「在偉大領袖毛澤東同志指導下的共產黨領導」這一中國革命普遍規律的一個例證。李立三接着講述了他經歷的安源往事，強調是毛澤東委派他去安源，並明確指示他運用合法的手段開辦工人學校，再建立黨支部。毛澤東確定了發動罷工的具體時間。同時，李立三指出，正是毛澤東的一封來信啟發他制定了罷工的口號：「從前是牛馬，現在要做人！」李立三承認毛澤東在即將發動罷工之際派劉少奇來安源，加強對罷工的領導，而且劉少奇確實做了重要的指導工作。李立三甚至首肯了影片高潮部分的情節。雷煥覺或者說是劉少奇英勇豪邁地面對敵人的武力威脅，最終談判成功，簽署了勝利的罷工協定，

劉少奇的勇敢得到準確的體現。但是李立三強調這部電影未能重點突出毛澤東思想在點燃安源的「燎原之火」中的無比重要性，因而會令電影觀眾產生疑惑為何「一些個人」（即劉少奇）的行動如此有成效。李立三強調安源的經驗為上海的歷史性事件五卅運動建立了一個模式。李立三再次將毛澤東的策略智慧付諸實踐，以建立工人學校開啟了群眾廣泛支持的大罷工運動的序曲。與安源的過程相似，李立三尖銳地指出，劉少奇在五卅運動爆發之後才抵達上海，工作任務是控制工會並對罷工進行指導。<sup>122</sup> 李立三的暗含之意，是指責劉少奇在勞工運動中姍姍來遲，所享受的功勞都要歸功於毛澤東的思想啟發和李立三辛苦的踐行工作這些前人奠定的基礎之上。

也許是為了應對李立三委婉含蓄的批評，劉少奇馬上啟動了自己的公開活動。1964年春天，劉少奇在安源的舊部下袁品高到北京參加五一勞動節慶典時，一連兩次被請到劉少奇的住所見面，暢談副主席的革命事蹟。袁品高是1922年大罷工的參與者，在小莫斯科時期是工人俱樂部的總代表，因而是證明劉少奇安源資歷的合適人選。他最近因作為電影《燎原》中脾氣火爆的武術高手易猛子這個角色的靈感來源而名氣大增，進一步增長了他作為國家主席擁戴者的可信度。

廣泛宣傳的此次二人重逢的地點，是在領導人居住的中南海大院裡。劉少奇在歡迎袁品高時，以他從前的這位警衛員好武的名聲為內容，開玩笑似地詢問：「你還有兩手嗎？」袁品高立刻敏捷地做了一個基本的武術動作，令副主席通常嚴肅的臉上露出了一絲微笑。二人上一次見面是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期。袁品高向劉少奇報告他的經歷，提到他去年大部分時間都是在湖南和湖北做演講活動。劉少奇問道：「誰要你去作的報告？」袁品高回答是劉少奇的一位老戰友，現在任職湖南省總工會的袁學之安排的巡迴演講。劉少奇評論道：「那很好。」劉少奇確認他的支持者勤勞地宣揚自己的安源事蹟。然後他將袁品高個人的進步經歷視為一己之功：「你入團、入黨和到廣州農講所都是我介紹的，你還記得嗎？」實際上袁品高是經李立三介紹入團和入黨的，但是他順從地回答道：「記得。」然後劉少奇回憶起他在安源工作時的情況，用他在煤礦的時候未發生流血事件來表明他的工作取得的勝利成果：「我們在領導罷工時，還沒有什麼損失，我離開那裡以後，犧牲了一些好同志，受到了損失。」<sup>123</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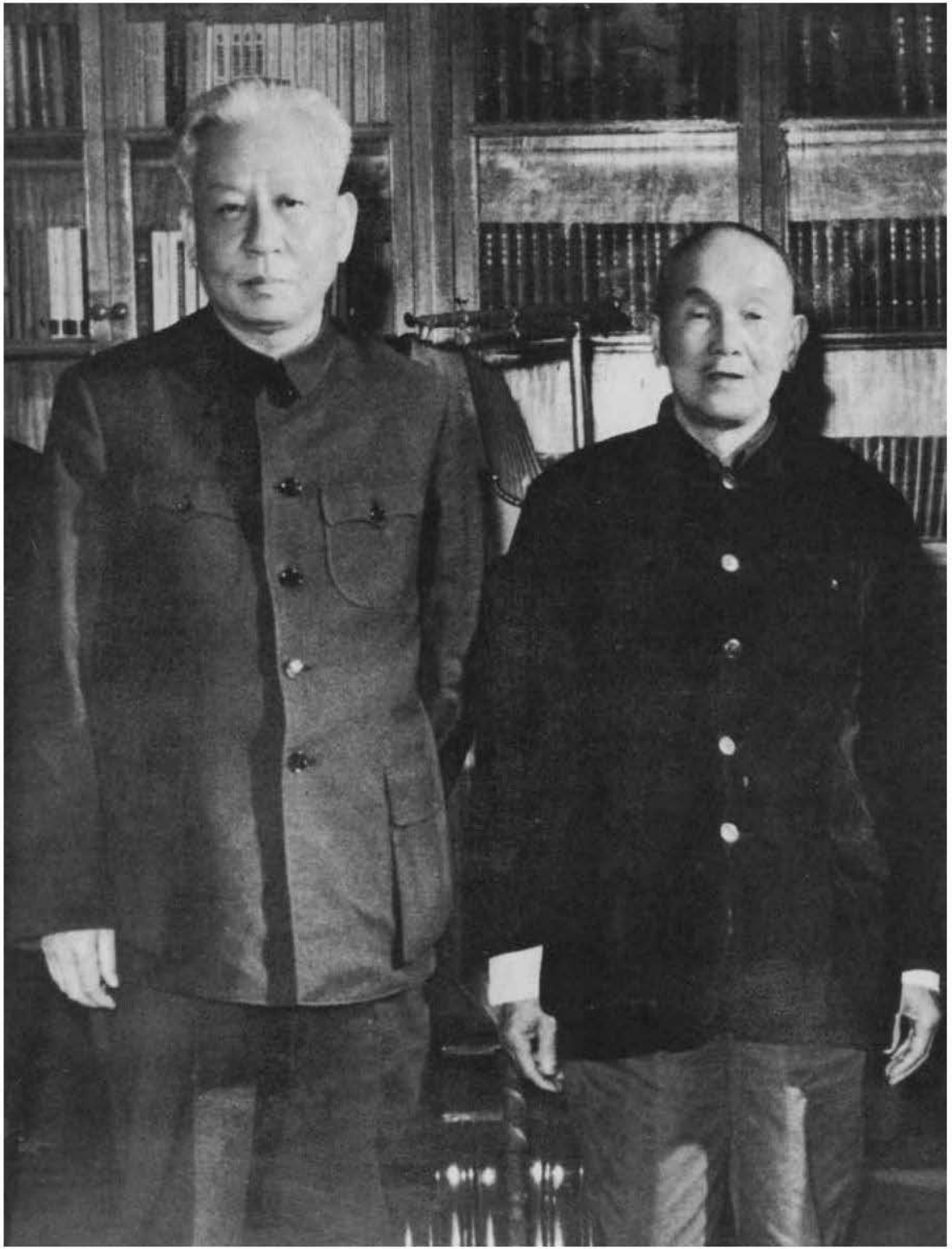


圖 10

1964年5月劉少奇（左）在北京的住所接見原安源警衛員袁品高。

在京期間，袁品高觀光遊覽了一些景點，並且看望了李立三。十天後，他又再次受到劉少奇接見。在後來公佈的談話記錄摘要中，劉少奇反覆強調安源罷工「取得勝利，沒有失敗」，並且在運動中湧現了許多幹部。雖然劉少奇承認他自己在罷工即將開始的前幾天才抵達安源，但是他表示，罷工取得勝利，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他巧妙地運用了當地精英階層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他回憶起當年掌握並利用煤礦的礦長和副礦長之間、副礦長和總經理之間、萍鄉的鄉紳人士之間、鄉紳和鎮守部隊之間的這些矛盾的往事。<sup>124</sup>

談話接近尾聲時，袁品高像之前的朱子金一樣，希望借這次會面為安源爭取一些物質好處。他懇請劉少奇為修復煤礦內的多處革命舊跡提供資助。然而，機敏謹慎的副主席再一次拒絕下撥中央經費：「修一修是可以。不要花錢多了。文物愈老愈好。你放心，我們死了以後，會有人修。修得更好。」然後劉少奇將談話轉到宏觀話題上。以前他在小莫斯科時期經常對蘇聯的優越性讚不絕口，與此相反，副主席在同袁品高話別時，認為中國革命比蘇聯革命成功，也對未來提出了警告：「中國革命成功了，全世界革命還沒有成功。蘇聯革命四十多年，出了赫魯曉夫修正主義。我們的後代能不能出修正主義，要依靠一條，依靠大多數人民群眾，才能夠不出修正主義。」<sup>125</sup> 劉少奇絲毫不知自己不久就會被批成是「中國的赫魯曉夫」，不可饒恕的修正主義罪行被一直往前追溯，連他在安源勞工運動中的領導不力之處都揪了出來。

## 教育下一代

儘管對於安源指望中央資助的要求，劉少奇的答覆不冷不熱，地方部門仍然繼續宣揚和傳播他的革命功績。袁品高從北京返回安源數月之後，萍鄉黨委批准建立一個功能齊全的博物館，叫做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紀念館，設在修繕之後的工人俱樂部大樓內。朱子金之父朱少連曾任工人俱樂部副主任，新建的紀念館由她擔任館長，而袁品高任副館長。在紀念館揭幕開放之時，一個比 1957 年春為紀念工人俱樂部成立三十五周年而設的展覽規模更大、政治更加自覺的安源勞工運動展覽也正式展出。而且，雖然承認有毛澤東和李立三參與，但展覽將劉少奇的功勞標記為安源革命歷



程的重要里程碑。1965年9月14日，新的博物館向公眾開放，精心佈置了從1921年到1930年期間安源勞工運動史的展覽。展覽分為六個部分。第一部分描述安源礦工遭受的苦難和他們自發的反抗鬥爭活動；第二部分重點講述安源黨組織和工人俱樂部的建立；第三部分講述安源大罷工的故事，突出劉少奇作為主要談判人的勇敢無畏；第四部分詳細說明在劉少奇領導小莫斯科時期，安源勞工運動「深入發展」的表現；第五部分探討安源勞工運動和農民運動的結合；第六部分描述安源工人參加秋收起義的事蹟，以及他們對於建立工農革命根據地所作的貢獻。<sup>126</sup>

除了在工人俱樂部大樓內展出這個由六部分組成的展覽外，十三個室外的安源「革命景點」也同時向公眾開放。確定哪些是屬於博物館級別的景點以及確切的位置所在並非一件易事。新紀念館的館長朱子金在大量採訪老工人的過程中發現，對比與劉少奇有關的場所，老工人們更樂於回憶與李立三有關的場所，而且記得更清楚。朱子金不願為此打擾國家主席本人，於是便寫信給李立三，說明現在的工作，並詢問他是否記得劉少奇到達安源時最初的居處。

尊敬的李立三同志：

為了對青年一代進行革命傳統教育，安源現已正式建立了路礦工人運動紀念館，修復了俱樂部、夜校等革命舊址。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的三位主要領導人中，毛主席和您在安源的住址早已恢復並陳列展出，唯獨劉少奇主席在安源的住址，雖經多方調查，迄今仍未落實，不知您是否記得劉主席當年在安源是住在什麼地方，敬請回信告之。

此致，敬禮！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紀念館館長

朱子金

雖然李立三的回信十分禮貌，但卻顯示出他十分精準地察覺到重建歷史之舉被政治化的實踐活動愈演愈烈，他本人不願捲入其中。

子金同志：

兩次來信都收到了。安源成立了紀念館，修復了俱樂部、夜校、毛主席住所等供人參觀，這很好，對青年一代是有教育意義的。少奇同志初到安源時住在什麼地方，我已經記不起來。

至於我，只是按照主席指示和工人群眾意見辦事的普通工作者，我的原來「住址」和「秘密工作所」的牌子，請不要懸掛，已經掛了的都請取下來，希望你向紀念館的同志說明，按此辦理。如果有不同意見，便請把我這封信送礦務局黨委一閱，並希望他們能同意我的意見，指示紀念館同志辦理。敬禮！並請向老工人們問好。

李立三

八月三十日〔1965年〕<sup>127</sup>

由於未意識到李立三在北京的失勢程度，安源紀念館的工作人員最初將李立三的顧慮解讀為是謙虛的表現。<sup>128</sup> 而且，由於所有的革命舊址已經被江西政府定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紀念館和煤礦黨委都無權取消標記。儘管如此，朱子金還是將李立三希望匿名的要求向上級轉達，很快便得到批准。<sup>129</sup>

理應享有開拓安源「革命傳統」最大功臣之名的共產黨領導幹部李立三不願意參與其中，無疑不只是一種謙虛姿態；李立三清楚地意識到比他位高權重之人正積極地聲稱本人與存有爭議的這段歷史之間存在深遠的淵源。從1964年到1965年期間，毛澤東和劉少奇就當前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召開了連番討論，中間屢次提到安源。在1964年12月20日的一次中央工作會議小型座談會中，毛澤東認為四清運動階段的做法過於繁縟，公開表達了不滿。他直率地批評：「有那麼多步驟，我就不贊成。」劉少奇的回答則提醒毛澤東本人四十年之前運用的謹慎工作方式，他以安源為例說明動員工作要有耐性和保持謹慎：「你安源開始聯繫小職員麼！……爭取多數，孤立少數，不要上當。」然而，對於毛澤東來說，安源象徵的是大膽行動而非謹慎行事。他指出，與歷史資料存在明顯出入的地方是，他之所以派劉少奇去安源是因為李立三不願意將他的罷工指示付諸實踐：「李立三同志老資格，到緊急關頭不幹了，才請我們國家主席去。」劉少奇並沒有給予糾正，反而將矛頭指向曾經一同共事過的同志：「不只李立三，蔣先雲也跑了。」眾所周知是李立三而非劉少奇主持了罷工勝利的慶祝盛會，對於這件麻煩的事情，劉少奇解釋，之所以讓李立三居於領導地位只是一個方便法門：「李立三認識他的人多，因為宣佈勝利是他宣佈的。」然後劉少奇重申他本人是一貫嚴格地強調謹慎和紀律：「同時我們活

動不准殺人，你如果殺人我們就停工。」毛澤東道：「那個礦一停，三天水就滿了。」<sup>130</sup>

兩周後，毛澤東對四清運動進展緩慢、按部就班的做法又一次表示失望，他再次以安源為例來說明，快速有效的革命動員方式比劉少奇提倡的紀律分明的工作組更為優越：「以前安源煤礦辦工會，安源工人我們一個都不認識……搞了三個月，罷工就罷起來了。」<sup>131</sup> 預示着國家主席未來命運凶多吉少的兆頭是，這次毛澤東並沒有提及安源取得勝利成果有劉少奇之功。受到毛澤東表彰的安源革命鬥爭「名副其實的」領導人不是劉少奇，而是逝世多年的鐵路工程技師朱少連：

真正的領導人、好人要在鬥爭中才能夠看出來……一個叫朱紹廉（朱少連）的有兩個老婆，他也要革命。因為工頭受壓迫，工資少，不夠用。這個人後來還不是英勇犧牲了。……你去發展，去搞群眾運動，去領導群眾鬥爭，在鬥爭中群眾要怎麼辦就怎麼辦麼，然後在鬥爭中造出自己的領袖來。……你後來建黨麼。現在進了城，當了官，就不會搞群眾運動了。……總之，要依靠群眾，不能依靠工作隊。<sup>132</sup>

儘管劉少奇已經準備響應主席號召快速行動的呼籲，他連聲附和道：「一個高潮一個高潮地來，不能拖延，拖延反而搞不徹底。」但是兩位最高領袖在該如何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做法上，存在着深刻的分歧，預示着在來年爆發的文化大革命中雙方最終將徹底破裂。劉少奇企圖從他在安源的革命經歷中確立英勇無畏的中國無產階級領袖形象，並樹立作為毛主席合法接班人的革命威望，卻最終反噬自身。

表明劉少奇從安源英雄行列中被剔除的另一跡象，是 1965 年樹碑立傳的電影《東方紅》的上映。這部電影以音樂歌舞表演的視覺盛宴展現一部中國革命史，是日後對毛澤東過度狂熱的個人崇拜的先聲。<sup>133</sup> 前一年在舞臺上的現場表演被拍攝成電影。幕布緩緩拉開時，唱響了對毛主席的讚歌：「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將毛澤東比作是東方升起的太陽，是宣明中國革命有且只有一位至高無上的領袖。毛澤東因此被認定是無產階級和農民階級的大救星。開場舞之後，繪有青年毛澤東頭像的一面旗幟主導整個舞臺，兩旁為繪有馬克思和列寧頭像的旗幟。這樣，表演轉向了勞工運動主題。《安源工人

俱樂部之歌》被選中來代表早期共產主義勞工運動。在安源煤礦佈景前，一群礦工手拿列有十三個條款的安源罷工協定，十分歡快地唱着這首俱樂部部歌。接着是神化毛主席的一組舞蹈，反映毛澤東作為中國無產階級領袖的合法地位。舞蹈中出現之人既非安源之歌的原創詞作者李立三，也非與安源工人俱樂部發展緊密相關的劉少奇。反而是一位鐵路工程員，形象上肖似已逝世的朱少連，領頭站在一隊跳舞的工人之前，歡快地揮動一盞信號燈。<sup>134</sup>

## 工作環境

宣稱代表無產階級利益的共產主義新政權的建立，當然絕非只是一些爭奇鬥豔的歌舞表演。共產黨統治最初的十五年，的確為安源工人帶來一定的實惠。廢除包工制和打擊秘密會社是宣傳最廣的內容，但是另外一些改善可能令普通工人更為感激。骯髒簡陋的棚屋原來到處搭建，為了改變這一情況，煤礦公司耗巨資為工人修建了新的住房。<sup>135</sup> 原來由工頭運營的食堂和澡堂，現在也由公司提供相當的資金翻新裝修。<sup>136</sup> 1953年煤礦公司轉為國有制，實施了優厚的退休金政策，規定工人們按照本人的工作資歷領取相當於原工資 60% 到 90% 不等的退休工資。<sup>137</sup> 與其他國有企業一樣，相當於公司全部工資開銷總數 3% 的一筆經費，用作工人的保險費用，為終身制的職工和家屬支付基本醫療費用。工人保險乃是李立三設計的。工會同時還為急需的工人提供貸款和補助，為在工業事故中傷亡工人的家屬提供撫恤金等服務。<sup>138</sup>

即使有多方面的改善，煤礦作業仍然高度危險。從 1950 年到 1965 年期間，萍鄉煤礦陸續發生瓦斯爆炸、塌方、水淹和其他工地災禍，導致 341 名工人死亡。在大躍進期間以及緊隨其後的一段時間，由於要求增加煤出產量的壓力空前巨大，死亡尤眾；從 1958 年到 1962 年間，共有 213 名工人在工業事故中喪生。由於職業性質引致的一些疾病也一直是嚴重的問題。1953 年，煤礦安裝了第一台 X 光設備，超過 70% 的工人都被檢測出黑肺病。儘管進一步改進了防護措施，這一可怕的患病數據在後來幾年有所下降，但礦工們的健康仍然是一個重大問題。<sup>139</sup>

雖然共產主義黨國體制對安源的「光榮革命傳統」有濃厚興趣，並宣明要改變工人階級所處的困境，但是顯然未能將這個晦暗的煤礦小鎮變成無產階級的烏托邦。<sup>140</sup> 然而，在安源工作被普遍認為是享有特權，尤其是那些與農村始終存在密切聯繫之人。一名原村民回憶起他被招工到安源當工人的那段經歷：

1956年礦上招臨時工，當時根本就沒有想過能夠當上工人，會有退休，更沒有吃勞保的念頭，反正是出來了有錢掙就可以了，做一天算一天，做一個月算一個月。……剛進礦主要是在井下拖料，由於那時候年輕，營養不良，拖不動，吃不消，拖哭過。後來堅持住就好了。……第一次穿上礦上發的藍色咔噠布工作服，戴上礦帽，穿上礦上發的皮鞋，感到無比的興奮。現在都記得當時的工作服上繡了「中國礦工」的紅色字樣。……礦上給你一個戶口就是，或者遷來，幹部就對我們說：你們現在是煤礦工人了，要好好幹，感謝毛主席。

……那時井上幹部的工資獎金比工人少，採煤工比工程師的工資高，工人由於幹群沒有區別，關係好，做事積極性高。偷懶的懶鬼要受到全班的批評教育。

我每次回家鄉都穿上礦上發的工作服，甚至戴上礦帽，穿上膠鞋，感覺挺自豪的。那個時候煤礦礦工是老大哥。1957年與愛人結婚，愛人當時才17歲。50年代初，煤礦工人的工作服一穿，大家很羨慕。……50-60年代，煤礦工人很好娶老婆，女人就是圖一頓飽飯……<sup>141</sup>

作為無產階級一員的自豪感，轉為對共產主義新秩序的擁護，而這種情緒並不光是局限於安源煤礦工人。斯蒂夫·史密斯觀察到，當時整個中國「與蘇聯相比，工人對毛澤東的忠心和對黨國體制所定的目標充滿熱情，似乎是普遍現象」。<sup>142</sup>

在毛澤東時期，勞動關係中有利可圖的實惠（以及強制性的約束）這一特點，部分解釋了為何政權明顯受到國有企業終身制職工的普遍支持。<sup>143</sup> 但是共產主義黨國體制同三十年前的小莫斯科時期一樣，並不滿足於這種胡蘿蔔加大棒的統治。文化表現的威力也為其所欣賞，並被積極地加以採用。

在新的社會秩序下形成的文化操控體系，反映了系統內不同層級諸多不同主體的多種意圖。就安源來說，當地居民和地方官員反覆多次試圖以

他們的革命遺產為資本，從中央政府爭取特殊關照和資助。從某種程度上說，他們的努力取得了成果。安源革命傳統被通過各種文化媒體形式廣泛地進行宣揚，從中透露出高層領導的積極性，為當地帶來了一定的實際利益，如鐵路線的重修、退休工人敬老院的修建等。1956年重新向公眾開放的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雖然被定為是展示共產黨領袖革命偉業的紀念館，而非增進工人福利的工會場所，但是所辦的展覽不僅為貧窮的煤礦小鎮吸引來有名的參觀者，還帶來可觀的旅遊收入。其他以安源歷史為主題的文化產品，如各種故事、戲劇、繪畫、電影等等，對於地方宣傳者和高層領導則是一種互惠互利。

然而，參與文化操控實踐的不同主體通常各懷動機，利益的分配也不均衡。當個別領導主動重寫歷史，不惜貶抑他人來提高自己的地位，這種差異尤為明顯。1959年，劉少奇當選為國家主席，表現他青年時代在安源的「英勇」事蹟的文字和圖畫湧現出一大批，開始帶有個人崇拜的成分。儘管這些活動與後來圍繞在中共主席身上的「安源光環」相形見绌，但是所有這一切表明存在着日漸加劇的混亂趨勢：中國的革命遺產正被任意伸縮扭曲，以迎合統治者的個人意圖和政治意圖。

歷史解讀上的異議，是對立衝突的關鍵所在，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達到了巔峰。羅伯特·傑·利夫頓 (Robert Jay Lifton) 在 1968 年文化大革命的高峰階段觀察到：「1962 年之後，尤其是自 1965 年（文化大革命正處於醞釀之中）開始，國家政權在努力重申過去所擁有的自信的歷史關係。黨的領導人之間的分裂與如何進行此事的形象有很大關係。」<sup>144</sup> 在中華帝國時期，實際上對歷史或者歷史研究作出權威定論是施展政治權力的核心工作。<sup>145</sup> 從更大的層面而言，如何正確解讀安源遺產的紛爭，是重塑歷史過程中的一部分。一個複雜的文化操控體系進行這項歷史的重塑活動，而學者、藝術家和政府官員在其中則扮演了顯著的重要角色。

對劉少奇的個人崇拜很多來自副主席與安源之間的歷史淵源。正如對斯大林同志的個人崇拜一樣，對劉少奇同志的個人崇拜利用劉少奇與礦工一起並肩作戰的英雄形象，以確立他宣稱的無產階級領袖地位。這樣便含蓄而委婉地將毛澤東降為農民階級的領導者，而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農民階級的先進性和革命性相對要少一些。毛澤東主義的擁護者對所有這些文化表現形式的武器一一給予反擊，精心地展開了對主席的個人崇拜。他

們不光將他塑造為安源勞工運動的真正大救星，同時聲稱他的功勞還在於運用安源的經驗成立湖南農民協會、發動秋收起義和組建紅軍。簡而言之，毛主席被宣稱為工農兵的最高領袖。

篡改歷史事實的這一趨勢在大躍進時期已經可見，在文化大革命時期變本加厲。這時，毛澤東同他昔日的同志——最著名的便是劉少奇——之間的分裂，被表達成暴力的階級鬥爭，捍衛的是無產階級革命真理，防止修正主義復辟的危險。在這場鬥爭中，遭到嚴重忽視的是以其名義來發動革命的那個群體的願望。這些人便是過去遭受壓迫、現在仍陷於困境的無產階級。當毛澤東最後的征戰開始時，小莫斯科時期的團結口號「工人萬歲」將被反覆高呼的另一個聲音「毛主席萬歲」淹沒。四十年之前，安源的革命工人驕傲地將曾經屬於皇帝專用、表示千秋萬代的敬語拿來自用，而現在這個專制的統治者在人民解放軍力量的協助下，將帝國合法性的外衣據為己有。





## 第六章

# 毛澤東最後的征戰：淨化革命傳統

1966年春天，毛澤東發動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sup>1</sup>這場新的群眾運動，通過讓青年一代體驗老一輩革命家在奪取政權的戰爭炮火歲月中歷經的艱辛苦難，來培養和塑造「革命接班人」，旨在發揚純正的無產階級文化，以防出現蘇維埃式的修正主義。數以百萬計來自全國各地的學生紅衛兵們如潮水一樣湧向毛澤東和戰友們曾經進行過革命鬥爭的地方，希望藉此激發他們自身的無產階級純真感情。作為中國共產主義勞工運動的搖籃，安源自然成為此次運動的焦點。在國家精心操控的批鬥中，中共副主席劉少奇被批判成是「中國的赫魯曉夫」。他被指控曾在安源期間犯下反革命罪行。安源這個煤礦小鎮受到影響，成為國家政治矛盾衝突的試金石。

如果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早期階段令人困惑不明，那麼文化大革命的開展則清楚地表明，這些外來者對安源的興趣並不以增強無產階級理想抱負為重，而更多是利用（以及誤用）其歷史從而服務於其他的政治目的。文化大革命雖然在表面上宣稱秉持無產階級目標，但是為安源工人帶來的實際收益卻甚少，除了安源此時在全國的名氣更為響亮，在國際上也增加了知名度。不過，矛盾的地方在於，安源居民把那個年代視為無上榮耀的時期，而這種認識深深地烙印在他們的集體意識之中。在那段時期，毛主席又強調中國工人階級總體的尊嚴和革命權威性，特別是以安源工人階級作為代表。許多安源人今天仍然公開表達對那段時期和運籌帷幄的偉大領袖的懷念，雖然那段年月如今受到官方否定，而安源人流露出懷念，無疑是對後毛澤東時代改革的某些方面表示不滿。但是，這也表明有效的文化操控對群眾記憶和思維具有強大的影響力。雖然文革期間形成的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在許多方面與之前對劉少奇的斯大林式崇拜相似，但是對毛澤東的崇拜之風的靈感來源更為深刻，也更多樣化。在今天的中國所見到

的對毛澤東的崇拜活動，儘管在形式上發生改變，但是也反映出文革儀式的延續影響。

文革狂熱展現出明顯的宗教特質。自命為道德正義化身的紅衛兵學生和解放軍士兵衝鋒陷陣，毛澤東領導的最後一次征戰，並非只是約略類似一場原教旨主義復興運動。如同歷史上其他「大覺醒」運動，這場運動由一位力圖淨化和保存其真正信仰的救世主領導，與驕傲自滿和異端邪說的雙重危險鬥爭。據李海燕 (Haiyan Lee) 分析，毛澤東是一位「如神一般的人物，他動員紅衛兵讓共產黨『重新無產階級化』，如同一個先知在千禧行動 (millenarian uprising) 中召喚世上的鹽 (譯者註：指基督徒) 重新施洗，以改換墮落的世界一樣。」<sup>2</sup> 歷次宗教復興運動在宗教改革熱潮高峰過去之後仍然彌久不衰，這場運動的影響力亦是如此。<sup>3</sup>

## 紅衛兵的造反運動

來自首都的紅衛兵代表將安源帶入文革的動盪之中。1966年10月，抵達萍鄉縣進行革命「串連」的第一個紅衛兵小分隊來自北京礦業學院，他們領頭掀起了「破舊立新」的運動。這些宣傳者的第一個行動是驅逐「假神」。紅衛兵們張貼了聲稱「劉少奇是工賊」的大字報之後，命令所有安源居民必須在二十四小時內清除所有與劉少奇有關的照片和圖畫。起初安源工人並不願意聽從這些稚齡外來者的指揮。許多當地人將劉少奇視為造福安源的人物而不願意反對他，他們聚集在工人俱樂部樓前與從北京來的學生狂熱分子理論。引得眾人感到好笑的是，有一位被激怒的老礦工指出紅衛兵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甚至還未出生，因此不可能對劉少奇在安源的活動有多少了解。他像打雷一般大聲吼道：「我們命令**你們**二十四小時之內滾出安源！」<sup>4</sup>

但與國內其他地方一樣，安源並不能長久逆全國潮流而行。安源的劉少奇支持者被噤聲，而從北方來的紅衛兵招募了本地一些心懷不滿的人，共同攻擊「修正主義」堡壘。在劉少奇已經被定為「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情況下，可想而知他們最初的行動目標為何對象。紅衛兵們聯合一些較年輕的煤礦工人，組成幾個造反組織。他們協力砸毀一尊劉少奇塑像，並在多個與劉少奇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活動有關的革命遺址處貼上

封條，包括安源工人俱樂部、1922年罷工談判場所的建築等等。這種攻勢迅速從歷史符號蔓延向當時的當權者。截至年底，學生紅衛兵和工人結合的造反派以追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由，殘酷地「炮打」和「火燒」煤礦公司的各級行政人員，導致煤礦公司的管理全面陷入癱瘓。<sup>5</sup>

1967年1月，上海市工人造反派推翻市黨委，即所謂的「一月風暴」。之後一群來自上海及中南部其他地方的紅衛兵突然降臨安源，企圖從當地當權者手中奪權。這第二波激進青年甚至比之前來自北京的群體更具破壞力。他們毀壞了安源工人俱樂部收集陳列的反映工人運動的許多物品，並炸毀劉少奇以前住在俱樂部時的房間。一名被如此肆意破壞公物的行徑震驚的老工人質問造反派：「劉少奇在中南海住過，你們為什麼不去炸中南海？劉少奇在人民大會堂接見過外賓，你們也去炸嗎？」<sup>6</sup>但是與之前一樣，全國範圍的潮流讓當地人束手無策。

儘管安源上演的這一幕紅衛兵奪權大戲和當時許多工廠企業單位中發生的情況並無二致，北京中央高層的決定很快就令煤礦處於特殊位置。雖然在公眾心目中劉少奇一人與安源的聯繫密不可分，但其實有多位中共領導人可以近乎合情合理地聲稱他們與安源的「光榮革命傳統」有關，於是安源勞工運動的歷史獲得人們不一般的政治興趣。對於力圖將當前的鬥爭與過往的背叛與成就相聯繫的中央領導來說，安源是一個豐富的礦藏。1966年11月19日和12月13日，毛澤東的妻子江青分別兩次會見了北京航空學院的學生，她在講話中引發大家對這些情況的注意。她提到：「安源煤礦是毛主席首先去的，一步一步走去的，碰到一個人就講一個人。走路，不要坐火車、輪船，運輸有困難。現在是無產階級的天下，鍛煉一下不要緊。我們過去能走，我想你們今天也能。」<sup>7</sup>江青之所以強調步行走路，顯然意在與因電影《燎原》而深入人心的劉少奇乘火車到達安源的形象相區別。她在話中着重宣揚毛澤東的辛苦跋涉，立刻激發了人們對這個煤礦小鎮的興趣。於是安源鎮成為革命朝聖的首選目的地。儘管被倡導步行去安源，紅衛兵們總的來說還是偏愛以革命「串連」的名義享受免費搭乘火車。他們的出行導致全國交通系統長達數月的擁擠阻塞。當時剛剛重又開通了自萍鄉出發的鐵路線路，增加了安源的交通便利，無疑是使得安源迅速成為文化大革命新長征朝聖路上一個重要節點的因素。<sup>8</sup>

安源被尊崇為毛澤東思想的正面典型，成為革命參觀和示範之地，但並不僅止於此。不管毛主席是走路還是坐火車去安源煤礦，他的確積極參與了早期的安源勞工運動。當然，劉少奇副主席也同樣如此。更重要的是，之前通過大量的文化產品，從兒童故事到戲劇、繪畫和電影，已經使公眾熟知劉少奇在安源的功績。這位國家領袖如今已被打倒，但是過去為增加他的名聲響亮程度而開展了各種各樣的宣傳活動，安源是宣傳中的重要部分，是以安源成為神化的毛澤東對抗邪惡的劉少奇的新宗教寓言的理想場所。<sup>9</sup>

對劉少奇在安源的所謂瘋狂行為的批判，帶有全國性的道德劇目的氣氛。中央批判劉少奇意欲獲得「中國無產階級大救星」名聲的行為，斥責他在安源別有用心地建立「異端派別」的總部。重新開放的安源工人俱樂部被嘲笑為劉家「祠堂」，而當地的追隨者也被叱責為在鼓吹對劉少奇的異端崇拜。「有的地方對他們（劉少奇及其部下）很崇拜，如安源專門掛劉少奇的像片而不掛毛主席的像。」<sup>10</sup>

由於安源在共和國最初的十七年裡被描述為叛黨的副主席的聖地，當「革命」力量試圖清除當地的「修正主義」遺產時，這個煤礦城鎮遭遇到嚴重的衝擊。清洗劉少奇在安源的巨大影響的運動，達到歇斯底里的程度，以至於連當地的樹木都無法倖免。1967年2月，多年來一直長在工人俱樂部入口處的兩棵茂盛的老梧桐樹被紅衛兵們砍倒了。他們聲稱這兩棵樹是劉少奇栽種的，其實不符事實。<sup>11</sup> 這一誤解可以追溯到劉少奇的前任保鏢袁品高。袁品高固執卻不符事實地認為這兩棵樹是劉少奇本人栽種的，甚至在樹根部位掛上銘牌，宣稱是他的恩人親手種植。多年來，袁品高一直在那裡講述劉少奇的革命功績，教誨安源的青年。對於梧桐樹來說不幸的是，在眾所周知的1964年劉少奇與袁品高在北京的會面中（參見第五章），劉少奇並未糾正這一錯誤說法。當袁品高告訴劉少奇，他在工人俱樂部入口處栽種的那兩棵樹已經長得高大茂密時，劉少奇並未更正這一說法，而是微笑並感歎：「啊！還在啊？」<sup>12</sup> 三年後，紅衛兵暴徒決心清除當時受批判的劉少奇的一切痕跡，挖掘出整個樹根，然後從樹根到樹枝都砍碎，澆上煤油燒成灰燼，淨化了這個場所。<sup>13</sup> 接下來從附近毛主席出生地韶山運來一批柏樹苗，舉行了一場莊嚴的儀式，將樹苗移栽到被連根拔除

的梧桐樹原來的位置上，意欲用「真正的」無產階級大救星的精神賦予安源神聖力量。<sup>14</sup>

同樹的遭遇一樣，凡是與劉少奇有某種關聯的人都遭受猛烈攻擊。鐵路工程技術師朱少連的女兒朱子金曾於 1957 年獲劉少奇接見，之後成為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紀念館館長，因此被打成劉少奇的「走狗」；而曾擔任過劉少奇保鏢的袁品高則被批為「大叛徒」。朱子金和袁品高被批鬥，多次被戴上紙糊高帽遊街，這種做法是紅衛兵從毛澤東於四十年前在當地紅色恐怖高峰時期撰寫的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學到的鬥爭節目。<sup>15</sup> 之後依照「小莫斯科」獨具特色的「化裝講演」這種表演形式，造反派們導演了一齣政治諷刺滑稽劇。劇中，袁品高被披掛上「資產階級的」西式服裝，被公開嘲笑為典型的「工人貴族」。他作為安源工人俱樂部的前任總代表享有補貼，原本是對其革命經歷的禮遇。然後這項津貼被停發。之後的三年，袁品高在附近一個煤礦被罰做繁重的勞動。<sup>16</sup> 由彭永輝領導的煤礦四人寫作小組，曾負責編寫礦廠史《紅色的安源》以及電影《燎原》的劇本，則被嘲笑為「四家村」，這個名字的靈感來自於臭名昭彰的「三家村」。北京主管宣傳的幾位黨的高級幹部寫的批評文章，被指責成是在影射毛主席，而被批成「三家村」。<sup>17</sup> 彭永輝同樣也遭到公開批鬥侮辱。<sup>18</sup>

## 武裝鬥爭

安源因為特殊的歷史背景而動盪不寧，其實是文革初期擾亂江西大部分地區的政治鬥爭的縮影。當時江西最高黨政領導楊尚奎和方志純因被指控追隨劉少奇修正主義路線而雙雙被免職。以江西軍區司令員為首的一派仍然忠於前任省領導班子，和當地多個造反聯盟組織連續發生多次械鬥，傷亡數以千計。<sup>19</sup>

省會南昌市發生的這種政治混鬥也同樣發生在下面的行政地區，混亂程度更為嚴重。1967 年初，安源的造反組織分裂為兩個敵對派系：萍鄉礦務局革命造反派聯合司令部和萍鄉礦務局無產階級革命派總司令部。兩派相互指責對方是劉少奇的隱密支持者，然後爆發激烈武鬥，生產陷入停頓。為恢復秩序，解放軍部隊奉命接管煤礦。<sup>20</sup> 但是軍事佔領並不能制止流血衝突。在數月的時間中，武鬥事件在萍鄉各地造成大量傷亡。由於武

鬥不斷，縣、市和周邊郊區農村的學校、火車站等多個公共建築在混亂中被焚為廢墟。<sup>21</sup>

萍鄉的暴力事件如此嚴重，引致高層關注。7月28日周恩來總理在接見江西代表時過問此事。總理一開始試圖將肆虐該地的暴力活動歸咎於一些在混亂中被允許進入萍鄉市區的農民。他提出周邊農村的農民要為燒毀市政大樓和毀壞萍鄉火車站的列車承擔責任。但是目擊者堅稱縱火和血腥殘殺的肇事者不是他們的農村鄰居，而是軍隊人員。他們講述了一件令人髮指的軍隊暴行，令周恩來大為震驚。「安源老工人以無比沉痛的心情向總理憤怒控訴宜春軍分區和萍鄉武裝部一小撮人策劃火燒萍鄉煤校的滔天罪行。」盛怒之下，周恩來命令萍鄉市武裝部張錦才到前面來聽。「老工人繼續控訴。說到紅衛兵小將被活活燒死時，淚涕俱下，全場無聲……」周恩來痛斥了軍區、軍分區和武裝部的惡行。<sup>22</sup>萍鄉以往經歷過多番白色和紅色恐怖，都還未有過如此殘忍暴虐的暴行。

但是中央領導層非但未立即制止這種敵對衝突，反而有意使得敵意更為加劇。幾天後，周總理再次會見江西代表時提及劉少奇與安源之間的關係。他的評論為進一步的報復提供了材料：

我給你們供給一個材料，劉少奇近二年一直在主席跟前吹噓他在安源的歷史，主席不吭聲，叫他暴露，主席就是容量大。其實，主席一直在領導安源鬥爭的。萍鄉的煤、大冶的鐵、漢冶萍公司，當時安源運動是湖南省委去領導的，主席全部歷史都清楚。主席說，劉少奇是第三代，李立三是第二代，第一代是什麼人？……

劉少奇總是吹噓，跟我說過幾次，（對姚文元）跟你也談過幾次吧。所以我覺得有問題。中國科學院革命歷史研究所從二十年代入手批判是有道理的。劉少奇跑到蘇聯去不到一年，回來就到安源搞了一下。二十年代還不僅是安源，還有上海，還有廣東，一九二五年在長沙被捕。廣東省港大罷工他也插了手，其他的我就不講了。（姚文元同志插話：這就是他撈的政治資本，這點要揭露。）我聽到不下五次，很奇怪，以為有什麼名堂，總是程咬金那麼三斧頭，當時還不會想到八月以後的情況。批判劉的根子要從二十年代搞起。真正批判劉的話，二十年代很多可批。<sup>23</sup>

受這番指控影響，萍鄉相互敵對的各個派別紛紛盡量與名聲受辱的劉少奇劃清界限。各派之間的械鬥更加激烈。8月8日發生了一場大規模的

武力衝突，他們非法闖入萍鄉市軍火庫竊取上百槍支。火拼造成 5 人死亡，51 人重傷。幾天後，一場更嚴重的衝突事件導致逾 12 人死亡。<sup>24</sup> 截至月底，萍鄉的武裝鬥爭已導致逾 25 人死亡，傷者更不計其數。<sup>25</sup>

## 批評「修正主義」文化

批判劉少奇的運動不單針對盡攬安源功業的劉少奇本人，也指向宣揚劉少奇形象的其他人等。宣傳部和文化部內擁戴劉少奇的支持者們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期間運用文化操控手段生產了多種作品，現在成為反革命「修正主義」的罪證。第一批目標包括火熱流行的電影《燎原》。1967 年 5 月 20 日，中共理論刊物《紅旗》發表一篇題為〈反動電影《燎原》與中國的赫魯曉夫〉的文章。文章開門見山地指出：

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為了達到他篡黨、篡國的罪惡目的，也把他的魔爪伸進了意識形態方面，伸進了文藝領域。他不顧毛主席的警告，夥同周揚、夏衍、陳荒煤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在八屆十中全會不久，就拋出了反動電影《燎原》。這部電影是他搞反革命復辟製造輿論的一個罪證。<sup>26</sup>

與影片相關而受攻擊的顯赫政治人物並不止劉少奇一人。《紅旗》發表的這篇文章同時也把另一位前安源革命先鋒李立三牽扯進來，因為他曾經認定電影主角代表着劉少奇：「老機會主義者李立三連續發表文章，公開聲明，『雷煥覺』（作者註：電影中的主角）就是某某人。這個某某人，從來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而是一個十足的老機會主義者、修正主義者。」<sup>27</sup> 文章暗含之意乃是李立三和劉少奇合謀，將屬於安源真正英雄應得的名聲據為己有。

文章將李立三與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批鬥對象劉少奇聯繫在一起，李立三覺察到危險，試圖為自己辯護。《紅旗》雜誌的批評文章發表次日，李立三寫信給周恩來，以生病為由請求總理出面干預，延緩即將到來的針對他的一場紅衛兵批鬥會。周恩來並未答覆，一連串殘酷的批鬥會接踵而至。儘管被反覆要求交代自己是「蘇修特務」，李立三堅決不接受這項罪名。5 月 31 日，當被要求交代自己的歷史問題時李立三寫道：「事實會證明，我不是老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sup>28</sup>

幾天後，經過連番的紅衛兵批鬥攻擊，李立三忍耐不住，給江青寫了一封長信，解釋 1963 年他在《人民日報》上對電影《燎原》的評論的寫作原委。李立三指出，與《紅旗》最近刊登的那篇文章提到的情況相反，他認定電影主角為劉少奇並非是為了讚揚劉少奇。另外，他堅持他與電影的製作也毫無關係，大概是在 1960 年夏天他才第一次看到劇本樣稿，當時的名字還是《安源大罷工》。當時安源煤礦黨委書記拜訪了李立三，徵詢他的意見。雖然李立三不能完全準確地回憶當時所談的內容，但認為他當時的意見與三年後電影上映之初他發表在報紙上的影評內容相同。根據李立三的回憶，電影公映之前，《北京日報》的記者們舉辦了一個私人放映會，他受邀參加並被徵詢意見。他向江青強調，他當時作的結論是電影有「嚴重的缺點和錯誤」，特別是毛主席在安源大罷工中的「偉大領導作用」在電影中竟沒有一點反映。所以他立即寫了一篇批判性的影評，但文章在《北京日報》登出時，許多批評的段落遭到刪減。由於不滿報社擅改原文，李立三又將影評投給《人民日報》。但是《人民日報》刊登了一個經過審查之後的版本，將他批判電影忽略毛主席領導地位如此嚴重錯誤的一個關鍵文句的語氣大為軟化。在寫給江青的信中，李立三強調「這種修改，不僅與我的原意完全不同，而且特別嚴重的是欺騙觀眾和讀者，吹奉（捧）這棵大毒草《燎原》影片。」李立三承認，撰寫影評時他並未充分認識到「毛澤東思想領導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偉大作用」，但強調他已經開始懷疑劉少奇企圖用影片突出自己，並抹殺主席的貢獻。李立三解釋說，他在影評中提出影片需要更強調毛澤東思想的領導作用，以使觀眾明白為什麼「某某人」（作者註：指劉少奇）能在安源取得如此成就。<sup>29</sup>

江青並未有答覆。殘酷的紅衛兵批鬥會一直持續不斷，未有減緩。文革的領導層放任一批又一批充滿敵意的工人和學生群體將李立三拉出來批鬥。那段時間，李立三難以安慰自己，除了得知自己在安源人的記憶中仍然是一個無產階級英雄：

人們從四面八方趕來質問李立三，有單位的也有學校的，要「調查」他過去做黨的工作中的所作所為……他唯一的慰藉為來自安源的一個拜訪者。那個人跋涉一千五百哩來認識這個礦工們仍然時常談論的人。他是一位中年教師，和李立三交談了兩個小時。他告訴李立三礦工們仍然為他由衷感到自豪，而且老一輩人永遠會記得他。<sup>30</sup>



雖然安源人民內心對他的真誠仰慕帶給李立三一些撫慰，但這並不能保護他免受逐漸升級的政治風暴衝擊。他的問題不光是參與了吹捧劉少奇為安源罷工最高領導的合謀，雖然這是無中生有的指控。另外，由於李立三曾在蘇聯生活過十五年，在莫斯科認識並與一名俄羅斯女性結婚，於是很容易被指控倒向蘇聯修正主義。紅衛兵將他的愛國心斥為「裡通外國」，使李立三痛苦不堪。事實上他的妻子李莎剛剛獲得中國國籍，他們的兩個女兒也在北京生活。6月22日，一場大規模批鬥會原定於當天下午舉行，李立三就在批鬥會之前數小時死去，留下一封遺書：

最最敬愛的毛主席：

我現在走上了自殺叛黨的道路，沒有任何辦法來辯護自己的罪行。只有一點，就是我和我的全家絕沒有做過任何裡通外國的罪行。只有這一點，請求中央切實調查和審查，並作出實事求是的結論。

我還有寫給你的信，放在家裡床單下。沒有寫完的，請要（派）人找出送你審閱。

致文化大革命的敬禮！

李立三<sup>31</sup>

李立三長期以來每晚固定服食安眠藥，他是否確實是服用過量安眠藥而自殺成為一個謎。<sup>32</sup> 但可以肯定的是，6月22日他在悲慘的境況下死去，背負着他至死不認的反革命修正主義的罪名。

與此同時，在主要的大報上刊登了一連串高調的文章，針對安源另一個「叛徒和工賊」劉少奇進行尖銳的批判。從1967年春天到1968年夏天，《人民日報》、《解放日報》和《文匯報》以鋪天蓋地的報導，詳細具體地控訴劉少奇壓制安源勞工運動以及冒領全部功勞的行徑。<sup>33</sup> 電影《燎原》的所有相關人員，包括編劇、演員、導演、攝影師等，皆一一被抄家和公開批鬥。<sup>34</sup> 前文化部副部長夏衍是批准該片的負責人，也是審定電影劇本最終版的關鍵人物，他在1968年4月4日的日記中記述：「今日《人民日報》四版全版批《燎原》。這件事，儘管有種種客觀理由，我還是要負很大責任。當時，的確是想把這部片子拍好，為劉少奇增光。」<sup>35</sup> 《燎原》作為編造劉少奇革命資歷的突出典型受到特別嚴厲的批判，但是它並非是那些文化操控下的產品中遭受如此命運的唯一一部。

著名的廠礦史《紅色的安源》一書被痛批為反革命作品，禁止傳播。1967年4月30日，負責出版此書的工作人員，從江西省宣傳部副部長到安源黨史研究員，戴上大書劉少奇「忠實走狗」的高帽遊街示眾。<sup>36</sup>《紅色的安源》編委之一的黃振輝無法忍受對自己的批判，寫了一張大字報，表達對曾參與編撰此廠礦史的悔意。他表白自己堅定地支持毛主席的文革路線，並中傷劉少奇最無可非議的自律品質。雖然大約四十五年前在安源遇到劉少奇時，黃振輝年僅十七八歲，他現在卻繪聲繪色地描繪他當時「目擊」劉少奇大吃大喝、賭博、嫖娼等胡作非為的劣跡行為。<sup>37</sup>

此時，原先風行流傳的劉少奇畫像也成為批判對象。侯一民創作的劉少奇領導安源罷工工人的油畫，以前廣泛印刷傳播，現在則被認為是「劉少奇在文藝領域試圖改變黨的歷史的早期證據」，並被貼上「毒草」的標籤。<sup>38</sup> 這位藝術家被紅衛兵縛綁雙手吊起來毒打。<sup>39</sup> 侯一民的畫作《劉少奇與安源礦工》草草地被挪出了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而博物館開始籌備新的「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亮安源工人革命運動」的大型展覽。

## 展示「無產階級」文化

1967年秋天在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舉辦的這個新展覽，由人民大學研究黨史的年輕講師張培森籌劃。張培森對中國共產黨早期工人運動做了深入的研究。他幾年前對李立三進行過長時間的訪談，這位剛展露頭角的歷史學者確信劉少奇卑鄙地編造了他在安源的經歷。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張培森就意識到他正在研究的安源課題將不光引起學術圈的興趣。<sup>40</sup> 安雅蘭解釋，張培森等人組織的這個展覽，「通過讓毛澤東取代劉少奇成為1922年煤礦工人大罷工這一重要事件的主要組織者，從而重新定義中國革命歷史的肖像表現法」。<sup>41</sup> 中共理論家戚本禹在展覽正式開放之前發表了講話，特別強調安源在領導層鬥爭中的重要性：「劉少奇從安源煤礦一直是與毛主席唱對臺戲，我們的批判……要從安源煤礦以來各個領域都要批判。」<sup>42</sup>

張培森策劃的安源展覽是刻意進行文化操控的結果，而展覽意圖貶斥的那個「對臺戲」亦是同類產物。雖然展覽表面上只是北京和江西的造反派組織聯合籌辦的一個基層會展，但實際上背後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組以及

其他高層領導——特別是周恩來總理——的重要支持。1967年7月，周總理接見江西代表團談論省內導致多人死亡的血腥派系武鬥時，一位安源代表——即講述解放軍暴行而使總理震驚的那位老工人——成功爭取到總理表示支持展覽。<sup>43</sup> 他們借助高層的支持，在革命歷史博物館的主展廳佈置了一個包含六個部分的大型展覽。安源工人俱樂部的陳列品中那些在造反派打倒劉少奇「祠堂」的運動中倖免於難的物件被運到北京，陳列在新的反劉展覽中。此外，周恩來親自下撥經費，派多名黨史學家組隊奔赴安源考察。他們收集的資料也被納入展覽。另外，經周恩來批准，展覽還展出了相關的中共中央檔案。<sup>44</sup> 雖然這個展覽主要承擔政治任務，而非美學功能，但藝術作品也是展覽的有機組成部分。著名版畫家楊先讓創作了描繪1922年大罷工系列事件的一組木版畫。後來成為中國著名藝術家的國畫家和書法家范曾被安排繪製一套漫畫來嘲諷劉少奇在安源的所作所為，其中有一幅漫畫描繪劉少奇與當地秘密會社頭子飲血酒結盟的情景。此畫與史實並不相符，事實上舉行儀式的真正主角李立三被作者換掉了。<sup>45</sup> 他們特意準備了表現毛主席多次造訪安源的一系列繪畫作品，掛滿了革命歷史博物館寬敞的牆壁。<sup>46</sup>

在這些反映毛主席連續到訪安源的繪畫中，劉春華創作的油畫《毛主席去安源》因簡約而恢弘的氣韻格外出眾。這幅高2.2米、寬1.8米的巨幅油畫描繪的是毛主席1921年秋天首次到訪煤礦的情景，表現了一個鼓舞人心的年輕革命者形象。畫面中，毛澤東獨自矗立在景色優美的武功山頂，身形高大偉岸，穿着長衫，手持一把簡樸的湖南油紙傘。他的形象被刻畫得極富浪漫色彩，甚至具有宗教氣息。正如安雅蘭所言，這幅畫「明顯含有奉獻精神的感召力」。<sup>47</sup> 文革後，在與藝術史學家訪談中，劉春華透露這幅畫是他創作的第一幅油畫，此畫的創作靈感一部分來自於拉斐爾(Raphael)的宗教畫。<sup>48</sup>

四十年後，劉春華對他的畫作的政治出發點作出陳述：

1967年，也就是文革的第二年，我繪製了此畫。當時的政治氛圍基本上受批判劉少奇的運動的影響。許多人都知道過去劉少奇曾經在安源領導過工人罷工。但首都高校的一批年輕教師和學生對(中共)黨史做過深入的調查，對這一時期有更全面的理解。他們認為安源工人運動的真正領導者是毛主席，而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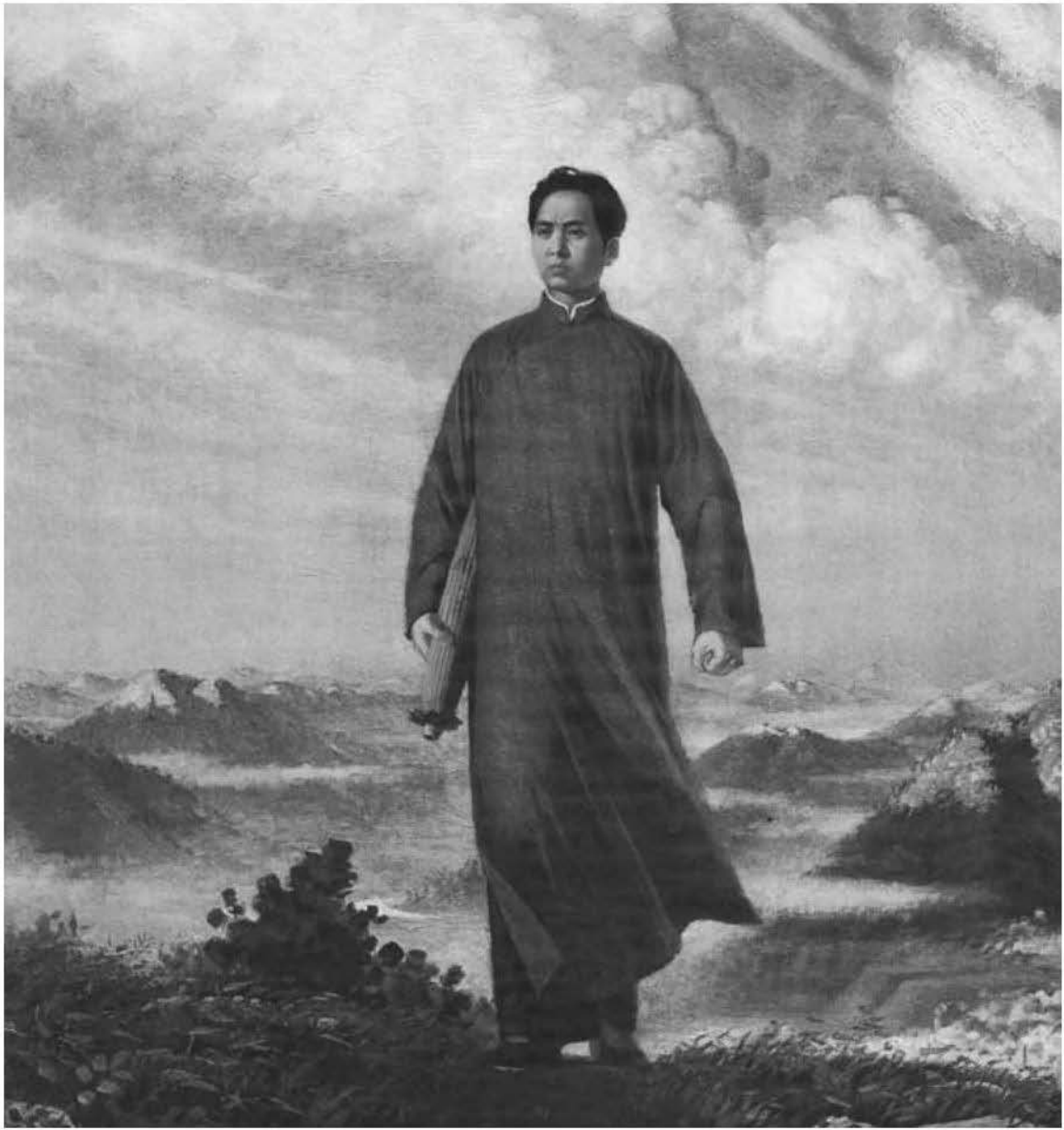


圖 11

油畫《毛主席去安源》，作者劉春華，1967 年繪。

部分的報導只提劉少奇。這一部分人感到毛主席在安源革命運動中（的作用）應該被積極地描繪與宣傳，並最終達到批判劉少奇的目的。他們計劃組織一個（題目為）「毛澤東思想照亮安源工人運動」的展覽。由於所有組織者都是紅衛兵，那顯然是一次非官方的展覽。張培森是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的一位教授，帶領一群學生負責此次展覽的準備工作，同時從北京的許多藝術院校招納了不少高水準的畫家。他們到中央美術學院找人時，找到了我。<sup>49</sup>

鑒於此畫在攻擊劉少奇的運動中的地位，值得大家留意的是，劉春華的油畫對毛澤東的刻畫與電影《燎原》對劉少奇的描繪竟極其相似。影片中主角以雷煥覺為名，他到達安源之時身著長衫，手持湖南油紙傘，陽光在他的頭頂照耀着。唯一的差別是，毛澤東徒步穿越山區，而非搭乘火車抵達，正如江青在對紅衛兵的講話中指出的那樣。油畫作者當時是一名年僅二十四歲的美術系紅衛兵學生，在動筆創作這幅針鋒相對、鼓吹個人崇拜的肖像畫之前，幾乎肯定看過那部與劉少奇有關的紅極一時的電影。無論如何，江青從第一眼看到此畫的一張照片開始，便捕捉到將劉春華的油畫作為開展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中心支柱的可能性。她要求將油畫在中南海進行一次特別的展出，並在活動結束之後發言總結，表示這是一個值得褒獎和效仿的典範。在建黨節的前一天，江青宣佈：

明天是黨的生日。我們考慮兩個獻禮作品：一個是油畫《毛主席去安源》，一個是鋼琴伴唱《紅燈記》。……《毛主席去安源》這幅畫思想水平相當高，藝術水平也不錯……我們這兩個創作對全國也是一個推動。<sup>50</sup>

第二天，即1968年7月1日，《人民日報》、《解放軍日報》和《紅旗》等主要報紙雜誌都刊登了這幅油畫的大幅彩照。油畫作為一種西方藝術，極易被批判成「資本主義文化」的表現形式，但是由於江青對此畫大加讚賞，在這個方面也不成問題了。上海《文匯報》發表了一篇社論，強調《毛主席去安源》得到「江青同志親自關懷和培育」，作為「洋為中用」的樣板，說明了運用這一外國藝術形式的正當性。<sup>51</sup> 由於江青的高度讚譽，劉春華的這幅毛主席畫像被尊為完美藝術的象徵，極受景仰，並且這幅畫使觀賞者油然而生類似於宗教皈依的情感體驗。一位年輕的藝術家後來回憶：「當江青將《毛主席去安源》讚美為『革命傑作』時，我們將這張畫的印製品掛在牆上，並輪流評述它體現的『深刻的思想性』和『完美的藝術性』。有些人聲音顫抖了，另一些人眼中噙着淚水。」<sup>52</sup> 按照要求，大家觀賞這幅油畫時要激發出宗教信仰式的反應。當時的報紙社論十分清楚明確地反映了如此的情況。例如，《光明日報》將劉春華的繪畫比作是「一首毛主席革命路線戰勝中國赫魯曉夫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讚歌」。<sup>53</sup> 《解放軍日報》總結了此畫蘊含的重要意義：「從此，安源路礦工人找到了救星，中國工人階級有了自己的領袖，千萬勞苦大眾見到了紅太陽。」<sup>54</sup> 這幅具有代表性

的畫像被大量印製，很快就呈現在海報、毛主席像章、香煙盒、瓷盤、花瓶、刺繡品等各種媒介形式上。文革期間最常見的郵票是票面八分的《毛主席去安源》畫像，發行達五千萬枚之多。為了避免褻瀆郵票上的神聖畫像，這是唯一不得在上面蓋郵戳的郵票。<sup>55</sup>

1968年，全國各地的工廠和公社在迎接屬於他們的劉春華畫作複製品到來時，都要組織熱鬧的慶典儀式。這幅畫被稱為是歷史上被複製最多次數的作品，總共發行量高達九億份。<sup>56</sup>在文革時期，這幅畫的一份複製品成為周恩來總理私人居所陳列的唯一藝術品。江青和林彪經常佩戴這幅安源畫像的毛主席像章。1968年10月1日，作為國慶慶典的一部分，一輛遊行花車載着這幅畫的巨型複製品經過天安門觀禮臺。在觀禮臺上毛主席和其他黨的高級領導幹部向人群揮手示意。<sup>57</sup>劉春華這幅畫的魅力跨越了中國國界。青年毛澤東到達安源的畫像是如此氣勢宏偉，以至於一位義大利藝術家仿摹此畫繪製了一幅作品，配以「年輕中國傳教士」的文字說明，懸掛在羅馬梵蒂岡禮堂長達幾個月之久，直到發現原畫的真正出處，這幅受庇佑的毛主席畫像才被匆忙移除！<sup>58</sup>

雖然文化操控比以前更加精心策劃、更為強烈，也更鼓舞人心，這種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在許多方面還是熟悉的。它與過去樹立劉少奇的安源形象的活動之間驚人相似。同侯一民在着手繪畫劉少奇同志的作品之前的做法一樣，劉春華在動筆畫毛主席之前也踏上了典型的安源朝聖之路，與那些老工人作了訪談。同侯一民一樣，劉春華後來描述說，他和準備安源展覽的紅衛兵同伴們由於參與這項崇高工作而激動不已，他們為「更正」歷史紀錄夜以繼日地作畫，廢寢忘食，表達了中國群眾的真實感情：

可是，長期以來，中國赫魯曉夫竟然貪天之功，把毛主席親自領導的安源工人鬥爭，說成是他的功勞。他為了給自己樹碑立傳，妄圖實現他篡黨篡國的野心，不惜工本地繪製黑畫，拍攝電影，炮製回憶錄等等，硬把一個工賊和小丑，打扮成「領導」安源工人鬥爭的英雄。是可忍，孰不可忍！中國赫魯曉夫在安源的滔天罪行，激起了我們無比的仇恨。我們是毛主席的紅衛兵，我們一定要把中國赫魯曉夫顛倒了的歷史重新顛倒過來！……邊畫邊請老工人和同志們提意見。……我們夜以繼日、廢寢忘食地畫呀，畫呀！……《毛主席去安源》這幅油畫能和全國人民見面，是毛主席的光輝思想和偉大革命實踐教育和鼓舞我們的結果，……是廣大工農兵群眾和紅衛兵小將熱情幫助我們的結果。<sup>59</sup>

為了把「歷史重新顛倒過來」，劉春華和他的紅衛兵同伴需要創造一幅比之前表現劉少奇的繪畫作品更能神化毛主席的畫像：

在構圖上我們把毛主席的形象安排在最突出的地位。毛主席高大的形象迎着我們，向我們走來了，像一輪光彩奪目的朝陽從我們面前升起，給人帶來了無限的希望。……我們彷彿也站在那二十世紀初葉烏雲壓頂、血雨腥風的安源山，見到身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壓迫，掙扎在水深火熱中的安源工人；彷彿見到了他們心中燒起的萬丈怒火；彷彿聽到他們心裡盼望救星早日到來的呼聲；彷彿見到了一群一群的工人仰望着東方，盼望東方出紅日……<sup>60</sup>

畫家聲稱他傳達了受壓迫的安源礦工的呼聲，可令人驚訝的是工人並沒有出現在他的畫作中。侯一民的畫描繪的是劉少奇領導罷工礦工走出礦井的場景，畫中強調了領導者和群眾之間的區別，他把劉少奇放在場景的中央位置而將安源礦工作為群體背景。可是在劉春華的毛主席畫像中群眾都消失了，工人階級的救星獨自一人站在山嶺上。<sup>61</sup>

除了宗教式的意義，劉春華的毛主席去安源之旅的畫作還蘊含了別的政治意圖。一方面，向劉少奇發起直接攻擊，明確表示毛主席才是安源唯一的英雄，因而也毫無爭議地是中國無產階級的領導者。另一方面，油畫通過強調勞工運動在中國革命史上的重要性，提醒大家從今以後工人才是文化大革命的主力軍，而非學生。到紅衛兵學生被分散到全國各地參加「上山下鄉運動」時，這幅畫發揮了鼓舞和動員的作用。<sup>62</sup> 例如，1968年夏天，上海所有主要院校的師生們集體參觀這幅畫的印刷品，他們表示「受毛主席四十七年前到安源點燃革命烈火的偉大形象的鼓舞」，宣誓要「成為毛主席的接班人，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到工廠和基層去」（譯者註：此處引文按原著英文翻譯，原始中文資料現存上海市檔案館）。<sup>63</sup> 在城市裡，工人們組成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取代了學生紅衛兵，成為繼續開展毛澤東領導的革命戰鬥的中心力量。

劉春華的這幅油畫蘊涵豐富的多重含意，所以格外廣為流傳。梁莊愛倫解釋道：

《毛主席去安源》間接地傳遞了兩個訊息：毛主席是這次罷工的領導者，亦是中國共產黨無可爭議的領袖；另外，現在他轉而依靠工

人。藝術現在真正成為一個政治武器。為了保證這兩層意思得到大家正確的理解，這幅畫被印刷上億萬份，在全中國廣泛流傳。農民插苗時把畫貼在附近；紅衛兵步行去內蒙古時，前陣打着這幅肖像；在新疆，學習班在這幅畫下開展活動。1968年9月，它被讚譽為「偉大神聖的畫像」，並和京劇《紅燈記》的鋼琴曲一起成為「兩大藝術瑰寶」，這樣它被放在了與八個樣板戲同樣的高度上。<sup>64</sup>

這幅畫被印刷上億萬份，複製品在學校、公社、工廠等各種單位都可見到。最初委託劉春華創作此畫的「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亮安源工人革命運動」展覽也受到全國各地博物館效仿。從1967年10月到1969年8月，在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連續展出的近兩年時間裡，安源展覽接待了超過250萬名參觀者。在參觀者之中有267個文化單位的代表，他們被派來觀摩，並且嚴格依照北京展覽的部分內容在地方上舉辦展覽教育活動。<sup>65</sup>很快，從山西到雲南，類似的展覽在各省市的博物館湧現。<sup>66</sup>

為了加強宣傳中央認可的政治訊息，地方展覽給參觀者分發了一份簡短的導覽小冊子《從安源到井岡山》。像宗教傳單那樣，這本手冊以編年史形式記載了安源工人運動中的大事，以說明毛主席的偉大革命事蹟。這份導覽手冊重點描述了從1921年秋到1930年秋期間毛澤東廣為人知的六次到訪安源，與展覽主要的六個部分對應。<sup>67</sup>各個博物館的導覽小冊子印製並不相同，在尺寸、插圖和政治性資料方面都各有變化。大多數導覽前言裡有國防部長林彪歌頌毛澤東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吹捧語。儘管如此，所有的小冊子描述毛澤東的六次訪問時都使用了完全一模一樣的文字。<sup>68</sup>第一部分題為「曙光初照安源山」，以劉春華的繪畫為圖例，描述毛澤東1921年秋天第一次到煤礦的旅程。導覽手冊上，毛澤東到達的那日，「驚雷一聲震天地，紅日照亮安源山」。<sup>69</sup>導覽的最後一部分題為「井岡道路放光芒」，着重記述1930年秋天毛澤東最後一次到訪安源，並在此招募紅軍戰士。安源被讚譽為毛澤東革命力量的源泉，解放了中國並將最終解放全世界：

英雄的安源工人，把毛主席的教導深深銘刻在心上，他們從地上爬起來……踏着毛主席指引的革命道路，又繼續戰鬥了！安源工人緊跟偉大領袖毛主席，為革命立下了不朽功勳……英雄的安源工人正迎着一輪光焰無際的朝陽，昂胸闊步，前進！前進！跟着毛澤東，永遠鬧革命！跟着毛澤東，世界一片紅！<sup>70</sup>



作為被毛澤東選中的群體，安源工人被表彰為是忠誠的無產階級，他們對大救星忠貞不渝，為大家指明了解救全世界的道路，將「蘇聯修正主義」犯下的罪行清除乾淨，將安源勞工運動的歷史「更正」過來，讓中國重新回到完成神聖革命事業的道路上。

這個工程的中心任務便是要防止出現任何其他對立的安源之「神」。雖然展覽的第一部分集中展示促成發動 1922 年 9 月大罷工的一些大事，包括開辦工人補習學校、設立黨支部和建立工人俱樂部，卻完全未提及已經離世且名聲已臭的李立三，更遑論提及安源的試驗受蘇聯啟發的事實。展覽中倒是提及劉少奇，但卻是以陰謀破壞革命的卑劣人物形象出現：

在大罷工爆發的前兩天，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投機革命，匆匆忙忙來到安源。這條資本家的走狗一來到安源，就執行一條徹頭徹尾的投降主義路線，和資本家礦長舒修泰勾勾搭搭，操着叛徒陳獨秀的腔調，把大好革命形勢說成「騎虎難下」，無恥地污蔑工人罷工是「鋌而走險」，拼命對抗毛主席關於大罷工的英明決策，竭力反對和壓制工人起來罷工鬥爭。劉少奇這個赫魯曉夫式的野心家，一貫把自己吹噓為「安源罷工的領袖」，說什麼「在安源時，……埋頭苦幹的可說是我。」呸！什麼罷工「領袖」？一個不折不扣的大工賊！<sup>71</sup>

除博物館展覽以外，一批通俗讀物也相繼出版，讚頌毛主席在安源的正確領導，並嚴厲批判劉少奇的「反革命」罪行。<sup>72</sup> 歌唱 1922 年安源大罷工的敘事民謠，也出現了新的版本。雖然事實上，1925 年創作的這首歌謠的各種原版中並未提及毛澤東，新版中卻充溢着對「毛潤之」的歌頌之辭。毛潤之為青年毛澤東在訪問安源期間曾用的字號。<sup>73</sup> 作為毛澤東的革命路線和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之間進行的「兩條路線鬥爭」的範例，安源勞工運動歷史遭到篡改和扭曲，近乎面目全非。

全國對安源給予鋪天蓋地的關注，顯然激發起毛澤東本人對往事的興趣。1968 年 10 月，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把其中一位代表、海軍司令員蕭勁光拉到一邊，向他詢問從前在安源的事情。蕭勁光告訴他，在蘇聯完成三年學習之後，1924 年他被中共湘區黨委派到煤礦組織工人運動。毛澤東問蕭司令是否認識著名的安源烈士朱少連和黃靜源。蕭勁光作了肯定答覆後，毛澤東惆悵地說：「多好的同志啊！可惜他們英年早逝。」<sup>74</sup> 毛

澤東隱含而未出口的意思大概就是，須對當時安源所有活動難辭其咎的同志應該是現在被貶黜的劉少奇吧。

## 「歷史」的資本化

文革將安源勞工運動進行重新解讀，對這個煤礦產生了巨大的反響力。凡是以前積極宣傳劉少奇安源功勳的那些黨史學者、老工人、工會幹部和政府幹部，皆在懷疑氛圍的陰雲中靠邊站。與他們處於敵對陣營的一群「激進分子」團體急急忙忙站出來，加強與北京的聯絡。前任安源領導們在過去十七年中一直努力爭取劉少奇的關照，而在新一屆安源領導班子中，大多數成員是在紅衛兵「奪權」運動中打倒原來的領導幹部後掌權的，他們立刻宣佈與這位前國家元首完全劃清界限，希望令中南海擁有更強大權勢的領袖滿意。

1966年秋天，紅衛兵查封了安源工人俱樂部。俱樂部繼續成為當地運動的一個焦點。1967年初，一些造反派組織自發地準備在俱樂部舉辦一個新的反劉少奇展覽。這個計劃最初被江西省級部門否定了，因為他們仍然不確定該如何講述安源革命歷史這個敏感話題。<sup>75</sup>不過，六個月後，工人俱樂部重新開放，邀請「所有革命組織和廣大革命群眾」參觀一個展覽。這個展覽得到官方的認可，而且嚴格依照北京革命歷史博物館的展覽佈置。<sup>76</sup>

根據歷史事實，安源工人俱樂部與劉少奇存在密不可分的關聯。因此，在俱樂部舉辦重點表現毛澤東革命功績的展覽顯得不甚合宜。不久，江西的政治形勢出現了重大變動，從而令文化操控以更大的動作進行。1968年1月，江西省革命委員會成立，由第六十軍司令、國防部長林彪的老部下程世清領導。前一年秋，因為派系間的武裝鬥爭在全省各地造成大量傷亡，程世清與他的部隊被調派到江西去恢復秩序。<sup>77</sup>在任職省革委會主任數周後，程世清召集了一個負責宣傳毛澤東在江西省革命事蹟的特別工作組的第一次會議。會議通過由萍鄉市、萍鄉礦務局和萍鄉鐵路局聯合承擔修建一座新紀念館，以紀念毛主席在安源的革命功勳。隨後萍鄉市革委會主任在當地組建了一個指導委員會負責監管工事，要求新紀念館一定要反映北京革命歷史博物館正在展出的展覽的精神「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

亮安源工人革命運動」。而且北京的展覽物件全部被複製，已經從北京運送至安源。<sup>78</sup>

萍鄉指導委員會由於缺乏舉辦如此大型且充滿政治色彩的展覽的經驗，故而向長沙一名經驗豐富的黨史研究者馬玉卿求助。馬玉卿以前曾在毛澤東出生地韶山擔任過展覽館館長，他同意出任展覽的高級顧問。馬玉卿在安源停留了一段時間，埋首研究有關毛澤東在當地活動的資料之後，提出一個大膽的計劃。他建議將新的博物館修建在山頂上原來聖公會聖雅各堂所在的突出位置上，這樣就能直接位於劉少奇設計的安源工人俱樂部大樓的正上方。其效果是新修建的毛澤東在安源革命活動紀念館高大宏偉，如高聳的巨塔，襯得下方的俱樂部建築渺小低矮，相形見绌。由於工程龐大，新博物館的造價也十分可觀，根據馬玉卿的初步估算，大約需要二十萬元。<sup>79</sup>

對於這個成本昂貴的提案，指導委員會內部出現不同意見。儘管無人質疑建造一座向毛主席表達敬意的紀念館以取代劉少奇的舊「祠堂」的必要性，有人指出由於經費有限，尚不能夠按照建議的規模來修建這棟建築，至少工程要推遲到下一年。萍鄉市的幾名官員，包括革委會主任在內，都同意馬玉卿堅持修建巨大展覽館的想法，但建議將萍鄉縣城的工人文化宮翻修後改成展覽館。工人文化宮由原來的孔廟改建，在運動中已遭毀壞。但是這個方案在公佈後遭到安源居民強烈反對，他們質疑為什麼一座紀念毛主席在安源活動的紀念館要設在萍鄉市區，而不是在煤礦選址。他們還批評，將紀念毛主席的場館設在孔廟的位置是不合適的。萍鄉市的官員被說服，同意只要區政府和省政府願意提供主要資金，就在安源修建這座新的大型建築。6月，萍鄉官員向南昌的省級部門遞交了提案，預算中將馬玉卿估計的成本價提高到兩倍的數額。

有點出乎萍鄉官員預料的是，江西省革委會主任程世清熱情地批准了計劃，並爽快地同意按照上報的工程預算費用四十萬元的數目撥款。他表示：「安源這個地方很重要，要錢好說，要不惜一切代價，趕快把紀念館搞起來，要建成世界第一流的。」程世清似乎打算借這項工事去奉承他在北京的領導靠山國防部長林彪。林彪在1930年曾短暫訪問安源，這也成為展覽內容中被強調的部分。程世清下達了省級批文，向全國各地招募博物館建設專家。從北京、南京、杭州、廣州等遙遠地方招募了逾兩千專

家。博物館專家、雕塑家等各種藝術行業的專家都被請到安源參與工程。這個項目由於得到省政府的全力支持，經審批的造價一再飆升，先增至八十萬元，接着上漲到一百二十萬元，最後竟高達二百萬元。<sup>80</sup>

1968年7月1日，即劉春華創作的《毛主席去安源》畫像被印在所有主要報紙頭版的當天，成千上萬的軍人和工人在安源集合，一起慶祝中國共產黨建黨四十七周年，這座向毛澤東致敬的紀念館也同時舉行了動工典禮。隨後的一個月，當地約九十個工作單位總共動員了五萬四千多名「志願者」，義務地為這個建設工程貢獻勞力。工人們肩扛着工具，在歡快響亮的爆竹聲和革命音樂中，從四周臨近的煤礦和工廠湧向工地。

動工典禮舉行數天後，安源又舉行了一場慶典來迎接劉春華油畫的巨幅複製畫，而這幅複製品也是由劉春華親手繪製的。與全國各地的工廠和公社的活動一樣，安源為這幅標誌性畫像複製品舉辦的歡迎慶典猶如一場宗教儀式。首先是由駐紮在煤礦上的「支左」炮兵旅莊嚴地接收這幅畫像。人們揮舞着紅旗，唱着歌頌毛主席的《大海航行靠舵手》之歌，鑼鼓喧天，爆竹震耳。士兵們恭敬地將畫像擡放到新紀念館建築工地正前方臨時搭建的一個高臺上。<sup>81</sup>與1949年之前安源廟會的舞獅表演相似，煤礦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在遊行過程中一邊歡快地跳舞一邊高唱讚歌，一路從礦井表演到工作站，經過宿舍，又穿過鎮上的大街。宣傳隊以熱鬧的歌舞通告工人們迎接畫像，工人紛紛從煤礦各處湧出來歡迎，接着又在畫像前集體宣誓：「永遠忠於毛主席，緊跟毛主席永遠幹革命！」如同三合會的成員或早期共產黨員們的儀式活動一樣。曾參加過1922年大罷工和秋收起義的老工人們應邀發言，他們表示畫中人物的面貌同他們在半個世紀之前親眼見到的毛澤東一模一樣。接着，大會開始批判「叛徒和修正主義者」劉少奇的罪行：為實施他的反革命陰謀，擅自篡改安源的光輝歷史。儀式末尾，安源革委會副主任代表全體安源工人向畫像總結表態，朗誦了激昂的口號：

毛主席啊，毛主席！我們安源礦工永遠忠於您，永遠忠於您的光輝思想，永遠忠於您的革命路線。海可枯，石可爛，忠於您的紅心永不變；頭可斷，血可流，您的光輝思想不可丟；生為您的革命路線而戰鬥，死為您的革命路線而獻身。毛主席啊，毛主席！我們一定牢記您「發揚革命傳統，爭取更大光榮」的偉大教導。<sup>82</sup>

人們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這座紀念毛主席偉大光輝的場館的修建工程中。在隨後五個月內，施工以瘋狂的速度進展。當年年底，一棟壯觀的展覽館已經矗立起來。建築高 24.5 米，室內空間達 3,245 平方米。外部牆體以黃色方磚砌成，屋頂鋪着黃色琉璃瓦。屋頂上立有一個摹仿劉春華油畫製作的毛主席頭像，頭像直徑達 6 米，由 428 片瓷磚拼成。屋簷裝飾着瓷製的十面紅旗和十支火炬。大樓入口的外牆上是毛澤東的書法，內容是他的一個著名口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句經典之語是毛澤東在井岡山寫下的，雖然不是在安源，但由於當時已被禁的電影《燎原》的巨大影響，造成在公眾心目中這句話已然與安源密不可分。紀念館將這句名言標記在這座毛澤東廟堂入口極其醒目的位置上，明確地表示從今以後，這句標語應該與安源的真正救星關聯在一起，與邪惡的冒名頂替者劉少奇根本無關。毛澤東書法的下方是他的信徒和指定接班人國防部長林彪的諛辭：「大海航行靠舵手，幹革命靠毛澤東思想。」

在劉少奇領導安源工人俱樂部的時期，俱樂部作為文化中心將革命宣傳輻射到周邊區域。與之相似，「毛主席在安源革命活動紀念館」也承擔着官方名字所界定的特殊使命。與紀念館有工作業務關係的一個歌舞劇團，新編排了一部謳歌毛主席領導安源大罷工的採茶戲《紅太陽照亮了安源山》。在迎接紀念館即將開放的慶賀活動中，劇團在江西全省連續表演了近一百場。紀念館下屬的報告團到各地宣傳「正確」的安源工運史，專題演講多達兩百餘場，聽眾超過二十五萬人次。1969 年 4 月 4 日，紀念館通過省級部門最後一次檢查，正式面向公眾開放。<sup>83</sup>

文革期間建造了一些向毛主席革命成就致敬的博物館，這個紀念館被認為是其中最宏偉壯觀的建築。安源這個紀念館的開幕令大家格外興奮激動，還吸引了一大批國內和國際的革命朝聖者，他們因為劉春華的油畫而知曉安源的大名。當時仍是年幼學生的一名當地人後來回憶：

記得那年冬天，我們坐在冰冷的教室裡，一邊哆哆嗦嗦學着《迎接偉大的七十年代》的元旦社論，一邊遠眺紀念館廣場前的大小車輛，心情無比激動。因為紀念館向全世界革命人民開放了！歐洲的一盞社會主義明燈，兄弟的阿爾巴尼亞代表團來到了安源。同學們深深體會到：「我們的朋友遍天下！」隨後，越南代表團、日本共產黨代表團，以及國內的大慶、大寨、林縣等先進人物代表團也紛至沓來，參觀學習。不過，這個時候安源接替袁老伯伯講述那過去



圖 12

毛主席在安源革命活動紀念館，1968 年修建。毛澤東頭像位於樓頂上。

事情的是一位名叫徐勝遠的老工人，他手拿毛主席語錄，身穿藍色的對襟布衣，對來訪者深情地說道：「就在 1921 年秋，偉大領袖毛主席身穿藍布長衫，手拿湖南雨傘，沿着鐵路，一步一步向安源走來。」<sup>84</sup>

參觀毛主席在安源革命活動紀念館的觀眾進入門廳，迎面便是巨大的劉春華的《毛主席去安源》複製品，為作者本人親手所畫。畫作四周是四面巨大橫幅，上面寫着國防部長林彪贈予毛主席的四個崇高稱號：「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和「偉大舵手」。依照北京革命歷史博物館原樣複製到安源工人俱樂部的展覽佈置，展覽也分為六個部分，每一部分都突出毛澤東對安源勞工運動的貢獻。<sup>85</sup> 與之前展覽不同的是，這個展覽把安源的歷史描繪為暴力壯闊的階級鬥爭史。第三部分題目為「安源山下雲水怒」，並未提及 1922 年罷工中毛澤東呼籲大家自我克制的事實；相反，裡面引用毛澤東「革命不要怕流血！」的警醒之語，這句嚴厲的話語讓罷工者們堅定了決心。在這個部分中有一幅版畫描繪劉少奇的老對手、人稱「謝猛子」的工人糾察隊員謝懷德為「保護工人階級利益」痛打安源路

局站長的情景。另一幅版畫描繪 1923 年當「老機會主義者」李立三試圖阻止工人莽撞發動罷工時，大家痛打他的情景。還有一幅版畫則展現安源工人向主管舒修泰和一個日本顧問潑糞的情景。<sup>86</sup> 與其一同展出的「黑材料」是揭露「中國的赫魯曉夫」是「資本家的忠實走狗」的「鐵證」：曾任萍礦公司礦長的舒修泰 1956 年寫給劉少奇的信件片段。

與以前的展覽相比較，另一個不同點是新的展覽並未以 1930 年招募士兵參加紅軍作為安源故事的尾聲。展覽的最後一部分以「安源工人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為題，內容着重於文化大革命本身。在這一部分的開始即出現毛澤東身著軍裝站在天安門城樓上，一名青年女紅衛兵為他戴上紅袖章的照片。照片的說明文字描述毛主席「為了祖國的前途，世界的命運，您又親自發動和領導了一場比巴黎公社，比十月革命更深刻……的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其後還有毛澤東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以及會見文革小組成員的一些照片。之後便是一幅畫着紅衛兵步行去安源的油畫，他們「沿着毛主席的足跡」去革命大串連。接着是萍鄉在文化大革命中貼出的第一張大字報的照片，大字報的內容表現鐵路工人們對劉少奇的批判。隨後是一幅安源工人在群眾集會中批鬥前煤礦黨委書記的照片。照片的文字說明描述安源工人們響應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號召，是「具有光榮革命傳統」的行為。隨後是一些表現紅衛兵和安源工人以集體「革命」行動來「貫徹毛主席指示」的照片，比如砸碎劉少奇雕像、查封工人俱樂部、將劉少奇題寫報頭的《萍礦工人報》撕成碎片、將長在工人俱樂部大樓前的「中國的赫魯曉夫」栽種的梧桐樹砍倒等等。劉少奇在他的私人住所接見「叛徒」袁品高的照片，被描述成劉少奇將自己打造成安源勞工運動英雄的一次徒勞舉動。

在紀念館的展覽內容中，以前的江西省領導班子受到嚴厲譴責。展覽陳列了一些「黑材料」罪證，包括 1957 年 7 月前江西省省長方志純下達的將多處與劉少奇有關的場所定為革命保護景點的指令。展覽也突出地列舉了多年來劉少奇將他的安源工作美化的說法。例如，1957 年劉少奇會見安源的朱子金時談道：「我一去就積極主張罷工，李立三還猶豫不決。」還有 1964 年劉少奇在湖南的一次幹部會議上有關安源的發言：「一次罷工之後，所有的黨員都躲起來了，只剩下我一個人。」展覽對這些話作了批駁，指出劉少奇的自我吹噓顯然假話連篇，因為 1922 年大罷工的所有功

勞都屬於毛主席。在這些「黑材料」之後，是安源工人在群眾批鬥會上譴責劉少奇的照片，文字描述工人們才是「歷史最好見證者」。這之後還有劉少奇在三十五年後重印出版他 1923 年寫的文章時，對原文做了改動的證據、安源工人批評電影《燎原》的照片、萍鄉鐵路老工人柳煦生在天津作報告揭露劉少奇罪行的照片，以及前安源糾察隊副隊長謝懷德的親屬譴責劉少奇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在安源期間迫害謝懷德的照片等等。展覽有一部分主要表現礦務局和鐵路局革命委員會的組建，以及「支左」解放軍對新的當權派給予大力協助的事例。接近末尾是一幅醒目的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在人民大會堂接見煤礦工人的油畫。最後一部分是劉春華創作的標誌性油畫《毛主席去安源》，以及江青對這幅作品的高度讚譽、此畫的多種海報形式以及各種類型的複製印刷品。這個展覽以多張安源工人喜迎油畫《毛主席去安源》巨幅複製品的照片結束，而那幅油畫的複製品則懸掛在紀念館的正門大廳裡。

## 毛澤東「接班人」的結局

這幅油畫雖然存在不符史實的內容，但被廣泛印製發行，成為政治話語的中心。安源的「光榮革命傳統」衍變成一幅自身的諷刺畫，層層的歪曲和捏造取代了對工人無產階級艱難生活境況的嚴肅關注。<sup>87</sup> 但這些不實和矛盾之處並未使解讀安源歷史的爭論得以遠離政治問罪，或者倖免於災禍。毛主席的指定接班人劉少奇與林彪二人都在各自的革命履歷上誇讚自己的安源經歷，然而他們在文化大革命的進程中卻相繼從萬人之上的高位跌下，最終致命隕落。

1969 年 11 月，劉少奇同兩年前的李立三一樣，背負着污名去世。與李立三之死相似，有關劉少奇逝世的情況十分模糊。或許是醫療疏忽或是受到虐待，劉少奇被人發現躺在一座臨時監獄的地板上，已經沒有生命跡象，全身沾滿嘔吐物和糞便。他的屍體被塞進一輛吉普車，悄悄運到一個火葬場，登記的還是一個假名。死因被簡單地記錄為「疾病」，其家屬在三年內未得到通知，而群眾十年內對此一無所知。<sup>88</sup> 讓劉少奇作為國家的頭號「叛徒、修正主義分子和工賊」停留在公眾心目中，這有利於毛澤東和部下們繼續這場人為的階級鬥爭，推動文化大革命蓬勃發展。



譴責劉少奇為出賣中國工人階級的「工賊」的批判持續不絕，意味着安源工運史繼續成為全國媒體報導的重大議題。劉少奇以及名氣稍遜的李立三離世後，依然是攻擊對象，而毛澤東則繼續受到全國誇張的吹捧。但是，這齣安源道德劇目中的其他人物在文化大革命餘下的年月裡，隨着政治局面的巨變而導致角色的顛覆性置換。

新建的安源紀念館領先將中國革命歷史和傳統重新詮釋。1969年在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國防部長林彪被正式確立為毛澤東的指定接班人。數月後，江西省委書記因應政治風向的變化，要讓他的靠山受到相稱於近期權勢地位提升的禮贊。安源紀念館的佈置進行了一次重大調整，安排更多的空間來陳列林彪於1930年在安源短暫停留的經歷，以及他過度阿諛奉承毛澤東的言論。在新展覽顯眼的中心位置上是林彪恭維毛主席的溢美之辭：「毛主席這樣的天才，全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一個，毛主席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天才。」雖然林彪和安源勞工運動之間並無關聯，紀念館還是特意請人創作了四幅林彪在安源的大型繪畫並陳列出來。林彪短暫訪問安源期間的下榻之處，也作為省級文化遺址向公眾開放。<sup>89</sup> 安源紀念館與當時政治正確的信號步調一致，不光吸引了國內的參觀群眾，還持續受到國際注目。1970年，紀念館接待了來自日本、法國、挪威、越南、泰國和其他東南亞國家的代表團。第二年頭幾個月，紀念館迎接了來自澳大利亞、印尼、阿爾巴尼亞、北朝鮮、越南、泰國和日本的代表團。<sup>90</sup>

然而，林彪的安源事蹟很快就被徹底重寫。1971年5月，毛主席在安源革命活動紀念館黨委書記廉明德突然被召進京，參加一個革命博物館代表會議。這次會議的目的是要削弱林彪集團的勢力。<sup>91</sup> 會上周恩來總理作了兩個委婉的報告，在報告中他要求與會人員學習毛澤東在1970年12月18日會見美國記者斯諾的談話。雖然話裡並未直接點明林彪，廉明德猜測這位國防部長一定遇到某種政治麻煩，因為毛澤東向斯諾抱怨林彪恭維他的所謂「四個偉大」稱號：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現在是導致個人崇拜「過分了」的「討嫌」東西。在與斯諾的談話中，毛澤東並沒有將林彪與「四個偉大」相聯繫，但是他強調自己只想保留林彪贈予他的四個稱號中的一個：導師。<sup>92</sup> 當周總理安排博物館館長們參觀人民

大會堂時，廉明德注意到各處均未出現林彪語錄的任何隻言片語，這進一步印證了他懷疑領導層的人事權序即將出現巨大變動的想法。

一回到安源，為反映這次北京之行領悟到的收穫，廉明德要求紀念館進行幾個調整。之前門廳內佈置的「四個偉大」橫幅被取下。館內那些最有問題的林彪語錄被摘下，換上了馬恩列斯的畫像。四幅林彪畫像被去掉三幅，八條林彪語錄有七條被移除。雖然廉明德自信他領會了周恩來的會議精神，但他的調整工作並不符合當地林彪派系並大力吹捧林彪的江西省革委會主任程世清的心意。程世清一聽說調整變更，便派人到安源紀念館訓誡廉明德未經省級部門批准擅自更改展覽內容，並要求他立即恢復林彪在展覽中的突出地位。

廉明德認為周恩來總理是比南昌官員更可靠的政治風向標，對程世清下達的指令遲遲不執行。他的拖延策略很快被國家層面的形勢發展證明是明智之舉。<sup>93</sup> 當江西省當局得知林彪被指控陰謀策劃暗殺毛主席，以及飛機墜毀喪命於蒙古這兩個令人無比震驚的消息後，便下令立即停止之前的指示，又派武警部隊將博物館包圍起來。現在輪到林彪在離世後被攻擊假造革命資歷了。林彪死後不久，一個革命老幹部學習班參觀了江西省內的多個博物館，其中包括安源紀念館。他們報告稱見到「有許多是宣傳林彪的，而且口徑都差不多或一樣，內容有不少是偽造、吹噓、騙人的」。<sup>94</sup> 政治意味濃重的「燎原」一詞，作為毛澤東奪回屬於他的革命遺產的標誌而被刻在安源工人運動紀念館的正面入口處，此時作為揭示林彪的「極端消極的悲觀主義」的證據來批判林彪。根據陳毅元帥的回憶，正是林彪對毛澤東在江西建立紅軍的規劃心存疑慮，促使毛澤東於 1930 年 1 月寫了一封長信給林彪，指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以此來消除林彪的消極情緒。<sup>95</sup>

學習班的報告上交之後，廉明德和井岡山革命博物館、紅軍革命博物館的館長們一起被傳召到省會南昌，聽取軍區副政委的簡要報告。報告向博物館館長們傳達了林彪陰謀暗殺毛主席的計劃失敗，並指示他們要清理各種與林彪相關的展覽內容。讓廉明德高興的是，與其他兩個江西主要的革命博物館不同，安源已經處理了大部分問題。但是，館中還有幾件與林彪相關的展品需要進一步處理：一尊大雕像、一幅題名為《1930 年安源工農歡迎紅軍》的油畫、一條語錄，以及聲稱的林彪來招募紅軍時的居

所。廉明德集合館內工作人員中的全體黨員參加清理工作。他們在協力一道砸碎雕像之後，分成三組行動：第一組修改油畫，使林彪的形象不在畫面上出現；第二組集中處理博物館展品的文字說明，刪去所有提及林彪的部分；第三組封閉林彪 1930 年的住處。次日，萍鄉市委書記來紀念館檢查，他對清查整理工作表示完全滿意。

## 局勢的逆轉

1972 年 5 月林彪在江西的忠誠部下程世清遭到清洗。次月，省級領導親自檢查安源的展覽，以確保內容符合中央的正確路線。檢查過程中，新任江西省委書記黃知真提出關於安源博物館名稱的敏感問題。鑒於「毛主席在安源革命活動紀念館」這一名稱乃是江西省革命委員會中的林彪派系人員選定的，黃知真建議博物館改名。因為這個名稱中列有毛主席的名字，他的提議引起了巨大爭論。但是江西省當局注意到近期毛澤東本人在講話中呼籲減少對他的個人崇拜，因而經過數月的磋商討論後，同意沿用文革之前原先安源工人俱樂部設置的博物館的名稱：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紀念館。同時，以畫像發霉為由，將劉春華的《毛主席去安源》巨幅複製畫作從博物館的門廳遷出。<sup>96</sup>

之所以作出搬遷這幅標誌性油畫的決定，一部分是基於傳言毛主席自己對這幅畫表示不悅。一年前，當副總理張春橋在毛澤東的出生地韶山參觀博物館時，看到另一幅劉春華畫作的複製品。他告訴館長，毛澤東對這幅畫有所保留，認為畫上的形象陳腐且不符史實。據張春橋說，毛澤東記得他初次去安源時穿着襯衫長褲，而非中式長衫！<sup>97</sup> 1972 年 10 月 1 日，重新命名且經過整修的安源紀念館重又向公眾開放，而曾經掛在大廳突出主題的那個巨幅油畫被清除了。<sup>98</sup>

雖然博物館的新名字強調工人群體本身對安源勞工運動發展所作的貢獻，但紀念堂依然強調毛主席是工人運動的中心主角。1972 年開放的展覽分為五個部分，其中有四個部分強調毛澤東的領導地位。這五個部分為：(1) 安源工人血淚史；(2) 毛主席親手點燃安源革命烈火；(3) 毛主席親自領導安源工人大罷工；(4) 毛主席領導安源工人開展農民運動；(5) 毛主席領導安源工人走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sup>99</sup> 不過，展覽中並未出現

對毛澤東的敵人進行攻擊批判，以及對暴力革命的稱讚誇獎等近期反覆強調的內容。整個陳列中唯一聯繫到劉少奇的地方是自他的文章中摘錄出來的敦促「勞資合作」的片段，以此反映他早期便反對毛澤東的革命路線。1969年的展覽中作為高潮的文化大革命部分，在新版安源故事展示中完全消失。與更早的展覽相同，1972年版本以1928-1930年紅軍建立結尾。雖然劉春華那幅著名油畫的縮小複製版仍被擱進第二部分的中間處，但是青年毛澤東去安源的引人矚目的形象已非整個展覽的視覺焦點所在。另外，以往革命朝聖者紛紛趕赴安源參觀展覽的情景此時也未重現。

許多年後，劉春華堅持認為他那幅繪畫在全國各地流行的熱潮遭遇突然的降溫，更多源於畫家本人和江青起了衝突，而並非是因為毛澤東不認同此畫。劉春華解釋，在1972年春的一次北京黨委擴大會議上，他對江青的一些言論表達了相反觀點，之後他就被指控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是「林彪團夥」而處於持續的監控之下。<sup>100</sup> 根據劉春華的說法，當時他那幅曾經神聖非凡的繪畫突然從高高在上的地位陡然直下，是他個人政治受挫的直接結果。無論確切原因為何，《毛主席去安源》的魅力，以及並非巧合的，革命朝聖地安源的熱潮，在林彪事件的真相開始浮出水面後不久，就迅速消退了。

政治潮流轉變在當地的另一個跡象，是以前擔任過劉少奇警衛工作的袁品高被重新安置。1972年，經過萍鄉煤礦黨組織的調查，袁品高在附近的一個小煤礦接受「勞動改造」三年之後，加諸他身上的所有政治指控終於被撤銷。他的黨籍和「革命」補助金都得到恢復。次年，袁品高退休回到鄰近的醴陵老家。應紀念館的邀請，袁品高時常回安源講述他早年的經歷，一直持續到1975年他以八十歲高齡去世為止。<sup>101</sup> 持續整整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階段於1976年正式結束。就在距文革結束還有幾年的時刻，劉少奇最熱忱和最公開的支持者洗脫了罪名，在安源革命傳統如何解讀上的爭端彷彿繞了一個完整的圓圈。

在林彪喪生後，派系鬥爭仍然持續不斷，毛澤東本人困擾於此而煩惱，故而轉向從安源歷史中解讀出趨於更為保守的含意。雖然毛澤東的記憶在他生命最後的時日裡逐漸衰退模糊，去世之前的一年中他仍在多個場合提及他作為一個年輕的工人運動組織者在安源得到的經驗教訓。1975年5月，毛澤東回憶，他到安源時那裡不同籍貫的工人們均各自組成相互敵

對的幫派，令他明白派系鬥爭存在的危害性。他說：「不要搞什麼幫，什麼廣東幫、湖南幫。」<sup>102</sup> 這一說法被視為是委婉地批評他的妻子與三個上海幹部形成「四人幫」團體。然而，鑒於毛澤東和其他組織者在安源的時​​候偏向於自己的湖南同鄉，而更貼近主題的是，近期中共領導層相互傾軋的各個派系利用安源歷史來針鋒相對，毛澤東的告誡何其諷刺。

## 工人的狀況

雖然政治氣候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顯著波動，工人們一直關切的生活狀況問題基本上未有改善。文化大革命中，整個工人階級的意識形態地位得到極大提高，安源無產階級的革命聲譽也更為響亮。但在安源或者其他地方，這種符號形式重要性的提高並未轉化為同等程度的工人福利改善。<sup>103</sup>

雖然十年文革期間安源煤產量年增長率達 4.8%，工人的工資卻停留在原地。<sup>104</sup> 福利待遇也是如此。從 1966 年到 1969 年這四年間，萍鄉礦務局從未撥款給支付工人醫療費用的勞動保險基金。<sup>105</sup> 國家投入工人住房的經費也急劇下降。文革之前的十年間，煤礦職工單元樓的建築經費平均每年達五十三萬元，而在文革十年期間此項費用急劇下滑到年均十六萬元，縮水高達 70%。<sup>106</sup> 礦區的教育狀況嚴重惡化。從 1966 年到 1972 年，因為主管教育的礦區文教局在文革中被解散，安源的學校全部關閉停課，課外活動也被取消。<sup>107</sup>

安源工人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不光在經濟上無收益，而且工作崗位行政管理結構還重新進行了組織，套用的是一個更加強調紀律和犧牲的軍隊模式。由於引進了軍隊幹部體系的用語，煤礦的廠長被稱呼為「團長」，分部主任被稱為「營長」，工作車間被稱為「連」，負責的組長為「排長」。黨委書記被稱為「政委」，技術員稱「參謀」。為了鼓舞工人積極參與帶有危險性的工作，下礦井叫做「上戰場」，工人們被號召要「不怕犧牲」。<sup>108</sup>

大家也許以為這種紀律嚴明的管束，將激起低薪收入職工群體的怨恨和抵制。但是許多老礦工都深情地懷念文化大革命，認為這種效仿軍隊行動的做法，是重振革命精神工程極具意義的一部分。據一位老工人對那個年代的回憶：

月月要搞大戰，礦工們……在「下定決心，不怕犧牲」的毛主席語錄歌聲中，從凌晨3點45分去下井，到下午3點多鐘才能升井，平均工作在12小時以上。可是礦工也沒有任何怨言，很多人還幹得熱火朝天。<sup>109</sup>

雖然文革中工人階級的生活受軍事紀律管束，並且物質匱乏，十分貧困，過去的這段經歷仍然勾起他們的懷舊情緒。安源工人在全國政治舞臺上充當明星角色的那段時期，在這些人的回憶中充滿了令人陶醉的無產階級榮耀。

無產階級在意識形態上受到高度評價，因此部分安源工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賦予新的政治機會。例如，1969年，萍鄉礦務局革命代表大會六位主席中有三位是工人身份，而並非行政幹部，而以前黨委全由行政幹部組成。一名叫潘世告的礦工連續任中共九大、十大兩屆中央委員，並一度任江西省委副書記。1971年4月，潘世告率中國工人代表團正式訪問阿爾巴尼亞。許多普通礦工在這一時期也積極參與政治活動。安源的中央煤礦合計二千九百個工人，有近一千名被官方樹為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sup>110</sup>

後來在鄧小平的市場化改革年代，工人們遭遇下崗的衝擊，使得他們充滿感激地懷念起文化大革命，因為那時候提供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保障。一名老工人回憶那個年代：「那時候……單位什麼都管……最重要的是單位還包小孩子上學和就業；在我們礦裡就連洗浴和理髮都由礦裡包了……現在呢？什麼都沒有了。」<sup>111</sup> 正如另一老工人所說，「改革對工人的好處不是很大，工資還是只能維持溫飽。」<sup>112</sup> 在追問之下，受訪者們還是承認後毛澤東時代的改革，給大部分安源工人帶來更高的生活水平，但是就業保障的喪失還是令他們感到不公。<sup>113</sup> 雖然事實上國有企業的終身聘用制度在文革之前就已經施行十多年，而且主要應當歸功於由李立三主持制定的勞動保險條例，而不是出於毛澤東領導的最後一次征戰，然而在公眾心目中這個制度卻與「毛主席的革命」密不可分。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後，全國各地敬獻悼念毛主席的花圈運到北京，其中就有安源工人送來的一份。<sup>114</sup>

如果說安源工人偏於浪漫化這段革命往事，這種傾向其實非安源人獨有。在其他地方也發現有一部分人流露出對群眾運動，特別是文化大革命

的懷念，他們之中既有農民，也有工人。<sup>115</sup> 這種情緒毫無疑問反映出他們對部分現行政策的不滿，而並非真正渴望回到過去那種一片黯淡的現實中。然而，從他們身上也表現出毛澤東革命對許多中國人而言，具有強烈的象徵號召力，特別是這個革命作出了要讓被壓迫者獲得尊嚴的承諾。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發動的，在一定程度上經過他本人精心設計部署。然而這場革命絕不僅是一場簡單的精英權力鬥爭。毛澤東並未要求缺乏經驗的紅衛兵，或是後來取代紅衛兵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輔助他剷除黨內的對手。他無需這些稚嫩的學生和工人相助，就能游刃有餘地處理這些挑戰。<sup>116</sup> 毛澤東發動的最後征戰的核心主旨是培養鍛煉可靠的接班人，使之能夠融入「新的群眾文化」。<sup>117</sup> 只有中國全體青年被灌輸堅定不移地獻身於無產階級革命理想，這位暮年領袖才能放心認定他畢生的事業不會隨着他的離世而終結。

回顧早期共產主義運動，對文化改造的關注是一個持久的要點。那時，青年時期的毛澤東、李立三和劉少奇積極致力於這方面的工作，希望在安源和其他工業中心培養年輕工人，樹立新的革命意識。不同的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期毛澤東以及其他革命者通過建立地方基層組織開展工作，比如工人俱樂部以及夜校，而現在則是強大有力的國家政權機制，從中央宣傳部到人民解放軍，指導着整個運動的進展。雖然黨的領導層在原則上仍然致力於賦予無產階級以特權的社會主義事業，信號中的要旨顯然已轉變。中國當時已經展開了一次神聖的革命運動，目的是要將中國和世界從蘇聯「修正主義」的危害中解救出來。與通過活躍的教育工作來發動安源大罷工和發展「小莫斯科」不同，後來的這場革命旨在發揚「無產階級文化」，在國家的宣傳中稱讚武士的「武」優越於文人的「文」。在文化大革命肇始時，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一批追隨效忠他的紅衛兵，他在這個場合上點明了這一點。當身穿解放軍制服的毛澤東接受一名女紅衛兵贈送的袖章時，他建議這位女青年改名以反映軍事化的時代精神：

報導說，毛澤東得知她的名字是表示「優雅」、「文明」之意的「彬彬」二字之後，他宣佈這是一個適合富家小姐，而非年輕革命者的名字。「是不是文質彬彬的彬？」她回憶說，毛澤東這樣詢問她。「我說：『是。』主席親切地說：『要武嘛。』」後來他贈予她這個現在更合時宜的名字「要武」。<sup>118</sup>

毛澤東建議這位年輕的紅衛兵更改名字以順應新的革命任務，標誌着他的文化大革命更多是利用中國的軍事權威傳統，而不是文化權威傳統。成型於文革期間的這種文化以街頭為舞臺，「表現出拋棄了過去對傳統知識分子學識修養的依靠，而要求體力的忍耐與冒險」。<sup>119</sup> 在這種新的無產階級文化中，文質彬彬的「文」被要武的「武」取而代之。毛澤東將一個如此明顯男子氣的名字贈予這樣一個戴眼鏡的女紅衛兵，意在宣明，弘揚武力的理想不分男女同樣適用。<sup>120</sup> 這一課的效應立竿見影。根據韓起瀾(Emily Honig)對紅衛兵暴力事件中參與行兇動武的女性的觀察所得，「女性的衣裝總是如同男性，更準確地說，像部隊的男戰士。」<sup>121</sup>

軍隊之所以擁有模範的魅力，被競相效仿，不僅僅因為代表着尚武的威力，也因為解放軍部隊與中國革命的歷史如此緊密相聯而具有強大的道德權威。儒家思想中文人作為文化力量和政治力量的源泉，享有高於軍人的尊貴地位，而毛澤東領導的革命看起來似乎徹底顛覆了這個傳統。可以肯定的是，人民解放軍在文革最初幾年間的地位上升，是人事權力鬥爭和官僚派系鬥爭的結果，正是國防部長林彪取代中共副主席劉少奇，勝利地成為毛澤東的指定接班人的一種反映。但軍隊的地位突出也含有一種象徵意義。羅伯特·傑·利夫頓發現人民解放軍意味着「革命的純正，結合精神和物質力量於一體」。所以，軍隊適宜於做毛澤東為「革命不朽」而發動的最後一次征戰的理想載體。<sup>122</sup>

毛澤東領導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參與群眾表現出戰鬥性和宗教性情感相互交融混雜的特徵，以青年尤為突出，這種特點有助於解釋為何這種經歷得以長期留存在大眾印象中。在安源，這種混合情感的具象表現，是那座紀念毛主席革命活動的富麗堂皇的紀念館。在軍隊的指揮下，這個儀式過程充滿了獻身的虔誠狂熱。新紀念館的開幕展上，以北京革命歷史博物館為範本，運用誇張的字眼着重強調安源故事蘊含的軍事意義。劉少奇反對暴力的指令成為揭示他的「修正主義」罪行的證據，受到批判；毛澤東強調紅色恐怖的作用、紅軍的壯大以及文化大革命的「階級鬥爭」等，作為神奇非凡的事蹟受到歌頌。

因而，更為引人注目的是，紀念館中陳列在中心位置上的那幅在當時席捲全國的毛澤東個人崇拜中受到頂禮膜拜的畫像展現的，卻是一個非暴力形象的毛主席。這幅毛主席去安源的畫上，他身著飄逸的中式長衫，手



持一把紙傘，神色沉靜地屹立在山嶺上，周圍雲霧繚繞。這種中性特徵的年輕知識分子形象不僅引起他妻子江青的強烈共鳴，也引起全國各地不分男女老少的各個階層民眾的共鳴。而這個形象產生的符號魅力不是因為體現了武士的「武」，而是由於表現了文人的「文」。

可以肯定的是，這個鎮定沉着的形象，宣示着任何覬覦安源遺產的毛澤東的對手都會被殘酷地消滅。在這幅被神化了的畫像的揭幕典禮上，劉少奇的畫皮被揭下，他被批判為惡魔般的「中國的赫魯曉夫」，為達到自身邪惡目的而企圖竊取神聖的革命果實。所以只有毛澤東才能被尊崇為無產階級和農民階級的大救星。不僅如此，畫中毛澤東身穿文人服裝，散發着儒家教師特有的智慧和權威。偏愛中國傳統服飾的江青竭力宣傳這幅畫，她肯定很欣賞這幅畫中服裝的重要作用。她明白一位最高領袖必須既要展示他在軍事上的才幹，也要展示教育方面的才能。<sup>123</sup> 1971年初，江青向她的一些心腹大聲說明：「主席的力量是文化人的力量。」<sup>124</sup> 在她丈夫的葬禮上，江青敬獻的花圈的挽聯是「沉痛悼念崇敬的偉大導師毛澤東主席」，落款為「您的學生、戰友江青」，清楚地指出毛澤東首先應該作為導師被人們銘記。<sup>125</sup> 贈與毛澤東導師的稱呼，其實與他的自評相一致。在毛澤東去世前不久，斯諾解釋為何毛澤東決定只接受林彪送給他的「四個偉大」稱號中的導師這個稱號：「毛澤東曾經是一名教師，現在仍然是。甚至在成為共產黨員之前，他在長沙便是一名小學教員。其他的所有稱號都會被他拒絕。」<sup>126</sup>

安源畫像散發的感染力表明，雖然毛澤東領導的革命道路上貫穿着血腥暴力，「紅色文人」的誘導力仍然是巨大的。這幅畫描繪毛澤東從長沙前往安源去向礦工傳授革命的路途之中，亦是在提醒人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應該是關於無產階級的。雖然劉春華的畫中沒有出現工人，但是毛澤東的目光注視着煤礦的方向。這幅畫的公開發佈標誌着已到了學生紅衛兵靠邊站，向工人宣傳隊讓路的時候了。中國城市青年被要求停止派別間的武鬥，要向工農學習革命經驗，這些年輕人被分散到全國各地去開展「上山下鄉」。

安源的煤礦工人體現了近於完美的工農兵相結合，這是理想的中國革命的社會成分。安源工人的動員工作受到中國政治權威的兩大支柱文化和軍事方面的啟發。他們上升至受人仰視的高位，成為「注定的革命者」。安

源由於與解救老百姓的大救星的特殊淵源而受到關照，無數烈士的熱血使革命歷程神聖而崇高，安源勞工運動象徵的是對革命理想的獻身與忠貞。安源的革命經歷不僅讓主角本身慷慨激昂，也讓全國各地的朝聖者、藝術家、知識分子和機關官員們精神振奮。刊登在《中國畫報》上的一篇專題文章中，一名老礦工如此總結安源的信條教義：

在艱苦的革命鬥爭年代，安源煤礦是一個煉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資產階級官僚主義相互勾結，吸礦工的血。礦工們過着牛馬不如的生活……在我們承受這種煎熬時，毛主席——我們心中的紅太陽——到達安源……毛主席的話點亮了我們礦工的心……我們覺醒了……在舊社會牛馬不如的我們成為國家的主人。把昨天和今天作對比，我們感到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我們老礦工決定永遠忠於偉大領袖毛主席、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和革命路線，永遠跟他幹革命。<sup>127</sup>

文化大革命中，各種安源故事充滿着救贖性的宗教虔誠，受到席卷全國的個人崇拜的影響。全國上下的個人崇拜之風模糊了舊儀式和新的共產主義活動之間的界限。在工人宣傳隊帶動下，全國各地的工廠都設立了供奉毛澤東著作的案几，後面掛着毛澤東的肖像，通常是那幅安源畫像，或是身著解放軍裝的毛澤東。工人們在那裡集合做「早請示」和「晚匯報」，如同原來敬拜家中供的祖先牌位和菩薩像一樣。<sup>128</sup> 這一做法很快擴散到了農村。梁恒在文革回憶錄中描述，他的父親，一名被下放到農村接受「再教育」的城市知識分子，把城裡的儀式介紹給他的新農民鄰居。將原來一個祭祀祖先的香案佈置成向毛澤東致敬的場所之後，

他把嶄新的毛主席和（國防部長）林彪畫像掛起來……「鄉親們」，他向好奇的圍觀人群宣佈，「現在開始我們要同城裡人一樣。為了鼓足幹勁，早上我們要請示，晚上要匯報。」……然後他轉身面對偉大舵手和革命元帥，無比嚴肅地彎腰深深鞠躬三次。許多人在偷偷地暗笑。父親看起來非常嚴肅，而農民們從未見過向自己祖先像之外鞠躬的人。但他們都熱衷於學習，因為他們熱愛毛主席。終於，他們有了一位認真的老師，教他們如何表達自己的熱愛之情。<sup>129</sup>

百姓家中也舉行向毛澤東致敬的活動。陳佩華 (Anita Chan) 與合著者如此描述文革中一個華南鄉村的日常生活：「每一頓飯前，仿效軍隊中尤其多的向毛澤東致敬的儀式，陳村的各家各戶開始表演忠於毛澤東的活動。在

家長帶領下，全家人齊聲念誦毛澤東語錄，唱《東方紅》，然後坐下吃飯時還要背誦。」<sup>130</sup>

毛澤東最後一次征戰的強烈宗教性，使這場運動有別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往的歷次文化操控實踐。儘管文革延續了過去十七年來共產黨統治的許多特徵，但它是一次如此重大程度的「大覺醒」，令所有之前的運動都相形見绌。<sup>131</sup> 可以肯定的是，吹捧劉少奇的安源功勳，特別是在他 1961 年成為毛澤東的指定接班人時，也都近似於狂熱的崇拜。雖然之前的這種運動是由國家宣傳系統積極開展的，但也未有任何地方可及文革階段的群眾參與規模和狂熱吹捧程度。對劉少奇的個人崇拜仿效的是對列寧和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其目的是用來加強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威望。相反，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旨在向國家的青年灌輸一種新的無產階級精神，從而讓他的革命可以千秋萬代永世長存。<sup>132</sup> 而這個目的通過說教的課本和宣傳電影是不足以達到的。別無其他，必須要擾動國家靈魂的一場宗教復興運動才可以實現。

將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動加以適應性轉化，從而服務於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不光是由犬儒主義的國家領導者們特意製造出的一個工具性策略。首先，群眾對毛澤東的崇拜在共產黨建立黨國體制以前業已存在。<sup>133</sup> 另外，人類學家芮馬丁在更廣泛的意義上提醒我們中國民間宗教的影響。她指出：「除非承認宗教同時也有助於那些無政治權威的人達到某些有益的目的，否則任何簡單地聲稱中國的儀式和宗教為政治權威者服務的說法一定是誤導人的。」<sup>134</sup> 毛澤東在去世之前試圖通過清洗「中國的赫魯曉夫」與他的蘇聯主子所奉行的修正主義路線，從而淨化他的革命集體並恢復純正的革命信念。他在人民解放軍相助下，號召中國人民跟隨他奪回他們自己的革命遺產，並在此過程中重拾國家的榮耀自豪。作為這次精神運動的關鍵舞臺，安源不僅在當地居民眼中，亦在國家媒體報導中獲得前所未有的重視。雖然安源過去曾被讚譽為中國的小莫斯科，但如今這個地方斷然放棄擁有過的蘇聯血統，轉而擁護毛式的革命路線。安源不再是中國革命者嚮往和尊奉外國經驗的象徵，而是已然成為中國獨特革命道路的符號標誌。安源上演的這幕漫長的道德劇目在文化大革命階段中的迴響，伴隨國家對外國革命叛變者（譯者註：此處作者似暗指文化大革命中廣泛宣傳的「蘇聯修正主義」概念）的救贖之勝利，至今仍振聾發聵。



## 第七章

# 革命傳統發生變革

1976年秋天毛主席逝世，他的遺孀江青連同「四人幫」其餘的激進成員被戲劇性地緝捕，長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終於正式落幕。三年之後，鄧小平宣佈了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改革開放」政策，目的是發展中國的經濟，使中國重新與國際社會展開交往。隨之引起的商業化和全球化使得毛澤東時代發展起來的文化操控體系 (system of cultural patronage) 產生了一些重大變化。長期研究中國文化政治的學者理查德·克勞斯觀察到：「隨着開放性的增強、國家監管的大幅減弱以及藝術家專業性的提高，一種新的文化政治已經成型。」<sup>1</sup> 但這並非意味着在後毛澤東時代，國家對於塑造和控制國民的思想毫無興趣。宣傳機器現在全面利用效力強大的大眾傳媒新形式，如電視、無線通訊技術、互聯網等，繼續大力宣傳倡導國家的首要事務。傳播學者趙月枝將現在的體系概括為一個「普遍全面的制度，其強制性、規管性、官僚化、技術性以及規範性的權力滲透到公共傳播的每一個層面」。<sup>2</sup>

相對開放的文化場所與模糊含混卻又無所不在的宣傳工作搭配在一起，使得改革時期中國革命遺產的展示和保護活動，出現了許多充滿諷刺意味、相互不協調的現象。上海「新天地」這個高檔酒吧餐飲區正坐落在中共一大會議舊址的位置，是以建築形式來傳達革命傳統蘊含多重意義的一個有名範例。<sup>3</sup> 對於安源勞工運動歷史的重新解讀存在着對立的紛爭，雖非廣為人知，但或許更具啟示意義。

## 撥亂反正

在後毛澤東時代的初期，安源的故事重又提起，顯然是出於官方的授意。例如，藝術家侯一民曾因他的「反動」油畫《劉少奇與安源礦工》遭

受迫害，而此畫在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於 1961 年揭幕開放時做過公開展出。他過去因政治受到嚴重批判，到 1977 年，他憑藉油畫《毛主席與安源工人在一起》重新受到公眾的注目。侯一民的新作品表現了一個簡便隨和的毛澤東，身穿襯衫和長褲，在礦井下半蹲着與一群傾聽得入迷的衣衫襤褸滿身塵土的礦工們談話。這與文化大革命時期劉春華的經典肖像畫《毛主席去安源》形成了鮮明對比。《毛主席去安源》描繪了一個獨自巍然屹立山巔的被神化了的毛澤東形象；而侯一民的新作則一如他的早期作品《劉少奇與安源礦工》，在構圖上讓群眾環繞於領袖周圍。雖然侯一民的兩幅畫的創作時間相隔十多年，政治環境也迥然相異，但現在卻被認為是正確反映劉少奇和毛澤東同為安源勞工運動領袖的系列作品。<sup>4</sup> 後一幅畫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不久便被掛在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中展出（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後來被併入中國國家博物館）。<sup>5</sup>



圖 13

油畫《毛主席與安源工人在一起》，作者侯一民，1977 年繪。圖片由汪悅進 (Eugene Wang) 提供。

在後毛澤東時代，之前製造的政治冤假錯案得到平反，從中受惠的並非只有藝術家，受人矚目的是一大批遭受迫害的政治精英得到平反昭雪。其中最受世人關注的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大冤案的受害者劉少奇的名譽在身後得到恢復。1980年春天，數百萬中國人通過電視收看這位前國家主席的追悼大會，加諸他身上的政治罪名，全部被正式洗清。在安源，逾兩萬名群眾聚集在工人俱樂部大樓前的操場上觀看了現場直播。<sup>6</sup>

正如大家已知曉，劉少奇在安源的所謂「右傾」錯誤是文革期間他受批的一大罪名。故而，隨着政治上對他平反，安源革命史被重新解讀也就毫不令人驚奇了。在官方舉行為劉少奇恢復名譽儀式之前的數月，他的遺孀王光美向兩個全國性大報《中國青年報》和《工人日報》的編輯部寫了一封公開信，目的是澄清劉少奇在安源的經歷。王光美之所以選擇這兩個報紙作為發言的渠道，主要是因為報紙的受眾是文化大革命中積極參與批判劉少奇的群眾運動的兩大主幹群體：青年人和無產階級。王光美以其亡夫之言，聲明理由是以工人自身的利益為重，為劉少奇在1922年安源大罷工中採用的策略作出有力的辯護：

工人日報社和中國青年雜誌社

同志們：

幾封來信都收到了。你們多次問我少奇同志對安源大罷工問題說過什麼。我現在簡單地講幾句話。

在文化革命初期，有許多歪曲安源罷工的大字報和批判文章。少奇同志看到後，他說：「具體的歷史事實是否不掉的！」當時我問他：「有沒有更好的辦法進行鬥爭？能不能堅持罷工直到路礦當局答應全部條件為止？」少奇同志回答：「太冒險。毀了機器房，水淹了礦井，幾年不能開工，一萬多工人怎麼辦？幾萬人的吃、穿、生活怎麼辦？」「在工人群眾發動起來以後，罷工高潮時，經過談判，路礦當局滿足了工人的大多數要求，取得了勝利。既爭取了安源工人的眼前利益，又代表了工人階級的長遠利益。安源大罷工效果是好的，改善了工人的生活，提高了工人的覺悟和政治地位，顯示了工人團結的力量，鼓舞了全國的廣大工人。」……

少奇同志對安源感情非常深厚。他多次答應安源的老工人和烈士子女們，他一定再去安源看看。有一次，少奇同志乘火車南下開會，途中在萍鄉車站月臺上徘徊近半小時，並答應當地幹部，他將專門到安源去一次，看望安源的同志們，參觀礦井建設，了解老工

人生活得如何，夜校還繼續辦麼？……安源的山山水水對他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少奇同志的這個願望，永遠不能實現了！不過，可告慰於他的是：歷史恢復了真實的面貌，這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勝利！緊緊地握手！

王光美

一九八〇年一月二十五日<sup>7</sup>

劉少奇得到平反昭雪一事在安源引起了一些反應。由於政治氣候的變化，當地政府以糾正歷史錯誤的名義，首先採取了一系列象徵措施，部分恢復了以前的做法。例如，該地的地方新聞報重新刊用之前劉少奇為之題寫的報頭。

王光美收到同文革前一樣在報頭印着她已故丈夫題字的《萍礦工人報》的贈刊。她向該報的編輯部回覆了一封感謝信。王光美稱讚安源工人在恢復其夫名譽上的作用十分關鍵，並強調安源對於後來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發揮的作用相當重大。

萍礦工人報編輯部

同志們：

接到你們熱情的來信和寄來的《萍礦工人報》。看到你們又刊用了少奇同志在一九五五年題的報頭，我的心情十分激動，想必安源的職工同志們也同我的心情一樣。

安源是少奇同志早年從事革命工作的著名地方。在這裡，他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深厚的感情，更重要的是他從這裡學到了極為可貴的知識，總結出很多的經驗。這些知識和經驗，對於黨和少奇同志以後的革命鬥爭，有很大的影響和意義。

少奇同志是黨和人民在革命鬥爭中培養起來的。

少奇同志平反昭雪，進一步體現了黨的實事求是精神，是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共同奮鬥的結果，安源職工同志們付出了巨大的力量。

請你們轉達我對安源職工幹部們的敬意！

王光美

一九八〇年三月八日<sup>8</sup>



王光美同之前的共產黨領導們一樣，倚借所謂的安源工人之意來標注自己（及其丈夫）的政治立場之正確。作為中國的「被選中的無產階級」，安源工人仍然享有一種精神力量，令政治領袖們忍不住要對之聲明宣示，以此作為其革命合法性的依據所在。王光美的意思是安源工人同她一樣，對劉少奇的革命工作懷有無限的深情，並且絕對認可。

然而，事隔不到兩周後，另一樁政治平反表明安源工人對領導 1922 年大罷工的另一位領袖人物李立三懷有更深厚的感情。3 月 20 日，舉行了一場國家級的追悼大會，出席者逾七百人，包括鄧小平、胡耀邦以及李立三原籍俄羅斯的遺孀李莎。李立三作出的革命貢獻，包括在安源的功勞，終於受到肯定，雖然來得太遲。對李立三所作的正式結論部分摘錄如下：

一九二二年他和劉少奇同志受湖南黨組織和毛澤東同志的委派，到安源從事工人運動。開辦安源工人補習學校，成立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開展工人業餘文化活動，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教育工人，發展黨組織，直到現在，安源的老工人，只要一談到李隆邛（立三同志當時用的名字），都覺得很熟悉和很親切。他同劉少奇等一起領導安源路礦工人進行的罷工鬥爭，對推動當時江西、湖南和全國的工人運動，發揮了很大作用。<sup>9</sup>

隨着劉少奇和李立三在政治上得到平反，基層幹部和文化工作者被允許對安源工人運動進行全面的重新評價。

1981 年，之前被列為禁書的礦史《紅色的安源》重印發行了新的版本，編者依舊是中共萍鄉煤礦委員會宣傳部，王光美 1980 年 3 月稱頌其夫安源經歷的那封信也編排在前言之中。以往出版發行過的《紅色的安源》各版本皆由彭永輝率領的編寫小組編纂而成，彭永輝亦是曾受嚴厲批判的電影《燎原》的編劇。1982 年他復出創作了《燎原》的續集，這部名為《大澤龍蛇》的電影受到廣大觀眾好評。這部新片延續了安源的故事，繼續講述北伐戰爭、秋收起義以及 1928 年組建紅軍隊伍的故事。影片圍繞劉少奇的保鏢袁品高（影片中的角色稱「易猛子」）的經歷展開，講述他被國民黨抓獲，從監獄逃脫，然後與共產黨重新取得聯繫的故事。《大澤龍蛇》由中國最著名的電影導演之一執導，取景於安源礦區。此片引發了媒體對這座煤礦小城鎮的一波報導熱潮。<sup>10</sup>

過去被批判的國家領導人現在得到平反，令那些地方上的擁戴者直接在政治上得益。彭永輝重新成為文學名家，身居行政要職，在改革初期被任命為安源煤礦工會主席。<sup>11</sup> 勞模郭清泗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早期為修繕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向劉少奇開口央求而獲中央撥款，此時也復出擔任安源黨委副書記。<sup>12</sup>

## 展示改變後的傳統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紀念館在當地繼續發揮政治風向標的功能，在改革初期開展了一番全面大調整，以順應時勢變化。1980年，館內的展覽佈置進行了一次重大調整，文革時期神化毛主席的展品均被替換下來，從而使佈局更為均衡。陳列品經過改動和補充，彰顯其他共產黨早期領導人，尤其是李立三和劉少奇在安源大罷工的動員工作，以及之後活動中所作的貢獻。展覽仍沿襲以往的結構分為六個部分，新的標題使用相對平實低調的語言，表現出更為尊重史實的態度。這六個部分為：(1) 安源工人的苦難和自發鬥爭；(2) 安源黨組織和工人俱樂部的建立；(3) 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4) 安源工人運動深入發展；(5) 安源工人運動與農民運動相結合；(6) 安源工人參加秋收起義。以往的展覽經常摘錄對老工人的訪談，時常多是一些並不可靠的材料。而現在每個展品都一絲不苟地標注了文字出處，均是全國各地圖書館或歷史檔案收藏的資料。<sup>13</sup>

修整工作不止於安源紀念館內部，其外觀也受到留意。雖然1972年紀念館的館名去掉了毛澤東的名字，但矗立於山頂的這座紀念館的屋頂上仍然保留着巨型的陶瓷毛主席頭像。這個頭像取材於劉春華1967年創作的那幅青年毛澤東去安源的油畫。1983年，劉少奇遺孀王光美宣佈她將會到安源作第一次訪問。當地幹部擔心若她遙望見到其夫的文革對手頭像會生不悅情緒。萍鄉官員急切預備要隆重熱情地接待這位貴賓，於是經上級部門批准，趕在王光美抵達之前將毛主席的頭像挪走了。毛主席的頭像被搬走後，在原頭像的位置上豎起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的部徽。部徽圖案為鐵錘和尖鎬交疊在火車輪上，象徵俱樂部成員由礦工和鐵路工人兩類群體構成。與1972年館名的更改一樣，現在這個紀念館是

表彰安源工人成就的一座豐碑，而不是為了紀念某一位革命領袖個人的豐功偉績。

紀念館外觀面貌的另一次更新則具有重大的象徵意義，表明安源仍擁有令高層領導運用文化操控技巧的吸引力。1984年，鄧小平親筆題寫了紀念館正門上的匾額，館名被正式確定為「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紀念館」。<sup>14</sup>紀念館工作人員和幹部們堅持多年的共同努力，終於成功地讓鄧小平為之動筆題字。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期，中國社會從毛澤東思想轉向「改革開放」，這座紀念館作為一種被否定的革命歷史遺跡落後於時代步伐，一度被呼籲關閉。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期，當地一些機構開始測繪紀念館所佔的一大片良地，規劃將紀念館推倒夷平之後，原地興建工人宿舍。紀念館工作人員察覺到自己的飯碗岌岌可危，於是在1983年春天集體開會商討紀念館該如何維持下去的辦法。他們一致認為最有效的辦法就是說服某位德高望重的中央領導，最好是鄧小平本人，親筆題寫館名。但他們不知該如何爭取鄧小平的支持，他們最初向萍鄉黨委交去的報告也未有回音。

隨着王光美1983年12月訪問安源的日期臨近，紀念館工作人員醞釀出一個新主意。紀念館的領導成員明白，與高層領導的私人關係有助於地方工作納入文化操控之中，於是懇請王光美幫其遞交一封信予鄧小平本人。但令人失望的是，劉少奇遺孀對此請求的答覆卻不太積極。與其亡夫通常的做法一樣，王光美以黨的紀律為由來推脫。她表示：「要我帶信當然可以，不過通過我個人將信轉給鄧小平同志不太符合組織原則。」雖然王光美返回北京時帶上了那封信，但是過了好幾個月紀念館都未收到回覆。然而，1984年5月，館員們在報紙新聞上獲知鄧小平為其他一些革命紀念館題寫了館名牌匾。於是他們草擬了另一封給鄧小平的信，上報給萍鄉黨委審閱並經修改後（雖然並未出具官方文書），次月便寄送北京。近三個月後，1984年8月31日，鄧小平潑墨揮毫，題下總共十一個字的紀念館全名。不久，中共中央辦公廳把這份珍貴的題詞快遞到南昌的江西省委辦公室。省委將原件留下存檔，給萍鄉寄去一份複件，供安源紀念館使用。9月底，近一千人聚集在安源紀念館參加由鄧小平親筆題寫的新牌匾揭幕式，出席者包括地方黨政代表、工人、農民、軍人以及在校學生等。<sup>15</sup>

紀念館的外觀面貌大變樣，內部的展覽佈置也有變化。1987年，紀念館做了一番重大調整，以迎接次年的安源煤礦建立九十周年節慶。這次更新力求令這個「五十年代標準」的展覽達到現代化水準。為了能夠吸引現在的觀眾，展覽佈置了新的燈光，加入了視聽特效。內容上，1987年調整工作的指導方針不僅重申了1980年調整工作堅持的「恢復安源工人歷史真實面目」的原則，並且強調要突出本地特殊經驗的必要性，而不光是展示中國革命史的普遍性。另外，還要在不偏不倚的視角去看待安源勞工運動的曲折歷史，而不光是展示光輝勝利的一面。更細而言，這次調整的目的，是要對工人運動領袖們的貢獻給予應有的重視，同時避免將「某些歷史人物理想化」。展覽重點集中於從1921年至1930年這一「經典」階段，而這段時期被認為是安源勞工運動對中國革命發展作出主要貢獻的時期。<sup>16</sup>

1987年的展覽中，有諸多新展品第一次展出。其中，一幀攝於近九十年前的1898年安源煤礦開礦紀念照片尤為珍罕。這張照片由煤礦公司前礦長李壽銓之子捐贈，上有李壽銓和幾位中國同事，以及首席工程師賴倫同幾位德國同事。令人驚訝的是，所有中國人都身著西式服裝，打着領帶，而所有德國人都穿着中式長衫！與過去劃分「西方帝國主義」的單一論調不同，後毛澤東時代的「改革開放」政策對在安源煤礦創始時期便實際存在着的國際合作給予微妙、體諒的承認。<sup>17</sup>

新展覽更具有全球性視野，前礦長之子並不是唯一表示支持的安源故人後代。1987年重新佈置之後，紀念館吸引了來自全國各地的貴賓，包括毛澤東僅剩的兒子毛岸青。毛岸青出生時正是他父親積極參與安源勞工運動的時期。他從小聽着煤礦的故事長大，一直懷有訪問安源的願望。參觀完展覽後，毛岸青應邀在紀念館留言簿上題寫觀後感。由於毛岸青於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在蘇聯接受教育，並不如其父一樣擅長中國書法，他用俄文寫下留言：「安源工人首先舉起中國革命的大旗。安源工人是中國革命的前驅。」<sup>18</sup>

另一些具有外國背景的安源名人親屬也被請來為新展覽助力。原籍俄羅斯的李立三遺孀李莎在北京的家中為此接受採訪。她辛酸的談話委婉地道出安源對她亡夫所具有的矛盾意味：「立三同志經常跟我談及安源。他對安源有深厚的感情，很想回安源去看看。可他到南方休假時，竟繞開了安

源。他的這種矛盾心情，你們是可以理解的。」當應邀為周年展覽寫下賀詞時，她用俄文寫下了政治正確的一段話：「安源工人運動在中國革命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祝今日的安源工人在社會主義建設中作出更大的貢獻！——為紀念安源煤礦建礦九十周年而題。李莎。」<sup>19</sup>

四年後，為紀念安源大罷工勝利七十周年，紀念館的展覽又一次重新佈置。雖然保留了以往各次展覽的組織結構和意識形態的框架，1992年的陳列佈置使安源故事的演示更為生動，比以往的展覽增加了更多、更複雜的歷史人物。李立三成功取得三合會頭領的合作如今已是故事中受認可的一段。甚至新展覽中也有蔣介石的身影，照片所配的正面文字說明如下：「1926年9月14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到安源，一萬四千餘群眾集會歡迎。蔣介石在歡迎會上極力稱讚安源工人，並提出由工會和礦局共同管理礦山。」<sup>20</sup>由於中國大陸正在與臺灣海峽對岸進行接觸，爭取昔日夙敵國民黨的善意表述，這個過去被批為罪大惡極的大魔頭現在才能被描繪成一位在安源革命故事中起過積極作用的人物。

## 非官方解讀

雖然官方對安源勞工運動的重新解讀展現了一個更加多元化的故事情節，大眾的想像仍集中在毛澤東身上。經歷過1922年大罷工的老人們或許認為李立三是最受人景仰的領袖，但對於大部分在文革中成長起來的工人們來說，毛澤東才是安源工人階級的救星。工人們對毛主席懷有由衷的敬意，這一點在1983年為劉少奇遺孀王光美訪問安源之行的準備工作中表露無疑。當地居民聽到官方計劃要將自1968年以來一直立於安源紀念館屋頂、作為標誌的毛主席頭像拆除的風聲，可是無一個工人願意參與這一被普遍認為是褻瀆革命的行動。結果，當地幹部不得不花費一大筆錢從外面僱用了三個人來砸碎這座毛澤東陶瓷像。後來當地人紛紛傳言，招來做這一備受爭議的拆除工作的三人，在一年內相繼死於非命。一名安源工人堅持說：「你不要懷疑這件事，我告訴你，這件事是千真萬確的。誰要動毛澤東，肯定不會好的。」<sup>21</sup>

1993年，萍鄉市民們廣泛散佈一則流言。根據當時的黨委書記的表述，此事說明人們對毛澤東的記憶仍深受其領袖魅力光環影響。

是真是假沒有人去探究，但似乎人們寧可信其有而不可信其無。傳說 1993 年 12 月 26 日毛澤東誕辰 100 周年前夕，豎立在韶山廣場的毛澤東銅像從南京製造廠運回韶山的時候，途徑萍鄉，因為時間尚早，負責運輸的人本想稍事休息就繼續往前走，可是車子進了萍城以後，卻怎麼也發動不起來，一直從下午三四點搞到五六點鐘也找不到原因，司機只好住宿下來。第二天清早，司機請來修理工，可是還未修，司機爬上駕駛室一踩油門，車子就隆隆地發動起來了，一點毛病也沒有了。後來人們就說，車子本沒有毛病，是毛澤東對萍鄉對安源有感情，特意要留下來住一晚，看看老地方，會會老朋友。而且慢慢地有人說，那天晚上有許多人在夢中見到了毛澤東、劉少奇、李立三在一起會面，甚至聽到了毛澤東帶着濃重的湘潭口音在講話。<sup>22</sup>

十年後，安源也豎起了一座毛澤東銅像。為了紀念 1922 年大罷工勝利八十周年，以劉春華創作的青年毛澤東去安源的油畫為原型而製作的一尊巨大毛澤東塑像被豎立在煤礦大門裡面。<sup>23</sup> 當地報紙報導了群眾興奮激動地歡迎銅像的情形：

當毛主席銅像護送車沿躍進路往東門道口，萍安大道去安源時，沿途群眾，包括商店，工廠的職工，都自發地燃放鞭炮恭迎。一些得知消息稍晚的群眾，紛紛租摩托車去安源迎接毛主席銅像。毛主席銅像順利抵達廣場，人們仍是久久不願離去，場面感人。它使我明白了什麼叫永遠活在人們的心中。<sup>24</sup>

當地居民顯然歡迎由雕像揭幕儀式引起的外界關注，但並非所有親歷者都會為之感動。美國記者潘公凱 (Philip Pan) 以嘲弄的語調記錄了他當時的安源之行：

2002 年，我到安源去參加紀念安源煤礦大罷工勝利八十周年的慶典活動。那是一個溫暖而灰濛濛的下午，在舊煤礦附近的一個廣場上聚集着一小群人，觀看共產黨官員們為一尊毛澤東銅像揭幕的儀式。這尊銅像依照文革時期那幅著名的毛澤東肖像畫而製成。即使是根據共產黨的標準，這也算是一樁恥笑之事。這不光是由於大多數的城市體面地、悄悄地拆掉了它們的塑像，而多年之後安源的官員反而豎起一座新的塑像。這也不僅是由於他們要長久地維持關於毛澤東在安源罷工中角色的認識的歷史謬誤，而這一謬誤還被用來掩蓋毛澤東後來把當時在組織礦工工作中貢獻最大的共產黨同志迫害致死的事實。其可笑之處在於，他們企圖表現共產黨是工人階

級的捍衛者。在過去，國家似乎一切為着無產階級，那時工人們端着享有工作保障和福利的「鐵飯碗」。但在毛澤東逝世已經二十五年之後，只有傻子和騙子才會信誓旦旦地說共產黨正在建設一個工人的天堂樂園，還在關注着像安源煤礦工人一樣的這類人。<sup>25</sup>

雖然鮮有安源工人稱讚後毛澤東時代的黨國體制增進了他們的福祉，但質疑依舊將毛澤東奉為神明的人恐怕更寥寥無幾，並不似潘公凱一樣。

## 重新表述安源

關於安源革命傳統的解讀存在對立的紛爭，而且爭論並非囿於安源煤礦。安源煤礦 2002 年豎立的那座備受爭議的銅像，以劉春華在文革時期創作的經典油畫《毛主席去安源》為原型。劉春華的這幅油畫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口舌之戰，成為全國關注的一個焦點。與繼續依賴熟習的文化操控實踐而進行的官方認可解讀不同，圍繞劉春華這幅油畫的爭論表明在後毛澤東時代，嘈雜的公共話語體系中，藝術品拍賣商、版權申索人、電視媒體爆料人和先鋒批評家發出新的文化聲音，其影響力日益提高。

數十年之前，劉春華這幅油畫在北京展出結束後，被定為「一級國家文物」，被革命歷史博物館收為永久藏品。但是一旦文革結束，這幅作品便開始遭到批評。1979 年 3 月，蒙受十年牢獄之災的著名漫畫家葉淺予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明確地揭示劉春華的油畫蘊含的宗教意味。葉淺予批評這幅畫的創作動機在於逢迎獻媚，而且與狂熱的個人崇拜之風有極大關係：「見過那幅畫的內行人都說其構思、構圖，甚至用色，無不脫胎於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宗教畫。『四人幫』把那幅畫欽定為美術作品的樣板，命令大量複製，凡樓堂館所、公私房舍統統懸掛，並且大量印刷，廣為分發。」<sup>26</sup> 或許為這種批評所刺痛，劉春華於 1980 年開具北京畫院的公函，從革命歷史博物館取走了他年輕時繪製的畫作。

隨後十五年中，這幅頗受爭議詬病的油畫靜靜地收置於劉春華自己的私人藏品裡。然而在改革年代，迅速商業化的文化市場帶來巨大的利潤誘惑，最終讓人難以抵擋。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毛澤東熱」帶動有關文革藝術品的市場需求量井噴，劉春華決定將他的珍貴藏品出售獲利。<sup>27</sup> 1995 年，時任北京畫院院長的劉春華在一次公開拍賣中以 550 萬元人民幣的天

價將《毛主席去安源》賣給中國建設銀行廣州市分行。這一事件激起了全國新聞媒體的強烈反響，諸多文章、社論和電視廣播節目都激烈地批評將這幅經典畫作進行買賣的行徑，屬於嚴重的國有資產流失事件。擁有巨大影響力的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新聞欄目，對這起轟動一時的訴訟案專門製作了一期節目，引起廣大觀眾的高度關注。節目中採訪了與1967年至1969年在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舉辦的「安展」有關的多名紅衛兵，而劉春華的油畫正是為這次「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亮安源工人革命運動」展覽而特意創作的。他們憤怒地指出，拍賣這幅畫是國家的一樁醜聞。一名街頭群眾在採訪中如此評論：「那是我們在小學見到的畫，這幅畫可以說在全國的影響乃至於在世界的影響都很深，從當時文革這個歷史情況看，當時那種背景，它應該屬於國家。」<sup>28</sup>

革命歷史博物館此時意識到原先收藏的這件「國家文物」含有的符號象徵價值與經濟價值，於是急於索回。但在改革年代，國家機構不能強行採取行政命令，必須依法行事。因此，1998年博物館向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起訴劉春華和建設銀行，主張《毛主席去安源》是國家財產，並要求原物返還。在案卷材料中，博物館提供了由國家國有資產管理局開具的聲明此畫確是國有資產的信函。次月，劉春華反訴財政部（由於國資局剛剛併入財政部），堅稱此畫乃是他的個人創作，因而是屬於他的個人財產，他有權任意處置。法院受制於案件的政治敏感性，一時也無法裁定所有權的歸屬，便宣佈這兩個案件無限期休庭。而此時，當年參與組織1967年「安展」的紅衛兵們被激怒了。他們認為正義未得到伸張，對劉春華提起訴訟，聲稱這幅油畫實際上是一件集體創作的革命政治藝術作品，而不是劉春華的個人之作。他們表示劉春華賣畫牟取私利的行徑侵犯了事實上的集體著作權。2000年3月，原告們在一封致媒體的公開信中解釋了自己的動機：

《毛主席去安源》是在文化大革命這一特定歷史時期產生的，儘管這幅畫所表現的內容是符合歷史事實的，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起的特殊政治作用，對正在受迫害的劉少奇主席起到了雪上加霜的作用。而劉春華至今還認為畫這幅畫是他的殊榮，不僅如此，劉春華還把這幅集體創作的作品據為己有，堂而皇之拍賣了。當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劉春華靠這幅畫撈到了政治資本，升了官；今天他又靠這幅畫發了財。<sup>29</sup>



實際上，這些昔日的紅衛兵們認為，無論是在毛澤東時代的文化操控體系下，還是後毛澤東時代的文化商業化潮流中，劉春華都撈取了不當得利。主審法官在訴訟庭審中指出，這個牽涉了政治的官司要得到公平的處理結果存在一定的困難：「本案是一個歷史問題，涉及到許多歷史背景，有些問題不一定非通過訴訟解決，因為有的問題不一定有結論，即使有了結論也不一定合適。」歷經多年的媒體追蹤報導和法庭上的對峙辯論，2002年4月1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最終作出判決。這個結果卻被其中一位原告稱為是「愚人節玩笑」。這個令人費解和頗受爭議的判決裁定，雖然劉春華個人擁有這幅畫的著作權，並由此可以保留售畫所得收入，但這幅畫的所有權卻屬於國家。但是因為這幅畫的購買方為建設銀行廣州市分行，從技術角度上講，本身乃是一個國有單位，所以這件國有資產仍然保留在國家手中。劉春華出售實際上不屬於他所有的畫作受到批評，但因為訴訟時效問題，法庭裁定依照法律條文，革命歷史博物館已不能追索回其合法財產。<sup>30</sup>

劉春華這幅畫作的曲折歷史，可以被認為是中國革命經歷的一種隱喻。一群富有理想主義的學生，懷着推動進步的社會和政治事業前進的熱望創作了這幅油畫，而這幅浪漫主義圖畫成為國家神化暴君的工具，幫助其以兇殘不義的恐怖運動翦除政敵，使千百萬青年的革命理想最終幻滅，而到最後中國革命傳統轉而商業化，儼如一幅諷刺畫，嘲諷着革命的初衷。這一荒誕的判決令許多批評觀察家震驚，也恰恰反映出對中國革命的意義作出廣泛認可的定論近乎不可能。

雖然（或者也許正因為）經歷曲折，劉春華的這幅畫仍然是政治評論提取靈感的來源。並且，在現時相對寬鬆的文化政策下，這些批評極富創意。縱覽整個改革年代，先鋒藝術家們以油畫《毛主席去安源》的著名形象為題材，再創作了各種各樣引人注目又妙趣橫生的新作品。<sup>31</sup> 例如，1991年劉大鴻創作了一幅題為《春》的畫作，以修正主義手法詮釋劉春華原作的宗教意味。劉大鴻的作品描繪青年毛澤東頭頂光環籠罩、身沐於冉冉升起的紅日，猶如武功山之巔的佛教版「登山寶訓」。在劉大鴻這一異想天開的版本中，毛澤東依然身著文人長衫，但放下了他的湖南雨傘，手上則放出一束神秘亮光。劉大鴻對宗教形象的借用強調了原作蘊含的虔誠特色。然而，將安源畫像通過改造方式創作的產品日漸反映更多的商業元

素。1995年，原作被拍賣給建設銀行的那一年，王興偉創作的《東方之路》描繪了一個現代形象的毛澤東，身著鮮亮的西裝，手上的舊式湖南雨傘被新的洋傘取代，大步流星跨越武功山，背向安源離去。顯然，王興偉的畫作意在表示革命已遭拋棄，現在追求的乃是新的經濟發展機遇。王興偉1996年創作的《盲》展示了一個同樣現代形象的毛澤東，畫中毛澤東把洋傘當作盲人手杖拄着，顯然正在尋找下山的道路。2000年，王興偉另一幅名為《X光》的怪異畫作，描繪了一個青年毛澤東與一個老年毛澤東在去安源路上的山頂相遇，而在他們中間卻橫着一具屍體（也許是中國革命的屍體？）。甚至外國藝術家也加入到戲謔安源畫作的行列中。艾豪·古德門德 (Erro Gudmundur) 2003年繪製了一幅《毛最後的威尼斯之行》 (*Mao's Last Visit to Venice*) 的畫作，畫中毛澤東仍是一身文人長衫，手持一把湖南雨傘，而置身的背景卻是義大利的城市風光。

在近期，中國藝術家們以在原作上添加或刪減人物的手法來製造諷刺。尹朝陽2005年創作了一幅與劉春華作品同名的畫作《毛主席去安源》。他在大家熟悉的武功山場景中加入一位向毛澤東揮手的年輕工人的模糊身影，至於這揮手是為了引起主席的注意還是在向他道別則不甚明晰。岳敏君2005年也繪製了同名畫作。顯而易見，圖畫中的武功山風景完全複製劉春華的原作。但是畫面上卻空無一人，甚至也無毛主席本人的身影。革命領袖或許會淡出，可中國的美景永存。在馬保中2007年創作的同名畫作《毛主席去安源》中，陰影籠罩的毛主席在武功山上歡迎個人崇拜的先驅斯大林，而斯大林本人卻身穿中式長衫。共產主義變成中國的了！

而在最近，數碼技術的應用使得安源畫像上的組成部分得以被重新配置，證明這幅油畫作為道德評價來源的影響力不減。2008年，王彤創作了一幅《毛主席去安源》的攝影作品，將穿着長衫的毛澤東形象置於宮殿般的安源區政府辦公大樓之前。這座龐大的辦公大樓耗費了巨額公款，令當地人十分氣憤。一幅題為《錢雲會上訪》的匿名作品，用一名正直的地方官員錢雲會的頭像取代了毛澤東的頭像。2011年錢雲會替被強徵土地的村民遞交上訪信後，被一輛卡車碾死，有傳言說是政府方面的命令。畫上仍是大家熟悉的武功山風景，錢雲會神色安詳地屹立着，身著長衫，手



圖 14

油畫《東方之路》，作者王興偉，1995年繪。此畫是對劉春華畫作《毛主席去安源》的諷刺。畫上描繪一個現代形象的毛澤東，身著西裝而非長衫，手握一把洋傘而非湖南雨傘，並且背對安源。圖片由漢雅軒畫廊提供。

持湖南雨傘，但是在身後的畫面上插入了一輛紅色大卡車，而他卻毫無察覺。<sup>32</sup>

當油畫《毛主席去安源》的原創者劉春華在 2007 年被問及他這幅影響力巨大的畫作的意義時，他的回答一如預料，十分謹慎：

這是一個特別敏感的問題。事實上文革是一場政治鬥爭。政治鬥爭的歷史從來都是「你死我活」的。今天，文革被認為是一場災難。……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待無產階級革命歷史，關於其到底有沒有促進無產階級利益的這個問題，我相信需要留待未來對文革歷史有更多的探討時再來評價。<sup>33</sup>

雖然這位藝術家的回答採取了回避的方式，但是正好反映了這場殘酷的群眾運動的模糊性，而且至今這場運動仍然擁有辯護者，尤其是在安源工人之中。

## 工人們的思想意識

美國記者與先鋒藝術家們的批評極具反諷意味，但是與此相反，許多安源工人依然毫不掩飾他們對毛澤東的景仰之情，對毛主席開闢的革命偉業由衷地崇敬，而對後毛澤東時代的市場改革則看法矛盾。儘管改革年代推行的經濟政策令大多數安源居民的生活顯著提高，但是人們對毛澤東和他親手創下的傳奇般的豐功偉業仍懷有由衷深情，特別是由於他領導的革命讓安源工人們享有尊嚴。他們有一種論調認為，改革的今天還不如過去的革命年代，成為當地話語體系的一個中心主題。<sup>34</sup>

工人階級對毛澤東時代的偏愛，映射出他們格外眷戀作為國企工人在改革前號稱「鐵飯碗」的就業保障。市場改革下的下崗失業現象，被認為是悖離了毛澤東領導的革命的承諾。一名退休礦工解釋：

原來吃大鍋飯時，生活還有些保障，起碼還有工做。幹部對你再有意見，最多是將你的工種搞得差一點，沒有過硬的理由，他無論如何也不敢把你開除的。現在情況不一樣了。不是說要改革嗎？這一改，幹部的權力就大了，現在他們想叫誰下崗就叫誰下崗，理由都不用找了……當年毛主席領導我們安源工人鬧罷工時，就是為工人爭權力啊，現在還是共產黨的天下，卻通過改革把我們工人的權奪走了。<sup>35</sup>

比取消就業保障更令人忿忿不平的，或許是伴隨市場改革而來的日益增長的不公平現象。一名老礦工回憶：「回頭看，幹群關係最好的時候是六七十年代，六十年代這麼苦，沒有幹部吃得好的現象，都是平等。現在幹群差距大……」<sup>36</sup> 他們發覺工人地位下降不光反映在經濟層面，也在社會和政治層面。2001年，在經濟改革已進行了二十多年的時候，一名六十九歲的退休礦工回顧：

我認為，工人階級在毛澤東時代地位高……毛主席關心工人群眾，我們工人是領導階級啊。就我來講，沒有毛主席的革命，我肯定不會活在世上了。舉一個例子吧。你到老工人家裏去，你會發現凡是五十歲以上的老工人家裏的妻子一般長得都比較好，而且年齡一般都相配。有的男的要比女的相差十多歲。這是因為那時工人的地位高，好多好女人爭着嫁給工人。特別是我們安源煤礦，是毛主席工作過的地方，更有好多婦女想嫁過來。現在不行了，現在這些工人找不到老婆了。原來五十歲的工人可以找一個二十多歲的女人，現在是二十多歲的工人都找不到老婆了。你說，什麼時候工人的地位高？這是明擺的啊。對我們工人來說，毛澤東時代就是好啊。就說文化大革命這件事，我總認為，毛主席的思想還是好的，他還是想讓這個國家走社會主義道路。只是他身邊有壞人，這些壞人將事情辦壞了。<sup>37</sup>

或許礦工們有關毛澤東的印象可能受到一定的誤導，雖然如此，卻反映出安源工人團體普遍堅信中國革命的根本正確性。畢竟，毛澤東領導的革命因為賦予工人階級一種新的尊嚴而受到稱讚。

工人們對從1994年下半年開始施行的工資改革尤其不滿。這個改革措施造成幹部們的工資收入增長迅猛於工人的工資。一名工人如此總結：「中國最辛苦的一是勞改犯，二是煤礦工人。基層的工人很苦很苦，懸殊太大，做事的人工資少，不做事的人錢多。……班長書記自己不幹，一個禮拜下次把井，指揮你快做快做。」<sup>38</sup> 安源一名下崗工人抱怨：「現在的企業領導人，比當年資本家都壞。如果早知道共產黨的天下也是這樣的話，當年那些安源老工人還搞什麼革命呢。」<sup>39</sup> 一名工會幹部甚至也傷感評論：「我可以說，如果有人想像安源罷工時毛澤東和李立三那樣來安源組織夜校之類，肯定會被作為反革命送進牢房。」<sup>40</sup>

各處皆瀰漫着這種不公平的感受。人類學家梅方權在安源進行了為期一年多的人種志學觀察研究，他總結道：「在礦區調查，不管訪問什麼問題，最後礦工們總會扯到公平問題、信任問題。」梅方權又引述安源一名黨員礦工的話來加強他的觀點。此人說：「原來毛主席講話沒有人不相信的，現在……雖然言論自由，罵也好講也好沒有人管你，但也解決不了問題。」<sup>41</sup>

對於許多人而言，毛澤東及其領導的革命代表一個失落掉的道義世界，而在那個世界裡工人，特別是安源工人，被視為領導階級。1922年大罷工的口號「從前是牛馬，現在要做人」概括的是通過艱苦鬥爭力拼獲得的尊嚴感。作為安源傳統的繼承者，這種尊嚴感是工人們為之驕傲自豪的核心所在。在後毛澤東時代，儘管工資收入提高，物質條件也得到改善，但是市場改革令無產階級的社會地位和政治地位急劇下降。毛澤東領導的革命未竟當年的承諾，建立起來的反而是一個「共產黨的天下」，而工人們及其先輩所憧憬嚮往並為之犧牲的「工人的天下」卻並未實現。

安源群眾對革命象徵符號的懷念不只限於毛主席本人。1987年朱子金去世後，民眾對她的深情悼念顯然也是類似如此的反映。這位因1957年受到劉少奇接見而出名的前安源紀念館館長在六十歲時患上肝癌去世。作為大罷工期間的共產黨工人領袖朱少連之女，她被認為是安源革命名聲的一個活紐帶。朱子金之子如此描述送母親骨灰回鄉安葬時的悲傷場面：

汽車到安源已是中午。安源有許多人守在路邊等候着。我們從街頭走過時，大街兩邊圍滿了人。母親在安源工作了大半輩子，安源人忘不了她，趕來送她一程。

鞭炮聲此伏彼起，燒熱了一條街。有人說，朱子金九泉之下當含笑，有這麼多的人這麼對她有感情，安源還是二十年前這麼熱鬧過一次，那次是接一幅名叫《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畫，那次人們是領導組織才去，這次是自己來的。有人掛出了這樣一幅挽聯：生在安源葬在安源一生俯首在安源，苦也革命甜也革命終身盡瘁為革命。<sup>42</sup>

山頂上一處可以俯瞰煤礦的地方成為鐵路工程技師朱少連之女的最後安息之處，由此安源歷史的一個篇章便告結束。民眾對朱子金的哀悼之情，說明安源人民長久以來萬分感激那些使家鄉與本地的工人群體從平凡變為全國家喻戶曉的諸位功臣。

## 改革開放

雖然安源長期以來一直憑藉本地的革命經歷力爭國內（和國際）的更多關注，在後毛澤東時代，安源還是衰落下去了。自從 1925 年發生了「九月慘案」之後，這個煤礦再也未曾恢復往昔的經濟繁榮光景。儘管如此，在文革期間，成批的紅衛兵以及各種革命佈道者與朝聖者在重走革命聖地的「新長征」途中接踵而至，參觀安源紀念館，安源猶如獲得精神上的重生。2001 年，一名退休幹部傷感地表示：

改革開放後，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了，安源政治上的光環沒有了，紀念館雖然開着，可沒有人來朝聖了。就像不靈的廟一樣，沒有人來燒香拜佛了啊……這個時候，安源人無論從政治上和經濟上都有一種被遺忘的感覺啊……而安源曾經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作出過的貢獻就是不應該被忘記。<sup>43</sup>

相對剝奪感不光令人們口吐怨言，也致使人們起來抗議。官方的萍鄉年鑒承認：「貧困人口增多，貧困程度加深，系統信訪和上訪事件不斷。」<sup>44</sup> 1998 年春天，地方政府準備隆重慶祝煤礦建礦一百周年，但遇到工人群體發出甚不和諧的抗議。工人們聲稱，在經濟改革中他們不幸被甩在了後面。

上千名來自安源礦區的下崗工人遊行到萍鄉市中心向政府請願。他們的要求包括恰當的福利和工作權。當地領導拒絕與工人代表談判。經過兩天僵局，挫敗感在工人中蔓延，工人們遊行到火車站並阻塞了鐵路。他們要求一輛火車把他們帶到北京以便讓中央政府知悉他們的困境。

當局立即派一個中隊的防暴員警驅散示威者……江西省公安廳和省委派小組調查情況，並命令支付工人和養老金領取者每個月 120 元人民幣。<sup>45</sup>

1998 年的抗議事件並非僅是個例，但工人們的抱怨並不能逆轉產業改革的勢頭。在漢冶萍煤鐵廠礦公司為拓展其現代採礦業務而註冊為中國首批股份有限公司近一個世紀後，2002 年 7 月，公司以現今的正式全名「萍鄉礦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然而這一次，企業的規劃是把上市作為轉型的前奏，生產將從採煤作業轉到製造卡車、巴士汽車、玻璃製品以及其他盈利更多的物品上。<sup>46</sup>

潘公凱根據他 2002 年對煤礦的訪問之行，對經濟改革措施作出嚴厲的評價：

如果說共產黨搞的社會主義讓安源礦工失落了，那資本主義的實施則進一步加重了他們的苦難。政府重組了煤炭行業；作為全國最大煤礦之一的安源煤礦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然後大批工人下崗了，企業計劃還要讓更多的工人下崗。那些保住了工作的礦工們眼睜睜看着自己的實際收入急速減少，即使煤炭的價格和出產量都在上升。退休工人是受影響最大的群體之一。這些老人們為了給國家爭光，挖了一輩子煤，因此患上肺病，倍受折磨。他們抱怨幹部們佔用了他們的退休金，削減了他們應有的醫療待遇。有些人說自己的妻子在大城市賣淫以貼補家用。<sup>47</sup>

雖然很難斷定這些抱怨究竟有幾分客觀、幾分主觀，但毫無疑問大批礦工把他們遭受到的困難歸咎於後毛澤東時代的經濟改革。自 2003 年至 2007 年期間，萍鄉市信訪局的記錄顯示，正式登記的信訪事例達到年均一萬三千起，其中許多事例涉及多名上訪者。這些上訪的首要原因是造成大批工人下崗的國企私有化改革。<sup>48</sup>

2004 年底，幾百名老工人在萍鄉公司總部門口靜坐抗議，要求提高退休金。抗議以退休金每月上漲 55 元人民幣收場，其中一位抗議領導者苦澀地說：「我們都受到了階級敵人的待遇。」<sup>49</sup> 在隨後的採訪中被問到舉行抗議的動機時，一名參與者坦率地表示：「要說生活吧還能過下去，現在就是生活懸殊太大心理不平衡。」<sup>50</sup>

不只安源工人感到現在的改革置他們於不利，許多革命老區也呈現出同樣的黯淡景象。由於擔憂這些地方暗流湧動的不滿情緒有可能引發社會騷亂，在政治上造成難堪，中央領導層對困難的老區開始給予特別的關注。溫家寶總理和胡錦濤總書記都對革命老根據地進行了一系列訪問，着重強調繼承革命傳統的重要性。他們的行程通過媒體廣泛大力宣傳。2003 年胡錦濤在參觀江西蘇維埃舊址時表示：「革命前輩在艱苦卓絕的革命鬥爭中培育起來的革命精神和優良傳統，永遠是我們戰勝各種困難和風險、不斷奪取新勝利的強大精神力量。」<sup>51</sup> 雖未明確「精神」之內容，但這並不妨礙中國政府將它轉化為一種實在的物質財富形式。2005 年經過官方的倡導，全國引發了一股「紅色旅遊」熱潮。去毛澤東革命戰鬥過的舊地旅遊



被大力提倡，因為既加強政權的合法性，又為仍是中國農村最貧困的地區注入旅遊收益。<sup>52</sup>

## 紅色旅遊

2004年9月，中共中央辦公廳讓各地政府遞交新的紅色旅遊計劃方案，安源是全國第一個遞交申請的地方。安源紀念館被官方定為全國首批百個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之一，說明紀念館被公認具有灌輸「愛國主義教育」的「紅色資源」價值。<sup>53</sup>自1956年開館以來，安源紀念館總共接待了五百多萬國內參觀者以及來自七十多個國家的八千餘名外國訪客，是在全國和國際上都享有盛名的一個旅遊景點。<sup>54</sup>

2005年10月17日，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了一場作為「萍鄉（安源）活動周」開場活動的圖片展。這一活動讓安源在時興的紅色旅遊項目中佔據的突出地位表露無遺。圖片展在開幕當天就吸引了近萬名參觀者。這個展覽特意突出安源是兼具「紅色」教育和「綠色」休閒特色於一身的旅遊勝地。展出的圖片既表現了安源作為「中國工人運動搖籃」的光榮歷史，又展現了當地秀麗的綠色山景。為了使展覽更生動活潑及讓觀眾們更感興趣，萍鄉的一個文化表演團以「紅色安源」為主題表演了歡快熱鬧的歌舞節目。<sup>55</sup>紅色旅遊熱使安源的革命名聲更為響亮。同年，中國井岡山幹部學院成立，教學計劃中設有安源革命歷史的課程。由安源紀念館的一名研究員準備的課題「我黨早期領導人在安源工運期間的理論探索與現實意義研究」被選入其中。這是安源歷史第一次被黨政官員參加的中央級培訓項目定為一門必修課程。<sup>56</sup>

紅色旅遊作為一種新的文化操控形式，借助國家指定項目拉動消費市場的經濟力量，為掙扎中的安源礦區帶來顯著實惠。2005年秋天，安源區政府報告，安源的全年遊客數量上升55%，而旅遊業收入增長84%。在前一年，總計約五萬三千名觀光者一共為安源貢獻了逾六百萬元人民幣的紅色旅遊收益。這個結果得益於國家宣傳推廣的一個電視廣告，這個廣告大力推薦一條從毛澤東出生地韶山到安源，再到毛澤東建立第一塊農村根據地井岡山的「紅色旅遊精品線路」。截至2006年，安源一年接待的紅色旅遊遊客上升至一百萬人次以上，收益達到兩億三千二百萬元，十分令人吃



圖 15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紀念館現貌。值得注意的是，屋頂上原來安置的毛澤東頭像被從前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的部徽代替。一尊青年毛澤東的塑像立在前面。照片為作者拍攝。

驚。<sup>57</sup> 遊客們熱衷於參觀安源紀念館。紀念館除了收取門票之外，還開設了一個紀念品商店，銷售與本地革命歷史相關的各類商品。最受歡迎的紀念品是摹仿油畫《毛主席去安源》而製作的銅、水晶、陶瓷或鍍金質地的各種小塑像或其他式樣的物件。<sup>58</sup>

在這段時期，隨着電影《毛澤東去安源》、電視劇《毛主席去安源》與《安源兒童團》以及 MTV《安源是個好地方》相繼播放，安源作為旅遊勝地的知名度進一步提升。<sup>59</sup> 極其重要的是，電影和電視劇突出的一個關鍵主題，是毛澤東對地方文化習俗的特別感受力。在影視劇中，毛澤東用一口湖南腔的樸實方言贏得了工人們的信任，他用熱情歡快的湖南民歌軟化了劉少奇的拘謹性格，並對李立三在開展組織勞工工作時使用從法國學到的「外國」方法提出批評，而且毛澤東依據自己對中國工人本土性的深入理解

對其進行糾正。電影《毛澤東去安源》重點描述（和誇大）了毛澤東在 1922 年大罷工中作出的貢獻。該片後來榮獲歷史題材電影的一個國家級大獎。

雖然安源能夠吸引遊客基本上是由於與毛澤東相關之故，但是現今的文化體系還是容許將三位著名的早期共產黨領導人的傑出貢獻都加以表現。這些影視作品以及紀念館的展覽都顯示，是毛澤東確定安源為開展動員工作的一個理想之地，並且對毫無經驗的勞工運動從全局上進行指導；是李立三開辦了第一所工人夜校，創建了第一個黨組織和第一個工人俱樂部；是劉少奇與煤礦公司展開談判，終於贏得了罷工的勝利，並把安源這個「中國的小莫斯科」建成無產階級文化活動中心。但為免使大家混淆三者的功績高下，最近在煤礦豎立的混凝土塑像則表明共產黨所確定的三人相對地位排序：一座高聳的青年毛澤東塑像被直接安放在通往山上紀念館的綿延階梯前；只有毛澤東像四分之三大小的青年劉少奇塑像被立於他本人親自重建的工人俱樂部大樓旁；而僅有毛澤東像一半大小的李立三半身像被置於一個角落。雖然存有爭議的這一官方排序與三者對早期安源工人運動作出的實際貢獻份量恰恰相反，但卻準確地反映了三人在當代觀光遊客心目中的聲望和名氣大小。

紅色旅遊日益熾熱，故而 2008 年為紀念秋收起義八十周年，安源獲得一項令以往投資相形見绌的重大國家投資。紀念館關閉了三個月進行翻新整修。這次翻修被宣傳為是自 1956 年紀念館開館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整修工程，耗資三百餘萬元。在紀念館旁幾分鐘路程之處落成一座「紅領巾誕生地紀念館」，主要反映安源在少先隊發展史上的地位，以及一座「安源工運時期廉政建設陳列館」，集中展示劉少奇和同事們在「小莫斯科」歲月施行的各種反腐措施。中央和江西省從財政經費中一共撥款三千多萬元，投入建設一條長達 13 公里的「紅色高速公路」，以便將安源與國家高速公路系統聯結起來。當地還專門修建了一座標示安源紅色旅遊主題公園的大門，與本地革命歷史相關的一些老建築也按原貌進行了修繕。<sup>60</sup>

## 經濟前景

雖然紅色旅遊活動幫助安源成功引進公共與私人資金，當地官員還是擔心不足以支撐安源未來的可持續發展。安源區旅遊局局長坦然承認，公

眾對工人運動史的興趣正日漸消退，所以要找尋其他的潛在領域，如：修復寺院以吸引佛教和道教信徒；修建以煤礦開採為主題的國家級博物館以吸引對工商業史感興趣的群眾；修建一間電影院專門放映在安源取景拍攝的所有著名電影，等等。<sup>61</sup>

安源工人們雖然十分高興紅色旅遊熱使安源又受到全國矚目，但對於未來仍是憂心忡忡：

現在安源這個地方名氣大，國家和共產黨要講政治，所以我們還有飯吃。因為共產黨是不可能看見安源的工人沒有飯吃的，這樣他們臉上就會無光。可是我們有時還是擔心，如果有一天共產黨不講政治了……安源工人的政治飯還能吃多久？<sup>62</sup>

去政治化的普遍趨勢以及公眾和共產黨對革命歷史的熱情正在削減，是令他們產生焦慮的原因。工人們表示：「我們常在一起議論說，原來共產黨是靠我們安源工人打天下的，現在總不能看我們餓死吧。說實話，安源煤礦如果不是有歷史這塊招牌，早就倒閉了。」<sup>63</sup>

大家對安源工運的興趣日益消退，正反映了當今中國工人階級的地位和聲譽一落千丈的現實。<sup>64</sup> 但安源的境況之所以格外艱難，不光是因為安源從前籠罩在革命光環中，而今非昔比，致使他們產生刺痛的相對剝奪感；更是因為安源的煤礦儲藏已幾近枯竭。1985年萍鄉礦業公司的年產煤量居於全國第33位，1990年下降為第45位；而至2008年，在全國108個主要國有煤礦中公司的排名下滑到第75位。<sup>65</sup> 由於礦藏量縮減，採煤的過程變得愈來愈困難和危險，煤炭生產愈來愈接近於革命前的情形。在毛澤東時代，安源礦工是終身制的國家職工，享有令人豔羨的福利待遇，但是現今的情況則同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之前的年代一模一樣，公司的勞動力組成結構主要是周邊農村的農民，他們與公司簽訂短期的工作合同，缺乏保障和福利。這些農民工的工資收入非常微薄，還不及萍鄉居民平均工資的40%。<sup>66</sup> 由於許多國企已宣告破產，現在萍鄉地區大部分的採礦活動都是在規模小、形態原始、不安全（而且通常是非法的）的為私人所有和管理的礦井中進行，極其相似於早期發展階段的情形。<sup>67</sup> 而且礦難傷亡事故的數字之高令人震驚。<sup>68</sup>

前現代化形態的煤礦開採模式重現當地，而在前共產主義時期盛行的宗教習俗活動也死灰復燃。人類學家梅方權在他的安源田野調查報告中記錄：

礦區附近私人小煤窯多，一般安全設施不齊，隱患多，風險大，小煤窯主為了尋找心理安慰，往往在開工之前要燒香拜佛。筆者在私人小煤窯的井口，經常可以看到如觀音菩薩、財神菩薩的瓷像。<sup>69</sup>

對事故的憂懼並非毫無道理。按每開採百萬噸煤與引致的死亡人數之比來考量，中國的採礦安全記錄是全世界所有國家中最差的，其死亡數字比印度高 10 倍，比美國高 160 倍。<sup>70</sup> 上述比較是基於中國的官方統計資料，而資料中的大部分數字還是有意降低了問題的嚴重性。由於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作為生產能源的煤炭資源，故而全國各地的煤礦演變為冷酷的私營老闆剝削壓迫勞工的場所。<sup>71</sup> 概而言之，中國的採煤業是全世界最危險的，而煤礦工人再次成為中國勞動力群體中最悲慘的一類。

## 文學描寫

其實，並不是只有礦工才發覺如今離當年的革命承諾已極其遙遠。當代的安源發生如此令人痛心的歷史倒退現象，引得許多才華橫溢的中國作家和學者從文學和學術角度作出豐富多樣的詮釋。2001 年，作家張學龍出版了《安源往事》一書，向建黨八十周年獻禮。這部歷史小說從毛澤東 1921 年秋天初訪安源之行開始，以兩年後礦長李壽銓離開安源為結尾。當準備登上火車就此離別他管理了二十多年的煤礦時，李礦長反思當年他為改良主義的目標來到安源，最近共產主義革命者帶着革命目的來到本地，他對這兩種目標進行思索：「二十多年前，我進入這裡，是希圖在實業富民強國中盡微薄之力。他們今天進入這裡，是希望以政治手段變革整個中國。我的努力已經化為了泡影，他們的選擇或許是對的？」<sup>72</sup>

張學龍的小說出版於書中描述的事件已經過去近一個世紀之後，而此時中國共產黨的工作重點已從政治動員轉向經濟現代化的任務上。這部小說的情節突出「共產主義」革命和「資本主義」改良之間的對峙和權衡折

衷，但並未說明哪一種策略在長期更為有效。2008年12月，小說作為三部曲系列之一重印時，名字更改為《煤都風暴》。三部曲的第一部於2005年出版，以編年史形式講述了十九世紀末作為近代工業橋頭堡的煤礦的創業故事；而第三部將故事延續到當代市場改革下發生的工業重組變革。換而言之，安源被重新包裝，變為一個經濟發展的成功故事，不再只是一個關於革命勝利的故事。2009年，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大清洋礦》因翔實細緻地講述了近代中國工業發展開關階段的歷史，榮膺江西省的優秀文學藝術作品獎。<sup>73</sup>

2002年，剛退休的前中共萍鄉市委書記劉南方發表了一部關於安源罷工的小說，名為《東方驚雷》。與張學龍的三部曲不同，劉南方的書集中描寫革命年代，但透露着不同尋常的文學敏感性。劉南方在小說的後記中坦誠表白，作為江西大學中文系畢業生，儘管後來一直從事黨政工作，但想當一名作家的願望時時縈繞於心。劉南方解釋說，他擔任萍鄉市委書記一共九年，對安源的革命歷史深有感觸。由於過去的宣傳在全國造成一些關於這段歷史的通常誤解，他希望他的小說能矯正這些看法。他指出，文革前的電影《燎原》依據課文「一身是膽」的內容塑造了藝術化的劉少奇形象，導致人們誤以為安源勞工運動全是劉少奇一人之力。他又指出，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油畫《毛主席去安源》激發了全國人民的宗教熱忱，以致大家錯誤地認定安源勞工運動全是毛澤東一人之功。劉南方進而總結表示，李立三作為重要的領導者和他在組織動員上的成就完全被忽略了。<sup>74</sup>

劉南方在他的小說中突出了領導安源勞工運動的三位主要領導人各自作出的特殊貢獻，並展現他們的工作如何相輔相成。毛澤東被刻畫成一位偉大的戰略家，李立三被描寫為一位精力充沛的活動家，而劉少奇則被描繪為一位謹慎嚴肅的組織者。但劉南方並不滿足於按照大家熟知的情節來演繹故事。在他的作品中，個性迥異的三人擁有一個共同點，即天生熱愛中國文學，並偏愛用經典詩文來闡述革命目標。劉南方運用本人淵博的中國文學知識，細緻入微地描繪這幾位富有共產主義理想的文化青年博聞廣識，引經據典，詩詞歌賦信手拈來，精彩的口才打動了地方精英人士，教育和啟迪了安源工人。這種寫法讓讀者們耳目一新。簡而言之，文化置位被認為是早期革命者們取得成功的一個關鍵因素。

## 學術解讀

安源煤礦的命運如此跌宕起伏，促使中國當代知識分子深入探究，由此湧現了一大批先鋒藝術作品和高水準的歷史小說，此外還出產了數量眾多精闢深刻的學術分析。黨史專家們謹慎撰寫的著作依舊主要是研究毛澤東、劉少奇和李立三三者的相對貢獻。學術專著中有兩部以富有同情的筆調如實反映了安源工人的境遇，剖析深刻，引人思索。這兩部傑出的研究著作是：于建嶸的《中國工人階級狀況：安源實錄》以及梅方權的《安源礦工：轉型期的變遷研究》。兩位作者均在安源進行了翔實又廣泛的人種志學調察，研究成果都於 2006 年付梓出版。兩部著作填補了有關當代煤礦勞工不滿情緒狀況的研究。梅方權之書是他在中山大學攻讀博士期間寫成的博士論文；而于建嶸則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知名學者，他以新穎獨到的方法研究湖南農民抗爭活動而廣為人知。雖然這兩本書報告了相似的現實情況，但梅方權作出更為謹慎的結論。梅方權的書由北京一個主流出版社出版發行，而于建嶸被迫通過香港的一家出版社發行他的著作。2001 年，于建嶸將研究成果做了刪改，採用更加政治正確的標題，刪去一些較有煽動性的安源工人談話後，由南京的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sup>75</sup> 但是此書剛開始進入印刷階段不幾日，中宣部便下達指示，即使是這一刪節版也被取消發行。<sup>76</sup>

于建嶸的著作是一部傑作。這部專著的研究細緻深入，分析討論精闢中肯，令人信服。此書亦是一本豐富多彩、引人入勝的旅行手記，同時又是一篇反映實情的新聞紀實報告。作者在文中懷着深厚的感情對當代中國工人階級的困境進行解釋分析。此書以多年的訪談和檔案研究為基礎，作為一部翔實反映安源工人境遇變遷的編年史，記錄了從 1922 年大罷工到現今爭取退休養老金的反抗活動。于建嶸並未對他的研究客體套用任何的抽象概念或模型，而是讓安源工人們暢所欲言。於是他收集到一份記錄當代中國工人階級主觀思想極其珍罕的第一手資料。于建嶸對工人們的思想從諸多層面進行分析研究，發現他們對整個毛澤東時代，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持正面評價。雖然于建嶸本人並不認可文革，但他還是如實地記錄下受訪者們對他提出的尖銳問題的回答。工人們多次反覆表達出對以往享有更高政治地位和更受社會尊重之日的眷戀之情。即使現在其中許多人的收

入增加了，礦工們仍然體味到痛苦而強烈的失落感。這種情況標示在客觀經濟狀況和主觀政治認知之間存在着嚴重的不協調。<sup>77</sup>

現今以及過去歷史上工人與知識分子之間的相互關係，是于建嶸寫作的一個深層主題。礦工們尊稱他為「于博士」。這位戴眼鏡的于博士受到當地人高度尊重和熱烈歡迎，工人們把他當作是向外界申訴委屈不公的一個管道，雖然于建嶸並不以為然。這當然是與安源的早期歷史息息相關，其實甚至與整個中國革命歷史都相關。若無毛澤東、李立三和劉少奇這些專注於勞工工作的文化人，1922年的安源大罷工就不會發生，更遑論贏得巨大勝利。李立三作古典文雅的駢體呈文，受到萍鄉縣知事的讚賞和地方精英人士的尊重，倚借他們的積極支持，李立三才能順利開設工人學校。正是通過教育活動，共產黨員們才逐漸讓頑固的礦工們相信比起從前長期依靠的洪幫，工人俱樂部會為他們謀取真正實在的福利。協助毛澤東和李立三在安源建立共產黨小組的第一位工人朱少連本人就是一名有文化的工人，在成為鐵路工程技師前曾接受過數年教育。另外，知識分子的權威性會轉化為一種精神力量。李立三一身長衫打扮加上來安源之前的法國工讀經歷，令礦工們尊崇他已近於神化。今天，工人們希望以知識分子為媒介得到類似的救助。于建嶸正好是一名執業律師兼著述甚豐的學者。他表示，不斷有工人來見他，請教如何表述他們的抗爭訴求或者請他替他們發聲。當于建嶸以本人身份既非官員亦非活動分子來推辭時，他們無疑很失望。並且，隨着于建嶸研究項目的逐步進展，他們流露出的沮喪情緒日漸加重。

于建嶸著作的高潮部分是退休礦工要求提高退休金的一場抗議活動。他們用安源本地的光榮革命傳統來闡述理由。這一革命傳統既有歷史貢獻的部分，也有文化重建的作用：

我們是萍鄉礦業集團公司的退休職工，是安源路礦工人的後代和繼承人。毛主席到安源領導路礦工人大罷工，革命前輩為我們流血犧牲，寫下了萍鄉煤礦工人的光輝歷史，電影《燎原》贊歌了安源，使全國人民看到了當年安源革命的星星之火……我們以此為榮耀（耀）。<sup>78</sup>

梅方權對安源的人類學研究雖不及于建嶸的著作那麼豐富、那樣飽含激情，但也展現了一幅相似的圖景，反映了礦工們對革命遺產的認同以及



他們對以前毛澤東時代的戀戀不捨。他對受訪者們懷念前改革時代的現象進行了概括總結：「下井工人未必了解當時整個國家的產業政策、工人政策，但是能夠感覺到工人地位的提高和國家宣傳中對工人的重視。」<sup>79</sup> 梅方權對礦工的流行文化深感興趣。接受採訪的當地群眾表示他們信仰各種超自然神靈，包括當地儺廟供奉的神祇以及觀音菩薩等民眾廣泛信仰的菩薩。國家對民間宗教所持的批判政策可能會影響當地人談論超自然神明的方式，但未必令他們改變自己的信仰實踐：「由於歷次對封建迷信活動的打擊和思想教育，使礦區的人們一方面不承認自己信迷信，說『世上無神鬼，都是人做起』，一方面又燒香拜佛，主動給寺廟捐款。」<sup>80</sup> 如同過去一樣，人們之所以對宗教如此虔誠，是希望獲得保佑，免受礦難事故災禍：「如果一次事故中誰沒有出事，旁人就會說：『他媽媽平時信菩薩，敬神敬得好，積了德，菩薩保佑啊。』」<sup>81</sup> 而且，接受梅方權採訪的工人們認為，這些宗教信仰與繼續敬仰毛主席是完全協調的。一名礦工解釋說：「心好菩薩就會保佑……毛主席語錄講惡有惡報，善有善報……也是一樣的。」<sup>82</sup>

鑒於採煤業本身存在極高的風險性，故而從事這一危險職業的勞動者熱衷於祈求得到超凡神靈的庇佑並不令人詫異。早於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們來到安源之前，很久以來，宗教信仰和儀式就已是安源礦工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李立三之所以能夠成功動員工人，很大程度得益於他將廟會活動和三合會儀式等民間宗教習俗化為己用，並加以改造，使之為革命目的服務。雖然中國共產黨秉持無神論思想，而且在 1949 年建立起新的共產主義政治秩序，這都未阻礙礦工們向超自然神明尋求撫慰和祈禱平安。文革時期出現了對毛澤東的狂熱個人崇拜，其中一個核心儀式就是要大家向那幅描繪青年毛澤東去安源的畫像致敬，正是這種禱祝活動延續保留的表現。今天，採煤作業愈來愈類似於過去舊時代的原始模式，此種將文革期間對毛主席的崇拜與前共產主義時期的宗教信仰相混合的特殊方式，為那些絕望無助以至於對任何神靈威力都會頂禮膜拜的人們創生了另一層精神保護。

對毛澤東的尊崇和仰慕在安源工人中極為普遍，這並不是一個孤立現象。人類學家高默波最近在華北農村做調查時發現：「我多次去中國農村旅行和進行工作……到處都聽到人們表示仰慕毛澤東甚至熱愛他之類的

話，但對於鄧小平人們並無熱情的表示……毛澤東的肖像仍張貼在普通家庭的牆上，但幾乎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鄧小平的肖像。」<sup>83</sup> 許多農村群眾之所以崇敬毛澤東甚於鄧小平，無疑有諸多方面的原因，包括鄧小平並不鼓勵用個人崇拜來鞏固領導地位。但大家對毛澤東的無比敬意，並非僅是過去個人崇拜的殘留效應。這也反映出人們仍然對毛澤東的革命壯志和豐功偉業仰慕不已，並且深深懷念過去那個簡單純潔的年代，未曾盛行今天的商業化、犬儒主義和貪污腐敗等弊病。

在鄧小平以及後任者們的治理下，中國扭轉（回）到市場化和全球化政策上，但同時仍然保留了黨的龐大宣傳機器，於是導致多種社會矛盾和政治衝突。一個開放的文化領域與一個僵化保守的傳播體系混雜於一體，猛然一看似乎會是一個功能失效且不穩定的結合體，既不能增進公共利益，又不能有助於社會穩定。事實上，一位分析家認為，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體制可以被概括為「公共領域執政官制」(public sphere praetorianism)，雖然文化領域經歷的商業化十分過度，而在公共政治目標方面卻缺少同量的關注。<sup>84</sup>

這種體制類型便是一個基本上未有經過改革的宣傳機器，主導監管着一個「缺乏嚴肅政治討論卻充斥着媚俗娛樂」<sup>85</sup> 的隨心所欲的文化領域。而這個體制彷彿在本質上不甚穩定。中國帝制時期的政治制度是世界上最具彈性的制度之一，但若與現今的形式比較，便會發現一些耐人尋味的相似之處。明朝的文化行業同樣高度商業化和國際化，而同時朝廷施行諸多（或多或少是有效的）強制性、行政性以及規範性的手段，讓百姓順從統治，並擴展政權自身的權力和權威性。<sup>86</sup> 參照歷史往事，當代中國的模式或許不一定如此脆弱。

正如安源傳統在當代被如何看待的諸般情形所顯示，當代中國的藝術家和學者創作的相關文化產品充溢着辛辣的諷刺和尖刻的評論。但這並非是指如此的做法對政治體制的存續構成威脅。學者和企業家們呼籲文化和商業表達應有更寬的邊界，作為回應，國家容許在適度的（雖然時常是含混模糊和任意不定的）空間內發揮創造性。黨國體制運用森嚴的宣傳機器，同時不斷使之現代化，以便繼續宣明和限定民眾的信念和行為被政治認可的諸般表徵。無論好壞，如此的結合或許會令人詫異地適合於維繫威權統治。

着眼於共產黨的長遠未來，被剝奪者的不滿比知識分子的異議更為棘手。至今，席捲中國城市和農村的抗議活動，都在證明這個系統的穩定性，而非搖搖欲墜。<sup>87</sup> 即使如此，革命傳統的挑戰正逐漸迫近，成為共產黨領導者持續關注的一個問題。對於複雜革命傳統的解讀，仍然受到嚴格規制，但這些存有爭議而且相互矛盾的各種解讀，令革命傳統具有潛在的煽動性。



# 結 論

毛澤東領導的革命，以否定中國文化為其普遍特徵，從破除傳統的「五四運動」時期開始，至席卷全國的以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為主題的「破四舊」紅衛兵運動時期達到最高點，使得大家對革命文化本身缺乏嚴肅認真的研究，此種情況一直持續到最近。毛澤東及其同志們是否成功對傳統給予致命一擊，仍然是爭論不休的問題，不過，毋庸置疑的一點是，他們顯然持有如此的強烈意圖。<sup>1</sup>

根據歷史學家李文遜 (Joseph Levenson) 影響甚廣的解釋分析，對於二十世紀的中國思想家和活動家們來說，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喪失殆盡。李文遜主張，恰是由於儒家傳統缺位造成思想知識和道德的真空，導致熱衷政治的中國人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理論這另一途徑。對比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的發展過程，李文遜強調，共產主義運動的俄國模式在萌芽發端時期其實更為自然而然，也更符合自身的文化。

俄國人和中國人……發動革命基於不同的出發點。俄國部分是由於歐洲的原因；中國全為中國的原因。……〔在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吸引力在於擔當了儒家文明喪失掉價值之後的一個填充物，並非（如同在俄國，馬克思主義之所以具備魅力）因其是本國知識界所傳承之文明的集大成者……因此在中國，作為消除文化困惑窘境的解決之道，馬克思主義其實如一個天外救星；而在俄國，馬克思主義的方案彷彿如同按劇情發展邏輯而產生的。<sup>2</sup>

根據李文遜，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是儒家傳統失去優越性之後的一個人工替代品，並非是從本土的文化衝動中有機生長出來的，與俄國正是相異。上述內容撰於 1965 年中國即將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臨界時刻，李文遜這一論斷似乎意味着中國將有條不紊地摒棄落後的過去所遺留

下來的任何殘餘成分。然而，如今由於又增添了可資研究分析的歷時長達半個世紀的歷史，比較中俄兩國的共產主義革命道路會賦予大家迥然不同的理解。正如墨子刻 (Thomas Metzger) 對當代中國知識話語的考察所指出：「將毛澤東主義和儒家傳統當作是單一的衍變生成的混合體，幾乎成了一種陳詞濫調。」<sup>3</sup>

蘇聯已解體多年，而中國依然保持着共產主義政治體制，但是中國的共產主義似乎已不如以前那般生硬。相較於東歐和蘇聯的共產主義制度崩潰於朝夕，中國共產主義政治體制的持續存在似乎昭示，中國共產主義制度的彈性其實反映了中國豐富的文化資源被認可和重新導向，而不是遭到全盤的否定和替換。儘管在中國如今已難尋覓一批（甚至一個）共產主義的「真正信徒」，但是一代又一代自上而下以及自下而上用眾人熟習的框架來解讀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種種做法所產生的影響，仍不可輕視。這個文化詮釋的過程，對於共產主義革命的勝利而言十分關鍵，而且對於支撐現今政治體制的民族主義及革命權威來說，亦佔據中心地位。並且，這一過程有助於解釋一個在意識形態和制度上其實均為舶來品的共產主義黨國體制，按照李文遜的用語即一個天外救星，是如何被接納以致被認為是「中國的」。

## 「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一系列政府提倡的舉措加上社會的反響，使得新的秩序與文化協同，借用鄧小平形容他主導的經濟改革的語彙，即是創造「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1949年，中國共產黨決定進駐而不是搗毀作為中華帝國權力象徵中心的天安門，及後面富麗壯觀的紫禁城。這一決定表明在構建一套截然不同的政治體制時，舊建築充任了靈活的腳手架用途。<sup>4</sup> 儘管文化大革命猛烈地攻擊「四舊」，文革也還是汲取了精英階層與普通民眾的傳統。<sup>5</sup> 此外，那個時代的宗教狂熱賦予毛澤東及其思想神聖無比的權威，以至於如今在中國各地仍然受到一定的崇拜。這一現象被齊慕實 (Timothy Cheek) 描述為「二十世紀的政治意識形態和源遠流長的中國民俗宗教相互混合的一種驚人表現」。<sup>6</sup>

2008年北京奧運會上，中華人民共和國通過一場生動形象的表演作了漂亮的自我展示，以此宣明自己傳承且守護着悠久的五千年文明。以古代篆刻藝術為靈感的奧運會徽醒目而別緻，由電影導演張藝謀編排的開幕式令人歎為觀止。中國共產黨通過精彩的北京奧運會，明確地宣示要把中國悠久的文化傳統發揚光大。為了在全球範圍內提升國家的文化軟實力，由中國政府資助在世界各地建立幾百所「孔子學院」，亦是受此驅動的表現。

儘管中國今天鮮有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民族主義者則一點也不缺。然而，這並不意味着文化民族主義替代共產主義成為佔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sup>7</sup> 中國的革命一貫以帶着全球理想目標和意義的民族主義革命的框架來建構，無論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期間反抗西方帝國主義及日本軍國主義的革命，還是在大躍進和文革期間反對蘇聯修正主義的運動，情況都是如此。<sup>8</sup> 在後毛澤東時期的愛國主義教育運動中，文化民族主義重新煥發活力，表現形式則耳目一新。文化民族主義一直以來都是中國共產主義的基礎和試金石。從早期革命領袖身穿中式長衫，按儒家古文款式撰文以動員安源工人，到文革期間經過精心部署的對所謂劉少奇蘇修主義的批判，直至最近的奧運盛會和遍佈全球各地的孔子學院，文化置位和文化操控在中國共產主義的興起和存續延綿上，都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

強調文化動員中民族主義的重要作用，絕不意味着否認國際影響對中國革命發展路徑所起到的決定性作用。中國共產黨及其創建的國家政權，高度仿效布爾什維克和蘇聯，正如今天孔子學院以法國文化協會和歌德學院為榜樣。然而，其中的意思絕不是指毛澤東及其後繼者只是簡單地給所謂無可避免存在的根本「傳統中國文化」披上一件共產主義外衣而已。其一，過去在文化方面的實踐，實在過於紛繁多樣並且變化多端，以致於無法得出一個單一的政治結果。另外，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革命同由此而誕生的共產主義黨國體制二者，確然是從外引進的**非傳統**政治形式。但是，儘管毛澤東及其同志們都堅持不懈地引入一種新型的激進政治，並培養一種新的無產階級文化來作為支持，他們對於任何文教的或武力的、民間的或舶來的廣泛文化資源在實現其宏大目標方面的價值，都一概重視。

毫無疑問，並不是所有的共產黨幹部在實踐文化置位和文化操控方面都可以同樣機敏和熟練。瞿秋白曾經批評早期中國共產黨員隊伍中那些曾在歐洲受過教育的人在本國卻表現得如同一個「外國人」，說明當時許多

歸國留學者在處理與中國本土文化的關係時遇到種種難題。而且，這類問題不僅源於個人局限性或能力不足。更為複雜的是，黨內官方政策在處理中國傳統時，並無一致的指導宗旨。直到瞿秋白擔任江西蘇維埃人民教育委員職務之後，中國共產黨才開始明確制定關於文化推廣並且本土化的政策。延安時期不同意見重又浮現，直到毛澤東表示推崇「民族形式」並號召終結外國的陳舊套路才（暫時）將爭議平息。<sup>9</sup> 而這種「民族形式」本身極易受到官方批判的左右，這一點在文革期間表現得尤為鮮明突出，首先是破「四舊」運動，然後又是批林批孔運動。

共產黨的中國文化政策一直不曾連貫一致，有時甚至效率低下。最近的一個事例便是天安門廣場上位於國家博物館（前身是中國革命博物館）前僅安放了三個月的大型孔子銅像一夜之間突然被移走，事先未曾有發出通告。<sup>10</sup> 這次搬遷究竟是因為終於後知後覺發現這尊雕像在眾多革命紀念碑之中顯得格格不入，還是源於新毛澤東思想在政治精英階層中再次復蘇，尚不得而知。但顯而易見的是，這一矯正行動是文化操控上的一次笨拙嘗試。

即使對於久經此道的中央宣傳部而言，文化動員工作也可能出現考慮不周或是不成功的情況。不過從中國共產黨早期開始直至現在，這類工作被視為黨的任務極其關鍵的部分。共產黨組織者們一代又一代積累起來的經驗也證明，李立三在安源推行的充滿靈感的方式極其巧妙：通過文化圈內人士將家喻戶曉的修辭與傳統進行技巧性的重新配置，可以激發群眾的支持並且足以維持。成功的文化置位與文化操控方式讓舶來品儼如舊相識；按俄羅斯食譜製作的食品也會被嘗出中國風味。

## 中國與俄國之比較

儘管中國革命確切受到俄國範式的深刻影響，但是在對於精英文化和民間文化的評價和利用這些方面，二者大相逕庭。研究蘇聯宣傳機構的歷史學家彼得·凱內茲認為，布爾什維克以居高臨下和不屑一顧的態度來對待俄羅斯文化：「列寧及其革命戰友們認為俄羅斯人的本土文化其實毫無價值。」<sup>11</sup> 同樣，「眾所周知，斯大林和他的陣營十分蔑視農民階層和農民信仰。」<sup>12</sup> 與此相反，雖然毛澤東同蘇俄的那些領導人一樣激進且冷酷無



情，但他卻積極地應和中國民間智慧和文化傳統中固有的政治力量。毛澤東經常以自己的農民背景為自豪，並以之為其政治和哲學思想的源泉。不過，他對中國文化的興趣並不局限於此。毛澤東在抗日戰爭發展到高峰階段時對革命同仁如此囑咐：

我們這個民族有數千年的歷史，有它的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對於這些，我們還是小學生。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但是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並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sup>13</sup>

儘管毛澤東領導的革命經常殘酷無情，但卻是在充分意識到文化資產在政治動員方面的功效的基礎之上建立起來的。

中國人民將自己的國家和文明從遭受國際屈辱的悲慘境遇中被拯救出來的功勞盡歸中國共產黨，而這種革命性的勝利也成了今天共產主義政權驕傲自豪的源泉，及其合法性的來源。同樣，毛澤東作為革命的最高領袖，在中國的官方和民眾中間都倍受尊崇。迪莉婭·達文 (Delia Davin) 指出：

凡是研究過毛澤東主義發展歷程的任何一個品性誠實的人都不會願意作為他的辯護人。他的烏托邦夢想，時常不顧現實，他的殘酷無情以及不達目的不甘休的決心，導致人民遭受可怕的磨難。但是他領導的革命使中國實現了統一並變成世界需要衡量和顧忌的力量。中國人民銘記着這諸多成就，而我們也應如是。<sup>14</sup>

在毛澤東的豐功偉績之中，最重要的成就之一乃是將一系列文化武器進行選擇性適應轉化，以鞏固一種新的革命秩序，而這種以俄羅斯為範本的革命秩序，卻被廣泛地認為是獨特的「中國式」，而非移植自外界。毛澤東直覺明白社會運動學者歷經數代才掌握的知識，即：如同國家政權和經濟領域一樣，文化領域亦是一個關鍵的鬥爭場地。<sup>15</sup> 運用革命修辭語言、美術、戲劇、群眾運動以及其他各種方式來建構國家認同感和社區歸屬感，是這個轉型任務的中心。

由於全國人口九成以上都是漢民族，所以文化民族主義實踐在共產主義國家競爭中，中國具有相對的優勢。<sup>16</sup> 讓一種新的共產主義文化同時又表現為中國式的文化相對較為直接容易，相較而言在蘇聯，一個新的蘇維埃文化並不能輕易地作為俄羅斯文化，遑論作為組成蘇維埃聯盟的多個民族的本土文化。<sup>17</sup> 當斯大林政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宣揚俄羅斯民族主義時，引發了可預見的民族間關係緊張。<sup>18</sup> 但是，即使民族主義由於「蘇維埃」價值觀的加強而趨於弱化，人們對於俄羅斯沙文主義的擔憂卻仍難以消除。根據馬克·貝辛格 (Mark Beissinger) 的觀察，「蘇維埃政權從來沒有完全消除人們對它形成的一種認識，即隱藏在其多元文化政策背後實質上是俄羅斯的強勢主導。」<sup>19</sup>

但是這兩個共產主義大國在文化民族主義方面存在的差異，不光由於各自民族組成分佈情況的不同。政治領袖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毛澤東及其革命戰友是毫不掩飾偽裝的愛國主義者，他們將共產主義作為一種手段用來修復中國失落掉的國家自豪感，並且把無產階級的訴求納入民族主義術語的框架之中。<sup>20</sup> 相比之下，「塑造了俄國工人階級文化的那些秉持民粹主義思想和馬克思主義源泉的社會主義者們……明確地否定了民族主義的說法。」<sup>21</sup> 而在中國，那句鼓動人心的「從前是牛馬，現在要做人！」口號不僅成為 1922 年安源工人大罷工的中心標語，而且在整個二十世紀的歷程之中，在談論中國整個國家與世界其他國家的相互關係，以及談及中國窮苦人民時，該口號反映的情緒都被革命人士和政治領袖反覆重提。<sup>22</sup>

中國文化民族主義的形成，以漫長的鬥爭和犧牲為代價，並被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痛苦經驗所強化。馬思樂 (Maurice Meisner) 指出，中國民族主義的誕生與「文化革命」的概念相互交織在一起。不過，雖然早期的思想激進人士如陳獨秀和魯迅曾呼籲拋棄所有的傳統文化，以建立一個新的中國，毛澤東的結論卻是，他領導的共產黨多年來奮鬥從事的文化革命必須考慮「人民的傳統文化中的優良部分，其中或多或少含有民主和革命的特徵」，一如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所發表的那番講話。<sup>23</sup>

當然，文化革命的觀念並不是中國人的創造發明。蘇聯也階段性地提倡文化革命的必要。<sup>24</sup> 但毛澤東對於這一過程的認識與列寧或斯大林截然不同。對於列寧而言，「文化革命的目的乃是知識的灌輸以及職業道德和紀律的培養」。<sup>25</sup> 在列寧看來，文化革命是滿足工業現代化需要的一個大

眾教育工作。雖然過程中含有廣泛的宣傳動員，其目標囿於灌輸培養共產主義忠誠從而建立一個發達的經濟體。對於斯大林而言也是如此，文化革命亦是促進經濟發展的手段，強調的是「政治上的外在服從以及經濟方面的紀律和工作努力」。<sup>26</sup> 這種正統的文化革命的蘇維埃概念，通過勞工教育來培養人們對共產主義的支持。劉少奇在安源被稱為「中國的小莫斯科」時期，嚴格依照和遵循了這一做法。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劉少奇繼續維護一種局限而且功利的認識。1958年春，他提倡道：「為了適應技術革命的需要，必須同時進行文化革命。」<sup>27</sup> 於是，在安源以及中國各地興起了一場曾經在蘇聯開展過的群眾識字運動。<sup>28</sup>

毛澤東則是構想一場更為徹底且武力的運動，其主要目的不是為了發展經濟，而是為了防止他領導的革命走向終結，要通過在青年一代中培養忠誠堅定的革命接班人來傳遞革命之火。而這一目的僅僅依靠教育和宣傳不足以實現；要實現如此目的，需要通過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來喚起宗教式的覺醒。誠然，毛澤東強調，針對隱藏的敵人存在階級鬥爭的需要，這一點是受到斯大林的強烈影響。<sup>29</sup> 但是斯大林發起的文化革命是由蘇聯的共產主義青年團，以及其他蘇共領導的機構部署的；可是在鬥劉少奇的那些工作組被撤之後，毛澤東發起的運動則是人員散漫且無法控制，持續的時間也更為長久。即使是斯大林推出的恐怖措施，譬如清洗殺戮、公審、個人崇拜和陰謀思維方式等，其嚴酷慘烈也遠遠不及毛澤東為拯救中國共產主義免於走上後斯大林時期的蘇修道路而發起的最後征戰。如同中國的整個共產主義革命一樣，文化大革命在時間跨度、範圍廣度和殘酷性上，使蘇聯這一先例相形見绌。那些被蘇聯以武力逼迫實行共產主義制度的東歐國家與中國之間的區別更是天差地遠。此外，對於政治權威的意義這也尤其深遠重大。與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不同，中國的共產主義領袖不是被當作蘇聯的代表，而是被廣大群眾視為民族主義者和革命英雄。

就在毛澤東離世之前的一段時間裡，他向自己的心腹清楚表示自己一生的成就可以濃縮為兩個部分：1949年革命和文化大革命。他若有所思地說儘管大多數人都會認可他前一項的成就，可後一項的結果就不得而知了。<sup>30</sup> 這個革命究竟能否真正地將中國從蘇修道路上解救出來？在蘇聯解體之後，一代人的時間又過去了，中國依然保持着共產主義政權，毛澤東辭世之前的話語尤為尖銳。

無論對毛澤東領導的革命是崇拜還是憎惡，作最後定論為時尚早。隨着共產主義黨國體制對自身革命傳統（包括毛澤東超凡入聖的形象）的重新注重，當代中國的民族主義浪潮復又高漲。200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六十周年之際，湧現了大批反映毛澤東豐功偉績的影視作品。兩年後，2011年正值中國共產黨建黨九十周年，全國興起了「唱紅」運動，曾經的紅衛兵一代以高昂的熱情投入其中，在全國形成一股熱潮。如此的活動浪潮讓人們對毛澤東和他領導的革命的記憶重又清晰再現，以此加強民眾對於執政黨的支持擁護。票房大片《建黨偉業》以群星志願參演為賣點，所刻畫的毛澤東及其革命志士同仁的先鋒形象不光帶有高度的浪漫主義色彩，還富有民族主義色彩，門票在全國各院線迅速售罄。

如此的文化操控行為將許多中國人的內心打動並不意外。1968年文化大革命正發展到高峰時，精神病學家和歷史學家羅伯特·傑·利夫頓極富洞見性地寫道：

人們無法預測未來的中國領導者們對於毛澤東主義的形象持如何的態度，但是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至少在一段時間裡，他們將繼續保持這種形象的高度聲譽，即使不再如此過度。人們還必須考慮中國共產主義文化潛在的耐久性和靈活性。我們可以預期，文化大革命留下的創痛影響將體現在超乎想像的更多方面上。然而我相信，若說最近擁有如此一呼百應的精神力量的政權會突然選擇棄之不用，將是一個草率的假設。<sup>31</sup>

利夫頓富有先見之明的預測，指出毛澤東和他的革命道路探索對人們有揮之不去的情感吸引力，亦是提醒我們在認識當代中國共產主義政權的支持來源時，不要作出片面簡單的理解。

許多人假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保持延續所憑靠的是一種工具性的「政績合法性」，一旦繁榮過熱的經濟開始變差時合法性將隨之消逝。這可能是一種幼稚的想法。<sup>32</sup> 即使經濟停滯大大加速了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體制的衰落，我們也不能確定，經濟衰退在中國也會產生同樣的效果。正如本書對安源的研究試圖表明的，如果中國共產主義的力量來源於更深的源泉，並不單是現在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那中國共產主義的壽命就不能輕易地以其他共產主義政權的生命期來進行預測。儘管當代中國人對於政治制度的態度既複雜而又矛盾，但是他們絲毫也不會懷疑共產黨或者黨的創始人有可能含有一點點的「非中國」內容。

佩里·安德森在其最近對兩個主要共產主義革命進行比較的研究中指出，與俄國人民不一樣，中國人民的支撐力在於：

作為世界上最古老的綿延至今未曾中斷過的文明，歷時數千年培養起來的自信，雖然在近一個世紀以來遭受打擊欺凌，但最終並未破壞掉……這種歷史自信奠定了俄羅斯和中國之間的根本區別。<sup>33</sup>

中國共產黨注重於文化訴求所享有的比較優勢，但大家不應該忘記蘇聯曾經也是在情感上和文化上獲得許多國民忠誠擁護的事實。然而，依照斯蒂芬·科特金 (Stephen Kotkin) 的分析，蘇維埃社會主義曾經一度是一種廣泛的信念，最終還是崩潰了，反映的乃是整個體系顯然無法與資本主義競爭相匹敵。蘇聯的社會主義身份認同設立為資本主義的截然對立面，一旦讓國內人民（包括俄羅斯人和非俄羅斯人）認識到生活標準和技術遠遠落後於資本主義世界，蘇聯就無法繼續存在。<sup>34</sup> 與此相反，鄧小平和後毛澤東時代的幾代中國共產黨領導們都願意推行經濟改革，作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個重要特點，這樣即使未能完全消除，也會極大緩解來自另外一條道路的資本主義制度的挑戰。至於市場經濟與威權主義的政治秩序相結合最終是否不可持續，這是一個開放的問題。畢竟，這種搭配不僅讓人聯想起歷時較短的一些先例，比如朴正熙時期的韓國和蔣介石時期的臺灣；而且還會令人將中國長達數千年的帝制歷史與之進行比較。<sup>35</sup>

## 發掘革命傳統

中國共產主義威權體制存續至今乃是諸多複雜因素共同作用的產物，其中至少包括來自於廣泛的不同社會階層人民對於政權的持續擁護。<sup>36</sup> 毫無疑問，這種民眾的普遍接受認可，部分是源於在後毛澤東時代的改革時期，生活水平在客觀上得到明顯的改善。部分也反映了共產主義黨國體制掌握着巨大的話語權和強制威力，由此使得異議政見的表達既困難又危險。在解釋中華人民共和國持續存在的原因時，按照佩里·安德森所言，一個更為關鍵的原因也許是由於悠久的歷史而形成身份認同上獨特的自豪和驕傲給國家帶來了生命力。但是，這並非是指目前和前共產主義模式差別甚大的政體，不存在絲毫嚴重的弊病。畢竟，中國共產主義政權的合法

性不是簡單地依靠所指稱的與中國古老文明的紐帶聯繫，更是源於承諾要讓大多數受壓迫的國民以及整個國家贏得尊嚴的那場革命。而這項承諾不僅易於受到極端民族主義者的挑戰，而且還有來自於那些在後毛澤東時代的改革之中感到被拋棄的人們的挑戰。於是，毛澤東的符號象徵對於當代中國政權並非是一個不會導致問題的權威來源。李靜君曾描述發生在遼寧的一次示威，三萬名對待遇不滿的工人跟隨一幅巨大的毛澤東畫像上街遊行，「因為我們要展示過去和現在的對比。」示威者中有一名老女工「大聲感歎道，『毛主席不應該這麼快就去世！』」<sup>37</sup>

許多在物質上貧困（以及富裕）的中國人，對國家在共產黨統治下取得的成就表現出強烈自豪感，比如六十多年前擺脫了帝國主義的壓迫，以及在 2010 年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等等。但是仍有許多人對於共產黨遠離以前讓受壓迫人民過上更美好生活的革命諾言感到不滿。一個安源礦工總結了無產階級現在所處的困境：「工人的工資愈來愈少……工人權利愈來愈小。工人生活狀況愈來愈差。現在的安源工人說：從前是牛馬，現在不是人！」<sup>38</sup>

由於認識到自己的歷史存在一些潛在的易受政治攻擊的方面，共產黨對於本身革命傳統的意義定論往往顯得模糊不清。關於安源的官方描述顯得既模糊含混又公式化：「安源精神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毛澤東、李立三、劉少奇等老一輩革命家領導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留下的寶貴財富，是集體奮鬥的結晶。」<sup>39</sup>「安源精神是中國革命精神的奠基之作，是中國現代史上雄偉壯麗的革命精神長河中的有機組成。」<sup>40</sup> 儘管共產黨自己總結得模模糊糊，但卻不能容忍其他的解釋方式。例如，我曾嘗試總結安源革命傳統的意義，並在亞洲研究協會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2008 年大會上以之作主席演講，但是那次演講不被共產黨審查部門認可。演講的摘要撰成一篇文章發表在《亞洲研究雜誌》(*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上，部分內容如下：

在安源，年輕的富有理想主義的共產主義幹部領導了一場極為成功的非暴力罷工，還面向工人、農民以及他們的家人開展了達到一定規模的教育工作。其結果是民眾對於共產主義革命事業的支援達到了極高的程度。儘管「安源革命傳統」的含意由於各種各樣的個人目的、政治目的或是金錢目的而隨着歲月變得模糊含混，甚至遭到

扭曲，但是作者盡力要從共產黨的早期歷史去還原是否曾經存在另外一些革命道路的可能性，主要不是由階級鬥爭和個人崇拜驅動，而是通過發展基層組織去爭取為人的尊嚴。<sup>41</sup>

然而，中國共產黨並不歡迎其他的視角。此篇文章的中譯本在一個著名的中國學術刊物上發表之後，引起了共產黨審查部門的注意，他們給編輯發了一份言辭生硬的警告信：

《重拾中國革命》一文有不少「政治問題」，不符合上面的要求。我在文章中標註了一下，這不一定是全部問題。

主要的問題：

引用禁書數本；涉及文革禁區，對文革有一些描寫犯忌；對中國革命的描述與黨的結論不同。

犯忌：對中共領袖人物毛的評價問題；對胡的話有非正面引用。涉及中共領袖人物的東西似乎是要報審的。

對安源工人生存和思想狀況的描寫犯忌。

我懷疑把這些東西都修改或刪除了，整篇文章不會剩下什麼，不成其為完整文章，因而沒有什麼可用性了。

更不可能帶着這些問題發刊，出版社、刊物本身都會受到處理、整肅。<sup>42</sup>

對於安源遺產所作的非正統解釋招致警示，這不僅反映黨國體制對於學術言論的持續掌控，也揭示出圍繞中國革命傳統進行的解釋依然是高度政治敏感。

在六四事件發生和東歐與前蘇聯的共產主義失去人民的擁護之後不久，中國的知識分子便表現出準備與他們的革命傳統分離的迫切之意。劉再復和李澤厚所著《告別革命：回望二十世紀中國》一書的出版在社會上引起轟動，是當時人們在處理現代中國歷史和思想問題時，普遍希望超越革命問題的一個症候表現。<sup>43</sup> 然而，革命傳統並非能輕易地被擱置在一邊。高默波提醒大家：「中國的 1949 年革命和毛澤東主義的遺產已經變成中國社會環境的一部分，是不能簡單地被丟棄掉的。」<sup>44</sup> 由於這種傳承的歷史和意義都不受公開和如實的驗證，所以出乎意料（而且不受欢迎）的復發的可能性很大。

即使那些走在前沿的呼籲中國民主變革的知識分子們，也發覺自己被革命傳統所羈絆。民主運動人士、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對 1989 年天

安門事件進行了坦誠的回顧，他承認運動的參加者們，包括他本人在內，都受到被以往諸多習慣烙上印記的思維的妨礙：

我們用來動員群眾的大部分資源和方法，都是以前共產黨本身曾經使用過多次的。……一旦我們開始自己的革命運動，我們便變得極端自負——就好像我們回復到了文革時期，並且覺得我們自己是世上最革命的。……如果我們沒有為了民主而採取絕食行動，並且全身心地投入而且還為此付出犧牲呢？……我們發出的聲音成為了唯一的真相。<sup>45</sup>

劉曉波的反思是在嚴厲叱責 1989 年的抗議運動並非一場民主運動，而且在不知不覺間複製了中國革命政治文化中的許多負面特點。

隨着「唱紅」以及其他一些毛澤東主義的遺留形式的興起，在「重慶模式」的推動下流行起來（近來「重慶模式」受到批評質疑），我們看到這些文化武器被用作工具來鞏固所謂的「太子黨」的聲望資格。「太子黨」全是革命元老的子輩和孫輩，他們正準備接手中國這艘大船的舵盤。<sup>46</sup> 這些「紅色後代」在文化大革命時期作為紅衛兵初始政治的磨礪，而今這些「紅二代」在爭奪政治權位時，泄漏了自己青春期社會化的影響。儘管存在派別劃分，太子黨群體從事的目標（和個人興趣）是一致的，便是讓革命文化重新如火如荼，使之成為共產黨長久統治的載體。

中國如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樣，革命的未來究竟如何還不得而知。一些學者預測，由於最近發生的遍佈前殖民地大部分區域的民主化浪潮，故而在二十一世紀，革命運動將會大幅減少。<sup>47</sup> 而另一些學者則強調在新自由主義改革中贏家和輸家之間的不平等日益擴大，他們認為革命的變數同於以前。<sup>48</sup> 無論如何，顯然本世紀第一個十年席捲前蘇維埃加盟共和國的「顏色革命」和其後 2011 年發生的阿拉伯之春引起了中國領導者們的擔心，他們害怕可能出現危及國內政治體制的革命威脅。<sup>49</sup>

無論未來如何，舊日的革命歷史會以各種不穩定的方式持續影響和干擾當前的政治現狀。這一困境並非是中國所獨有。關於當代美國，吉爾·萊波雷 (Jill Lepore) 指出：「一個從革命中誕生的國家看待其歷史時一定會小心謹慎，而且焦慮不安。革命發生一次是一件好事，而再次發生就是麻煩。」<sup>50</sup> 在中國，上一個世紀的進程中革命反覆多次發生，在 1911 年、1927 年、1949 年、1966 年，以及依照鄧小平的論斷，還包括 1979 年，



都爆發了革命事件，因此這種焦慮就更為強烈嚴重。而且無論中國還是美國，政治秩序的批判者同擁護者一樣都使用國家革命傳統來印證己方立場的正當合理性，因為歸根結底，「任何一物都不足以勝過革命」。<sup>51</sup> 後人們所面臨的挑戰，並不是將歷史遺忘或者加以篡改，而是在發掘革命遺產中需要突出那些激勵啟發的部分，使之克制那些可怕的暴力成分。



# 註釋

## 緒論

1. Robert Alexander, *Re-wri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ary Tradi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2. Jill Lepore, *The Whites of Their Eyes: The Tea Party's Revolution and the Battle over American Hist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3. Perry Anderson, "Two Revolutions," *New Left Review* 61 (January–February 2010): 59–96.
4. "Maoist Revival Gathers Pace in Chongqing," *Financial Times*, May 24, 2011.
5. 例如，2011年春，倍受尊敬的經濟學家茅於軾發表了一篇博文，嚴厲批評毛澤東，認為他應當為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多達五千五百萬中國人之死負責。此文迅速被國家部門從網上刪除了。這篇博文引起了大量的強烈反對之聲。
6. 李向平，〈信仰、權力、市場——毛澤東信仰的經濟學現象〉。載：中國宗教學術網，[http://iwr.cass.cn/zjyjj/201101/t20110128\\_6030.htm](http://iwr.cass.cn/zjyjj/201101/t20110128_6030.htm)（於2012年2月2日瀏覽）。
7. Mobo Gao, *The Battle for China's Past: Mao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London: Pluto Press, 2008).
8. 關於毛澤東思想對當代政策的影響，參見 Sebastian Heilmann and Elizabeth J. Perry, eds., *Mao's Invisible Hand: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Adaptive Governance in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9. 關於革命的代價，參見 Rana Mitter, *A Bitter Revolution: China's Struggle with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及 Peter Zarrow,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等。關於毛澤東本人的角色，參見 Delia Davin, *Mao Zedong* (Stroud, UK: Sutton, 1997); Jonathan D. Spence, *Mao Zedong* (New York: Viking, 1999); Ross Terrill, *Mao: A Biograph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hilip Short, *Mao: A Life* (New York: Henry Holt, 2000); Lee Feigon, *Mao: A Reinterpretation* (Chicago: Ivan R. Dee, 2002); Timothy Cheek, *Mao Zedong and China's Revolutions* (Boston: St. Martin's, 2002); Michael

- Lynch, *Mao* (London: Routledge, 2004); Maurice Meisner, *Mao Zedong*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7); 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雖然這些作品在着重點和評價上極為不同，但是整體看來，都對毛澤東和他領導的革命給予負面評價。
10. Jung Chang and Jon Halliday, *Mao: The Unknown Story* (London: Jonathan Cape, 2005).
  11. 曹樹基，〈大飢荒：1959-1961 年的中國人口〉（香港：香港國際時代出版有限公司，2005 年）；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飢荒紀實〉（香港：天地出版社：2008 年）；Ralph A. Thaxton Jr., *Catastrophe and Contention in Rural China: Mao's Great Leap Forward Famine and the Origins of Righteous Resistance in Da Fo Villa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Frank Dikotter, *Mao's Great Famine: The Hi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 (London: Bloomsbury, 2010).
  12. 當然，兩國的革命有諸多重大相似之處，參見 S. A. Smith, *Revolution and the People in Russia and China: A Comparative Hist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13. Richard Louis Walker, *China under Communism: The First Five Year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5); Alexander Pantsov, *The Bolsheviks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9-1927*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0).
  14. Benjamin I. Schwartz,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Lucien Bianco,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15. 關於一些具體的其他可能方法，參見 Chalmers A. Johnson,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Mark Selden, *The Yanan Wa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Ilpyong J. Kim,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Communism: Kiangsi under the Communis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Roy Hofheinz Jr., *The Broken Wav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easant Movement, 1922-1928*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16. Sherry B. Ortner, "Theory in Anthropology since the Sixtie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6, no. 1 (January 1984); Ann Swidler, "Culture in Action: Symbols and Strateg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 no. 2 (April 1986): 273-86; Lisa Wedeen, "Conceptualizing Culture: Possibilities for Political Scien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6, no. 4 (December 2002): 713-28; William H. Sewell Jr., *Logics of History: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152-74.

17. 有關革命領導地位的其他方面，參見 Ronald Aminzade, Jack A. Goldstone, and Elizabeth J. Perry, "Leadership Dynamics and Dynamics of Contention," in *Silence and Voice in the Study of Contentious Politics*, ed. Ronald Aminzade et al.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126–54.
18. 關於這一具有影響力的研究的部分例子，參見 Lynn Hunt,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Keith Michael Baker, ed.,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Creation of Modern Political Cul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Mona Ozouf, *Festival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Keith Michael Baker, *Inven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Essays on French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9. Alberto Melucci, *Nomads of the Present: Social Movements and Individual Need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20. Prasenjit Duara,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21. 關於中國反抗文化的政治劇場的研究，參見 Joseph W. Esherick and Jeffery N. Wasserstrom, "Acting out Democracy: Political Theater in Modern China," in *Popular Protest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Modern China*, ed. Jeffrey N. Wasserstrom and Elizabeth J. Perr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4), 32–69.
22. Richard Curt Kraus, *Brushes with Power: Modern Politics and the Chinese Art of Calli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II.
23. Ellen R. Judd, "Revolutionary Drama and Song in the Jiangxi Soviet," *Modern China* 8, no. 1 (1983): 127–60; David Holm, *Art and Ideolog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Chang-tai Hung, *War and Popular Culture: Resistance in Modern China, 1937–194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Paul Clark,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 Hist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Chang-tai Hung, *Mao's New World: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1).
24. William Hinton, *Fanshen: A Documentary of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8); Hinton, *Shenfa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3); Jan Myrdal, *Report from a Chinese Village* (New York: Pantheon, 1965); Myrdal, *Return to a Chinese Village* (New York: Pantheon, 1984); Edward Friedman, Paul G. Pickowicz, and Mark Selden, *Chinese Village, Socialist Stat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及 Friedman, Pickowicz, and Selden, *Revolution, Resistance, and Reform in Village China*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25. Lynda Shaffer, *Mao and the Workers: The Hunan Labor Movement, 1920–1923* (Armonk, NY: M. E. Sharpe, 1982).

26. Michael Herzfeld, *Cultural Intimacy: Social Poetics in the Nation-State*, 2nd e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本書將「文化親密性」解釋為一種為文化圈內人提供「共同的社會性的保證，對於權力的基礎瞭若指掌，該權力時而允許被剝奪權利者在某種程度上巧妙地表達不恭順，又時而會加強威懾」(3)。邁克·赫茲費爾德 (Michael Herzfeld) 對希臘的研究着眼於民族國家，但是論及中國，必須考慮到國家層級之下的地方差異。
27. Elizabeth J. Perry, "Red Literati: Communist Educators at Anyuan, 1921-1925,"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April 2007): 123-60.
28. 關於兩種特質的討論，參見 Kam Louie and Louise Edwards, "Chinese Masculinity: Theorizing Wen and Wu," *East Asian History* 8 (1994): 138-94; Kam Louie, *Theorizing Chinese Masculinity: Society and Gender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29. Emily Martin Ahern, *Chinese Ritual an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92.
30. 關於這些人 (如韓偉、王耀南、吳烈、幸元林以及其他諸人) 的回憶錄，參見：中共萍鄉市委《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編纂組編，《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0年)，下冊，頁 893-1120。這本珍貴的資料為 1922 年到 1930 年期間安源的工人運動提供了豐富的基本文獻。
31. 有關農村婦女的研究，參見 Gail Hershatter, *The Gender of Memory: Rural Women and China's Collective Pas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32. Ching Kwan Lee and Guobin Yang, eds., *Re-envision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Collective Memories in Reform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II.
33. 有關的不同視角研究，參見：溫鐵軍，《三農問題與實際反思》(北京：三聯出版社，2005年)；于建嶸，《底層政治》(香港：中華文化出版社，2009年)。

## 第一章 革命預演

1. 如今萍鄉在行政區劃上已經從縣升格為市，安源被定為下轄的區和鎮一級。儘管萍鄉歸江西省管轄，但在文化上卻更接近湖南。
2. 〈萍鄉採茶戲簡介〉，載《萍鄉古今》(1984年12月)，頁 297。
3. 華文、儼曉，〈萍鄉煤炭發展概況〉，載《萍鄉文史資料》第 6 輯 (1987年1月)，頁 2；李為揚，〈李壽銓與安源煤礦〉，載《萍鄉文史資料》第 6 輯 (1987年1月)，頁 58。
4. 黃式國，《萍鄉市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6年)，頁 11-15。
5. 萍鄉市教研室編，《萍鄉歷史》(萍鄉：出版社未知，1995年)，頁 21。
6. 儘管太平天國運動發生於半個世紀之前，二十世紀初期大家仍津津樂道，這一點在張國燾的自傳中得到反映。中國共產黨創建人之一的張國燾是萍鄉

- 人氏，幼年被學校一名老更夫講述當年參加太平軍作戰的往事所吸引：「我和其他小學生們對於那位身經百戰的『長毛』軍人異常敬重，稱許他是一位老英雄。」Chang Kuo-t'ao,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1-1927*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71), 14.
7. 《共產黨》(1921年4月27日)，頁3。
  8. 黃式國編，《萍鄉市志》，頁697、699。
  9. 〈萍鄉鞭炮演化史料〉，載《萍鄉文史資料》特輯(1988年9月)，頁9。
  10. 彭雲華、張振初，〈解放前的萍鄉煤礦〉，載《萍鄉文史資料》第6輯(1987年1月)，頁16-21。
  11. 關於李壽銓的資料主要來自李孟星，〈李壽銓軼事〉，載《揚州民革》(2005年7月)，頁1-16。此文作者為李壽銓之孫，文中資料大部分來自李壽銓本人的日記、回憶錄、詩詞以及其他文字作品。
  12. 黃式國編，《萍鄉市志》，頁1185。
  13. Jeff Hornibrook, "Local Elites and Mechanized Mining in China: The Case of the Wen Lineage in Pingxiang County, Jiangxi," *Modern China* 27, no. 2 (April 2001).
  14. Hornibrook, "Local Elites and Mechanized Mining," 222.
  15. Albert Feuerwerker, *China's Early Industrialization: Sheng Hsuan-huai and Mandarin Enterpris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Feuerwerker, "China's Nineteenth Century Industrialization: The Case of the Hanyeping Coal and Iron Company, Limited,"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 and Japan*, ed. Charles Donald Cowan (New York: Praeger, 1964), 79-110; Wellington Chan, *Politics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75).
  16. 張振初，《安源軼事》(萍鄉：安源煤礦，1995年)，頁62-64。
  17. 同上，頁46。
  18. Feuerwerker, "China's Nineteenth Century Industrialization," 84. 雖然基本沿襲盛宣懷本人的管理風格，企業從官辦工業實體轉成股份制公司，從而完全變成一個商業性公司。Feuerwerker, *China's Early Industrialization*, 68.
  19. 超過安源煤礦的，只有英國人控制的河北開灤煤礦及日本人擁有的滿洲地區撫順煤礦。Tim Wright, *Coal Mining in China's Economy and Society, 1895-1937*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142-46.
  20. Feuerwerker, *China's Early Industrialization*, 68.
  21. 江西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江西近代工礦史資料選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頁447-48。
  22. 1869年萍鄉縣的人口達215,648人；至1906年，人口數量翻了一倍以上，達到590,948人。載黃式國編，《萍鄉市志》，頁1131。

23. 僱員人數的波動與產量的升降相一致。1916 年，安源煤礦年產量達到 95 萬噸時，僱工數量猛增至兩萬名。江西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江西近代工礦史資料選編》，頁 387、449。
24. 張振初，《安源軼事》，頁 27、55、154。
25. 同上，頁 60。
26. Chang,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6.
27. Hornibrook, "Local Elites and Mechanized Mining," 223.
28. 《萍鄉古今》第 10 輯(1990 年)，頁 10。
29. 〈盛宣懷致賴龍訓條〉，載《萍鄉文史資料》第 6 輯(1987 年 1 月)，頁 118。
30. "The Pingsiang Colliery," *Far Eastern Review* 12, no. 10 (March 1916): 377.
31. Guy Puyraimond, "The Ko-lao Hui and the Anti-Foreign Incidents of 1891," in *Popular Movements and Secret Societies in China, 1840-1950*, ed. Jean Chesneaux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113-24.
32. 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編，《中共萍鄉地方史》(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3 年)，第一卷，頁 22。
33. 同上；黃式國編，《萍鄉市志》，頁 696。
34. Dian H. Murray, *The Origins of the Tiandihui: The Chinese Triads in Legend and Histor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35. 黃式國編，《萍鄉市志》，頁 696。
36. 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編，《中共萍鄉地方史》，頁 23-24；黃式國編，《萍鄉市志》，頁 696；中共萍鄉礦務局委員會宣傳部編，《紅色安源》(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 年)，頁 27；薛世孝，《中國煤礦工人運動史》(開封：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年)，頁 35。
37. 李俊朝，〈洪江會與萍瀏醴起義〉，載《湖南經濟管理幹部學院學報》第 13 卷第 1 期(2003 年 1 月)；中共萍鄉礦業公司委員會宣傳部編，《紅色安源》，頁 27；薛世孝，《中國煤礦工人運動史》，頁 36。
38. 李俊朝，〈洪江會與萍瀏醴起義〉；Joseph W. Esherick, *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1911 Revolution in Hunan and Hube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62-63.
39. Harold Z. Schiffrin, *SunYat-se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357.
40. Chang,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3-4; 薛世孝，《中國煤礦工人運動史》，頁 39。
41. 李孟星，〈李壽銓軼事〉，載《揚州民革》(2007 年 1 月)。
42. Samuel Yale Kupper, "Revolution in China: Kiangsi Province, 1905-1913," PhD dis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3, 81.
43. Chang,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2.



44. 同上，頁 4-6。
45. 同上，頁 15。
46. Esherick, *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59.
47. 唐湘萍，《話說萍鄉》(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 年)，頁 60。
48. 薛世孝，《中國煤礦工人運動史》，頁 41。
49. 在李壽銓的詩詞中，吟詠安源的秀美風光是常見主題。〈李壽銓熱愛安源〉，載《江西文史資料》第 23 輯 (1987 年)，頁 115-17。
50. 李為揚，〈李壽銓與安源煤礦〉，頁 53-94；〈李壽銓和黃興友善〉，載《江西文史資料選輯》第 23 輯 (1987 年)，頁 112-13。
51. 張振初、劉家林、劉宗道，《安源大罷工前後》(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年)，頁 15；劉善文，《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1993 年)，頁 41。
52. 張振初，《安源軼事》，頁 98。
53. 萍鄉市黨委編，《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0 年)，下冊，頁 1127；楊放萍，〈安源礦警隊瑣談〉，載《萍鄉文史資料》第 2 輯 (1984 年 12 月)，頁 84-86。
54. 黃式國、蕭賢富編，《萍鄉大事記》(萍鄉：萍鄉市誌辦公室，1989 年)，頁 28-29。
55. 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編，《中共萍鄉地方史》，頁 62-63; Wright, *Coal Mining in China's Economy and Society*, 183.
56. 劉明漢編，《漢冶萍公司志》(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1990 年)，頁 62。
57.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 983。
58. 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編，《中共萍鄉地方史》，頁 17；張振初，《安源軼事》，頁 202。
59. 黃式國、蕭賢富編，《萍鄉大事記》，頁 25-31；張振初，《安源軼事》，頁 193-94。
60. 萍鄉歷史地方誌辦公室編，《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研究文匯》(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 年)，頁 412-13。
61. 張振初，〈王鴻卿其人〉，載《萍鄉文史資料》第 8 輯 (1987 年 12 月)，頁 157。
62. 中共萍鄉礦業公司委員會宣傳部編，《紅色安源》，頁 181；張振初，《安源軼事》，頁 181；王耀南，1967 年 8 月 21 日訪談，載《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資料彙編》第 3 卷第 1 冊。這部彙編是列為「絕密」的油印本資料，收藏於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紀念館檔案室。
63. 1906 年六月，礦工罷工，抗議工作時間由原來的八小時增加至十二小時。但是這次停工行動遭到軍隊的武力鎮壓，新制度繼續施行。薛世孝，《中國煤礦工人運動史》，頁 52。

64.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 115；下冊，頁 984、1134；江西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江西近代工礦史資料選編》，頁 459。
65. 雌飛，〈安源遊記〉，載《大公報》(長沙：1922年6月10日、23日、25-26日)。
66.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 1010。
67. 在其他礦區文化中亦存在類似的雙重性。關於波利維亞的錫礦工的傑出研究，見 June Nash, *We Eat the Mines and the Mines Eat Us: Dependency and Exploitation in Bolivian Tin Min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68. Wu Yunduo, *Son of the Working Class*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56), 5-6。
69. 黃式國編，《萍鄉市志》，頁 221；張振初，《安源軼事》，頁 35-36。
70. 煥肇，〈萍西寺庵文化的特色〉，載陳世國編，《萍鄉宗教文化大觀》(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 119-24；梅方權，《安源礦工：轉型期的變遷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2006年)，頁 48。
71. 《萍鄉採茶戲簡介》，頁 297-99。
72. 張振初，《安源軼事》，頁 66、101。
73. Charlton M. Lewis, "Some Notes on the Ko-lao Hui in Late Ch'ing China," in *Popular Movements and Secret Societies in China, 1840-1950*, ed. Jean Chesneaux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97-112。
74. 同上，頁 101。
75. 關於哥老會如何起源的各種解釋存在諸多矛盾，參見：平山周，《中國秘密社會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12年)；陶成章，〈教會源流考〉，載蕭一山編，《近代秘密社會史料》(臺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頁 5；Jerome Chen, "Rebels between Rebellion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9, no. 4 (August 1970): 815；Lewis, "Some Notes on the Ko-lao Hui," 98-100；徐安琨，《哥老會的起源及其發展》(臺北：臺灣省立博物館，1989年)。
76. 徐安琨，《哥老會的起源及其發展》，頁 60-68。屬於某一個地方堂口的地盤範圍在江西被稱作為「碼頭」。這並不是經過確切界定的領土範圍，而是指該地頭領所住居處以及堂口的周邊地區。周寒僧，〈我所知道的江西洪江會〉，載《江西文史資料選輯》第 4 輯 (1982年12月)，頁 145。
77. 關於三合會的儀式，參見 Barend J. ter Haar, *Ritual and Mythology of the Chinese Triads: Creating an Identity* (Leiden: Brill, 1998)。哥老會並不要求新入會成員走過密密麻麻的刀劍陣，而三合會傳統上有如此的入會儀式。
78. Lewis, "Some Notes on the Ko-lao Hui," 104；Charlton M. Lewis, *Prologue to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Ideas and Institutions in Hunan Province, 1891-1907* (Cambridge, MA: 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 1976), 76-77。
79. 唐湘萍，《話說萍鄉》，頁 123-24。
80. 徐安琨，《哥老會的起源及其發展》，頁 154。
81. 同上，頁 153。

82. Lewis, "Some Notes on the Ko-lao Hui," 104; Chang,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3-4.
83.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 1127。
84. Barend J. ter Haar, "The Gathering of Brothers and Elders: A New View," in *Conflict and Accommodation in Early Modern East Asia*, ed. Leonard Blussé and Harriet T. Zurndorfer (Leiden: E.J. Brill, 1993), 259-84; 徐安琨，《哥老會的起源及其發展》，頁 102。
85. 施堅雅 (G. William Skinner) 如此描述他在四川的田野調查之地：「在民國時期，統稱為哥老會的秘密幫會在農村社會的各層級都行使至高的權力。」Skinner,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Part I),"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 no. 1 (November 1964): 37.
86. 有一處文獻列出江西哥老會成員的諸多職業之中，還有妓女這一行當，但所有的文獻都顯示成員幾乎全為男性。周寒僧，《我所知道的江西洪江會》，頁 148。
87. 一份十九世紀中期關於哥老會的詳細文獻中指出，成員（以「外甥」名義）豢養男童提供性服務。此說有可能是為了污蔑秘密社會而存在不實之處，但有證據證明中國其他會黨中存在同性戀行為。而一些哥老會的分會，尤其是那些女性稀缺的煤礦地區，也存在這種行為並非不可能。這些關於哥老會的批評，參見〈哥老會說〉，載《辟邪紀實》（1862 年），附錄。有關於三合會的同性戀行為，參見 Dian H. Murray, *Pirates of the South China Coast, 1790-1810*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88. 徐安琨，《哥老會的起源及其發展》，頁 110。
89. 同上，頁 102、116；李俊朝，〈洪江會與萍瀏醴起義〉。
90. 徐安琨，《哥老會的起源及其發展》，頁 155-59。
91. 對於上海勞工情況的討論，參見 Elizabeth J. Perry, *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92.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 983。
93. "The Pingsiang Colliery," 379.
94. 張軍，〈秘密社會與第一次工人運動的高潮〉，載《求索》1 期（2005 年），頁 190。
95. 毛澤東初訪安源時，據說有二十幾個宗教組織在此活動。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博物館展覽。
96. 下列關於聖公會教堂在安源的活動資料來自馬漢欽，〈萍鄉基督教百年史略及現狀〉，載《萍鄉高等專科學校學報》3 (1) (2004 年)，頁 109。
97. 在聖公會教堂的例子中，安源傳道區在 1909-1923 年期間歸桂湘教區管轄（總部設在長沙），但是在此階段之前以及此階段之後，都向漢口的吳德施 (Logan Roots) 主教匯報。作者感謝華中師範大學的章博釐清這個史實脈絡。

98.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 1133-34；張振初，《安源軼事》，頁 104-5；《萍鄉古今》第 1 輯（1982 年 7 月），頁 122。
99. 馬漢欽，〈萍鄉基督教百年史略及現狀〉。
100. 劉善文，《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頁 292。
101. Hornibrook, "Local Elites and Mechanized Mining," 226.
102. Chang,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27.
103. 同上。
104. Clark Kerr and Abraham Siegel, "The Interindustry Propensity to Strike—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in *Labor and Management in Industrial Society*, ed. Clark Kerr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54).
105. 關於因經濟突然衰退而引發「相對剝奪」的研究，參見 Ted Robert Gurr, *Why Men Rebel*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and James C. Davies, *When Men Revolt and Why*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1997).
106. Kam Louie, *Theorising Chinese Masculinity: Society and Gender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在萍鄉地方文化中，獅燈分為兩種類型，反映了這種二元性。一種獅燈是紅臉，俗稱為「文獅」，在主要的慶典和節日懸掛；另外一種是黑臉，被稱為「武獅」，在武術表演時懸掛。〈萍鄉獅燈〉，載《萍鄉古今》第 4 冊（1984 年），頁 310-11。在中國的許多地方，民間宗教崇拜劃分為「文」和「武」兩種儀式，佛教徒通常負責前者而道教徒通常負責後者。John Lagerwey, *China: A Religious Stat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103.
107. Louis, *Theorising Chinese Masculinity*, 17.
108. Nash, *We Eat the Mines and the Mines Eat Us*, 169.
109. 關於另一個地理環境中，根深蒂固的反抗傳統對共產主義革命者造成障礙的研究，參見 Elizabeth J. Perry, *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 1845-1945*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 第二章 教導革命

1. John H. Kautsky, *Political Change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m* (New York: Wiley, 1962); Edward Shils, *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Power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2); 及 Theda Skocpol,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2. John Fitzgerald, *Awakening China: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3. 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共中央關於工人運動文件選編》（北京：檔案出版社，1985 年），頁 1。
4. 同上，頁 2。

5. Wen-Hsin Yeh, *The Alienated Academy: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Helen R. Chauncey, *Schoolhouse Politicians: Locality and State during the Chinese Republic*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2).
6. Charles W. Hayford, *To the People: James Yen and Village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7. Donald J. Munro, *The Concept of Man in Early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The Concept of Man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0).
8. Benjamin A. Elman,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9. Benjamin A. Elman and Alexander Woodside, eds., *Education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600–190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10. 鄧中夏，〈中國共產黨做職工運動的起點〉，載《二七大罷工資料選編》（北京：工人出版社，1983年），頁21–23。
11. Lynda Shaffer, *Mao and the Workers: The Hunan Labor Movement, 1920–1923* (Armonk, NY: M. E. Sharpe, 1982), 42–49.
12. 此信全文及對撰寫者身份的分析可見劉善文，〈「告中國的農民」一文作者應是毛澤東〉，載中共萍鄉市委黨史工作辦公室編，《毛澤東在萍鄉》（萍鄉：萍礦工人報社，1993年），頁135–50。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編，《中共萍鄉地方史》（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3年），第1卷，頁36。
13. 關於毛澤東究竟何時訪問安源和訪問過安源多少次，以及每次陪同他的究竟是何人，各種資料存在着諸多分歧。甚至同一作者有時候還作出相互矛盾的描述。參見：李銳，《毛澤東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動》（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57年），頁179；李銳，《毛澤東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動》（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頁373。本文作者曾試圖從多種資料中梳理出最可信合理的場景脈絡，特別依據劉善文、楊桂香，〈毛澤東到萍鄉和安源從事革命活動究竟是幾次〉，載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編，《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研究文匯》（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199–209；以及劉善文、劉義勝，〈毛澤東同志1921年秋到安源史料考〉，載《江西工運史研究資料》第3輯（1982年8月10日），頁22–36。另一種說法主張毛澤東直到1921年12月才第一次到訪安源，結伴者為李立三，此說可參見《萍鄉今古》第3輯（1982年9月），頁15–22。
14. 萍鄉礦務局志編纂委員會，《萍鄉礦務局志》（萍鄉：出版社未知，1998年），頁65。
15. 《毛澤東年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頁91；單世聯，〈安源三人行〉，載《地方文革史交流網》（2011年2月28日）。

16. 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期間對老工人們進行的訪談活動中，有多人回憶到毛澤東帶着一把傳統的湖南雨傘和身著藍色的文人長袍。參見：中共萍鄉市委黨史工作辦公室編，《毛澤東在萍鄉》，頁 46、51、53；以及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紀念館編，《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資料彙編》第 3 卷第 1 冊(1985 年)。
17. 〈鄭洞國與毛主席〉，載上海《文匯報》(1985 年 1 月 13 日)。
18. 朱子健回憶錄，1967 年 9 月 15 日，載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紀念館編，《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資料彙編》第 3 卷第 1 冊。
19. 《毛澤東年譜》，頁 91。
20. 張理全已經和在安源的四個湖南籍鐵路技師建立了聯繫，他們是他之前在甲種工業學校的學生。張理全定期將勞動組合書記部的二十幾份刊物給他們寄去，再由他們傳閱給其他工人。《萍鄉今古》第 3 輯(1982 年 9 月)，頁 4、19。
21. 中共萍鄉礦務局委員會宣傳部編，《紅色安源》(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 年)，頁 41、319。
22. 李立三，1963 年 8 月 8 日訪談，安源紀念館檔案室，檔號 1451。
23. 同上。
24. 萍鄉市委編，《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0 年)，下冊，頁 899、902、1059。李思慎、劉之昆，《李立三之謎》(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年)，頁 38。
25. 李立三，1959 年 1 月 10 日訪談，安源紀念館檔案室，檔號 1450；《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 415；下冊，頁 1133；張振初，《安源軼事》(萍鄉：安源煤礦，1995 年)，頁 104。
26. 陳柴初回憶錄，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紀念館編，《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資料彙編》第 3 卷第 1 冊。
27.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 902；中共萍鄉礦務局委員會宣傳部編，《紅色安源》，頁 45。
28. 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編，《中共萍鄉地方史》，頁 49-51。
29.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 936。
30. 中共萍鄉礦務局委員會宣傳部編，《紅色安源》，頁 45。
31. Elizabeth J. Perry, *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32. 吳友生回憶錄，1971 年 4 月 24 日，載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紀念館編，《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資料彙編》第 3 卷第 1 冊。
33. 中共萍鄉礦務局委員會宣傳部編，《紅色安源》，頁 61。
34. 同上，頁 49。
35.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 903。
36. 中共萍鄉礦務局委員會宣傳部編，《紅色安源》，頁 47。

37. 朱子健回憶錄，1968年7月9日，載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紀念館編，《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資料彙編》第3卷第1冊。
38. 李六如編的課本讀物最早於1922年10月印了第一至第三冊，在安源剛開始使用的是蠟紙油印本。最後一冊印於1923年5月。在一年之內，《平民讀本》連續再版四次，以滿足共產黨在江西、湖南、湖北以及廣東等省份開辦的工人學校對教材的需求。《中共黨史人物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頁61、131。
39. 開辦學校所需的200元和最初幾個月的行政花銷(差不多每個月40元出頭)主要來自於這兩個渠道。《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172。
40. 張振初，〈陳盛芳其人其事〉，載《萍鄉文史資料》第12輯(1990年12月)，頁134。陳盛芳在煤礦擔當了十多年的工頭，積攢了大量財富，在老家醴陵買下一大片田地，還在湘贛地區開了數間店鋪。陳盛芳成為當地數一數二的大地主和大財主，擁有相當大的經濟和社會影響力，有時候他利用本人的影響力來幫助李立三。張振初、劉家林、劉宗道，《安源大罷工前後》(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9-10。
41. 中共萍鄉礦務局委員會宣傳部編，《紅色安源》，頁64-66；《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1288；鄧啟沛，〈安源工運是我黨集體奮鬥的光輝範例〉，載萍鄉歷史地方誌辦公室編，《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研究文匯》，頁28。
42. 中共萍鄉礦務局委員會宣傳部編，《紅色安源》，頁68-70。
43. 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編，《中共萍鄉地方史》，頁53。
44. 劉善文，《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1993年)，頁95。
45.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161-62。
46. Fernando Galbiati, *Peng Pai and the Hai-Lu-Feng Soviet*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122.
47. 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編，《中共萍鄉地方史》，頁47；中共萍鄉礦務局委員會宣傳部編，《紅色安源》，頁71-77。
48. 中共萍鄉礦務局委員會宣傳部編，《紅色安源》，頁76。
49. 吳友生回憶錄，1971年4月24日，載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紀念館編，《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資料彙編》第3卷第1冊。
50. 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編，《中共萍鄉地方史》，頁97；《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978。
51. Chang Kuo-t'ao,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1-1927*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71), 411.
52.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939。關於哥老會大佬借神力樹立權威的研究，參見徐安琨，《哥老會的起源及其發展》(臺北：臺灣省立博物館，1989年)，頁116-17。

53. 易友德，1967年3月20日訪談，安源紀念館檔案，檔號 1070; Patrick Lescot, *Before Mao: The Untold Story of Li Lisan and the Creation of Communist China*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4), 38-39.
54. 黃愛國，〈安源路礦工人消費合作社發行的股票〉，載萍鄉歷史地方誌辦公室編，《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研究文匯》，頁 377；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編，《中共萍鄉地方史》，頁 55；劉少奇、朱少連，〈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略史〉，載《劉少奇與安源工人運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1981年)，頁 5。
55. 中共萍鄉礦務局委員會宣傳部編，《紅色安源》，頁 294-303；《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 1384。
56. 黃愛國，〈革命的硬骨頭：記安源煤礦老工人袁品高〉，載萍鄉歷史地方誌辦公室編，《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研究文匯》，頁 359-62。
57. 易友德，1967年3月20日訪談，安源紀念館檔案室，檔號 1070。
58. 易友德，1973年10月20日訪談，安源紀念館檔案室，檔號 1103。
59. Jean Chesneaux,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1919-1927*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chapter 8; 陳衛民，〈1922年上海罷工運動的興起〉，載《史林》I-2 (1986年)，頁 126-35。
60. 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編，《中共萍鄉地方史》，頁 56-59。
61. 同上，頁 60-61；《毛澤東年譜》，頁 98。
62. 賀桂蘭回憶錄，1971年8月9日，載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紀念館編，《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資料彙編》第3卷第1冊。
63. 張振初、劉家林、劉宗道，《安源大罷工前後》，頁 28-29。
64. 《毛澤東年譜》，頁 99。
65. 多年後，毛澤東表示從在長沙初次見面開始，他就從未對李立三熱情過。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8), 146.
66. 郭晨，〈安源鬥爭拾零〉，載《劉少奇與安源工人運動》，頁 182-83。
67. 1896年，為開辦新的煤礦，一名特使被派到萍鄉來商談購買土地事宜，他在給官僚資本家盛宣懷的一封信中評論安源礦工們的境況「苦況甚於牛馬」。張振初，《安源軼事》，頁 8。關於這一比喻的更多論述，參見 S. A. Smith, *Like Cattle and Horses: Nationalism and Labor in Shanghai, 1895-1927*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
68. 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編，《中共萍鄉地方史》，頁 64-65。
69. Qiang Fang, "Hot Potatoes: Chinese Complaint Systems from Early Times to the Late Qing,"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8, no. 4 (November 2009): 1105-35.
70.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 41。
71. 〈勇赴〉，載《江西工運史》第3冊 (1982年8月10日)，頁 85-91，江西工會黨委出版內部用。



72. 長沙革命紀念館、安源工人博物館，《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料》(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頁 697。
73. 劉善文、胡自國、高飛和黃愛國編，〈老工人回憶安源大罷工〉，載《江西工運史研究資料》第 3 輯(1982年 8 月 10 日)，頁 55-58。
74. 張振初、劉家林、劉宗道，《安源大罷工前後》，頁 29。
75.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 122-23。
76. 同上，下冊，頁 939；中共萍鄉礦務局委員會宣傳部編，《紅色安源》，頁 104-5；張振初，〈陳盛芳其人其事〉，頁 135。
77.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 43。
78. 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哈爾濱：東北書局，1948年；再版，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頁 30。
79. T. Y. Chang, "Five Years of Significant Strikes,"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 21, no. 8 (June 1926): 19.
80.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 897。
81. 同上，上冊，頁 128。
82. 《萍鄉煤炭發展史略》，載《江西文史資料選輯》第 23 輯，《萍鄉文史資料》第 6 輯(1987年)合編版，頁 177。
83.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 45。
84. 同上，上冊，頁 129。
85. 同上，下冊，頁 901。
86. 中共萍鄉礦務局委員會編，《毛澤東、劉少奇、李立三在安源的故事》(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年)，頁 68。
87.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 901。
88. 中共萍鄉礦務局委員會編，《毛澤東、劉少奇、李立三在安源的故事》，頁 69。
89. 劉少奇、朱少連，〈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略史〉，載《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 124。
90. 同上，上冊，頁 122。
91. 同上，上冊，頁 126。雖然李礦長指定萍礦總局文牘科長舒季俊作為煤礦公司的官方談判代表，但是李礦長本人在幕後發號施令。劉善文，《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頁 131。
92. 鄒沛、劉真，《中國工人運動史話》(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1993年)第 1 冊，頁 217-18。
93. 〈李立三同志有關安源工人運動的談話〉，載《劉少奇與安源工人運動》，頁 150。
94. 《萍鄉煤炭發展史略》，頁 78；中共萍鄉礦務局委員會，《毛澤東、劉少奇、李立三在安源的故事》，頁 77。

95. 譚九如，〈萍鄉基督教的歷史與現狀〉，載陳世國編，《萍鄉宗教文化大觀》(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112-16；馬漢欽，〈萍鄉基督教百年史略及現狀〉，載《萍鄉高等專科學校學報》3(1)(2004年)，頁109-10；詹海烈，〈江西基督教聖公會史話〉，載《文史大觀》第1期(1995年)，頁40-45。
96. John Fitzgerald, "Nationalism, Democracy and Dignity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in *The Dignity of Nations: Equality, Competition and Honor in East Asian Nationalism*, ed. Sechin Y. S. Chien and John Fitzgerald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93-114.
97. S. A. Smith, *Like Cattle and Horses: Nationalism and Labor in Shanghai, 1895-1927*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 268.
98. 關於安源當地人參與其中的情形，參見《劉少奇與安源工人運動》，頁150；李六如，《六十年的變遷》(北京：作家出版社，1961年)第2卷，頁184；陳琨修、劉謙編纂，《民國醴陵縣誌》(再版，醴陵：醴陵市地方誌委員會，1987年)，頁901。
99. John Gaventa, *Power and Powerlessness: Quiescence and Rebellion in an Appalachian Valley*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0), 116.
100.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940。
101. 同上，下冊，頁840-59。
102. 此處零散地摘錄了這部長篇押韻民歌的部分小節片段。
103. 引自 Robert Marks, *Rural Revolution in South China: Peasants and the Making of History in Haifeng County 1570-1930*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4), 225-26。關於「彭菩薩」的稱呼，參見 Marks, *Rural Revolution in South China*, 186; and Galbiati, *Peng Pai and the Hai-Lu-Feng Soviet*, 121.
104. 劉善文，《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頁207。

### 第三章 中國的小莫斯科

1. 劉善文，《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1993年)，頁2。
2. 《萍鄉古今》第5輯(1985年)，頁52。
3. 萍鄉市委編，《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0年)，下冊，頁940-41。
4. 其中一個障礙可能是劉少奇在莫斯科時對於所學的知識領悟有限，據說他的俄文程度薄弱。Chang Kuo-t'ao,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1-1927* (Lawrence: 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 1971), 201.
5. 入會費相當於工人的日薪，這一項使俱樂部獲得1,500餘元的收入，而月費(也是相當於工資的一定比例)也使得每月增加了一筆480元的額外收入。
6. 劉善文，《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頁227。
7.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1060。

8. 同上，下冊，頁 900。
9. Rex A. Wade, *Red Guards and Workers' Militias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40, 159.
10. 關於保甲的內容，參見 Hsiao Kung-ch'uan, *Rural China: 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0); 關於萍瀏醴起義的情況，參見本書第二章；關於五四運動的內容，參見 Jeffrey N. Wasserstrom, *Student Protest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The View from Shanghai*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66-67。關於中國帝制晚期階段的「正統」組織和「叛逆」組織在結構設置上類同的研究，參見 Philip A. Kuhn, *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chapter 3.
11.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 94-95、141。
12. 關於秘密會社的類同相似性，參見李俊朝，〈洪江會與萍瀏醴起義〉，載《湖南經濟管理幹部學院學報》第 13 卷第 1 期 (2002 年 1 月)。
13. 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編，《中共萍鄉地方史》(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3 年) 第 1 卷，頁 91。
14. 劉善文，《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頁 237。
15.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 302。
16. 劉善文，《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頁 239。
17.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 139。
18. 同上，上冊，頁 141。
19. 關於中國共產主義革命者的籍貫在他們到異鄉開展組織活動中發揮的作用的研究，參見 Wenhsin Yeh, *Provincial Passages: Culture, Space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20.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 202-3。
21. 張振初、劉家林、劉宗道，《安源大罷工前後》(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年)，頁 59。
22. 韓偉回憶錄，1968 年 7 月 18 日，載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紀念館編，《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資料彙編》第 3 卷第 1 冊；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編，《中共萍鄉地方史》，頁 92；《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 103。
23. 張振初，《安源軼事》(萍鄉：安源煤礦，1995 年)，頁 166。
24. 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編，《中共萍鄉地方史》，頁 132-33；張振初，《安源軼事》，頁 167。
25. 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編，《中共萍鄉地方史》，頁 129。
26.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 994-95。
27. Victoria Bonnell, *Iconography of Power: Soviet Political Posters under Lenin and Stali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28.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 939。
29. Lowell Dittmer, *Liu Shao-ch'i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Politics of Mass Critic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209.
30. Chang Kuo-t'ao, "Introduction," in *Collected Works of Liu Shao-ch'i* (Hong Kong: Union Research Institute, 1969), i; quoted in Dittmer, *Liu Shao-ch'i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10.
31. Chang Kuo-t'ao, "Introduction," in *Collected Works of Liu Shao-ch'i* (Hong Kong: Union Research Institute, 1969); 中共萍鄉礦務局委員會編，《毛澤東、劉少奇、李立三在安源的故事》(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 年)。
32.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 90。
33. 同上，上冊，頁 99。
34. 中國社會科學院、安源工人運動紀念館編，《劉少奇與安源工人運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1 年)，頁 181。
35. 中共萍鄉礦務局委員會宣傳部編，《紅色安源》(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 年)，頁 208-9。
36.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 91。
37. 萍鄉市總工會、安源工人運動紀念館編，《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勝利六十周年紀念畫冊》(安源：出版社未知，1982 年)，頁 25、29。
38.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 221-22。
39. 同上，下冊，頁 920。
40. 中國社會科學院、安源工人運動紀念館編，《劉少奇與安源工人運動》，頁 156、186；《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 326-29。
41. 李立三之前借給俱樂部共 90 元，俱樂部在開張後不久就償還了 80 元。《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 327-28。
42. 同上，下冊，頁 894。
43. 同上，上冊，頁 93。
44. Nym Wales,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New York: John Day, 1945), 40.
45.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 178、347。百分比依據原始資料數據重新計算得出。
46. 同上，上冊，頁 290-95。
47. 劉家林，〈二十年代安源工人教育〉，載《江西工運史研究資料》第 3 輯(1982 年 8 月 10 日)，頁 48-49。
48. 黃愛國，〈安源路礦工人讀書處〉，載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編，《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研究文匯》(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 年)，頁 294。
49.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 179-81。
50. 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編，《中共萍鄉地方史》，頁 131-32；鄧啟沛，〈安源工運是我黨集體奮鬥的光輝範例〉，載《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研究文匯》，頁 33；

- 楊放萍、黃愛國，〈劉少奇領導安源工人運動的歷史貢獻〉，載《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研究文匯》，頁 38；《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 111，下冊，頁 1215。
51. 儘管安源路礦兩局僱傭的工人皆是男性，但其中一些工人將他們的妻子安置在煤礦附近。
  52. 中共萍鄉礦務局委員會宣傳部編，《紅色安源》，頁 199；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編，《中共萍鄉地方史》，頁 131；《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 269、342。
  53.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 1008。
  54. 同上，下冊，頁 868-69。
  55. 楊放萍，〈略述安源工運中黨對工人之教育〉，載《黨史通訊》第 2 期 (1987 年)，頁 12；《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 269。強迫抗拒學習的文盲工人去上課亦是布爾什維克政策，列寧在 1919 年 12 月法令中規定了這一條款。參見 Peter Kenez, *The Birth of the Propaganda State: Soviet Methods of Mass Mobiliz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150.
  56.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 946-47。
  57. 同上，上冊，頁 104。
  58. 同上，下冊，頁 782。黃愛國，〈安源路礦工會教育股編印的「小學國語教科書」〉，載《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文匯》，頁 379-81。
  59. 吳運鐸在自傳中談到，1925 年，他當時十歲，在共產黨為安源煤礦工人子弟開辦的一所學校上四年級。Wu Yunduo, *Son of the Working Class*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56), 16. 保爾·柯察金是著名蘇聯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的主角，作者為尼古拉·奧斯特洛夫斯基 (Nikolai Ostrovsky) (1904-1936)。
  60.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 828-38。
  61. 同上，下冊，頁 821-22。
  62. 同上，下冊，頁 1001。
  63. 有關這個標準在中國的突出重要性，可參見 Donald J. Munro, "Egalitarian Ideal and Educational Fact in Communist China," in *China: Management of a Revolutionary Society*, ed. John M. H. Lindbeck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1); Susan Shirk, *Competitive Comrad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and Andrew G. Walder,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作者從史蒂夫·史密斯認為蘇聯並無類似機制這一觀點中大獲裨益。
  64. 中國社會科學院、安源工人運動紀念館編，《劉少奇與安源工人運動》，頁 161。
  65. 晏資明，〈中共最早的地方黨校〉，載《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研究文匯》，頁 292-93；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編，《中共萍鄉地方史》，頁 130；楊放萍，

- 〈略述安源工運中黨對工人之教育〉，頁 14；萍鄉黨校編，《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校》（萍鄉：萍鄉教育出版社，2004 年）。最後者為內部參考資料。
66. 劉善文，《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頁 214-19。
  67.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 186。
  68. Vladimir Brovkin, *Russia after Lenin: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1921-1929* (London: Routledge, 1998), 84-93.
  69. 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編，《中共萍鄉地方史》，頁 133。
  70. 劉善文，《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頁 256。
  71.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 919。
  72. 吳烈，〈憶安源路礦工人革命運動〉，載《萍鄉黨史通訊》第 3 期（1985 年），頁 16-17。
  73.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 332-33。
  74. 同上，下冊，頁 1014。
  75. Kenez, *The Birth of the Propaganda State*, 58.
  76.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 941。
  77. 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編，《中共萍鄉地方史》，頁 132、162。
  78. 劉善文，《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頁 222。
  79.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 903。
  80. 同上，下冊，頁 946。
  81. 賀大衛 (David Holm) 注意到這種連續性的存在，他指出在延安時期，共產黨便舉辦各種大型的群眾慶典活動來紀念歷史上的那些起義，意在宣稱自己乃是天命所歸。David Holm, *Art and Ideolog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333.
  82. Kenez, *The Birth of the Propaganda State*, 139.
  83. 關於共和模式的內容，參見 Henrietta Harrison, *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 Ceremonies and Symbols in China, 1911-192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84.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 1172。
  85. 《萍鄉古今》第 6 輯（1985 年 5 月），頁 8-9、33；第 8 輯（1987 年 3 月），頁 31。
  86. 《萍鄉古今》第 6 輯（1985 年 5 月），頁 26。
  87. Karl Gerth, *China Made: 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3), 4.
  88. 李立三任上海總工會的委員長，劉少奇任總務科主任。上海總工會指導了五卅運動的總體方向。當時李立三充分利用在安源積累的經驗，同秘密會社的頭領結成重要聯盟。參見 Elizabeth J. Perry, *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81.

89.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 190。
90. 中共萍鄉礦務局委員會宣傳部編，《紅色安源》，頁 153。
91. 劉善文，《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頁 228-31。
92.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 155。幾乎一百名被開除的人之後都復職。
93. 劉善文，《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頁 232-33。
94. 同上，頁 233-34；《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 198。
95. 《萍鄉煤炭發展史略》，載《江西文史資料選輯》第 23 輯、《萍鄉文史資料》第 6 輯合編版（1987 年），頁 79。
96. 張振初、劉家林、劉宗道，《安源大罷工前後》，頁 45；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編，《中共萍鄉地方史》，頁 85-86。
97.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 363。
98. 劉善文，《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頁 245-46；《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 996-97。
99.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 900。
100. 劉善文，《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頁 244-45。
101. 《萍鄉煤礦發展史略》，頁 77-84；《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 1272-88。
102. 《萍鄉煤炭發展史略》，頁 31。
103. 萍鄉礦務局志編纂委員會編，《萍鄉礦務局志》（萍鄉：出版社未知，1998 年），頁 89。
104. 《漢冶萍公司檔案史料選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 年），下冊，頁 262。
105.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 866。
106. 中共萍鄉礦務局委員會宣傳部編，《紅色安源》，頁 149-50；張振初，《安源軼事》，頁 137-38；萍鄉市委宣傳部編，《劉少奇在安源的故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頁 38-40。
107. 張振初，《安源軼事》，頁 130。
108. 同上，頁 133。
109. 萍鄉礦務局志編纂委員會編，《萍鄉礦務局志》，頁 98。
110. 安源工人運動紀念館編，《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料》（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1 年），頁 769-71。
111. 李立三回憶錄，1963 年 6 月，載《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 904。
112. 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編，《中共萍鄉地方史》，頁 107。
113.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 920。
114. 劉善文，《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頁 165；《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 135-36。

115. 劉善文、黃愛國，〈李立三在安源史料述略〉，載《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研究文匯》，頁 276-77；《劉少奇論工人運動》(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年)，頁 144。
116. 《劉少奇論工人運動》，頁 216。
117.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 98。
118. 劉善文，《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頁 167；《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 134-35。
119. 這些細節見於安源黨史專家黃愛國對袁品高進行的系列訪談。袁品高曾經擔任過劉少奇的保鏢，也是謝懷德統領的工人糾察隊隊員。在萍鄉黨校與黃愛國進行的訪談，2009 年 10 月 23 日。
120.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 97、100。
121. 同上，上冊，頁 237-51。
122. 劉善文，《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頁 242-44。
123.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 234。
124. 謝家俊，〈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禁賭〉，《萍鄉黨史通訊》第 1 期 (1990 年)，頁 40。
125.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 235。
126. 同上，上冊，頁 159。
127. 同上，上冊，頁 198。
128. 《萍鄉煤炭發展史略》，頁 84-88。湖南鄉紳對李壽銓感激不盡，這點在隆重的送別贈禮上得以反映：一尊他本人的巨大的陶瓷半身像，多幅湖南繡品 (此地以出產刺繡而聞名)，其中一幅罩上玻璃的巨大刺繡畫像，需要四人抬着，因過重而無法掛於家中的牆上。
129. 中共萍鄉礦務局委員會宣傳部編，《紅色安源》，頁 200；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編，《劉少奇在江西》(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頁 2。
130. 關於聖公會牧師和罷工工人之間關係友善的資料，可參見馬漢欽，〈萍鄉基督教百年史略及現狀〉，載《萍鄉高等專科學校學報》3 (1) (2004 年)，頁 109；詹海烈，〈江西基督教聖公會史話〉，《文史大觀》第 1 期 (1995 年)，頁 40。
131. Walworth Tyng, "The Miners' Church at Peaceful Spring: Among the Collieries and Coke Ovens at Anyuen—A Vivid Picture of Our Work in a Little Known Part of the District of Hankow," *The Spirit of Missions* 90 (1925): 477.
132. 中共萍鄉礦務局委員會宣傳部編，《紅色安源》，頁 201-3。
133. 劉家林，〈二十年代安源工人教育〉，載《江西工運史研究資料》第 3 輯 (1982 年 8 月 10 日)，頁 50-51。劉少奇的反基督教工作其實是當時國共兩黨共同掀起的浩大的反基督教民族主義運動的一部分。參見 Jessie G. Lutz,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the Anti-Christian Campaigns of the 1920s," *Modern Asian Studies* 10, no. 3 (1976): 395-416；在同一時期，蘇聯也展開了類似的反俄羅斯東正教的



- 運動。參見 Brovkin, *Russia after Lenin*, 93-107; Daniel Peris, *Storming the Heavens: The Soviet League of the Militant Godles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28.
134. 中共萍鄉礦務局委員會宣傳部編，《紅色安源》，頁 163-99。
135.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 950。
136. 劉善文，《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頁 171-75；《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 941-42。
137. Letter from J. Calvin Huston (April 23, 1925), quoted in Lynda Shaffer, *Mao and the Workers: The Hunan Labor Movement, 1920-1923* (Armonk, NY: M. E. Sharpe, 1982), 104.
138. 劉善文，《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頁 178-91。
139. 同上，頁 192-93；于建嶸，《嶽村政治》(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年)，頁 142-70。
140.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 1380。
141. 龔逸情，〈關於安地工作失敗後同志被捕經過的詳細情況報告〉，《萍鄉黨史通訊》第 4 期 (1985 年)，頁 7-8。
142.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 526、574。
143. 張振初，《安源軼事》，頁 174；劉善文，《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頁 258-62。
144. 《申報》，1925 年 10 月 21 日，載《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 1217-19。
145.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 927。
146. 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編，《中共萍鄉地方史》，頁 166-72；黃愛國，〈安源九月慘案的經過〉，載《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研究文匯》，頁 298-304；《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 574；下冊，頁 913、1340。
147. 《萍鄉煤炭發展史略》，頁 31。
148. 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編，《中共萍鄉地方史》，頁 173；張振初，《安源軼事》，頁 183；劉善文，《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頁 259。
149. Chang Kuo-t'ao, "Introduction," in *Collected Works of Liu Shao-ch'i* (Hong Kong: Union Research Institute, 1969), iv.
150.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 909-10。
151. 劉善文，《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頁 231。
152. Dittmer, *Liu Shao-ch'i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153. V. I. Lenin, "On Cooperation," in *Collected Works*, 2nd English ed.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65), 33: 467-75.
154. Peter Kenez 指出有一些蘇聯農民對管理該村閱讀室的負責人和他們的政治教育工作充滿敵意，致使他們及其家人受到人身傷害。Kenez, *The Birth of the Propaganda State*, 141. Vladimir Brovkin 認為蘇聯村民「憎惡圖書館，將其視為反宗教的運動中心場所……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開展的破除傳統、習俗、生活

- 方式以及宗教信仰的意識形態戰線運動最後黯淡收場。」Brovkin, *Russia after Lenin*, 92, 107. James von Geldern 觀察到，在同一時期「在布爾什維克主義者認為應當閱讀的讀物和人民願意閱讀的讀物的問題上，存在着無休無止的鬥爭。」James von Geldern, "Introduction," in *Mass Culture in Soviet Russia*, ed. James von Geldern and Richard Stit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 xvi.
155. Kam Louie and Louise Edwards, "Chinese Masculinity: Theorizing Wen and Wu," *East Asian History* 8 (1994): 138-94.
156. Cheng-Hua Fang, "Power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in Imperial China: Civil and Military Power from Late Tang to Early Song Dynasties," PhD diss., Brown University, 2001.
157. 劉少奇，〈二七失敗後的安源工會〉（1925年4月），載《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446。
158. Jung Chang and Jon Halliday, *Mao: The Unknown Stor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5).
159. 〈敵「湖南全省清鄉總報告書」摘錄〉，載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紀念館編，《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資料選編》第2卷第6期（1984年），頁26。此為未出版的原始資料合輯，收藏於安源紀念館檔案室，被定為「絕密」材料。
160. 根據不完全統計，在1921至1925年間超過3,280名工人、3,180名兒童和100名婦女從安源的共產主義學校畢業。楊放萍，〈略述安源工運中黨對工人之教育〉，頁17。

#### 第四章 從動員群眾到軍事武裝鬥爭

1. 萍鄉市委編，《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0年），上冊，頁526-27；劉善文，《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1993年），頁261-62。
2. 劉善文，《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頁265；張振初，《安源軼事》（萍鄉：安源煤礦，1995年），頁180。
3.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539。
4. 同上，上冊，頁542。
5. 同上，下冊，頁915。
6. 同上，下冊，頁921。
7. John W. Lewis, "Leader, Commissar and Bureaucrat: The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in the Last Days of the Revolution," in *China in Crisis*, ed. Ping-ti Ho and Tang Tsou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 vol. I, book A: 449-81; Lowell Dittmer, *Liu Shao-ch'i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Politics of Mass Critic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8.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532-33。

9. 劉善文,《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頁 268-70。
10.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 574。
11. 同上,上冊,頁 659。
12. 張振初,《安源軼事》,頁 149。
13.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 1384。諸多曾經在安源工人學校學習過的其他煤礦工人延續了類似的模式,他們在廣州受訓,然後在北伐中被派回湖南家鄉進行軍事宣傳和組建農民協會。這些工人包括袁德生、袁德喜、湯正倫、朱昌炎與趙國城等。諸人的生平簡介見《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 1394-1405。
14. 《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史話》(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 65。
15. 蔣介石本人在 1926 年 9 月 20 日當天的日記中提到了這一事件,日記藏於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本書作者感謝蘇成捷 (Matthew Sommer) 和謝美裕 (Hsieh Mei-yu) 幫助找到此篇日誌。漢冶萍煤鐵廠礦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在 1926 年 11 月 13 日致董事會的一封信中談及蔣介石所作的演講。參見《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 1358;以及劉善文,《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頁 284-85。
16.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 928。
17. 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編,《中共萍鄉地方史》(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3年),第一卷,頁 199-200。
18.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 1358;張振初,《安源軼事》,頁 182。
19. 〈湘區書記報告〉,載《中共中央文件選編》(1926 年 10 月 22 日)(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第 2 冊,頁 297。
20. Hans J. van de Ven, *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3), 95.
21. Mao Zedong, "Report on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Peasant Movement in Hunan," in *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7), I: 28.
22. 同上, I: 46。
23. Zhang Baohui, "Communal Cooperative Institutions and Peasant Revolutions in South China, 1926-1934," *Theory and Society* 29, no. 5 (2000): 702.
24. Stephen C. Averill, *Revolution in the Highlands: China's Jinggangshan Base Area*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6), 234-37.
25. 劉善文,《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頁 281-82。
26.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 929。
27. Elizabeth J. Perry, *Patrolling the Revolution: Worker Militias, Citizenship and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6), 80-82.
28. 劉善文,《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頁 282-83。
29. 同上,頁 291-92。

30. 同上；高飛，〈槍斃大惡霸地主葉紫屏〉，載《萍鄉文史資料》第 2 輯（1984 年 12 月），頁 136-38；〈萍鄉人民審判土豪劣紳委員會暨特別法庭〉，載《萍鄉黨史通訊》第 3 期（1988 年），頁 42-44。
31.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 1031。
32. 劉善文，〈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頁 293。
33. 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編，〈《中共萍鄉地方史》〉（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3 年），頁 215-16。
34. Christina K. Gilmartin, *Engender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Radical Women, Communist Politics, and Mass Movements in the 1920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35. 張振初，〈安源軼事〉，頁 191。
36. 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編，〈《中共萍鄉地方史》〉，頁 219。
37. 〈萍鄉煤礦工人管理礦山〉，載《萍礦工人報》（1998 年 6 月 11 日）。再版：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編，〈《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研究文匯》〉（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 年），頁 418-20。
38.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 1243。
39. Chang Kuo-t'ao,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1-1927*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71), 606-7. 張國燾之言的準確性遭到質疑，見唐純良，〈李立三全傳〉（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9 年），頁 103-5。無論李立三父親的真實命運如何，毫無疑問革命活動在湖南醴陵縣製造的恐怖極端嚴重。
40. 關於「四一二事件」的敘述，參見 Nicholas R. Clifford, *Spoilt Children of Empire: Westerners in Shanghai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the 1920s* (Hanover NH: Middlebury College Press, 1991), chapter 15.
41. 幸元林，〈安源工人革命鬥爭片段回憶〉，載《萍鄉黨史通訊》第 6 期（1985 年），頁 16。
42. 劉善文，〈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頁 298-307。
43. Roy M. Hofheinz Jr., *The Broken Wav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easant Movement, 1922-1928*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53.
44.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 636。
45. 同上，上冊，頁 657。
46. 江西省文化廳、安源工人運動博物館編，〈《秋收起義在江西》〉（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 年），頁 24。
47. 關於此過程的研究，參見 Averill, *Revolution in the Highlands*.
48. 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編，〈《中共萍鄉地方史》〉，頁 275。
49. 〈萍鄉煤炭發展史略〉，載《江西文史資料選輯》第 23 輯、《萍鄉文史資料》第 6 輯合編版（1987 年），頁 26-32。

50. 江西省文化廳、安源工人運動博物館編，《秋收起義在江西》，頁 31。
51. 同上，頁 32。
52. Walworth Tyng, "Difficult Days in Hunan: Veteran Missionary Gives Vivid Picture of Unrest in China as Governments Change," *The Spirit of Missions* 92 (1927): 71.
53. 劉善文，《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頁 333。
54.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 644。
55. 劉善文，《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頁 334-37。
56. 〈敵「湖南全省清鄉總報告書」摘錄〉，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紀念館編，《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資料選編》第 2 卷第 6 冊 (1984 年)，頁 26。此為未出版的原始資料合輯，收藏於安源紀念館檔案室，被定為「絕密」材料。
57. 關於這段時期共產黨和國民黨兩黨互相模仿的研究，參見 Perry, *Patrolling the Revolution*, chapter 3.
58. 〈我所知道的「安源工人反共委員會」〉，載《萍鄉文史資料》第 12 輯 (1990 年 12 月)，頁 109-10。
59. 〈敵「湖南全省清鄉總報告書」摘錄〉，頁 136-37、171-72。
60. 同上，頁 170-71。
61.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 1095-96。
62.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寫作組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87 年)，上冊，頁 121。
63. 《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一卷，頁 62。
64. 劉善文，《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頁 374。
65. 引自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編，《中共萍鄉地方史》，頁 323-34。
66. 《聖公會報》第 24 卷第 6 期 (1931 年 3 月 15 日)，頁 10-11。
67. 王耀南，1967 年 8 月 21 日訪談，載《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資料選編》第 3 卷第 1 冊。
68. 劉榮華，1969 年 5 月 24 日訪談，載安源紀念館檔案，檔號 1254。
69. 徐桂生，〈青洪幫發展簡況及其在萍鄉的活動〉，載《萍鄉文史資料》第 12 輯 (1991 年 12 月)，頁 76。
70. 《萍鄉安源煤礦調查報告》(南昌：江西省政府經濟委員會，1935 年)，頁 168-72。收藏於上海市圖書館。
71. 關於戰時接管一些重要企業的情況，參見 Mark W. Frazier, *The Making of the Chinese Industrial Workpla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Joshua Howard, *Workers at War: Labor in China's Arsenal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72. 關於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在當時政府經濟管理事務中的作用，參見 William C. Kirby, *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73. 中共萍鄉礦務局委員會宣傳部編，《紅色安源》(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 451。
74. 同上，頁 459。
75. 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編，《中共萍鄉地方史》，頁 478。
76. 中共萍鄉礦務局委員會宣傳部編，《紅色安源》(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 504。關於《紅色安源》不同版本的更多情況，參見第五章。
77. 萍鄉市工會編纂委員會編，《萍鄉工會志》(萍鄉：出版社未知，1999年)，頁 38。
78. 萍鄉市委編纂委員會編，《萍鄉人民革命鬥爭史》(萍鄉：出版社未知，1962年)，頁 153。關於平江事件，參見 Gregor Benton, *The New Fourth Army: Communist Resistance along the Yangtze and the Huai, 1938-194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79. 國家歷史檔案館(臺北)，檔號 003-010305-0205。資料中包括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從 1946 年 8 月至 1948 年 3 月期間關於安源地區非法私人採礦活動重現的報告。
80. 萍鄉市工會編纂委員會編，《萍鄉工會志》，頁 38。
81. 萍鄉礦務局志編纂委員會編，《萍鄉礦務局志》(萍鄉：出版社未知，1998年)，頁 16。
82. 萍鄉市委編纂委員會編，《萍鄉人民革命鬥爭史》，頁 153-54。
83. 同上，頁 155。
84. 同上，頁 156。
85. 同上，頁 156-57。
86. 同上，頁 158、166-67；《安源煤礦史》(長沙：湖南師範學院，1958年)，頁 156。
87. Dittmer, *Liu Shao-ch'i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11-29.
88. 1930 年 11 月 16 日，一封來自共產國際的信件，批評李立三在未鞏固農村革命根據地的情況下盲目攻打城市的做法，犯了冒險主義路線的錯誤。這一批評迫使李立三在 11 月 25 日從中共政治局辭職，不久後離開中國。Derek J. Waller, *The Kiangsi Soviet Republic: Mao and the National Congresses of 1931 and 1934*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73), 16.
89. 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8), 146.
90. 引自劉濤和劉允真，〈看！劉少奇的醜惡靈魂〉，1967 年 1 月 2 日，載於宋永毅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大學服務中心，2002 年)。
91. Anna Louise Strong, *China's Millions* (New York: Coward-McCann, 1928), 100.
92. 同上，頁 103-4。
93. Nym Wales,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New York: John Day, 1945), 32-33.

94. 于建嶸，《中國工人階級狀況：安源實錄》（香港：明鏡出版社，2006年），頁 67–68。
95. Chang-tai Hung, *War and Popular Culture: Resistance in Modern China, 1937–194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4), 221. 關於國民黨和共產黨兩黨的對比，參見頁 278–79。
96. Robert C. North, *Kuomintang and Chinese Communist Elite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97. 如賀大衛 (David Holm) 觀察到，奠定了日後紅軍文化生產基礎的江西蘇維埃時期的戲劇和音樂，深受湘贛南部地區傳統的影響。
98. 關於「紅色劇院」對共產主義革命的重要性，參見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119–25.
99. 有關蘇聯工人文化宮的描述，參見 John Dewey, *Impressions of Soviet Russia and the Revolutionary World* (New York: New Republic, 1929). 儘管中國的這種機構以蘇聯為效仿對象，但是在其場所內舉辦的文化活動顯然帶有很鮮明的地方特色。
100. Paul Pickowicz, *Marxist Literary Thought in China: The Influence of Ch'u Ch'iu-pa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107, 172–73.
101. Holm, *Art and Ideolog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20.
102. Pickowicz, *Marxist Literary Thought in China*, 228–31.
103. Holm, *Art and Ideolog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55.
104. Jack Belden, *China Shakes the World*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49), 63.

## 第五章 築造革命傳統

1. 萍鄉礦務局志編纂委員會編，《萍鄉礦務局志》（萍鄉：出版社未知，1998年），頁 17。
2. Richard Curt Kraus, *The Party and the Arty in China: The New Politics of Culture*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4), 37, 48–49.
3. Chang-tai Hung, *Mao's New World: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0), 257.
4. Julian Chang, "The Mechanics of State Propaganda: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1950s," in *New Perspectives on State Socialism in China*, ed. Timothy Cheek and Tony Saich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7), 76.
5. 1951年1月，上級任命一名叫宋維靜的女性來接替郭象豫的萍鄉礦務局局長之職，但是由於某種原因，此人實際上並未到任，郭象豫繼續管理大權。同年後一時期，當礦務局黨委會重組後，郭象豫的權力被大為削弱。即使如此，郭象豫仍然繼續留任一年，直至1952年6月。參見萍鄉礦務局志編纂委員會編，《萍鄉礦務局志》，頁 18、711。因國民黨時期殘留影響的存在，新建

- 的秩序並不平靜。根據萍鄉公安局的資料，在解放後最初的四個月內，一共逮捕了 140 餘名「惡霸」，被抓獲或槍決的國民黨成員、員警和「土匪」達到 1,043 名。參見萍鄉市公安局公安史志辦公室編，《萍鄉公安志》(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1 年)，頁 9。這是一份內部資料。
6. 萍鄉礦務局志編纂委員會編，《萍鄉礦務局志》，頁 17；湖南師範學院編，《安源煤礦史》，油印手稿，長沙，1958 年 12 月，頁 158。
  7. 萍鄉市公安局公安史志辦公室編，《萍鄉公安志》，頁 63。
  8. Julia C. Strauss, "Paternalist Terror: The Campaign to Suppress Counter-revolutionaries and Regime Consolid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50-1953,"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44, no. 1 (January 2002): 80-105; Yang Kuisong, "Reconsidering the Campaign to Suppress Counterrevolutionaries," *China Quarterly* 193 (2008): 102-21.
  9. 湖南師範學院編，《安源煤礦史》，頁 158-69。
  10. 關於上海工廠發生的運動，參見 Elizabeth J. Perry, *Patrolling the Revolution: Worker Militias, Citizenship and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6)。在萍鄉，在這場運動中受到攻擊的人數略高於該縣 5% 的人口。萍鄉市公安局公安史志辦公室編，《萍鄉公安志》，頁 64。
  11. 當時發生了成千上百以幫會為基礎的反抗共產主義新政權的事件，幾乎遍佈全國各地。關於此類事件的匯編，參見趙嘉珠主編，《中國會道門史料集成》上下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 年)，上冊，頁 599-600 有關於萍鄉的討論。
  12. 文云成、史宗正，〈「華中反共救國軍」的產生及其滅亡〉，載《萍鄉文史資料》第 4 輯(1985 年)，頁 7。
  13. 〈張光馨的自白〉，載《萍鄉文史資料》第 4 輯(1985 年)，頁 68-69。
  14. 文云成、史宗正，〈「華中反共救國軍」的產生及其滅亡〉，頁 9-10；王中民，〈「華中反共救國軍」在萍鄉煤礦的覆滅〉，載《萍鄉文史資料》第 4 輯(1985 年)，頁 46。
  15. 黃式國編，《萍鄉市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6 年)，頁 899；萍鄉市公安局公安史志辦公室編，《萍鄉公安志》，頁 72-73。
  16. 〈周學芝的自白〉，《萍鄉文史資料》第 4 輯(1985 年)，頁 67；黃式國編，《萍鄉市志》，頁 898-99。
  17. 王中民，〈「華中反共救國軍」在萍鄉煤礦的覆滅〉，頁 44。
  18. 萍鄉市公安局公安史志辦公室編，《萍鄉公安志》，頁 76。
  19. 湖南師範學院編，《安源煤礦史》，頁 160。
  20. 萍鄉市公安局公安史志辦公室編，《萍鄉公安志》，頁 158-72。



21. 根據公安局的地方誌，直到 1986 年萍鄉才又出現一次有預謀的叛亂。該年中，一個千禧主義佛教組織龍華會，成員有 48 名，來自湖南和江西兩省，他們被當作「反革命」叛亂團伙而遭到取締。同上，頁 74-75。
22. 湖南師範學院編，《安源煤礦史》，頁 161-63。
23. 萍鄉礦務局志編纂委員會編，《萍鄉礦務局志》，頁 226。
24. 同上，頁 463。
25. 朱訓編，《中國礦業史》(北京：地質出版社，2010 年)，頁 192。
26. 中國社會科學院、安源工人運動紀念館編，《劉少奇與安源工人運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1 年)，頁 72。儘管劉少奇回信上的日期並沒有標注出年份，根據某些資料顯示，這封信的時間是在 1953 年或者更晚，但是當地的黨史專家廣泛認同信件年份為 1952 年。
27. 同上，頁 463。
28. 中共萍鄉礦務局委員會編，《毛澤東、劉少奇、李立三在安源的故事》(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 年)，頁 204。
29. 萍鄉礦務局志編纂委員會編，《萍鄉礦務局志》，頁 22-23；中國社會科學院編，《安源工人運動的歷史不容顛倒》(北京：出版社未知，1967 年)，頁 17。
30. Feng Chongyi, "Jiangxi in Reform: The Fear of Exclusion and the Search for a New Identity,"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s Provinces: Comparative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 ed. Hans Hendrichske and Feng Chongyi (London: Routledge, 1999), 256.
31. 《反動影片〈燎原〉出籠記》，由上海東方紅電影製片廠製作的文化大革命傳單，收藏於萍鄉市圖書館。
32. 參見彭江流的文章，《萍鄉古今》第 2 輯 (1982 年 8 月)，頁 108。
33. 湖南師範學院編，《安源煤礦史》，頁 166-67；中共萍鄉煤礦委員會宣傳部編，《紅色的安源》(北京：作家出版社，1961 年)，頁 357；《萍鄉日報》(2004 年 9 月 26 日)。
34. 中共萍鄉市委黨史辦公室，《萍鄉英烈》(萍鄉：萍鄉出版社，1986 年)，頁 72-77。
35. 中共萍鄉煤礦委員會宣傳部編，《紅色的安源》(1961 年版)，頁 357-58。
36. 湖南師範學院編，《安源煤礦史》，頁 167。
37. 朱培鈞，〈訪安源煤礦〉，載《旅行家》第 3 期 (1956 年)，頁 7-8。
38. 《紅安戰報》(1967 年 7 月 5 日)，紅衛兵報紙，收藏於萍鄉市圖書館。
39. 湖南師範學院編，《安源煤礦史》，頁 167-68。
40. 中共萍鄉礦務局委員會編，《毛澤東、劉少奇、李立三在安源的故事》(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 年)，頁 202。
41. 《人民日報》(1949 年 9 月 22 日)。

42. 劉少奇，於 1949 年 3 月在西柏坡的講話，載《劉少奇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 第 1 卷，頁 421。
43. Elizabeth J. Perry, "From Native Place to Workplace: Labor Origins and Outcomes of China's Danwei System," in *Danwei: The Changing Chinese Workplace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d. Lu Xiaobo and Elizabeth J. Perry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7).
44. Elizabeth J. Perry, "Masters of the Country? Shanghai Workers in the Early PRC," in *Dilemmas of Victory: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d. Jeremy Brown and Paul Pickowicz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59-79.
45. 上海市檔案館，檔號 C1-2-240。
46. 唐純良，《李立三傳》(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9 年)，頁 153。
47. Paul Harper, "The Party and the Unions in Communist China," *China Quarterly* 37 (1969): 96. 也可參見 Jackie Sheehan, *Chinese Workers: A New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chapter 1.
48. 劉少奇，〈國營工廠內部的矛盾和工會工作的基本任務〉，載《劉少奇論工人運動》，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年)，頁 407。
49. 李思慎，《李立三之謎》(北京：新華出版社，2005 年)，頁 337-53。
50. 關於這次罷工潮的起因及結局，參見 Elizabeth J. Perry, "Shanghai's Strike Wave of 1957," *China Quarterly* 137 (March 1994).
51. 上海市檔案館，檔號 C1-2-2255.
52. 萍鄉礦務局志編纂委員會編，《萍鄉礦務局志》，頁 24。
53. 〈徹底清算劉少奇在安源的反革命罪行〉，載《新北大》第 6 期(1967 年 4 月 25 日)。收錄於 Yuan Zhou, ed., *A New Collection of Red Guard Publications* (Oakton, VA: 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1991), part 1, vol. 15, 7195.
54. 關於這個故事的不同版本，參見白陽編，《安源工人鬥爭故事》(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54 年)，頁 15-20；《毛主席第一次到安源》(北京：作家出版社，1959 年)，頁 36-42。
55. 〈萍鄉採茶戲簡介〉，載《萍鄉古今》第 4 輯(1984 年 12 月)，頁 300。
56. 陳煥聲，《1922 年安源大罷工》(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56 年)。1959 年出版了這個戲劇的一個略長版本，其中簡略提及毛澤東和李立三兩人，但是戲劇的高潮部分仍然是劉少奇代表工人出面英勇地與資方進行談判。蕭松，《安源大罷工》(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 年)。
57. 萍鄉市委編，《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0 年)，下冊，頁 1270-72。
58. 同上，下冊，頁 897。
59. 《反動影片〈燎原〉出籠記》。

60. 中國社會科學院編，〈安源工人運動的歷史不容顛倒〉；《紅安戰報》第 16 期 (1967 年 6 月 30 日)。
61. 《反動影片〈燎原〉出籠記》。
62. 中共萍鄉礦務局委員會編，《毛澤東、劉少奇、李立三在安源的故事》，頁 205。
63. 參見張振初 1960 年 7 月 4 日撰文記載的安源工人們講述的劉少奇在安源的故事。
64. 《萍鄉市政府志》(北京：新華出版社，1992 年)，頁 192。
65. 中國社會科學院、安源工人運動紀念館編，《劉少奇與安源工人運動》，頁 189-91。
66. 同上，頁 216。
67. 萍鄉礦務局志編纂委員會編，《萍鄉礦務局志》，頁 24。
68. 中國社會科學院編，《安源工人運動的歷史不容顛倒》，頁 45。
69. 中共萍鄉礦務局委員會宣傳部編，《紅色安源》，頁 583。
70. 關於「百花齊放」運動和隨後的反右運動的背景，參見 Roderick MacFarquhar,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1956-195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Merle Goldman, *China's Intellectuals: Advise and Diss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71. 湖南師範學院編，《安源煤礦史》，頁 178-82。
72. 同上，頁 217。
73. 中國社會科學院編，《安源工人運動的歷史不容顛倒》，頁 23。
74. 蕭建萍，〈都是「燎原」惹的「禍」〉，載《大眾電影》第 8 期 (2005 年)。
75. 袁品高的聽眾並不限於遊客。1962 年萍鄉市工會安排袁品高到當地多個工廠作報告，講述 1922 年大罷工的事跡，聽眾超過兩萬名工人。《萍鄉市工會志》(萍鄉：萍鄉出版社，1999 年)，頁 192。
76. 湖南師範學院編，《安源煤礦史》，頁 209。
77. 同上，頁 209-13。
78. 同上，頁 188-202。
79. 同上，頁 220。
80. 萍鄉礦務局志編纂委員會編，《萍鄉礦務局志》，頁 457-63。
81. 〈「文化大革命」時期的萍鄉煤礦〉，載《萍礦工人報》(1998 年 9 月 24 日)。收錄於萍鄉歷史地方誌辦公室編，《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研究文匯》(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 年)，頁 436。
82. 《萍鄉煤炭發展史略》，載《江西文史資料選輯》第 23 輯、《萍鄉文史資料》第 6 輯合編版 (1987 年)，頁 140-41。
83. 南昌市檔案局，(機密資料) 檔號 5018-18-1。
84. 《反修戰報》第 1 期 (1967 年)。收藏於萍鄉市圖書館。

85. Paul Clark, *Chinese Cinema: Culture and Politics since 1949*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Paul Clark,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 Hist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13.
86. 2006年6月作者在南京訪問蔡少卿，蔡少卿曾經是北京大學安源工人運動研究組的成員。這個研究組還在北京採訪了二十餘名參軍之前曾在安源做過工的老軍人，並對中央檔案館的人事檔案卷宗做過資料收集。根據蔡教授敘述，研究初稿被送達鄧拓和其他高級主管幹部。然而，由於當時政治氣候複雜多變，這個研究項目一直未完成，也未出版任何文字。安源紀念館檔案室，檔號 1450。研究組 1959年1月10日訪談李立三的記錄稿，見《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 896-901。
87. 湖南師範學院編，《安源煤礦史》。
88. 《徹底清算劉少奇在安源的反革命罪行》，頁 7。
89. 《紅色曙光》第 8 期（1967年4月30日）。紅衛兵報紙，萍鄉市圖書館收藏。
90. 中共萍鄉礦務局委員會宣傳部編，《紅色安源》（1959年版），頁 5-10。
91. 《萍鄉市工會志》，頁 283。
92. 《徹底清算劉少奇在安源的反革命罪行》，頁 8。
93. 中共萍鄉礦務局委員會宣傳部編，《紅色的安源》（1961年版），頁 359-60。
94. 中共萍鄉礦務局委員會宣傳部編，《紅色的安源》（1959年版），頁 618-20。
95. 劉少奇和毛澤東皆是鑄成大躍進之人，儘管二人的着重點截然不同（劉少奇強調黨組織的必要性，而毛澤東注重群眾的自發性）。有關資料詳見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8-196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96. 《中國工運史料》第 2 期（1958年），頁 134。
97. 《湖南歷史資料》第 1 期（1958年），頁 4。
98.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 91-104，印有劉少奇文章的最初版本。
99.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頁 139-43，印有此文章的最初版本。
100. 《劉少奇在中共軍委擴大會議上講話》（1959年9月9日），頁 10-12（油印版收藏於哈佛大學 Fung Library 圖書館）。劉少奇本人對於斯大林式領導風格的推崇實際上由來已久。1937年3月4日他在給張聞天的信中寫道，「我們還沒有中國的斯大林，……我們的政治經驗還幼稚，還要虛心學習。事情還要彼此好好商量，集思廣益，建立真正的集體領導，更多的請示國際。」《劉少奇問題資料專輯》（臺北：中共研究雜誌社，1970年），頁 1。
101. 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早期，當地的歷史學家和宣傳家彭江流曾編寫了另一版本的民歌，其中李立三（李隆郅）被毛澤東（毛潤之）代替。其開篇詩句為「直到 1921 年，忽然霧開見青天，有個能人毛潤之，打從湖南來安源。」《萍鄉古今》第 6 輯（1982年8月），頁 112。

102. 《徹底清算劉少奇在安源的反革命罪行》，頁 7–8。關於 1925 年的最初版本，見《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 840–59；及安源工人運動紀念館編，《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料》（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1 年），頁 571。與 1925 年版本相比，這首民歌的 1955 年版本賦予劉少奇更主要的角色，但誇大程度仍遜於 1959 年版本。1955 年版本見中國社會科學院、安源工人運動紀念館編，《劉少奇與安源工人運動》，頁 126–39。
103. 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編，《劉少奇在江西》（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88 年），頁 152–59。
104. 萍鄉市委編纂委員會編，《萍鄉人民革命鬥爭史》（萍鄉：出版社未知，1962 年），頁 29。
105. Julia F. Andrews, *Painters and Politic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7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242–43.
106. Ellen Johnston Laing, *The Winking Owl: Ar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38.
107. 《美術風雷》第 1 期（1967 年），頁 10–14。
108. Andrews, *Painters and Politic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40.
109. Victoria E. Bonnell, *Iconography of Power: Soviet Political Posters under Lenin and Stali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162.
110. 同上，頁 165。
111. 侯一民，〈劉少奇和安源礦工的構思〉，載《美術》第 4 期（1961 年），頁 21–22。
112. Andrews, *Painters and Politic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328.
113. 萍鄉礦務局志編纂委員會編，《萍鄉礦務局志》，頁 28、694。
114. 楊公敏，〈電影「燎原」拍攝追憶〉，載《劉少奇在上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 年），頁 326–28。
115. 電影《燎原》，天馬電影製片廠，上海，1962 年。
116. 《徹底清算劉少奇在安源的反革命罪行》，頁 8。
117. 《反動影片〈燎原〉出籠記》。
118. David Brandenberger, “Stalin as Symbol: A Case Study of the Personality Cult and Its Construction,” in *Stalin: A New History*, ed. Sarah Davies and James Harri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250.
119. 同上，頁 251–70。
120. 蕭建萍，〈電影「燎原」風波始末：雷煥覺就是劉少奇？〉，載《大眾電影》第 8 期（2005 年）。
121. 《顧頡剛日記》（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 年），頁 150。
122.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 906–10。

123. 中國社會科學院、安源工人運動紀念館編，《劉少奇與安源工人運動》，頁 184-85。
124.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 894-95。
125. 中國社會科學院、安源工人運動紀念館編，《劉少奇與安源工人運動》，頁 188。
126.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紀念館內容介紹》。雖然並無出版日期和地址，但是根據其文字內容，這本小手冊應是 1965 年紀念館開放時出版。收藏於哈佛燕京圖書館。
127. 中共萍鄉礦務局委員會編，《毛澤東、劉少奇、李立三在安源的故事》，頁 217、218。
128. 朱子金以為李立三當時仍擔任勞動部部長，於是便將她的第一封信（1965 年 6 月）寄至此地址。直到 8 月一位中央官員訪問安源紀念堂的時候，她才得知李立三被降職為中共中央華北局書記處書記。然後她再次致信，並寄至新的地址。從北戴河海濱療養院休養三個月返回北京後不久，李立三便回覆了這兩封信。同上，頁 216。
129. 同上，頁 218。
130. 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小型座談會上的講話〉（1964 年 12 月 20 日），載於宋永毅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大學服務中心，2002 年）。
131. 毛澤東，〈關於四清運動的一次講話〉（1965 年 1 月 3 日），載於宋永毅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132. Mao Zedong, "Talk on the Four Cleanups Movement," *Long Live Mao Tse-tung Thought*, January 3, 1965.
133. Clark,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 History*, 158.
134. 朱少連已經犧牲幾十年，故而在這些互相批鬥成風的時期，這無疑有助於他的革命名節。一直有一個謠傳，說他同許多安源原來的積極分子一樣在白色恐怖時期投靠了國民黨。1959 年 1 月，北京大學數名歷史學家詢問李立三，朱少連是否背叛過革命，李立三回答，「聽人說，被捕以後叛變了，叛變到什麼程度不知，可能拷打後，供出機關、名單，大的叛變恐怕不大，可能有叛變行為，具體情況不知道，後來就槍斃了。」安源紀念館檔案，檔號 A12-27-27 (1)。所出版的李立三訪談的數個版本都省略了這些講話。
135. 據萍鄉礦務局報告，從 1950 年到 1965 年期間，為 7,665 名礦工及家屬建造新住房達 181,292 平方米，耗資近 750 萬元。同一時期，另外還為 6,227 名單身工人修建了新宿舍。萍鄉礦務局志編纂委員會編，《萍鄉礦務局志》，頁 608、612。
136. 同上，頁 613-16。
137. 中共萍鄉礦務局委員會編，《毛澤東、劉少奇、李立三在安源的故事》，頁 209。

138. 萍鄉礦務局志編纂委員會編，《萍鄉礦務局志》，頁 671–77。
139. 同上，頁 302、599。
140. 關於毛澤東時期中國進行的工業烏托邦的失敗行動，參見 Li Hou, “Urban Planning in Mao’s China: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Daqing Model,” Ph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2009.
141. 梅方權，《安源礦工：轉型期的變遷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 年），頁 86。
142. S. A. Smith, *Revolution and the People in Russia and China: A Comparative Stud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232–33.
143. Andrew G. Walder,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144. Robert Jay Lifton, *Revolutionary Immortality: Mao Tse-tung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8), 23.
145. R. Kent Guy, *The Emperor’s Four Treasures: Scholars and the State in the Late Ch’ien-lung Era* (Cambridge, MA: 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 1987).

## 第六章 毛澤東最後的征戰

1. 關於這段時期的政治歷史，詳見 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2. Haiyan Lee, “The Charisma of Power and the Military Sublime in Tiananmen Squar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70, no. 2 (May 2011): 405.
3. Timothy L. Smith, *Revivalism and Social Reform*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0); Marshall William Fishwick, *Great Awakenings: Popular Religion and Popular Culture* (New York: Haworth Press, 1995); Thomas S. Kidd, *The Great Awakening*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4. 中國社會科學院、安源工人運動紀念館編，《劉少奇與安源工人運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1 年），頁 213–14；李紹洲，〈我們的「安展」〉，收於李紹洲的系列回憶文稿《身繫非常歲月》，參見 <http://lishaozhou417.blog.163.com/blog/static/126614511200910196651287/>（李紹洲的個人博客）。
5. 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文化大革命時期」的萍鄉煤礦》（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 年），頁 436。
6. 中國社會科學院、安源工人運動紀念館編，《劉少奇與安源工人運動》，頁 215。
7. 《陳伯達、江青對北京航空學院同學的講話》（1966 年 11 月 19 日）；《陳伯達、江青接見航空學院紅旗展示的講話》（1966 年 12 月 13 日）。兩份資料均來自宋永毅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大學服務中心，2002 年）。

8. 許多到訪煤礦的人即使是乘坐火車而來，也還是要沿着崎嶇陡峭的山路步行去井岡山。2009年7月與北京大學樂黛雲教授的私人談話。由於她當時是在北大五七幹校，於是在1970年到訪過安源。
9. 關於毛澤東革命魅力的神學解讀，參見 Christian Sorace, "Saint Mao," *Telos* 151 (Summer 2010): 173-91.
10. 戚本禹，〈戚本禹對「批判陶鑄聯絡站」的指示〉(1967年2月9日)，載於宋永毅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11. 中國社會科學院、安源工人運動紀念館編，《劉少奇與安源工人運動》，頁215。安源老居民的回憶則明確表示那些樹在建造工人俱樂部之前就已經生長在那裡，來源同劉少奇無關。參見朱子健，1967年12月15日訪談，《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資料》第3卷第1冊(1975年)。
12. 中國社會科學院編，《安源工人運動的歷史不容顛倒》(北京：出版社未知，1967年)，頁47。
13. 蕭建萍，〈都是「燎原」惹的「禍」〉，載《大眾電影》第8期(2005年)。
14. 中國社會科學院編，《安源工人運動的歷史不容顛倒》，其中有樹被砍伐並重新植樹的照片。
15. 中國社會科學院、安源工人運動紀念館編，《劉少奇與安源工人運動》，頁215。
16. 黃愛國，〈革命的硬骨頭：記安源煤礦老工人袁品高〉，載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編，《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研究文匯》，頁368。
17. 關於三家村的資料，參見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3: chapter 11.
18. 〈徹底清算劉少奇在安源的反革命罪行〉，載《新北大》第8期(1967年4月25日)。
19. Feng Chongyi, "Jiangxi in Reform: The Fear of Exclusion and the Search for a New Identity,"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s Provinces: Comparative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 ed. Hans Hendrichske and Feng Chongyi (London: Routledge, 1999), 257.
20. 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文化大革命時期」的萍鄉煤礦》，頁436-37。
21. 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編，《萍鄉大事記》(萍鄉：萍鄉市地方誌辦公室，1989年)，頁86。
22. 〈周恩來、姚文元接見江西省四方代表講話記錄〉，載於宋永毅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23. 〈中央首長接見江西四方面代表談話摘要〉(1967年8月3日)，載於宋永毅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24. 中共萍鄉市委黨史工作辦公室，《中共萍鄉黨史大事記》(萍鄉：出版社未知，1955年)，頁179。
25. 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編，《萍鄉大事記》，頁86。
26. 《紅旗》(1967年5月20日)。轉載於李思慎，《李立三紅色傳奇》，下冊，頁297。
27. 同上。
28. 同上，下冊，頁806。
29. 李立三6月5日寫給江青的信收錄於李思慎，《李立三紅色傳奇》，下冊，頁806-9。1970年秋天，《人民日報》文藝部在回覆安源紀念館的詢問中聲稱，他們刊登李立三1963年寄來的電影評論時未作任何刪節或修改。然而，由於按照報社的標準規章並不保留原有手稿，《人民日報》的人員稱無法找到李立三投來的原始稿件。安源紀念館檔案室，檔號A12-27-27(2)。
30. Patrick Lescot, *Before Mao: The Untold Story of Li Lisan and the Creation of Communist China*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4), 327.
31. 李思慎，《李立三紅色傳奇》，下冊，頁817收錄了此信。
32. 李立三的家人堅持說他本人並無自我意願服下致死的過量安眠藥。同上，下冊，頁819-29；Lescot, *Before Mao*, 344-48.
33. 《人民日報》，1967年5月8日、1967年8月5日和1968年4月22日；《解放日報》，1967年8月15日、1968年6月23日和1968年7月1日；《文匯報》，1967年5月21日、1967年8月22日和1968年7月3日。同時參見《解放軍日報》，1967年7月29日，《北京日報》，1967年5月11日，及《江西日報》，1967年10月22日。
34. 楊公敏，〈電影「燎原」拍攝追憶〉，載《劉少奇在上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年)，頁328。
35. 《夏衍全集》，第16卷(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5年)，頁403。
36. 《紅色曙光》第9期(1967年5月11日)。這份紅衛兵報紙是在萍鄉出版的，由萍鄉市圖書館收藏。
37. 《聯司號叫》第10期(1967年9月14日)。這份紅衛兵報紙收藏於萍鄉市圖書館。
38. Ellen Johnston Laing, *The Winking Owl: Ar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68.
39. Julia F. Andrews, *Painters and Politic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7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328. 侯一民回憶說其實這是他第二次被迫對這幅畫作出檢討。第一次是由於油畫的印刷品將原畫的色彩印錯了，他生氣地把油畫的劣質印刷件撕毀。那一次侯一民因毀壞國家主席的肖像畫而被批評是對國家主席不敬。不久之後，當劉少奇被冠上中國頭號走資派稱號時，侯一民被迫第二次寫檢討，這一次是要解釋他當初為何要將劉少

- 奇畫在主要位置。侯一民，《泡沫集》(瀋陽：遼寧美術出版社，2006年)，頁58。
40. 李紹洲，〈我們的「安展」〉。張培森 1963年6月訪談李立三的記錄稿，載《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902-5。
  41. Andrews, *Painters and Politic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338.
  42. 戚本禹，〈七月二十六日戚本禹同志在接見建工學院新八一戰士的談話〉，載中國社會科學院編，《安源工人運動的歷史不容顛倒》。
  43. 這位工人之前曾由張培森和展覽委員會的其他成員聯繫過，通過他得到了總理本人的許可。張培森，〈我所了解的「安展」及油畫「毛主席去安源」的創作〉，載《炎黃春秋》第7期(1998年)，頁32。
  44. 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師範大學和北京礦業學院以及萍鄉和安源當地的造反組織組成的「革命」研究員，在湖南和江西進行了為期兩個月的田野調查。他們的調查成為展覽大部分文字材料的基礎。這些成果在1967年7月油印出版，見中國社會科學院編，《安源工人運動的歷史不容顛倒》。
  45. 李紹洲，〈我們的「安展」〉。
  46. Andrews, *Painters and Politic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338；李紹洲，〈我們的「安展」〉。
  47. Andrews, *Painters and Politic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339.
  48. 同上，頁338-39。
  49. Zheng Shengtian, "Chairman Mao Goes to Anyuan: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Artist Liu Chunhua," in *Art and China's Revolution*, ed. Melissa Chiu and Zheng Shengtian (New York: Asia Society, 2008), 119.
  50. 江青、陳伯達、康生，〈中央文革接見鋼琴伴唱「紅燈記」演員等革命文藝戰士的講話〉(1968年6月30日)，載於宋永毅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51. 《文匯報》(1968年7月6日)。
  52. 引自 Wu Hung, *Remaking Beijing: Tiananmen Square and the Creation of a Political Spa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80.
  53. 《光明日報》(1968年7月12日)。
  54. 《解放軍報》(1968年12月2日)。
  55. 梅方權，《安源礦工：轉型期的變遷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年)，頁58。
  56. Andrews, *Painters and Politic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339.
  57. 黃式國、黃愛國，〈「毛主席去安源」的幕後風波與歷史真實〉，載《南方週末》(2006年4月20日)。
  58. "Picture of Priest in Vatican Is of Mao,"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4, 1969; Han Suyin, *The Morning Deluge: Mao Tsetu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1972), 95.

59. 劉春華，〈歌頌偉大領袖毛主席是我們最大的幸福〉，《人民日報》(1968年7月7日)。
60. 同上。雖然毛澤東來自安源西邊的湖南省，因此指稱工人們面向東方仰望冉冉升起的太陽顯然是一種比喻，而並非單純是文字表面的含義。
61. 雜誌《美術》1964年第1期(42期)上刊登文章，批評侯一民的油畫將礦工們的形象畫得過於一般化，儘管侯一民本人在1961年第4期(21期)上發表文章，說明油畫上有幾位人物的形象是按照現實中數名與劉少奇關係緊密的安源工人的照片畫成的。
62. 關於這次運動的全面研究，參見 Thomas P. Bernstein, *Up to the Mountains and Down to the Villages: The Transfer of Youth from Urban to Rural China*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63. 上海市檔案館，檔號 B105-4-302。
64. Laing, *The Winking Owl*, 69.
65. 張培森，〈我所了解的「安展」及油畫「毛主席去安源」的創作〉，頁 36。
66. 李紹洲，〈我們的「安展」〉。
67. 根據李紹洲的回憶文章，這個展覽原本只分為五個篇章，顯然是由於當時大家認為毛澤東到訪安源一共有五次的原因。萍鄉市圖書館收藏的一份 1967 年 1 月 20 日的紅衛兵傳單「毛澤東思想的光輝永遠照亮紅色安源」中，按時間先後順序羅列了這五次訪問。然而，之後大家又發現毛澤東去安源總共有六次。現今的官方說法是毛澤東從 1921 年到 1930 年期間到訪安源總共八次，儘管所聲稱的某幾次到訪的憑據僅僅是一些可信度相當弱的口述歷史。訪談黃愛國，萍鄉黨校，2009 年 10 月。
68. 哈佛燕京圖書館收藏了這一手冊的六個不同版本，依次來自於從 1968 年到 1969 年期間在北京、廣州、溫州、德州、襄樊以及某一未知地區舉辦的各個展覽。
69. 《從安源到井岡山》(北京：1968 年 7 月)，頁 2。
70. 同上，頁 26。
71. 同上，頁 11。
72. 以頌聖體例來表現毛澤東在安源的故事而產生了一些文藝作品，其中有上海工人革命文藝創作隊編，《紅太陽照亮安源山》(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68 年) 和安源工農兵詩歌編選小組編，《紅日照安源》(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69 年)。前一本書在印刷第二版時達到 30 萬份，不過該書引起了一定的風波，因為此書以劉春華的油畫《毛主席去安源》作為封面，可圖中毛主席的臉上有一些斑點，好似鬍鬚未剃乾淨。上海革命委員會認為這一無禮行為代表着「對毛主席的最大不忠」，於是下令徹查此事。後來調查出的情況表明這些黑點只不過是由複製劉春華油畫所用的木板紋路造成。雖然在第一次印刷時，這些斑點成功地被白色的粉末覆蓋，但是在第二次印刷時，這些粉末已經

- 脫落。然而，在第一次出版時，此書也引起了評議。張春橋批評封面圖片使用的金色油彩並不亮麗奪目，而且過於浮華；於是在第二次印刷時則改用無比至尊的帝王御用的明黃色。上海市檔案館，檔號 B167-3-99。
73. 李思慎、劉之昆，《李立三之謎》(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頁 401。
  74. 中共萍鄉礦務局委員會編，《毛澤東、劉少奇、李立三在安源的故事》(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年)，頁 222。
  75. 紅衛兵手抄傳單(1967年1月20日)，收藏於萍鄉市圖書館。
  76. 《紅安戰報》第16期(1967年6月30日)。此次展覽籌備了一個月，得到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和株洲鐵路技校的協助。
  77. Feng, "Jiangxi in Reform," 257.
  78. 張培森，〈我所了解的「安展」及油畫「毛主席去安源」的創作〉，頁 35。
  79. 黃慰媛、黃愛國，〈毛主席在安源革命活動紀念館興建始末〉，載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編，《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研究文匯》，頁 391-93。
  80. 同上，頁 393-95。
  81. 〈千萬顆紅心向着紅太陽〉，載《解放軍日報》(1968年7月9日)。收錄於《贊革命油畫「毛主席去安源」》(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70年)，頁 57。
  82. 〈毛主席啊！安源礦工永遠忠於您！〉，《人民日報》(1968年7月11日)。收錄於《贊革命油畫》，頁 21-24。
  83. 黃慰媛、黃愛國，〈毛主席在安源革命活動紀念館興建始末〉，頁 395-98。
  84. 蕭建萍，〈都是「燎原」惹的「禍」〉。
  85. 下文內容皆來自《毛主席在安源革命活動紀念館陳列說明(初稿)》(1968年10月10日)，安源紀念館檔案室，檔號 A6/3-29-5。
  86. 圖片的基本情況來自《民國日報》1925年4月29日的一篇報道。其中報道在前一天，漢冶萍煤鐵廠礦公司派來一名日本代表到訪安源，而工人們誤以為他是來解決工資拖欠達數月的問題。當工人們最終發現日本顧問只是來檢查由日本貸款的項目進展情況，並非肩負解決欠薪的職責，他們異常憤怒，於是向包括礦長舒修泰在內的調查隊人員潑了幾桶糞。此篇新聞報道收錄於《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頁 1189-90。
  87. 將劉少奇作為中國工人階級敵人的官方批判，參見《大工賊劉少奇是工人階級的死敵》(香港：三聯出版社，1968年)。宣傳冊的中心文章是1968年11月22日《人民日報》一篇題為「真工賊假領袖」的社論。依據安源煤礦革命委員會，社論批判劉少奇背叛了安源礦工的革命傾向。公安部長康生在中共九大上列舉了劉少奇作為「工賊」的「證據」。參見〈康生在中央直屬機關傳達「九大」大會上解答問題〉(1969年5月24日)，載於宋永毅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88. Lowell Dittmer, "Death and Transfiguration: Liu Shaoqi's Rehabilitatio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 no. 3 (May 1981): 455-80.

89. 《毛主席在安源革命活動紀念館陳列大綱》(1969年12月1日)，安源紀念館檔案，檔號 322-B4-4-26。
90. 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編，《萍鄉大事記》，頁 91–92。
91. 關於林彪事件對安源紀念館的影響，具體情況參見黃愛國，〈9·13 事件前後的安源紀念館〉，載《萍鄉工人報》(2001年9月13日)。
92. Edgar Snow, *The Long Revolution* (New York: Vintage, 1973), 169.
93. 關於林彪事件，參見 Jin Qiu, *The Culture of Power: The Lin Biao Incident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and Frederick C. Teiwes and Warren Sun, *The Tragedy of Lin Biao: Riding the Tiger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71* (London: Hurst, 1996).
94. 「蕭克將軍揭露林彪」，來自〈揭露大叛徒、大漢奸、大賣國賊早年的反黨錯誤和罪行〉(1972年5月20日)，載於宋永毅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95. 陳毅，出處同上。
96. 黃式國、黃愛國，〈毛主席去安源〉。
97. 安源紀念館檔案，檔號 C5-1-8 (1971年7月20日)。張春橋也提到有「一位同志」(推測是江青)提醒主席，可能由於歲月流逝，他也許只是忘了他曾穿着的是文人長袍。
98. 黃愛國，〈9·13 事件前後的安源紀念館〉。
99. 安源紀念館檔案，檔號 329-B4-4-29 (1972年7月1日)。
100. 劉春華，〈也談「毛主席去安源」的幕後風波與歷史真實〉，載《南方週末》(2006年7月27日)。
101. 黃愛國，〈革命的硬骨頭：記安源煤礦老工人袁品高〉，頁 368–69。
102. 毛澤東，〈同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談話〉(1975年5月3日)，載於宋永毅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103. 關於文化大革命對上海工人的影響，參見 Elizabeth J. Perry and Li Xun, *Proletarian Power: 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7).
104. 《「文化大革命時期」的萍鄉煤礦》。
105. 萍鄉礦務局志編纂委員會編，《萍鄉礦務局志》(萍鄉：出版社未知，1998年)，頁 671。
106. 同上，頁 608–9。
107. 同上，頁 558–59。
108. 梅方權，《安源礦工：轉型期的變遷研究》，頁 92–93。
109. 同上，頁 280。
110. 于建嶸，《中國工人階級狀況：安源實錄》(香港：明鏡出版社，2006年)，頁 176–78；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編，《萍鄉大事記》，頁 88–89。
111. 同上，頁 191。

112. 梅方權，《安源礦工：轉型期的變遷研究》，頁 281。
113. 于建嶸，《中國工人階級狀況：安源實錄》，頁 202。作者本人在 2005 年夏、2006 年夏和 2008 年夏，以及 2009 年秋天在訪談安源工人的過程中得到了相似的回應。
114. 1976 年 9 月 12 日，新華社關於毛主席逝世後人民敬獻花圈的新聞報道，來源於宋永毅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115. Kevin J. O'Brien and Lianjiang Li, "Campaign Nostalgia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Asian Survey* 39, no. 3 (May-June 1999): 376-91; Ching-Kwan Lee, "The Revenge of History: Collective Memories and Labor Protests in Northeastern China," *Ethnography* 1, no. 2 (2000): 217-37.
116.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117. Paul Clark,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 Hist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3.
118. Emily Honig, "Maoist Mappings of Gender: Reassessing the Red Guards," in *Chinese Femininities Chinese Masculinities*, ed. Susan Brownell and Jeffrey N. Wasserstro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259. 注意為了使文字更清楚，這段引文中的音譯從威妥瑪式 (Wade-Giles) 拼法轉變為拼音拼法。
119. Clark,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252-53. 女性和男性一樣被要求以理想化的英勇革命戰士為榜樣，那段時期產生的著名革命芭蕾舞劇（後來成為樣板戲）《紅色娘子軍》突出地反映了這一點。
120. 毛澤東號召暴力行動並非只限於言論。兩周之前，北京一所精英女校的學生將老師毒打致死。〈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載《二十一世紀》（1995 年 8 月），頁 36-42。
121. Honig, "Maoist Mappings of Gender," 257.
122. Robert Jay Lifton, *Revolutionary Immortality: Mao Tse-tung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8), 50.
123. 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早期，江青根據自唐朝至明朝的帝國服飾風格為女性設計了一款新的「國服」。Honig, "Maoist Mappings of Gender," 256.
124. Ross Terrill, *Madame Mao: The White-Boned Dem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266.
125. 同上，頁 325。
126. Snow, *The Long Revolution*, 169.
127. *China Pictorial* 9 (1968): 44.
128. Donald E. McInnis, *Religious Policy and Practice in Communist China* (New York: Macmillan, 1972), 338.
129. Liang Heng and Judith Shapiro, *Son of the Revolu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3), 174.

130. Anita Chan, Richard Madsen and Jonathan Unger, *Chen Village: The Recent History of a Peasant Community in Mao's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170.
131. 白霖 (Lynn White) 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推行的各種運動政策、階級標籤、主從庇護主義 (clientelism) 對於促成文化大革命的暴力至關重要。Lynn White III, *Policies of Chaos: The Organizational Causes of Violence in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132. 毛澤東主義和列寧主義對於文化革命 (cultural revolution) 的概念差異，「在塑造蘇聯歷史和中國歷史上並非無關緊要」，參見 Maurice Meisner, "Iconoclasm and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and Russia," in *Bolshevik Culture*, ed. Abbott Glason, Peter Kenez and Richard Stit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5), 279.
133. Jack Belden, *China Shakes the World*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49), 63; Maurice Meisner, *Marxism, Maoism and Utopianism*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2).
134. Emily Martin Ahern, *Chinese Ritual an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106.

## 第七章 革命傳統發生變革

1. Richard Curt Kraus, *The Party and the Arty in China: The New Politics of Culture*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4), viii.
2. Yuezhi Zhao, *Communication in China: Political Economy, Power, and Conflict*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8), 20.
3. Peter G. Rowe and Seng Kuan, eds., *Shanghai: Architecture and Urbanism for Modern China* (New York: Prestel, 2004); and Anne Warr, *Shanghai Architecture* (Sydney: Watermark Press, 2007).
4. 畫完劉少奇的肖像畫後不久，1962 年侯一民又開始繪畫毛澤東在安源的主題，雖然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他才完成創作。侯一民，《泡沫集》(瀋陽：遼寧美術出版社，2006 年)，頁 5–7、58。
5. 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編，《侯一民創作油畫「毛主席與安源工人在一起」美術作品分析》(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1978 年)。
6. 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編，《萍鄉大事記》(萍鄉：萍鄉市地方誌辦公室，1989 年)，頁 103。
7. 中國社會科學院、安源工人運動紀念館編，《劉少奇與安源工人運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1 年)，頁 73–74。
8. 收錄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編，《劉少奇與安源工人運動》，頁 75。

9. 收錄於李思慎、劉之昆，《李立三之謎》(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頁421。
10. 蕭建萍，〈安源又「熱」起來了〉，載《大眾電影》8期(2005年)。
11. 萍鄉礦務局志編纂委員會編，《萍鄉礦務局志》(萍鄉：出版社未知，1998年)，頁713。
12. 同上，頁718。
13. 安源紀念館檔案，檔號577-B4-4-43。
14. 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編，《萍鄉大事記》，頁112。
15. 〈鄧小平為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紀念館題寫館名的前前後後〉，《安源周刊》(2004年8月5日)，A1-2。題字顯然正如館長們長期以來孜孜以求的那樣，成為紀念館的一把保護傘。二十年之後，在2004年8月正值鄧小平百年誕辰之際，紀念館的研究員們稱讚鄧小平的題字令安源的革命歷史「永放光芒」。
16. 《安源路況工人運動紀念館陳列大綱》(1987年11月)。安源紀念館檔案室一份無文件編號的油印文件。
17. 安源紀念館檔案，檔號7-007(1987年7月15日)。
18. 劉家林，〈毛岸青來安源參觀訪問〉，載《萍鄉黨史通訊》第1期(1988年)，頁89。
19. 劉傳政，〈風雨同舟，情感日篤〉，載《萍鄉黨史通訊》第1期(1988年)，頁76-78。
20. 安源紀念館檔案，檔號029(1991年8-9月)。
21. 于建嶸，《中國工人階級狀況：安源實錄》(香港：明鏡出版社，2006年)，頁67。2009年10月作者本人訪問安源居民時，這個謠言曾多次被提及。
22. 劉南方，《東方驚雷》(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2年)，頁2。
23. 為紀念大罷工八十周年，紀念館又一次重新全面佈置展覽，於2002年9月18日向公眾開放。雖然這次展覽沿襲了上一個展覽(1992年)的政治正確性，也仍然籌備了近一年的時間。重新佈置的展覽增加了五十多件新展品，其中包括十九世紀由德國製造的鐵路器材與一個1921年在當地鑄造的鍋爐，以便突出本地為中國現代工業發展作出的貢獻。2002年的展覽按照年代順序將安源的故事分為慣常的六個階段，從煤礦的創建期一直講述到農村根據地的形成，另外增添了新的總結篇，列舉了二十多位從安源工人開始其革命生涯的解放軍將領。《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紀念館陳列內容大綱》(2002年1月11日)，由安源紀念館檔案室收藏的無檔案編號的油印資料。
24. 〈沸騰安源〉，載《萍礦工人報》(2002年9月18日)。
25. Philip P. Pan, *Out of Mao's Shadow: The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a New China*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8), 114-15.
26. 《人民日報》(1979年3月14日)。



27. 關於毛澤東熱，參見 Geremie Barmé, *Shades of Mao: The Posthumous Cult of the Great Leader*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6).
28. 李紹洲，《為了國有資產的尊嚴見證法律的尷尬——參加油畫「毛主席去安源」權益訴訟札記》，參見 <http://lishaozhou417.blog.163.com/blog/static/1266145112010622631193/> (李紹洲的個人博客)。
29. 同上。
30. 關於拍賣和訴訟官司的報道見《南方週末》(2006年7月27日)；人民網 *People's Daily Online* (2006年12月4日)，以及中國新聞網 [www.chinanews.com](http://www.chinanews.com) (2007年10月22日)。
31. 關於中國前衛藝術的全面介紹，參見 Karen Smith, *Nine Lives: The Birth of Avant-Garde Art in New China* (New York: Prestel, 2006).
32. 以油畫《毛主席去安源》為題材而再創作出的這些繪畫和其他一些畫作，以及使用數碼技術改動原畫圖像而創作出的這類作品在互聯網上數量很多。
33. Zheng Shengtian, "Chairman Mao Goes to Anyuan: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Artist Liu Chunhua," in *Art and China's Revolution*, ed. Melissa Chiu and Zheng Shengtian (New York: Asia Society, 2008), 129.
34. 認為今不如昔的這個傾向乃是一種全國性趨勢，在安源格外明顯(可能其他一些因毛澤東的革命活動而聞名的地區也是如此)，他們對革命的懷念之情反映人們對於後毛澤東時代的改革持批評態度。Geremie Barmé, *In the Red: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Lu Hanchao, "Nostalgia for the Future: The Resurgence of an Alienated Culture in China," *Pacific Affairs* 75, no. 2 (Summer 2002): 169–86.
35. 于建嶸，《中國工人階級狀況：安源實錄》，頁 62。
36. 梅方權，《安源礦工：轉型期的變遷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年)，頁 295。
37. 于建嶸，《中國工人階級狀況：安源實錄》，頁 244。
38. 梅方權，《安源礦工：轉型期的變遷研究》，頁 283。
39. 于建嶸，《中國工人階級狀況：安源實錄》，頁 122。
40. 同上，頁 278。
41. 梅方權，《安源礦工：轉型期的變遷研究》，頁 297。
42. 陳海平，〈一年祭〉，網絡博文參見 [http://blog.163.com/c\\_chenhp/blog/static/84340903200851705425685/](http://blog.163.com/c_chenhp/blog/static/84340903200851705425685/)。
43. 于建嶸，《中國工人階級狀況：安源實錄》，頁 45–46。
44. 萍鄉年鑒編委會編，《萍鄉年鑒》(北京：方志出版社，2006年)，頁 116。
45. 《中國勞工通訊》(香港)第 43 期(1998年7–8月)。
46. [www.china-project.com/en-end/july0f.html](http://www.china-project.com/en-end/july0f.html) (瀏覽於 2009 年 9 月)。
47. Pan, *Out of Mao's Shadow*, 114–15.

48. 彙編自數年的萍鄉年鑒。萍鄉年鑒編委會編，《萍鄉年鑒》(北京：方志出版社，2003-2008年)。
49. 梅方權，《安源礦工：轉型期的變遷研究》，頁 301。
50. 同上，頁 287-88。
51. 胡錦濤訪問江西革命根據地的報道，載《人民日報》(2003年9月3日)。
52. Mollie Kirk, "Patriotism for Sale: Communist Apologetics in the Red Tourism Program," senior honors thesis, Harvard University, East Asian Studies, 2008.
53. 紅色旅遊項目在某些方面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在 1989 年天安門事件之後為加強青年人的愛國意識而發動的愛國主義教育的延續。以前的愛國主義運動除了教材改革，還將包括安源在內的一些革命活動地點定為國家支持的學習參觀景點。Zhao Suisheng: "A State-Led Nationalism: The Patriotic Education Campaign in Post-Tiananmen China,"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31, no. 3 (1998): 287-302; Wang Zheng, "National Humiliation, History Educ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ical Memory: Patriotic Education Campaign in China,"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52, no. 4 (December 2008): 783-806; <http://tour.jxnews.com.cn/system/2004/09/17/000730857.shtml> (瀏覽於 2009 年 9 月); [www.jxay.gov.cn/zwdt/show.asp?id=2366](http://www.jxay.gov.cn/zwdt/show.asp?id=2366); [www.jxay.gov.cn/zwdt/show.asp?id=1828](http://www.jxay.gov.cn/zwdt/show.asp?id=1828) (瀏覽於 2009 年 9 月)。
54. 《萍礦工人報》(2004 年 8 月 5 日)。
55. [www.jxgdw.com/jxgd/news/jszt/2006jxhbh/hspx/userobject1ai610374.html](http://www.jxgdw.com/jxgd/news/jszt/2006jxhbh/hspx/userobject1ai610374.html).
56. 《萍鄉日報》(2005 年 6 月 7 日)。
57. 萍鄉市政府，〈萍鄉市紅色旅遊發展情況彙報〉，未出版的資料，來自萍鄉市旅遊局，2007 年 5 月 23 日。
58. 萍鄉年鑒編委會編，《萍鄉年鑒》(北京：方志出版社，2007 年)，頁 243；本文作者在安源紀念館進行的訪談(2009 年 10 月)。
59. [www.jxay.gov.cn/zwdt/show.asp?id+2366](http://www.jxay.gov.cn/zwdt/show.asp?id+2366).
60. 萍鄉年鑒編委會編，《萍鄉年鑒》(北京：方志出版社，2008 年)，頁 146。
61. 2009 年 10 月 29 日本文作者在安源訪問安源區旅遊局局長湯江琦。約有十二部關於安源革命歷史的電影和電視連續劇在安源煤礦實景拍攝。梅方權，《安源礦工：轉型期的變遷研究》，頁 48。最近在毗鄰煤礦之處建成一個長期固定的電影外景地。
62. 于建嶸，《中國工人階級狀況：安源實錄》，頁 116。
63. 同上，頁 212。
64. Anita Chan, *China's Workers Under Assault: Exploitation and Abuse in a Globalizing Economy* (Armonk: M. E. Sharpe, 2001); Pun Ngai, *Made in China: 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65. 《當代中國的煤炭工業》(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9年)，頁 281；《中國煤炭志》(北京：煤炭工業出版社，1999年)，頁 151；《中國煤炭工業年鑒 2008》(北京：煤炭工業出版社，2009年)。
66. 萍鄉年鑒編委會編，《萍鄉年鑒》(2006年)，頁 116。
67. 萍鄉年鑒編委會編，《萍鄉年鑒》(2005年)，頁 126–27。
68. 據萍鄉官方資料，自 2002 年至 2007 年期間煤礦事故造成 124 人死亡。萍鄉年鑒編委會編，《萍鄉年鑒》(2005–2008年)。根據很多來源顯示，實際死亡人數大大高於官方統計數據。
69. 梅方權，《安源礦工：轉型期的變遷研究》，頁 275。
70. 同上，頁 324。
71. 煤礦現今的出產提供中國主要能源需求的三分之二。2005 年中國的煤產量達到 22 億 3 千萬噸，近乎美國產量的二倍，而美國是全球第二大煤產量國。參見 *The Future of Coal: An Interdisciplinary MIT Study* (Cambridge, MA: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007), chapter 5.
72. 張學龍，《安源往事》(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1年)，頁 402。
73. <http://hi.pingxiang.gov.cn/archiver/?tid-316.html>.
74. 劉南方，《東方驚雷》，頁 427–28。
75. 于建嶸，《安源實錄：一個階級的光榮與夢想》(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年)。
76. [www.youtube.com/watch?v=SqN8GevrtDU](http://www.youtube.com/watch?v=SqN8GevrtDU) (瀏覽於 2011 年 8 月 23 日)。
77. 也有其他研究當代中國工人階級的專家研究過這個主題。參見 Ching Kwan Lee, *Against the Law: Labor Protests in China's Rustbelt and Sunbel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Chen Feng, "Privat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in Chinese Factories," *China Quarterly* 185 (March 2006): 42–60.
78. 收錄於于建嶸，《中國工人階級狀況：安源實錄》，頁 411。
79. 梅方權，《安源礦工：轉型期的變遷研究》，頁 88。
80. 同上，頁 274。
81. 同上，頁 271。
82. 同上，頁 272。
83. Mobo Gao, *The Battle for China's Past: Mao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London: Pluto Press, 2008), 198–99.
84. Daniel C. Lynch, *After the Propaganda State: Media, Politics, and "Thought Work" in Reformed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5.
85. 同上，頁 9。
86. 關於明朝文化的商業化的研究，參見 Craig Clunas, *Superfluous Things: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4); and *Empire of Great Brightness: Visual and Material Cultures of Ming*

-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7). 關於政治體系的研究，參見 Charles O. Hucker, *The Ming Dynasty: Its Origins and Evolving Institution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78).
87. Elizabeth J. Perry, "Popular Protest: Playing by the Rules," in *China Today China Tomorrow: Domestic Politics, Economy and Society*, ed. Joseph Fewsmith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10), chapter 1.

## 結論

1. 大家熟知的關於毛澤東的革命本質上是對中國文化進行否定這種論斷，參見 Richard H. Solomon, *Mao's Revolution and the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2. Joseph R. Levenson,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A Tri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3: 115-17.
3. Thomas A. Metzger, "*Transcending the West*": *Mao's Vision of Socialism and the Legitimization of Teng Hsiao-p'ing's Modernization Program*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96), 17.
4. Wu Hung, *Remaking Beijing: Tiananmen Square and the Creation of a Public Spa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Geremie R. Barmé, *The Forbidden C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5. 關於文化大革命的精英政治反映了「傳統」中國政治文化的要素這一論斷，參見 Jin Qiu, *The Culture of Power: The Lin Biao Incident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關於大眾修辭在通俗文化上的起源的討論，參見 Elizabeth J. Perry and Li Xun, "Revolutionary Rudeness: The Language of Red Guards and Rebel Workers in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New Approaches*, ed. Jeffrey N. Wasserstrom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221-36.
6. Timothy Cheek, "Mao, Revolution, and Memory," in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Mao*, ed. Timothy Cheek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25.
7. Guo Yingjie, *Cultural National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Zhao Suisheng, *A Nation-State by Construction: Dynamics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m*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8. 關於民族主義在 1949 年之前的情況的詳盡研究，參見 Chalmers A. Johnson,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Tetsuya Kataoka, *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George E. Taylor, *The Struggle for North China* (New York: AMS Press, 1978).

9. David Holm, *Art and Ideolog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24, 53.
10. “Confucius Statue Vanishes Near Tiananmen Square,” *New York Times*, April 22, 2011.
11. Peter Kenez, *The Birth of the Propaganda State: Soviet Methods of Mass Mobilization, 1917–1929*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6.
12. Jeffrey Brooks, *Thank You, Comrade Stalin! Soviet Public Culture from Revolution to Cold Wa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67.
13. 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載《毛澤東選集》（北京：外文出版社，1971年），頁155–56。
14. Delia Davin, “Dark Tales of Mao the Merciless,” in *Was Mao Really a Monster*, ed. Gregor Benton and Lin Chun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20.
15. Hank Johnston and Bert Klandermans, eds., *Social Movements and Cultur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5).
16. Colin Mackerras, *China’s Minorities: Integra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17. 這並不意味着創造一種新的蘇維埃文化是無用的。可參見 Bruce Grant, *In the Soviet House of Culture: A Century of Perestroika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本書出色地研究了庫頁島上一小群尼夫赫 (Nivkhi) 漁夫積極參與築造蘇維埃文化的情況。蘇聯工人同樣也是這一過程中的重要參與者，有關於此的具體研究可參見 Stephen Kotkin, *Magnetic Mountain: Stalinism as a Civiliz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18. David Brandenberger, *National Bolshevism: Stalinist Mass Culture and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Russian National Identity, 1931–1956*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233.
19. Mark Beissinger, *Nationalist Mobilizat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Stat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51.
20. S. A. Smith, *Like Cattle and Horses: Nationalism and Labor in Shanghai*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 Kataoka, *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Suzanne Pepper, *Civil War in China*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1990); Jonathan Unger, ed., *Chinese Nationalism*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6).
21. S. A. Smith, *Revolution and the People in Russia and China: A Comparative Hist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167.
22. John Fitzgerald, “Nationalism, Democracy and Dignity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in *The Dignity of Nations: Equality, Competition and Honor in East Asian Nationalism*, ed. Sechin Y. S. Chien and John Fitzgerald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93–114.

23. Quoted in Maurice Meisner, “Iconoclasm and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and Russia,” in *Bolshevik Culture*, ed. Abbott Glason, Peter Kenez and Richard Stit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5), 280–84.
24. Alfred G. Meyer, “Communist Revolutions and Cultural Change,” *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 5 (Winter 1972): 345–70; Sheila Fitzpatrick, ed., *Cultural Revolution in Russia, 1928–1931*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8); Alfred G. Meyer, “Cultural Revolutions: The Uses of the Concept of Culture i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Political Systems,” *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 16 (Spring–Summer 1983): 6.
25. Zenovia A. Sochor, *Revolution and Culture: The Bogdanov-Lenin Controvers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 228–29.
26. 同上，頁 229。
27. 《安源煤礦史》(長沙：湖南師範學院，1958 年)，頁 209。
28. Charles E. Clark, “Literacy and Labour: The Russian Literacy Campaign within the Trade Unions, 1923–1927,” *Europe-Asia Studies* 47, no. 8 (December 1995): 1327–41.
29. 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 (1928–1933)，斯大林表示文化革命是通過破除舊的文化權威來樹立新的「無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階級戰爭」。參見 Sheila Fitzpatrick, “Cultural Revolution as Class War,” in *Cultural Revolution in Russia, 1928–1931*, ed. Sheila Fitzpatrick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8), 8.
30.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 (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600–1。
31. Robert Jay Lifton, *Revolutionary Immortality: Mao Tse-tung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8), 156–61.
32. Zhao Dingxin, *The Power of Tiananme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the 1989 Beijing Student Moveme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33. Perry Anderson, “Two Revolutions,” *New Left Review* 61 (January–February 2010): 79.
34. Kotkin, *Magnetic Mountain*, 359–61. 關於俄羅斯人和非俄羅斯人之間的隔閡，參見 Roman Szporluk, *Russia, Ukraine, and the Breakup of the Soviet Union*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2000).
35. 關於二者之間的比較，參見 Jae Ho Chung, “Central-Local Dynamics: Historical Continuities and Institutional Resilience,” in *Mao’s Invisible Hand: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Adaptive Governance in China*, ed. Sebastian Heilmann and Elizabeth J. Per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及 Elizabeth J. Perry, “Sixty Is the New Forty (Or Is It?): Reflections on the Health of the Chinese Body Politic,” in *The PRC at Sixty: An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ed. William C. Kirb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36. Andrew J. Nathan,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Journal of Democracy* 14, no. I (January 2003): 13–14; Teresa Wright, *Accepting Authoritarianism: State-Society Relations in China’s Reform Er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37. Ching Kwan Lee, “What Was Socialism to Workers? Collective Memories and Labor Politics in an Age of Reform,” in *Re-envision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Collective Memories in Reform China*, ed. Ching Kwan Lee and Guobin Yang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158–59.
38. 于建嶸，《中國工人階級狀況：安源實錄》（香港：明鏡出版社，2006年），頁298。
39. 譚庚炳、黃愛國，〈安源精神的繼承和發展〉，載《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研究文匯》，萍鄉市史志工作辦公室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184。
40. 劉建民，〈安源精神是中國革命精神之源〉，出處同上，頁193。
41. Elizabeth J. Perry, “Reclaim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7 (November 2008): 1147–64.
42. 中共審查部門於2010年8月31日寫給雜誌社的一封信件。
43. 劉再復、李澤厚，《告別革命：回望二十世紀中國》（香港：天地圖書，1995年）。
44. Moby Gao, *The Battle for China’s Past: Mao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London: Pluto Press, 2008), 201.
45. Liu Xiaobo, “That Holy Word, ‘Revolution,’” in *Popular Protest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Modern China*, 2nd edition, ed. Jeffrey N. Wasserstrom and Elizabeth J. Perr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4), 315ff.
46. 《南方週末》（2011年3月10日）。
47. Jeff Goodwin, “Is the Age of Revolution Over?” in *Revolution: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ed. Mark N. Katz (Washington, DC: CQ Press, 2001), 276ff.
48. Eric Selbin, “Same as It Ever Was: The Future of Revolutions at the End of the Century,” in Katz, ed., *Revolution: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285–86.
49. Jonas Parello-Plesner and Raffaello Pantucci, *China’s Janus-Faced Response to the Arab Revolutions* (London: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June 2011).
50. Jill Lepore, *The Whites of Their Eyes: The Tea Party’s Revolution and the Battle over American Hist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21.
51. 同上，頁14。





封面

书名

版权

目录

譯序

致讀者

致謝

緒論

1. 革命預演

2. 教導革命：1922 年罷工

3. 中國的小莫斯科

4. 從動員群眾到軍事武裝鬥爭

5. 築造革命傳統

6. 毛澤東最後的征戰：淨化革命傳統

7. 革命傳統發生變革

結論

註釋